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在地、離散與現代性：

從《顯影》僑刊媒介到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考察

Locality, Chinese Diaspora, and Modernity:

Tracing the Emergence of Vernacular Modern Literature

in Quemoy through the Monthly 'Shining'

劉晉綸

Jin-Lun Liu

指導教授：黃美娥 博士

Advisor: Mei-E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August 2025

## 摘要



1992 年金門與馬祖終獲解嚴，1993 至 1997 年金門珠山首開先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因而促使《顯影》在 2006 年重刊。本論文透過媒介研究與文學史研究，以《顯影》為分析對象，藉此考察金門僑鄉的現代性，以及現代文學的起點，同時試圖釐清《顯影》有關在地鄉緣組織、離散僑居群體之間的文化實踐與文學生產情形。本文首先從歷史背景、刊物發展，聚焦於發刊於 1928 至 1949 年間的《顯影》，其主事者的身份與經歷，嘗試勾勒出 1920 至 1940 年代金門知識文化份子的面貌。接著，則是探討《顯影》的現代媒介功能及其社會參與，還有如何受到五四文化的「啟蒙」論述影響，致力於性別、體育、教育、實業改革與傳統風俗等議題，連帶推動在地社會的現代化。最後再以歷時性的視角，對《顯影》的文藝作品進行文本細讀，兼以探討珠山於 1928 至 1936 年間的文教活動與文學創作；並將 1932 年發生的「淡、寒文藝論戰」視為重要事件，指出其中的「文藝實用觀」，引導了「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發展，據此劃分為 1928 至 1932 年的「白話嘗試期」，以及 1932 至 1936 年的「大眾文藝期」。前者旨在抒情言說，反映「戀曲」與「鄉愁」交織的個人主義、主觀主義文學風貌；後者轉向關注鄉土小人物，讓文學承載介入精神與教化意味，展現了現實主義的「文藝大眾化」訴求。大抵，綜合上述多元分析角度，進而呈現了《顯影》月刊之於金門文史的重要性。

關鍵詞：金門文學、《顯影》、僑刊、離散、現代性。

## Abstract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Quemoy and Matsu in 1992 prompted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Jushan from 1993 to 1997,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republication of 'Shining' in 2006. This thesis draws on media studies and literary history to examine the early formation of vernacular modern literature in Quemoy by focusing on 'Shining'—a community journal produced by local diasporic actors in Southeast Asia between 1928 and 1949. It seeks to clarify how cultural practices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emerg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ocalized kinship structures and diasporic identiti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overview of 'Shining', reconstructing the sociocultural landscape of Quemoy's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in the 1920s–40s, by analyzing the identities and trajectories of the journal's organizers, including writers and readers. The second part turns to the journal's media function and its role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exploring how 'Shining' appropriated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to advocate reform in gender norms, education, sports, industry, and folk customs—thereby contributing to broader projects of local modernization.

Finally, through a diachronic reading of the journal's literary texts from 1928 to 1936, the thesis identifies two distinct periods: the "Experimental Vernacular Phase" (1928–1932), marked by lyrical subjectivity and affective expressions of nostalgia and romance; and the "Popular Literature Phase" (1932–1936), which shifted toward realist narratives centered on ordinary rural lives.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1932 literary controversy between editors Dan(淡菊) and Han(寒冰), wherein competing visions of literature's purpose—utilitarian populism versus elitist aestheticism—shaped the contours of Quemoy's emergent modern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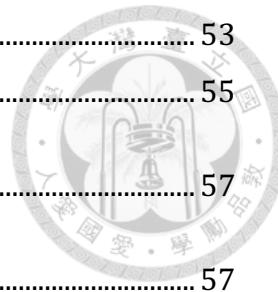
Through this multi-layered analysi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critical role 'Shining' played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local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Quemoy.

**Keywords:** Quemoy literature, 'Shining', diasporic journals, diaspora, modernity.

#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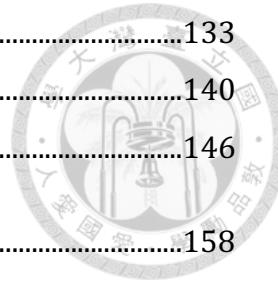


摘要 .....	i
<b>Abstract .....</b>	<b>ii</b>
目次 .....	iii
表次 .....	vi
<b>第一章 緒論 .....</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一、 珠山《顯影》：一份重要的「在地」出土史料 .....	1
二、 重返僑鄉：追索金門「離散」情境的過現未 .....	3
三、 從碉堡、洋樓到報刊：僑鄉「現代性」再探 .....	7
四、 國族與地域：定位於金門的「文學史」構想 .....	11
第二節 前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	16
一、 海外華人、僑鄉與僑刊研究 .....	16
二、 《顯影》相關研究 .....	24
三、 金門現代文學研究 .....	27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理論運用 .....	32
一、 媒介研究 .....	32
二、 現代性 .....	35
三、 離散研究 .....	42
四、 跨國主義 .....	45
第四節 本文章節架構 .....	49
<b>第二章 《顯影》創辦、發展與編投情形 .....</b>	<b>53</b>
第一節 緣起、創辦與重新出土 .....	53



一、創辦及其歷史背景.....	53
二、重新出土及重刊.....	55
第二節 刊物沿革及其迴響.....	57
一、編輯、組織與發刊情況.....	57
二、南洋地區的接受與迴響.....	73
第三節 編輯人與投稿者介紹.....	76
一、薛丞祝.....	76
二、薛永麥.....	77
三、薛健椿.....	80
四、薛崇武.....	81
五、張夢我.....	82
六、顏西林.....	83
七、薛殘白.....	84
小結.....	85
第三章 作為多元媒介的《顯影》.....	87
第一節 跨國／跨地互動的媒介.....	88
一、在地與離散的對話：跨地訊息交流.....	88
二、從鄉訊到僑刊：《顯影》的自我定位和任務.....	92
三、「家」「國」攜手：愛國情境與民族主義的浮現.....	102
第二節 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媒介.....	112
一、教育機構的籌募與倡建.....	113
二、地方開墾的觀點與批判.....	119
三、實業建設的推動與困難.....	123
第三節 新文化與新思想的媒介.....	133

一、文化與思想的變遷：對舊社會與舊慣的批判 .....	133
二、戀愛與自由的追求：從婦女議題到婚姻儀式 .....	140
三、打造良好公民身體：教育與體育運動的推廣 .....	146
小結 .....	158



## 第四章 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顯影」..... 162

第一節 文學活動及文學生產的社會環境因素.....	165
---------------------------	-----

一、從「珠小校友會」所帶動的文教風氣談起.....	165
二、現代「新劇」與傳統「南曲」的文化實踐.....	169
三、實用書寫方式的引入：白話字學院.....	173

第二節 1928-1932：白話文學的嘗試與摸索 .....	174
--------------------------------	-----

一、離散情境中的詩歌書寫：新、舊詩的並存與過渡 .....	175
二、戀曲與鄉愁的交織：從白話散文與小說的嘗試談起 .....	180
三、淡、寒文藝論戰評述：在地化與理念化的觀點激盪 .....	196

第三節 1932-1936：文藝大眾化的推廣與實踐 .....	208
---------------------------------	-----

一、淡、寒論戰遺緒流衍的「現實主義」文藝觀 .....	208
二、如何大眾？——從《顯影》「雛燕」欄談起 .....	219
三、怎樣鄉土？——論《濯巖》的實踐及其意義 .....	222

小結 .....	234
----------	-----

## 第五章 結論 ..... 239

### 參考文獻 ..... 246

附錄一 淡菊〈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	258
------------------------	-----

附錄二 寒冰〈片言〉.....	261
-----------------	-----

# 表次

表一：《顯影》卷期、發行時間、欄位及重刊後頁碼..... 61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珠山《顯影》：一份重要的「在地」出土史料

那是 1996 年春日裡的一天，時任金門珠山薛氏宗親會理事長的薛芳千先生接到了來自宗親薛永順的來電通知：薛氏姻親顏西林先生要將《顯影》月刊完璧歸「薛」，請儘速面洽顏公館。到場後，當薛芳千目睹那厚達尺餘，兩塊木板上下相箝，以繩綑縛的《顯影》時，心中頓時感慨掀湧：他自幼生長於珠山四十載，卻從來不曾聽聞什麼《顯影》月刊。<sup>1</sup>此時，讓我們試將 1996 這一年放回戰地歷史的時間表，方能感受那個年代，仍舊處於夜盡天明的氛圍中——金馬地區方才掙離戰地政務的五指山，<sup>2</sup>在那甫獲鬆綁的四年裡，金門人終於有機會票選縣長，島上唯一的「尚義機場」也正式啟用，自此，金門人終於不需再背負太多顧忌，而終於得以述說曾被封印的故事，解放曾被噤聲的島嶼。<sup>3</sup>我們或許可以說，當《顯影》真正還給珠山的那一刻，僑鄉奮鬥的血淚歷史，也在同一剎那還給了金門。

距離上述這段令人格外感動的一幕，業已渡過將近三十個年頭，此刻的《顯影》已成為金門文史專家與愛好者潛心研閱，作為認識金門民初（1920-40 年代）僑鄉歷史的必讀之物。時間撥回 1990 年代的珠山，當處於臺灣「社區總體營造」與「地方學」遍地開花的時間點，在陳其南、翁徐得、夏鑄九、楊天厚、林麗寬

<sup>1</sup> 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頁 241-242。

<sup>2</sup> 1992 年，金門、馬祖正式終止戰地政務實驗——亦即「金馬解嚴」——從此，各式各樣在文化、政治、歷史記憶的緊縮狀態，如獲鬆綁。

<sup>3</sup> 可參考楊樹清以「長期戒嚴軍管下的文化覺醒」作為標題，所述自 1995 年始，由金門縣立文化中心號召的「金門學叢刊編輯委員會」之緣起：由龔鵬程、楊樹清、陳水在等人所發起的「金門學」，盼以區域史為出發點，嘗試喚起學者研究金門的風氣。楊樹清，〈閱讀金門學：緣起、架構、發展、影響與深化〉，收錄於陳奇中主編，《金門學概論（增修版）》（金門：國立金門大學，2022），頁 3-8。

等人的推動下，珠山在 1993-1997 年推行了金門首開先例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最終輯成《中華民國八十六年金門縣珠山社區總體營造采微成果專輯》，內容包含對珠山風俗、地理、歷史、人文、風水、宗族、教育、信仰等在地知識的深入考掘。<sup>4</sup>且看《珠山社造專輯》當中一段針對珠山交通情況所做的耆老口述訪談：

珠山臨海，早期海運應該特別發達吧？

「金門因四面臨海，在與大陸還有往還期間，海運確較發達，也由於鄰近大陸的地緣關係，與大陸的通往自然較台灣多。我到廈門讀書期間，寒暑假皆坐船回珠山，碼頭即在今日金門中學側邊『華僑之家』之下，謂之『同安渡頭』，當時的交通船稱『金星輪』，為新加坡金門會館所捐獻，坐一趟船要兩角錢，費時四個鐘頭之久。」（按：為薛崇武答）

……根據《金門縣志》（民國八十一年版）頁一〇九九所言：「港灣井虎垵，位珠山東，蔽西南風，潮高一丈，可泊小舟。」當知珠山早期的海運，近有井虎垵，可往鄰近海域；遠有同安渡頭，可往同安縣城，交通不可為不便捷。<sup>5</sup>

在上述這段問答中，我們可看出訪問者在進行訪問前所做的歷史功課，其亦順勢地提出了關乎「海運」的問題。然而縣志中所提到的「井虎垵」，或曰在清季以前的珠山歷史扉頁中曾經佔據一角，實際上，在金門廿世紀的歷史現場中，它幾乎鮮為人知，故此處耆老侃侃所答之物，反倒才是一份熱騰鮮活的歷史記憶。有趣的是，在這份名為「珠山社區」的交通歷史口述訪談錄中，自同安渡頭搭乘由新加坡金門會館捐獻金星輪的故事，卻不僅僅是珠山耆老薛崇武先生的青年記憶，而是著實反應了民初僑匯資源管道對金門公共海運設施的影響，這是一

<sup>4</sup>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金門縣珠山社區總體營造采微成果專輯》以下簡稱《珠山社造專輯》，參見林麗寬主編，《中華民國八十六年金門縣珠山社區總體營造采微成果專輯》（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06）。

<sup>5</sup> 林麗寬主編，《中華民國八十六年金門縣珠山社區總體營造采微成果專輯》（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06），頁 20-21。

段所有民初金門出外打拼者的共同記憶。

從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的角度而言，同安渡頭即是民初時代珠山與金門共享記憶的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而使此一空間產生具有地方感（sense of place）意涵的，則是民初僑鄉的現代化歷史。由是，珠山社區總體營造的實踐，不啻深化了珠山地方的社區意識，也有助其集體認同的建構，並在珠山與金門作為共同的「意義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之間建立起「在地性」（locality）。<sup>6</sup>據社會學者楊弘任所言，「在地性」的概念界定，乃透過與各種不同的外來力量對比的狀態來成立，當對比之尺度調整，在地性意涵亦隨之而變。換言之，在地性的邊界與尺度充滿彈性，於在地性的邊界內，有其共享知識與實作傳統，是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也有其共同倫理與公共參與傳統，是為「在地範疇」（indigenous category）。在確立我群社會認同邊界的前提後，社區總體營造即可以文化轉譯的態度與方式，加入專家知識的藉助，並在地方居民的自發參與下，形塑新型態的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也深化其在地性，以此修補被高度都市化進程所衝擊的，失卻特色與活潑個性的地方聚落。<sup>7</sup>如此而言，利用在地性概念可伸可縮的彈性，我們得以透過對珠山的理解來回瞰全金，此時，在地性的邊界也隨而自「地方」拉伸至「全島」甚或「全縣」。

## 二、重返僑鄉：追索金門「離散」情境的過現未

珠山與全金共享的近代僑鄉歷史，當溯源於金門位處福建東南沿海的地理位置：金門乃遭受海盜侵掠滋擾的重災區，兼之以土地貧瘠、水源不足，出外謀生遂為許多人的不二之選，而金門也成了閩粵沿海地區衆多僑鄉之一。金門

<sup>6</sup> 參見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5-21；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17-26。

<sup>7</sup> 楊弘任，〈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第 49 卷第 4 期（2011.12），頁 5-29。

出洋的第一人始於何時，目前並無確切說法，不過據金門史地專家江柏煒所考，歷史上的金門主要經歷四次的海外移民潮，首次集中於 1860 年代，時值《北京條約》開放華工合法化；第二次則在 1912-1929 年間，該時新政權甫成立，全中國正經歷軍閥混戰的動盪，加之以南渡交通的便利，以及南洋地區優於中國的治安水準，大批青壯人口於是外移；第三次乃因 1937-1945 日軍攻佔金門，有能力的金門人為避禍而紛紛「走日本手」；第四次則發生於 1945-1949 年間，因僑民不願返鄉被徵兵，遂不敢回國，自故鄉南逃者不在少數。<sup>8</sup>

而座落於金門島西南方雞庵山麓，舊稱「山仔兜」的珠山，是金門出洋發展風氣甚為興盛的村落之一，據統計，1935 年村總人口估計為 842 人，僑居人口約 318 人，佔四成一，<sup>9</sup>造成此項統計比例如此高度的起源，可按二說：

一為薛東翰（20 世）於咸豐十年（1865）年往馬尼拉經商，並在當地開枝散葉。一為清咸豐、同治年間（1850~1875 年），薛氏族人因參與廈門木山薛姓及殿前陳姓之械鬥，獲知「往呂宋（菲律賓）經商可致富」的消息……自此，薛氏在菲律賓經商致富而匯僑資回鄉……。<sup>10</sup>

隨著珠山子弟大量移入南洋地區，僑居地與僑鄉之間的聯繫勢在必行，於是，金門珠山搭上了中國僑鄉在 1920 年代大量發行僑刊的順風車，<sup>11</sup>《顯影》終於 1928 年 10 月問世，停刊於 1949 年 5 月。在那個郵務不便的年代，《顯影》月刊在金門編輯與印刷，發送到星、馬、印、菲等僑居地，提供金門當地與僑居地之間的連結，並報導鄉聞、金門見聞、海外僑鄉事蹟與僑居地等訊息，讓洋客

---

<sup>8</sup> 江柏煒，《新加坡的出洋客》（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1.12），頁 11-13。

<sup>9</sup> 袁興言，《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07），頁 4-19。

<sup>10</sup> 袁興言，《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07），頁 2-4。

<sup>11</sup> 詳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對「僑刊興起」的回顧，以及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1-147.

及鄉人了解彼此動態。<sup>12</sup>

除此之外，《顯影》也大量記載了有關金僑生活境況與的評議性文字，且看發表於《顯影》中的一篇社論〈洋客〉：

金門這個地方，雖不夠算得多麼寬，多麼大，……，近年來雖這麼經營，這麼擴張，結果又是如此如此，全無發達之可言，……因此遂致一般生不得死不能的窮漢子，……步出金門而飛也似地一直翻到南洋掘金去了。……哎，到了現在，那裡能夠知道南洋的金礦，已不單讓我們華僑採掘了，不但是洋鬼子，就是連那些渾渾噩噩的吐番兒，也已不像先前那樣的可欺了，他們不僅是自己覺悟起來，力求進展，一步連和一氣，像我們華僑進攻，而更要下逐客令了！！！<sup>13</sup>

這則刊登於 1928 年 12 月《顯影》的社論，先是描繪了金門洋客的出洋原因乃出自故鄉的「不發達」，接著展示了帶有傳統中國華夷意識的優越感，最後描繪了土生異族群體（indigenous community）的反抗。<sup>14</sup>

而另一首刊於同期，題為〈洋客苦〉的古典詩，則以濃縮的語言繪製了一幅具象化的離散情境：

別鄉離井最愁腸，野店荒村當賤庸；鏡破梅妝辛苦甚，隴頭雲海只為窮。

---

<sup>12</sup>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 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第 17 卷 1 期 (2005.03) ，頁 175。

<sup>13</sup> 穎顯，〈洋客〉，江柏煒編輯，《顯影 (Shining) 》第一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101-102。筆者按：此處為本文引用《顯影》之第一註腳，其頁碼對應至由江柏煒編輯重印之《顯影 (Shining) 》（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而自本註以降之所有註腳，蓋一併比照本註辦理，特此。

<sup>14</sup> 如同孔復禮所述，中國海外僑民趾高氣昂的民族自豪感，刺激了周遭異族對華人的反感，最終不可避免的則是排華運動的萌興，這種因著民族主義而產生的論述，將於第三章進行更詳細的說明；詳參孔復禮（Philip A. Kuhn）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新北：臺灣商務，2019），頁 367。



在這首小詩中，離鄉背井之所以令人愁腸百結的原因來自於「當賤庸」的悲哀，事業有成的洋客經驗固然是為人津津樂道的佳話，事實上在出洋謀生的「洋客」中，能「衣錦還鄉」之人並非多數，正如金門傳統俗諺所云：「六亡、三在、一回頭」。在重商邏輯高度運作的南洋資本主義社會中，「經商」幾乎是唯一致富的路不過，華人僑商組織的潛規則中，其實存在著高度依賴親情紐帶的運作模式，<sup>16</sup>於是那些不得其徑的移工／移民，大多數被迫成為原物料開採、重物搬運等無技術的廉價勞工（coolie）。在《顯影》中，這類「出洋不利」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有人出洋不久旋而返鄉務農，<sup>17</sup>卻在故鄉體驗到稼穡艱難的灰心後，不得已而選擇「重渡異域」。<sup>18</sup>《顯影》中不乏關乎這類生命情境的文學描寫，如南渡新加坡的知名報人薛殘白為鼓勵因失利而返鄉的友人所作的新詩〈給侯君長樂〉，<sup>19</sup>或是《顯影》主編澤人（薛健椿）在其具有自然主義色彩的短篇小說〈露絲和她的女兒〉中所刻畫的家庭悲劇，這些為生存而一再跨洋奔波的生命際遇，充滿著輾轉而輪迴、可歌與可泣的辛酸。<sup>20</sup>

對這些離散情境（diasporic condition）的考察，是《顯影》中提供我們重返金門僑鄉歷史的重要線索。時至今日，「出洋客」的歷史，貌似已在「新金門」的記憶中淡去，但無論是「僑鄉文學」作家黃東平、寒川等人筆下那遠道而來的

<sup>15</sup> 照，〈洋客苦〉，江柏煒編輯，《顯影（Shinning）》第一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104。

<sup>16</sup> 如以地域方言群為分類標準的「幫」、「商會」等組織；詳參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新北：臺灣商務，2019），頁 244。

<sup>17</sup> 〈實務農好〉，載於《顯影（Shinning）》第一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113。

<sup>18</sup> 〈重渡異域〉，載於《顯影（Shinning）》第九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2121

<sup>19</sup> 《顯影（Shinning）》第四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787-788。

<sup>20</sup> 《顯影（Shinning）》第九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1987-1988、2113-2115、2141-2143。

原鄉情懷，還是旅臺作家吳鈞堯散文作品中對金門昔果山的追憶，對所有「生活在別處」的金門人來說，何嘗不是同一種鄉愁、同一份思念？換句話說，金門作為「僑鄉」的情感結構，無論追溯到什麼樣的年代，都應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肇此，本文探索金門僑鄉歷史記憶的「過去」，正希望能與「當今」仍然作為大量青年移出地區的金門有所對話，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離散金門人能繼續透過僑鄉歷史的敘事找回自己，回到那個不曾停止召喚記憶的故鄉。

### 三、從碉堡、洋樓到報刊：僑鄉「現代性」再探

金門除了以「僑鄉」著稱，另一個難以撕去的標籤，或曰是難以擺脫的歷史記憶，恐怕非「戰地前線」莫屬了。從這兩個定位金門的名稱，不難聯想此近百年來的歷史中，金門業已歷經了兩次不同時空、不同來源、不同脈絡的現代化進程，其內容分別為民初僑鄉社會曾經推動的現代性，與冷戰時期的「軍事化現代性」（militarized modernity）。此二種現代性為金門所帶來的社會文化變遷不可不謂深遠，並且有著相同的特點：皆與戰爭狀態、歷史動盪，與小島複雜的身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自千禧年到來，戰時弩張的對立竟已演變為今日頻繁的交流：當小三通以象徵和平的姿態駛入金廈水道，兩岸（當然指的是臺澎金馬）人民也從彼此曾經的看似陌生，到今天的唇齒亡寒。此際，小島金門再度以一個微渺又擺盪的姿態，夾處生存在世界強權博弈與地緣政治之間，折衝樽俎，自是平添了更多自我定位的難度。此間，後冷戰時代到來，面臨著中國愈發強勢的經濟，隨之而來的「小四通」（指與對岸通水、通電、通橋、通天然氣），是否會成為另一種如履薄冰的「現代性」——勢必帶給金門更多的政治齟齬——而究竟是拒是迎，乃至於如何協商，至今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不得不面對的擺盪中，欲尋找一個可供安身的支點，則回返「現代性」的學術研究框架，或能突破區域／邊陲的桎梏，對金門歷史提出具有解殖意味（sense of decolonization）的敘事方案。

是以，本文對於重返僑鄉現代性的探討，若回到另一種視角，<sup>21</sup>或可參考 1990 年代「後殖民」被引入臺灣文化學術界，用以支撐本土論述的，一系列建構「臺灣主體性」的知識論。<sup>22</sup>千禧年，作為後殖民研究主旋律的「現代性」知識論步趨在後，一時，臺灣文史學界對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為主題的研究趨之若鶩，旨在衡日治時期作為軍國主義治理手段的現代化進程。事實證明，殖民現代性的研究在贖回臺灣主體聲音、臧否歷史功過等訴求上頗有佳績，可是位於海峽彼端，被視作「地方」(region)、前線或邊陲的金門，因在常民、社會、文化、政策、制度等歷史脈絡上與臺灣「本島」(main island) 長期有別，是以沒福與臺灣共享這一份「佳績」。<sup>23</sup>歸根結底，所謂的「金門學」，終究有別於臺灣「地方學」的內涵，因為兩地所謂的「本土」根本不是同一塊地方，自是難以共構出同源一轍、同島一命的社會情懷與地方意識。<sup>24</sup>

事實上，以金門為主軸、帶有後殖民思考的「現代性研究」，早已有許多關注國際冷戰架構的研究者潛心投入，其犖犖大者，可參考江柏煒與宋怡明對於「冷戰下的金門」之研究：他們皆曾定焦於軍事管制時期的金門，審視其軍事化

---

<sup>21</sup> 在 Couze Venn 的〈現代性、現代化與後殖民的當下〉一文中，即以後殖民主義的框架重新考察自十五世紀歐洲開啟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伴隨著歐洲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一起向全球各個角落擴張的西方現代性及其問題，其討論內容包含「文明化使命」、「啟蒙運動」、「帝國治理」、「殖民地的接收情形」與「另類現代性」等課題，詳參 Couze Venn 著，謝明珊譯，《後殖民的挑戰：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1.05)，頁 61-112。

<sup>22</sup> 邱貴芬，〈薩伊德逝世與台灣後殖民思潮〉，收入於靜宜大學中文系主編，《2003 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頁 90-93。

<sup>23</sup> 江柏煒進一步解釋了這個事實對金門與臺澎兩地所造成的矛盾與隔閡，此節錄如下：「另一種矛盾的身分是金門人在臺灣本島的處境。金門人並沒有和臺灣與澎湖群島一樣有著日本殖民時期及其現代性歷程，1937-45 年間的日本軍占時期對金門及其海外社群來說，並非正面的歷史記憶。因此，以臺灣為本體的(狹義)近代歷史敘述，對金門人來說沒有感同身受的說服力。」詳參江柏煒，〈臺灣海峽的關鍵島嶼：金門及其現代史的啟示〉，《展望與探索月刊》22 卷 5 期 (2024.05)，頁 55-56。

<sup>24</sup> 李鴻駿認為，根植於臺灣的「地方學」是 1990 年代三種思潮（對本土歷史的關懷與重視、社區總體營造的興起、政府文化機構的變革）匯集而成的產物，而「金門學」實際上有著「借鑒於『海南學』」的背景，故其所謂的「本土歷史的關懷與重視」不只與臺灣大相逕庭，更是在「厭臺情結」下展開。詳參李鴻駿，《浯島在他方：金門學的「協商政治」與文學建構》(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頁 4。

現代性（militarized modernity）的軌跡；而透過集體記憶政治的考索，宋怡明與江柏煒不約而同地檢討了冷戰時期的現代化進程對在地的文化社會所造成的扭曲，<sup>25</sup>並重新批判反共愛國話語與國族主義怪獸，是如何將「戰地」、「前線」等標籤牢牢地貼附於金門，迫使其加入「犧牲的體系」（the system of sacrifice）。<sup>26</sup>此外，為了撕下金門身上的戰地標籤，江柏煒呼籲以金門在地社會為主體，通過不以臺海兩岸為標榜的史觀界域——世界史、地域史——進行深入、反覆的討論與辯證，期待金門有一天終於能走進「後戰地」（post-war）。<sup>27</sup>肇此，軍事化現代性作為後殖民方法的金門研究，在「冷戰」作為研究範疇，業已透過各種新史料，舉凡口述歷史、檔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或重探其軍事現代化之軌跡，或重述「民間社會集體記憶」的內涵，此一實踐，誠已深刻地反省出金門作為「邊陲」、「前線」時，一路走來的不察與未察。

當後殖民式的關懷踅過碉堡，繞回洋樓——彷彿穿越冷戰歷史迷霧，返還民初僑鄉文化視野，此際，江柏煒曾以「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為題，探討金門華僑商紳對地方社會的公共建設成就，考察他們如何引入一種混雜華人傳統與西方殖民風格的現代性。<sup>28</sup>江氏的研究大量參考了《顯影》史料，實有助於還原與分析 1920-40 年代金門現代化過程的社會內部風貌。不過其所指出的，華僑商紳所建立的「混雜的現代性」乃多半體現於制度層次——教育啟蒙、實業發展、公共衛生與環境景觀等公益事業，以及物質層次——洋樓民居建築的移植與轉化，並明確地指出：該種混雜現代性乃出自民間華僑基於樹立權威而有意識的學舌（mimicry）過程；只是，一來受限於資本來源（僑匯）輸入的不穩定性，二來由於該過程終究並非由「地方社會內部」所推動，故不免在

<sup>25</sup> 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07），頁 66。

<sup>26</sup> 有關冷戰金門被壓抑的戰爭歷史，以及如何重新陳列、規劃一個可反省的歷史敘述空間，可參考江柏煒，〈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 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收錄於《民俗曲藝》第 156 期（2006），頁 85-15。

<sup>27</sup>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頁 210-214。

<sup>28</sup> 參見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文化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收錄於《民俗曲藝》第 174 期（2011），頁 185-257。

幾番戰亂（包括 1937 年日軍對金門長達八年的佔領以及 1949 年以後國民黨對金門實施的軍事控管）的影響下中斷。總括江氏對二十世紀初期金門所鑄定之「現代性」知識論，很可能使僑鄉本質被迫導向單一的結果：「以華商資本為本質的現代化進程往往在戰亂中暴露其『易斷裂』之特質。」正如該文總結道：

華僑與地方知識分子透過僑刊的發行，以殖民現代性為範型，期待社會進一步與經濟繁榮。但他們推動的混雜現代性，卻是一種去政治的、去脈絡的殖民現代性之挪用，聚焦於西方物質文明的集體想像、仿效及複製，而缺乏了現代性概念在西方社會脈絡的意義之理解，也缺少對於殖民主義的質疑與批判。因此，這種西方物質文明的學舌，隨着僑匯的式微而曇花一現。這可謂之為混雜現代性的侷限。雖然如此，透過人員、物質、思想的跨境流動，還是使地方社會擁有一種歷史上少有的開放性，華僑在僑鄉所扮演的公共角色仍然值得高度肯定。……因為混雜現代性以海外華僑為主體、物質文明為主題，讓它陷入一種歷史的侷限性，未能使得僑鄉社會發生更深層與深遠的變革。<sup>29</sup>

該結論意味著，當 1949 年 10 月隆隆的炮聲為金門的烽火歲月揭開帷幕，混雜現代化的社會進程是亦戛然而止，換句話說，「『現代』已隨華僑去，此地空餘『舊洋樓』。」無獨有偶，東亞近代史研究專家川島真，同樣透過《顯影》、《正氣中華》與國史館檔案的考察，也指出僑匯在冷戰軍事基地建設體制（事實上金門在該時期仍舊面臨「熱戰」）下的似續若斷，使金門現代性的系譜在「僑鄉現代化」與「軍事化現代化」之間產生「巨大的斷絕性」。<sup>30</sup>

那麼，除了借道於縱時性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探索以刨根，此處是否可以藉助另一種人文研究的形式來重返？換言之，當江柏煒以「混雜現

---

<sup>29</sup> 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文化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收錄於《民俗曲藝》第 174 期（2011），頁 230。

<sup>30</sup> 川島真，〈金門的軍事基地化與僑鄉因素的變遷：1949 年前後的連續與斷絕〉，收錄於楊加順總編，《2008 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烽火僑鄉、敘事記憶——戰地、島嶼、移民與文化》（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8.11），頁 207-220。

代性」啟開了一種對華僑商紳從「南洋」吸收並引進「西方」的「洋式」文化、物質資本的本質化思考，那麼，此處是否可能再探僑鄉視閾的地方知識份子對「五四」啟蒙資源的挪用與學習、<sup>31</sup>愛國與民族主義視野中地方社會的塑造心態，並重新評估他們在利用「報刊」媒介所進行的公共文化實踐時所受到的文化來源，以及再思他們的認同政治？

#### 四、國族與地域：定位於金門的「文學史」構想

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重要的發軔點，其時進入中國的西方思潮除了胡適引進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以及醞釀中共崛起的馬克思主義，另一種思潮則為講求在民主制度基礎上糅合社會主義經濟平等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sup>32</sup>它們的影響，著實體現在《顯影》裡星散的報導、評議與文學作品之中。而除了大量西方文化營養的吸收，近代中國知識文化社群的思想文化與學識養成，事實上保持了一定的傳統烙印，另，在不靖與內外交迫的民初歷

---

<sup>31</sup> 一般學者所認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時代區間乃橫亘於陳獨秀創刊《青年雜誌》之 1915 年，並結束於 1927 年的「四一二大清黨」、南京政府之所成立。在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那些搖旗吶喊的「青年們」鎖定之鵠的在於「國民性的改造、舊傳統的摧毀」，但正如同李澤厚在其《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所揭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開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是以，這段歷史預示了瞿秋白於同年在「八七會議」所指出的「新時期必須將民衆武裝起來暴動」，也促成了往後中國文藝運動的左右分裂。本文所提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於 1915-1927 年，乃參考重要學者林毓生的分期方式。另，周策縱在其 1970 年代（恰恰銜接其時中國文革的動盪時代）所撰寫的《五四與中國》，則將所為之「五四時代」定界於 1917-1921 年，另又將發生於 1919 年的五四事件作為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亦即在「五四」以前（應即為 1915-1919）的主要特徵是「一些新起的知識分子集中精力，以他們的思想來感召學生和青年」，而在「五四」後，則起於愛國、排外等心理，以學生「成為主力，發動對中國傳統和守舊主義的全面攻擊。於是活動範圍已超出純粹思想界以外了。」詳參林毓生著，楊貞德等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新北：聯經出版，2020.09），頁 17-25；周策縱等著，《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05），頁 17；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0.08），頁 6、202-203；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207-231。

<sup>32</sup>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211-212。

史中，又展現了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sup>33</sup>這樣的知識結構與文化型態，與成長於金門傳統書塾，薰陶於廈門、南洋西式教育的珠山及金門的在地知識份子若合符契。是故，民初金門在文化意義上的現代性實踐與過程，除了應置於僑鄉文化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feeling）來探討，當中所關涉的文化啟蒙意識及其源流，則應收歸於近代中國啟蒙時期的視野。順是，本文將從報刊研究的進路，討論啟蒙話語對金門民初地方知識份子文化觀念的形塑，並針對《顯影》所紀載的大量文章進行細緻性考察，旨在探討他們如何形塑與再現當時的文化尺度與社會情境。

不過，這一批星散於《顯影》中的文字史料，除了有助於帶領我們重返民初金門的歷史現場，從「文學」的角度視之，其實也有助於我們勾勒民初「金門文學史」的樣貌。誠如克朗（Mike Crang）所言：「文學是個社會媒介。人群與時代的意識形態及信仰，同時塑造著這些文本，又為其所塑造。」<sup>34</sup>一個時代的文化知識型（episteme）或典範（paradigm）建構，與文學觀念的養成及創作成果是密不可分的；而共享著同一套文化知識體系的不同「區域」，則因著地域性的差異，而有了各色之變異。有關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與金門現代文學的關係，可參考作家黃克全所云：

金門建縣在民國四年，金門的現代文學不妨也從五四開始算起。五四運動啟動了新文學，當局教育部發行國語注音辭典、公佈小學國文課程改成國語等等措施……，白話文文學遂全面興起，全國響應，金門雖偏居一隅，也不例外。島鄉傳統文學典型漸遠，五四以降這一段期間的白話新文學，在金門島上也自有一番榮景。<sup>35</sup>

這段引文名曰〈金門現代文學芻議〉，帶有金門文學史建構的關懷，除了提及現

<sup>33</sup> 參考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頁1-2。

<sup>34</sup>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76。

<sup>35</sup> 黃克全，〈一座島嶼的滄桑與現代——金門文學芻議〉，《國文天地》第34卷第2期（2018.07），頁14。

代文學的起源問題，亦指出方興未艾的「金門學」研究重「史」輕「文」的病灶；《金門學叢刊》雖輯有歷史、地質、建築、社群、民俗、語言、戰爭、古蹟、田野檔案、民間戲曲、傳說……等範疇，看似體系宏大，純文學的討論卻往往寂寂無聞，推其所由大略有三：一、金門自古「逐利」的民間性使純文學創作在當地被視為雕蟲小技；二、在戰地政務的陰影下，純文學的命脈「若續還斷」；三、有鑒於宗族文化與地域史學多半旨在建立一套齊一的、可共享的文化歷史記憶，由是造成了文化創造生產力的萎縮。<sup>36</sup>上述，皆是筆者在定位金門「文學史」構想之際，不可不慎之處。

目前對於民初時期的金門現代文學，包含作家、作品、文學團體以及歷史風貌等，在前行研究上力尚未逮，是本文期待能夠拓展的方向。肇此，本文欲拈出金門文學「現代性」，並探取地方知識份子的「白話文學書寫實踐」，以鉤索金門現代文學的起點。在一般常見的中國「新」文學史知識體系中，「白話文運動」好似在胡適 1917 年《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降，文言文就此成為一個歷史的幽影。之所以存在著這塊誤區，乃往往因研究者僅將眼光放在「新文學作品」、「現代文學作品」中所致，放眼文學史，這種錯判甚至發生於歷史見證人本身。

胡適在其〈中國新文學大系·理論建設集·導論〉中曾言：「在那二三十年中，古文家力求應用，想用古文來譯學術書，譯小說，想用古文來說理論證，然而都失敗了。」<sup>37</sup>文學史研究者胡全章對此評述道：

以文言和白話判定文字文學之死活，並不符合這段文學歷史的實際情況。

且不說晚清時期文言詩文始終占據社會文化優勢地位，即便是到了 20 世紀 40 年代，文言文在政界、文化界和社會上依然有著強大的勢力，政治性報刊、綜合性報刊、政府公文依然是文言的重要勢力範圍，《大公報》

<sup>36</sup> 黃克全，〈一座島嶼的滄桑與現代——金門文學芻議〉，《國文天地》第 34 卷第 2 期（2018.07），頁 12-13。

<sup>37</sup> 胡適，〈建設理論集·導言〉，收於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5），頁 5。

等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型日報的新聞通訊稿和社論文章仍然采用改良文言，應用文依然主要由文言來承擔。<sup>38</sup>

《顯影》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迴響，以其大量的白話文學的積極實踐，使其躋身於一個可供考索金門現代文學的起點，但觀其報導文章、應用文體，卻又如胡全章所說的，「主要由文言來承擔」，這不啻能夠映照出《顯影》新舊交雜的文體風貌，也再次提醒了《顯影》作為「白話起點」的重要與特殊性。

在中國大陸中文學界的討論中，有關白話新文學／現代文學，當已存在一個衆所周知、約定俗成，卻在兩岸三地，甚至西方學界都不乏爭議與異議的文學史定義，是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為依據的「近代」（晚清：1840-1910）、「現代」（五四：1919-1949）、「當代」（1949-）革命史觀來分期。誠如論者蔡孟哲指出，這種線性進化史觀存在著定義「現代」的風險，以及涵攝政治爭議的文學史分期模式，是在採取時必須多加注意的。<sup>39</sup>是以，本文使用「現代」作為

---

<sup>38</sup> 胡全章，〈近代中國報章之興與文體之變〉（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08），頁 255-265。

<sup>39</sup> 改革開放後，由北京大學錢理群等前輩所主編之《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則具體將「中國現代文學」的區間，以 1917 年 1 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止於 1949 年 7 月 23 日由左翼中國政權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即後來的「中國作家協會」）。而採取相同分期方式，並被視為是教科書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亦包含世紀之交由程光輝等學者所編寫之《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時期」的定義，可參考宇文所安、孫康宜所合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劍橋」），該書並不以一個大的章節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分野，而是將「鴉片戰爭」（1840-1842）以降至抗日戰爭（1937-1945）年之間的中國文學，不過，該篇章同樣由王德威主寫，在史觀上或許會與《哈佛》有所重疊，但在《劍橋》中卻可見其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究竟該如何分期，有更加明確且精準之定義／定錨，亦即：作為文學「現代化」以及文學（最早追溯到孔門四科十哲的文章之學）最終轉型為「文學」（以 literature 作為一種審美概念、學問規範化以及文化機構的轉型，是被劃分在 1841-1937 的；換言之，《劍橋》（其實也就是王德威）將晚清維新運動以至日軍侵華年間的中國文學視作一個整體性的文學史發展脈絡來陳述，其開端由龔自珍、黃遵憲「詩學的啟示」為肇始，晚清文人作為接替（梁啟超、晚清小說等等，此處已有王氏多年累積的大量論述，筆者在此不必贅述），而真正的「現代文學時期」，其則有明確標注為 1917（五四運動）至 1937（日軍侵華）。詳參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1；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 年之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9），頁 406-539；蔡孟哲，〈現代

探索金門「白話文學」起點的根據，乃採用 2021 年由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中國現代文學」之定義，該書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歷史共時性」（historical synchronicity）之觀點來編纂文學史，<sup>40</sup>如蔡孟哲對該書所做出的精闢見解：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哈佛》）在體例、方法和語境層面反思過往文學史建構經典的局限，企圖重新編織並構連（articulate）時間、空間、文本、人物、器物和歷史事件之間的多重關係性，嘗試組裝出一部另異／翼的文學史，以及「文學與文化現代性」的圖像與系譜。《哈佛》在時間與空間的跨度都有別以往中國現代文學史所含納的範疇，別具創意的編纂構思突破了過去文學史書寫的窠臼，並以華語語系觀點拓展了文學史的空間與版圖。<sup>41</sup>

換言之，《哈佛》並不強調建構性（constructivism）、連貫性（coherence）、進化論（evolutionism）等線性文學史觀，反而以事件與事件、歷史與歷史、人物與人物的多重交疊、衆聲喧嘩的姿態，進行了一場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想像，其對傳統文學史論的「中心—邊陲」觀之揚棄，提供了我們以「華語語系」的論述視角，作為觀看一時一地的文學生產進程——亦即可能用以闡述、論辨、思考位於這座位於閩南沿海邊緣的小島金門，其「現代文學之生成」該當如何溯源、考微。

---

性的重構：評《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收錄於《文化研究》第 36 期（2023.04），頁 405-411。

<sup>40</sup> 其所謂之「現代」，甚至可能上溯自 1635 年晚明儒者楊廷筠，是如何從杭州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汲取「文藝之學」的概念，並於其《代擬續編》中將傳統中國的「文學」二字之定義發衍、闡揚而使其近似於近代英語中的「literature」，此一脈絡甚至能綰合晚明李贊、袁宏道、馮夢龍等文學現代化先驅，以及第一次鴉片戰爭以降志在「師夷長技」的魏源，以及鼓吹「新民救國」的梁啟超，乃至於周作人所謂「人的文學」云云。詳參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麥田出版，2021.02），頁 29。

<sup>41</sup> 蔡孟哲，〈現代性的重構：評《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收錄於《文化研究》第 36 期（2023.04），頁 405。

## 第二節 前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本文在將研究對象《顯影》僑刊置於「僑鄉文化的感覺結構」來探討之同時，不擬忽略海外華人研究之於僑鄉研究的重要性，故應在此作一併簡要回顧後，再聚焦於僑刊研究現況，以此探問：此將金門《顯影》月刊納入華人僑鄉、僑刊研究如何可能？此外，有關《顯影》月刊於 1996 年重新問世後，學術場域與公共文化領域如何以《顯影》作為主要對象與參考對象之相關文獻，亦是筆者在開啟《顯影》研究時不應繞道的對象。另外，為從發行於 1928-1949 年間的《顯影》月刊來尋索金門現代文學的起源，提供金門文學史的一個嶄新視野，故最末亦爬梳與此一命題相關的金門文學研究概況。

### 一、海外華人、僑鄉與僑刊研究

若論及晚近奠基海外華人研究的重量級著作，不可不提及王賡武出版於 1994 的《中國與海外華人》一書，該書主要以東南亞為論述重心，穿越海外華人歷史之縱深，從宋、元、明代的中國的對外關係，談到近現代與當代的各種海外華人研究論題。該書幅深旨遠，對海外華人研究產生巨大影響的是「華人移民四大類型」：華商型（The Trader Pattern）、華工型（The Coolie Pattern）、華僑型（The Sojourner Pattern）與華裔或再移民型（The Descent or Re-migrant Pattern）。氏著特別凸顯了海外華人移民活動以「華商型」為基礎的特徵，其定義對象包含出國貿易的商人、工匠以及派遣其同夥、代理人到海外為其工作之人，是宋代以來中國國內商業、手工業及礦業實踐的延伸，直至 1850 年以前，此為唯一且重要的移民類型。<sup>42</sup>本文使用「海外華人」而非「華僑」作為「Overseas Chinese」這個名詞的釋義，亦來自王賡武之解釋，據其所言，「華僑」進入當代語境之時機，得溯源於晚清鄭觀應、黃遵憲之文章，此一名詞的使用標誌著中國官員和知識份子的政治覺醒，是帶有政治意識的詞彙，故在使用上不得不慎。

<sup>42</sup>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1994），頁 4-18。

<sup>43</sup>儘管「華僑華人」至今仍為一些論著者所用，但王氏早已特別提醒，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至 40 年代晚期之東南亞歷史論及「華僑」才是符合歷史常識的，反之則否。<sup>44</sup>

《海外華人百科全書》是世紀末海外華人研究的心血結晶，1995 年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以英文出版，由館長潘翎領銜主編，率領海外華人研究專家一同撰寫。<sup>45</sup>該書體大思精，不僅在許多範疇啟發海外華人研究的思考，匯整海外華人研究著作之精華，並提供大量的圖像資料，達到圖文並茂的效果。該書章節囊括多方：首章「原籍地」概述了中國僑鄉的史地緣起，以及說明僑鄉之概念；第二章「移民」則從中國海上貿易發展談起，兼及世界史發展，以及海外華工大量輸出的背景，以及移民的幾種模式，其中最重要之概念當為「連鎖式移民」，認為移民一旦在居留地定居後，將一環又一環地透過親屬與同鄉聯繫拉

---

<sup>43</sup> 「華僑」一詞之所以帶有政治意味之解釋如下：「另一個重要之點是「華僑」一詞一但開始應用後的力量。一但對獲准在國外居住有了政治上的承認，要求官方保護的願望日益增長，更加強烈。但當所得到的保護證明是軟弱無力時，就激起了其他政治情緒。一批持不同政見的人要求推翻政府，並以反滿反清的措辭（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表達了這種要求。」此外，在 1904 年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後，「華僑」開始和「殖民」聯繫在一起，促進了其後三四十年華僑史寫作的樣板。詳參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1994），頁 29-45、289-293。

<sup>44</sup> 此外，有關「華僑華人」與「華僑」一詞的在國共內戰之後的相關問題，得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49 年 10 月的成立，血緣主義的國籍政策在此時結束，1954 年後因多重因素鼓勵華僑歸化，越來越多海外中國人取得移居國之國籍，此際，帶有中國國籍與民族主義意味的「華僑」一詞不再能精確地形容所有海外中國人，「華人」一詞也漸次成為了無中國國籍的海外中國人的指稱，值得一提的是，「華僑華人」遂成了一個固定運用的並稱。參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1994），頁 290-293、302；可兒弘明，〈カマン・インテレストとしての華僑・華人〉，輯錄於可兒弘明、游仲勳編，《華僑華人——ボーダレスの世紀へ》（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1995），頁 22-24。

<sup>45</sup> 包含 Anthony Reid、J.A.C. Mackie、John Cayley、Paul Bailey、Paul Handley、Thomas Menkhoff、Scarlet Cheng、司克敦（Ronald Skeldon）、何模樂（Marlowe Hood）、魏安國（Edgar Wickberg）、費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陸華祖（Walton Look Lai）、多伍（Leo M. Douw）、王賡武、鄭德華、黃麗嫻、黃樂嫻、崔貴強、梁秀晶、莊國土、冼玉儀、林願清、李淑志等，皆是一時之選的專家學者。

入更多的移民；<sup>46</sup>第三章「組織」則探討海外華人的社會組織，說明了移民多以職業、原籍地的聯繫組成幫、會、會館、公所、同鄉會等組織，最後則分析了海外華人以家族企業為主要呈現模式的商業網絡及其特性。第四章「關係」則探討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包含中國的僑務政策在 19 至 20 世紀的變遷，如何影響了近代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並介紹僑匯產業、海內外的通訊與文化交流等議題，該章最末則分析了華人與非華人的關係，並檢討了「華人意識」（Chineseness）以及華人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情境與特性。最末章「社區」則介紹海外華人在東南亞、美洲、大洋洲、歐洲、東亞、非洲、澳大利亞、印度洋等地區的概況，資料豐富異常。該書另外一大特點是在各章小節之間插入了許多的「專欄」，意在提供正文論述以外，有關海外華人的各種領域知識，包含介紹各種藝術（電影、文學、繪畫）、介紹海外華人家庭生活面貌、介紹廣東僑鄉建築等，使本書更顯得多元而生動。<sup>47</sup>

孔復禮《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以下簡稱《華人在他鄉》）是孔氏將其在韓國的六次演講稿擴展而成的專書，探討自明穆宗「隆慶開關」（1567）以降的海外華人移民史，其原文書名主標題「Chinese among Others」，透露了該書旨趣：海外華人如何在「others」（他鄉／他者）群體中形塑移民生活的生態（ecology）。該書從白銀經濟作為近世中國（early Modern China）海外貿易體系與世界經濟關係的出發點，並結合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的術語「生態棲位」（niche）來框定華人海外移民在「他鄉」所處的環境與空間，<sup>48</sup>這樣的說法著實體現了海外華人社會的離散情境，不僅針對前述潘翎所述之「連鎖式移民」，做出了更加

---

<sup>46</sup> 詳參潘翎主編，崔貴強編譯，《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8），頁 61。

<sup>47</sup> 本研究參考的是 1998 年的中文版。詳參潘翎主編，崔貴強編譯，《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8）。

<sup>48</sup> 孔氏在此所提出的「生態棲位」，即指移民群體所發現、所創造之得以生存、興旺發展並防禦其他移民群體、在地居民與外國勢力競爭的環境或空間，而有關其理論中「生態棲位」更為詳細的論述，請見本章第三節第三小節「離散研究」；詳見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21。

理論化的詮釋，也令僑鄉與僑居地的空間在跨國／跨地的溝通互動之時，形成了某種「跨在地性」（translocality）。<sup>49</sup>

「僑鄉研究」最早當追溯到 1934-1935 年社會學家陳達在太平洋國際學會之支助下所進行的實地調查報告《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不過，其成書之時尚未有「僑鄉」之稱，陳達僅稱作「華僑社區」。該書主要聚焦於「南洋華僑對於家鄉所發生的影響」，<sup>50</sup>以社會學分析、人口統計、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勾勒廣東潮汕與閩南漳泉「華僑社區」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遷，並分項探討了閩粵華僑在僑鄉與僑居地間所從事的職業、僑匯、生活、家庭、婚姻、治安、都市化、交通、教育、環境、衛生、信仰等情形。該書不僅蒐集保存了民初時期的大量田調資料，亦奠定了僑鄉研究幾個主要關注的範疇，是為從事僑鄉研究不可不讀的經典文本。<sup>51</sup>

僑鄉研究近年的學術碩果，可參考 2010 年啟動的「華僑華人藍皮書」企劃，以及「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國僑鄉研究》。<sup>52</sup>前者於 2011 年出版的第一期《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中，有〈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發展〉一文，大致總結了僑鄉研究的主要關懷：包含僑鄉類型、移民問題、網路理論、社會文化乃至經貿關係等，據其整理，筆者發現大多數的僑鄉研究除了採歷時性、整體性的觀點來探討僑鄉社會的生成及其性質，多數更關心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僑鄉社會的發展狀況，甚至將僑鄉分類為中興、衰退、穩定等型態，此外也不難看

<sup>49</sup> 「跨在地性」（translocality）是奠基於「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一種理論延伸，對理解各種社會空間性質和影響的動態特質至關重要。在「國籍」作為跨邊界交流的檢閱尺度上，「跨在地性」更加地關注以地方作為延伸的視角，以進一步分析其中介安排（intermediary arrangements）、流動性（fluidity）和混合過程（intermingling processes），正如海外華人移民的自我認同順序往往先是建立了同鄉→方言群→國族的順序。有關「跨在地性」的理論框架說明，參見 Clemens Greiner and Patrick Sakdapolrak, "Translocality: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Emerg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Geography Compass* 7, no. 5 (2013):373-384.

<sup>50</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洋的華僑社會，陳達亦稱之為「華僑社區」。參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頁 7、62。

<sup>51</sup> 李明歡主編，《福建僑鄉調查：僑鄉認同、僑鄉網路與僑鄉文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頁 12-13。

<sup>52</sup> 為廣東五邑大學於 2014 年創刊，旨在推動僑鄉文化研究。



出，鑑於當今中國對海外華僑華人的關注乃是放置於全球經濟戰略來思考，是故多數研究偏向著墨華僑華人對於僑鄉的經濟性影響。<sup>53</sup>文中特別指出，有關「何謂僑鄉」，學界尚無一公允定義，不過大致上有一具體共識：「僑鄉」即「大量移住海外的中國人之故鄉」。不過其亦提醒：

並非凡是有僑戶的地區都可稱之為僑鄉，僑鄉應有人數眾多的華僑、華人、歸僑、僑眷；與海外的親友在經濟、文化、思想諸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本地人多地少，資源缺乏，但由於僑匯、僑資多，因而商品經濟比較發達……華僑素有捐資辦學的傳統，當地的教育水平較高。

除外，在構成「僑鄉」的過程裡應有一定的人口量化數據，如關於福建僑鄉政策上以「相當於該縣（市、區）總人口 20%以上或 10 萬人以上」為定義僑鄉之標準。<sup>54</sup>總結近年來中國大陸之於僑鄉學術研究成果，乃多數圍繞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僑鄉與海外僑資之互動關係，主要是：僑鄉如何在僑匯收入、資金下促成當今僑鄉經濟社會發展——如著名的蘇南模式、晉江模式與溫州模式。<sup>55</sup>

誠然，僑鄉經濟之於社會風貌與歷史文化有其連帶關係，但以歷史文化為主的研究，始終並非僑鄉研究的核心關懷。近年來以僑鄉社會文化為標榜的顯學，是上世紀末由國學大師饒宗頤著力推廣的僑批研究，該研究頗有迴響，也被僑鄉潮州視為重要文化遺產，最終在 2013 年進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2022 年由班國瑞（Gregor Benton）、劉宏共同編寫之《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僑匯（1820-1980）》，是目前在資料搜集與論述上最為全

---

<sup>53</sup> 如因應近十年來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推出的一帶一路貿易戰略，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在 2016 年帶領青年研究者團隊出版了《搭橋引路：華僑華人與“一帶一路”》，旨在剖析華僑華人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如何扮演與中國大陸外交合作之橋樑角色，參見陳琮淵、黃日涵編，《搭橋引路：華僑華人與“一帶一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sup>54</sup> 蔣楠、許金頂、張恆艷、魏丹，〈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發展〉，收錄於邱進主編，《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205-206。

<sup>55</sup> 蔣楠、許金頂、張恆艷、魏丹，〈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發展〉，收錄於邱進主編，《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203-242。

面的專著。<sup>56</sup>

江柏煒《閩粵僑鄉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是由其臺大城鄉所博論《“洋樓”：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1940s~1960s）》延伸，並在陳達的基礎上結合田野調查及史料彙整而來。該書不僅透過大量歷史材料之爬梳，說明近代中國海外移民的歷史脈絡，並以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中所援引的「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來框定中國海外移民的社會文化機制，是以具現化地捕捉了海外華人以同方言、同鄉，乃至於同姓、同宗的移民社會表徵。而得益於江氏多年來深耕於金門的學術背景，該書另一大特點則在於利用金門作為僑鄉的歷史材料來加以分析閩粵僑鄉的近代化歷程以及經濟、文化等社會情態。

研究僑鄉社會文化的另一條進路是較為晚近的「僑刊研究」，然其困蹇之處首先在其史料保存不全，其次在於前行研究的稀缺；據江柏煒對千禧年以前的僑刊研究之回顧，可知較早談及僑刊研究的論文包括 1982 年鄭德華、吳行賜《華僑論文集（第一輯）》的〈一批有價值的華僑史資料〉、1990 年陳山鷹發表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三期的〈從僑刊鄉訊資料看美國華僑華人的故土觀念〉、以及 1996 年日本學者吉原和男的〈僑刊・鄉訊を利用した僑鄉研究の可能性〉。<sup>57</sup>

千禧年，亞美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學者徐元音（Madeline Y. Hsu）出版了研究淘金熱與北美華人社群的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一書，其中〈讀刊宛如上大街：離散中的僑刊社群〉（*Magazines as Marketplaces: A Community in Dispersion*）一文（以下簡稱〈讀刊〉），該書除了以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觀點，深描了在 1882-1943 年來自廣東台山的北美華人海外社區之情形，並透過志書、報紙、僑刊、田調、口述歷史等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僑鄉與僑居地間持續存在的聯繫關係。不啻謹慎進行了全面而宏觀的歷史爬梳，更靈活運用了中英雙語史料，重探了海外華人移民研究過往

<sup>56</sup> 班國瑞（Gregor Benton）、劉宏著，賈俊英譯，《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僑匯（1820-1980）》（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2.02）頁 33-39。

<sup>57</sup> 參見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2005.03.01），頁 164。

以民族主義掛帥的學術框架，精到地回溯了僑刊誕生的歷史淵源。<sup>58</sup>是以，「僑刊」的誕生導源於清末甲午戰敗（1895）所引發的動盪情緒以及隨之而來的，受到戊戌變法（1898）影響而具有高度政治推動意味的出版狂潮。<sup>59</sup>此後，海內外的革命派熱衷出版各色各樣的革命系列報刊雜誌，接著，影隨其浪潮而來的「地方性報刊」，則是中國各省各地的地方知識分子在普遍認知到了發展報業能夠促進地方風俗、教育、建設的益處後，紛紛舉纛號召組織的出版社團；他們望能引領政府在經濟、社會、教育制度上有所改革，並進一步建立穩定的地方自治團體。〈讀刊〉一文指出，廣東台山的《新寧雜誌》（以下簡稱《新寧》）為海內外台山人社群間提供了重要的新聞、訊息交流平台，起初雖未特意關注海外社群，卻看似意外地受到北美五大洲地區僑民的熱烈迴響。《新寧》的成功經驗，不僅直接影響了 1916 年正式標榜其核心理念為「服務僑民」的廣東《四邑雜誌》之創刊，也間接導致 1920-30 年代間百樣迭出的「僑刊」之發起——通常發起與規模較小的社區及地方學校、公會、宗族、醫院等各級團體。總結〈讀刊〉一文，乃是以《新寧》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勾勒了僑刊鵠起於中國各地的社會脈絡，以及民初「建設新中國」的歷史氣氛，而海內外華人亦透過民族國家主義的號召來集結創辦刊物。順帶一提，《新寧》在創辦時的成員原為當地「安良局」（1908 年後改為「教育會」）成員如譚毓芝、趙拱宸、劉日初、劉小雲等，他們多數致力於建立台山的現代化學校，並以報紙為改善當地風俗與現代化的重要媒介，提倡動員地方精英和資源，以促進國家力量的增強；而本文的分析對象《顯影》則是由地方小學校友會所發起，並致力於在地的現代化與啟蒙，同樣少不了地

---

<sup>58</sup>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4–155.

<sup>59</sup> 如陳炯明所創辦的《海豐自治報》，或上海創辦的《寧波白話報》，舊金山的《文興日報》（Revive Civilization Daily），後更名為《世界日報》（World Daily Newspaper）；紐約市的《中國維新報》（Renew China Newspaper）；溫哥華的《日新報》（New Day Newspaper）；以及檀香山的《新中國報》（New China Newspaper）；孫中山的革命支持者又在舊金山創辦了《少年中國晨報》（Young China），以及檀香山的《自由新報》（Liberty News）等。詳參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8–129.

方知識分子的參與，兩者不啻有其異曲同工之妙；換言之，僑刊出版與地方教育事業之間不斷互涉之關係，值得我們留心與注意。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發表於 2004 年中研院人社中心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其大致說明了僑刊與鄉訊為何，並闡述其運用於僑鄉研究之可能性，再簡介《顯影》的創辦與發展歷程，與實際操作《顯影》如何用來研究金門僑鄉社會生活之史料及文化變遷，內容包括：珠山薛氏族僑居地的線索、僑鄉社會生活的再現、近代治安事件與地方自保、社會啟蒙及教育事業的發展、防疫與公共衛生、南洋風俗民情與華僑異地生活的報導、洋客的擇姻娶妻與僑鄉婦女的處境、實業發展的推動、時局變遷的記載及其批評。由是，《顯影》無論是要作為 1920—1940 年代金門之常民生活備忘錄，或是僑鄉之社會文化發展史，皆已十分清晰。該文不僅指出了《顯影》作為「僑刊史料」之於僑鄉研究的重要性，亦指出《顯影》其意義與侷限。

60

近十年來將其主要研究方向鎖定於僑刊研究的學者姚婷，在其 2017 年發表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的單篇論文〈僑刊參與華南僑鄉社會治理的實踐初探——以 1949 年前的台山僑刊為例〉一文中，認為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僑刊通常僅作為文本史料與人們傳遞交流情感訊息的媒介，然而若從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觀點視之，則僑刊亦可被視為有機構成的組織。姚氏指出了僑刊主要涉及的「內部相關者」乃是「傳播者」（即僑刊組織的主辦方），此外的兩個「外部相關者」則為「華僑」及「政府」。此中，由青年知識份子主導的社會訊息傳播者在此一社會結構中扮演了對整體社會進步較為積極的角色，而華僑一方面作為僑刊的主要受眾，另一方面則是經費的資助者。有趣的是，鑑於民初軍閥混戰以及政權不穩的歷史背景，政府在地方社會治理上往往扮演著「低效而無能」的管理者，而民間自治組織在這種缺乏政府良性支持的社會失序狀態下，其具體實踐實際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削弱。本文的貢獻首先在於凸顯了僑刊作為社會治理的

<sup>60</sup>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2005.03.01），頁 160-216。

重要功能性角色，其次則在結構主義社會學的觀點上揭橥了僑刊如何在僑鄉社會網絡的微型系統中，承擔並「成為一種新興社會的表達性主體」。<sup>61</sup>

總結僑刊研究的發展與成就：目前主要的僑刊研究大致聚集於廣東台山、開平與福建金門，而僑刊的興起、僑刊的研究價值以及僑刊的具體社會實踐，已經被充分地闡述。筆者認為，僑刊研究除了能夠如實地演繹僑鄉社會的縮影，也應當被視為華文報業發展史中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僑刊的跨國／跨地交流網絡所涉及與呈現出來的經濟文化互動系統，或可被重新納入近代中國的華文報業歷史中；另一方面，僑刊中所刊載之具有現代文學價值的作品與評議文章，亦應與納入僑鄉社會文化史以及僑鄉文學史的討論範疇，此乃筆者的核心關懷之一。

## 二、《顯影》相關研究

《顯影》是閩粵僑鄉少數保存完善的僑刊，它紀錄了金門地區在民國初期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面貌。1949 年國民政府進駐金門，實施嚴格的軍事統治，當時人人自危，《顯影》由是停刊，直至 1996 年才得以重新問世。<sup>62</sup>2006 年，金門薛氏宗親會重刊《顯影》，研究者更易於取用這份資料，其價值已經得到許多人深切認可。以該刊作為對象之相關文獻橫跨華僑華人研究、人文地理學、建築史、人文研究等領域，或透過《顯影》關注僑民向金門地方捐資等運作，以說明原鄉認同感；抑或探討珠山僑鄉從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的形成；甚或透過《顯影》中的文章敍事探討公共衛生與地方治安的浮現。

2015 年由金門縣文化局出版的《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一書，是以金門在 1937-1945 八年的日軍佔領時期（金門人稱「日本手」

<sup>61</sup> 姚婷，〈僑刊參與華南僑鄉社會治理的實踐初探〉，《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2017 年 3 月第一期），頁 29-37。

<sup>62</sup>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 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 (2005.03.01)，頁 160-175。

時期）為主軸的史料彙整專書，該書由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林正珍教授領銜編寫，乃繼承林氏另在 2014 年編寫的《日據時期金門鴉片檔案譯註暨相關調查研究》，該書搜集了日佔時期物產掠奪政策下所留下的鴉片檔案。而本書則彙整了口述歷史訪談、中日戰爭期間《臺灣日日新報》有關金門的記載、「金門行政公署週年紀念特刊」（1940），以及《顯影》中的圖片資料、文字資料，並援引了日本「南支南洋」政策中與金門的相關日語文件，透過這些資料，以及將日治時期「鴉片政策」做為觀察日佔時期金門社會的進路，該書已經初步回顧了其「日本手時期」相關特殊機關的建構、運作實況，以補充歷史研究中對日軍佔領時期金門研究之不足。該書另一大貢獻在於將重光後兩卷《顯影》油印手寫的〈八年滄桑錄〉、〈六六自述〉、〈履痕淚痕記〉繕打編印，並考求多方諸證，使《顯影》更加檔案化、資料化。<sup>63</sup>

袁興言《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該論文以微觀史學、微觀社會學的觀點切入，透過《珠山薛氏族譜》與《顯影》等史料考察金門珠山作為僑鄉的地理歷史變遷、移民類型、僑匯經濟及僑鄉空間營造。該論文充分利用了《顯影》的資料統計紀錄，包括人口統計、土地面積、糧食價格乃至於地理考查等資料；《顯影》儼然成為僑鄉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宗族社會經濟研究基本材料。<sup>64</sup>

謝佳玲《《顯影》中金門番客故鄉感形構之研究》，乃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的國族認同論述與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的「地方論述」，探索「出洋客」如何透過《顯影》的報刊公共空間形塑「故鄉感」。該研究之亮點在於並置原鄉情懷的多重所指（multiply signified）：「珠山、金門、中國」，<sup>65</sup>可惜卻未能說明這三個由小而大、由地方到區域的空間名詞，何以在「故鄉感」

<sup>63</sup> 詳參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

<sup>64</sup> 袁興言，《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07）。

<sup>65</sup> 謝佳玲，《《顯影》中金門番客故鄉感形構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07）。

的內涵中彼此對照、定位與衍義。

李昀駿的碩論《《顯影》敘事中的金門治安、公共衛生及地方意識的浮現》，則稍微界定了此一「故鄉感」的闊限，並拈出其中可能存在「珠山→金門」之漸變。藉由《顯影》中所記載的治安事件與報導，以及刊物欄位標題的變遷整理，氏著說明了《顯影》中的敘事語境與「想像的共同體」是一步一步地由地方聚落擴大為整個金門島。該論文企圖以此闡述《顯影》在自我定位上從「鄉訊」轉變為「僑刊」的位移現象，並試著探討了金門地方宗族概念中，從「我是珠山人」轉變為「我是金門人」的認同形塑。<sup>66</sup>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述，仍須以更嚴格的標準去審視《顯影》在創辦過程中，物質基礎的逐漸完善與刊物發展的歷時性過程。此外，《顯影》的發行適逢一個極為困蹇的年代，有著資金籌措不易、訊息流通困難、印刷資源設備缺乏等問題，因此時而修刊、時而調動欄位，情形甚是複雜，故當研究者為特定資訊而翻閱《顯影》時，不免先感大海撈針，再興無下箸處之嘆，尚需更加詳實與表格化的整理，以餉來者之索驥。

王怡超〈民匪共處的小區盜賊經濟圈——從珠山《顯影》看 1928~1949 年間金門盜賊事件〉，係針對《顯影》中有關盜賊事件之記載，分析金門近代盜匪之性質，該文從明清至民國初年的金門地區防衛背景談起，並將盜賊來源、成員背景、劫掠模式，探討金門作為民匪共處的小區劫掠經濟圈，在村際、人際、權力網絡關係之間的社會矛盾與不靖的治安。<sup>67</sup>

此外，金門縣文化局為推動縣民透過「村史」來認識家鄉，自 2016 年開始規劃辦理「大家來寫村史」的徵選作業，迄於 2022 年 11 月，短短七年內已有四十三本金門村史問世，可見村史寫作之蔚為熱潮。其中也不乏有村史工作者利用了《顯影》，比如陳成基《風車今昔·上李流風——埔後村史》使用《顯影》作為參考

<sup>66</sup> 李昀駿，〈《顯影》敘事中的金門治安、公共衛生及地方意識的浮現〉，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22.07）。

<sup>67</sup> 王怡超，〈民匪共處的小區盜賊經濟圈——從珠山《顯影》看 1928~1949 年間金門盜賊事件〉，輯於陳益源主編，《2012 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立文化局、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2.12），頁 235-250。

資料，以說明日據金門時期每兩鴉片的價格堪敷公務員一個月的薪餉，<sup>68</sup>或是曾任《96 年續修金門縣志·經濟志》主編的楊秉訓於《湖下村志：湖清峰翠慶雲出》透過《顯影》中的地方報導與調查實錄，重新考證了民國時期金門轄區之規劃變遷。<sup>69</sup>在 2015 年由新加坡金門會館所出版的《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也藉由《顯影》拼湊出了祖籍金門珠山的兩位金門先賢：包括曾任 1937-1948 年新加坡華僑中學校長薛永泰，以及曾任《顯影》星洲特派員，並擔任《星洲日報》、《匯總新報》、《星中日報》新聞撰稿人的著名星洲報人薛前璧。<sup>70</sup>總此，出土的《顯影》，不僅填補了過去民國史料之不足，也在新的時代提供新金門人憶故鄉情、說故鄉事的機會。

### 三、金門現代文學研究

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是目前有關「金門現代文學」研究甚具規模的書寫，其認為，金門現代文學的特色與臺灣文學體系化、本土化之過程互為表裡，但是「金門等離島，是被排除（於）本土論述的建構中了。」<sup>71</sup>吳鈞堯深感金門現代文學在臺灣文學研究與寫作的發展中，長久以來遭受漠視，故有意拈出金門本位、金門意識作為對抗，<sup>72</sup>此處並不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吳鈞堯界定金門現代文學史之範圍，乃自一九四五年以降，雖亦認為《顯影》或許能作為「金門現代文學發展的一種可能性」，<sup>73</sup>顯然已關注到了《顯影》可能作為金門現代文學的起點，但仍舊保持著存而不論的態度。另外，《金門縣志》中

---

<sup>68</sup> 陳成基，《風車今昔·上寮流風——埔後村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20.11），頁 85。

<sup>69</sup> 楊秉訓，《湖下村志：湖清峰翠慶雲出》（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22.11），頁 54-56。

<sup>70</sup> 許振義編，《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2015.03），頁 158-173。

<sup>71</sup> 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104-105。

<sup>72</sup> 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121、173。

<sup>73</sup> 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16。

將《顯影》視為「文學誌」，並列入「近代文藝」的欄位介紹，謂曰：「民初金門即有聚落自行出版刊物，當前碩果僅存的顯影月刊，卻仍規劃小而美的藝文版提供鄉親作品發表，見證著金門近代文藝發展青澀的模樣。」<sup>74</sup>總言之，無論是吳鈞堯還是《金門縣志》，咸認為《顯影》作為一份金門現存最早的、可追溯的「現代報刊」有其時代意義，卻未能以「金門現代文學」的框架視之，將《顯影》納入通盤與深入的研究。

黃克全〈一座島嶼的滄桑與現代——金門文學芻議〉將金門現代文學的發展概況依照個別的時期與特性綜整為：一、民國四〇到七〇年代的「軍旅流離文學」；二、自 1973 年以降陳長慶創辦《金門文藝》刊物所引領的本地文藝青年寫作風潮，主要是「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其也不忘補充說明：「金門民間俗文學」與「海外僑鄉文學」也應納入金門文學之範疇。值得一提的是，黃氏認為《顯影》中碩果僅存的文字史料，足能代表「五四以降這一段期間有過一番榮景」的「白話新文學」。<sup>75</sup>

而若論及金門現代文學研究中報刊與場域研究的視角，則可參考黃美娥對具有濃厚軍方色彩的金門軍中報紙《正氣中華》所做的爬梳。其針對反共抗俄時代（1949-1964）的金門文藝論述進行研究，透過分析身處冷戰時期的文學／藝，一窺金門作為國家、人民、戰地的前線象徵，官方論述是如何伸手介入、生產出一套具有軍事殖民性格的文藝話語體系。<sup>76</sup>此一報刊研究的進路，允然能夠作為補足建構金門現代文學史的一塊五色石，但《正氣中華》終究是以右翼黨國色彩為基調的一份報紙，且時間緊扣戰後，我們較難以憑此探尋金門地區接觸近現代文學的起源。縱使如此，該研究仍然開啟了金門以本地報刊作為研

<sup>74</sup>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166。

<sup>75</sup> 黃克全，〈一座島嶼的滄桑與現代——金門文學芻議〉，《國文天地》第 34 卷第 2 期（2018.07），頁 12-17。

<sup>76</sup> 黃美娥，〈反共抗俄時代的金門文藝論述——以《正氣中華》為分析場域（1949-1964）〉，陳益源主編，《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4.12），頁 53-81。

究範疇之新聲。本文的「僑刊研究」雖與該框架有所區隔，但以金門文學的「報刊研究」視角而言，實際上也未嘗不能視作相同的進路。

金門文學的研究方法，目前大多數論者以作家（點）、主題（線）為主，以繫年（面）為輔，編織金門廣袤的文學史系譜。筆者認為，以點、線為主要對象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種文學史的基礎研究方式，這種研究方式，通常產生在研究者對「整體的」歷史認識不夠透徹的階段。不過，隨著金馬解嚴三十年以來，各方各界對金門學研究之深入，以及對史料的更加掌握，金門文學現今已有條件從史、從「面」的框架來全盤展開。舉凡民初以前的古典文學區塊，目前除了已有多項註釋書籍，如金門縣文化局的「金門古書新譯叢書系列」，與專門以史料文獻為考掘目標的專書，<sup>77</sup>以及多本以金門古典單一作家為研究目標的博碩士論文：包含兩本博論，如潘是輝《林豪的史學思想及其實踐》（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陳茗《海疆文學書寫與圖像——林樹梅奇特人生與藝文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以及若干本碩論，如張建騰《金門蔡獻臣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鄭沛文《許獮及其作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蕭鈺婷《盧若騰詩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9）、郭黛暎《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0）、游秀雲《邱葵《釣磯詩集》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盧志鎮《金門先賢盧若騰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楊彩雲《林豪《誦清堂詩集·臺陽草》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論文，2019）。

另外一個區塊是以唐蕙韻領銜的金門民間文學研究，透過田野的採訪，保存了許多的口傳韻語文學，以及口頭散文敍事作品，有助於我們從「民間」的、「俗」的觀點切入金門的風俗與面貌，唐蕙韻對金門民間文學的整理，帶動了臺

<sup>77</sup> 見郭哲銘主編，《金門古典文獻探索》（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灣後續其他地方的民間文學蒐羅的風潮。<sup>78</sup>而民國以降的現代文學區塊，則亦以 2003-2006 年金門縣文化局的「金門文學叢刊」（共三輯）系列、2023 年的「金門文學讀本」系列為重要選集，加上許多博碩士論文的積澱，如翁慧攷《金門鄉土文學之研究—以軍管時期為中心》（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6）、蔡秉蓉《楊樹清散文中的原鄉追尋（1962~2007 年）》（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莊彩燕《金門南洋華僑之社會衝擊（一八四〇~一九四九）》（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1）、洪靉婷《吳鈞堯離島文學書寫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3）、楊雅婷《黃克全小說中的歷史困境與生命哲學》（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劉致穎《回首來時路——吳鈞堯金門書寫主題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4）……等，皆將金門現代文學的面貌以「作家、主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筆者嘗試將上述成果加以繫年，將金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大致如下：

一、民初時期（1915-1949）：此一階段反映出金門知識份子由舊到新的過程，主要為僑匯經濟，加上五四啟蒙的文化系統所影響。此一階段的史料較為稀缺，目前可見的作家活動群集中於《顯影》與《浯江》月刊，是目前金門現代文學的萌芽期。

二、金門戰地時期（1949-1992）：此一階段反映的是金門作為「戰地前線」所經歷的烽火歷史，作品內容有服膺黨國反共話語的戰鬥性文學，亦有描寫在地小人物、刻畫戰地壓抑扭曲的社會與人性的作品。若大致以其創作年代與其描繪的金門社會為框架，大致可涵蓋吳鈞堯在《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以下簡稱《撥霧》）中，並以所謂的「鄉土文學」、「戰地神話」、「現代主義」作為分類，其所謂「鄉土文學」特點可歸結為（一）描寫金門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金門人接受苦難砥礪而形成的「剛毅木訥」典型人物形象（二）金門的女性書寫；

---

<sup>78</sup> 可參考唐蕙韻，《金門民間傳說》（金門：金門縣政府，1996）；許乃蠡主編、唐蕙韻整理，《金門民間文學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

(三) 描寫烽火下的死亡、生活與共情記憶。<sup>79</sup>而「戰地神話」則歸結為：臺(一) 描寫為國捐軀信仰的軍國神話；(二) 描寫金門作為反攻大陸重要堡壘的新中原神話。<sup>80</sup>「現代主義」文學之特點則說明如下：

金門長期處在壓迫環境，但是高壓管理、白色恐怖，兼以教育馴化……金門人人都被教育為愛國的良民跟忠貞的戰士。因此，儘管居民洞悉到跟傳統斷裂以及價值的分崩離析，卻未必有能力可以針對此，提出反諷和控訴。黃克全表現出他的思考特質，成為金門現代主義文學最有力的發聲。茲以文學作品交代金門及作家的徬徨跟迷惑，並劃分『斷裂的島嶼』跟『疏離的家園』討論。

總言吳鈞堯對於作家作品的文學手法與文學風格除了有主題性、寫法性上的分類方式，值得參考的是，其也以「依附」和「阻斷」形容 1949 年以降金門歷史的發展特色。<sup>81</sup>

三、金馬解嚴以後（1992-）：此一階段反映出金馬解嚴以後，將金門作為主體，具有明確批判性與意識形態的文學風景，大致能援引吳鈞堯在《撥霧》一書中所拈出的「金門本位」文學，其所謂的「金門本位」文學旨在指出臺灣援引後殖民資源建構本土論述時，對金門的漠視。其論述涵納（一）金門人眼中的鄭成功；（二）針砭執政當局，陳列了民間與官方的兩種不同聲音。「金門本位」文學呈現了金馬解嚴後金門主體性的浮出，並列舉 2004 年在烈嶼鄉公所簽署的「離島連線宣言」以為例，要「主動掌握離島位置的詮釋權」、「作自己島嶼的主人」。<sup>82</sup>除外，以「金門文化建構」為導向的「僑鄉文學」與「地方文學」，也應納入

<sup>79</sup> 詳見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58-77。

<sup>80</sup> 詳見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78-89。

<sup>81</sup> 詳見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89-104。

<sup>82</sup> 詳參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頁 104-121。

此一討論範圍之內。余懿珊指出，金門文學的形成與界定，可以從 1990 年代以來，以楊樹清為首的金門文化工作者，以及金門縣政府所推動的文化政策談起，一直到近年來透過書籍出版、研究補助與研討會等文化活動之舉辦，一步步形塑起金門文化之論述，也因此提出了「僑鄉文化」與「僑鄉文學」，開創出看待金門文化特性的新視角。<sup>83</sup>此外，林宏信則從「地方文學獎」帶動「地方文學生成」的角度，說明了由金門縣文化局所展開的「金門文學叢刊」與浯島文學獎以「在地生成」的機制建構金門文學的過程，事實上，這條路徑與吳鈞堯的「金門本位」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林氏更貼近於從外緣與文學場域機制的角度切入。<sup>84</sup>

###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理論運用

#### 一、媒介研究

英國傳播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B. Thompson）在《媒介與現代性》（*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一書中指出，技術媒介（technical medium）作為象徵形式的物質基礎，不僅改變了訊息的傳遞方式，更塑造了人們對日常生活、遙遠地方與歷史連續性的感知。這種「文化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culture）過程，特別在印刷術與定期刊物的發展中，深刻影響了交流網絡與權力結構。<sup>85</sup>一個更加廣為人知的論述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及「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其指出愈發興盛的出版工業所共享的文化載體，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他的理論曾被過往研究《顯影》的論者們援引，卻不約而同地忽略了該術語的特定的論述框架——從「共同民族語言」所生出的「民族主義」。在《顯影》中我們看到的，雖然間或出現海外華人源自於愛國主義的國族論述

<sup>83</sup> 詳參余懿珊，〈金門意識與地方取形塑：以「僑鄉文學」之建構為例〉（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頁 29-58。

<sup>84</sup> 詳參林宏信，〈觀察 1990 年代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為觀察對象〉（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sup>85</sup> 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3.

(discourse)，不過誠如班國瑞（Gregor Benton）與劉宏所指出，「多數僑刊仍是以地方或區域為重點的單一出版物。」<sup>86</sup>故此，設若《顯影》是金門僑鄉想像一個「跨國／跨地金僑社區」的通訊技術媒介，前提應該要是建立在地方／地緣社群的基礎上。本文第三章，筆者將論述僑刊《顯影》何以作為近代金僑社區重要的通信技術媒介，並探討潛藏其中的資本轉換機制與權力互動形式，藉此說明它如何形塑 1920-40 年代的僑鄉社群。此外，在文化與思想方面，它不僅於珠山地方社會權作傳統與現代化的中介，也作為一個公共平台，激發了地方知識分子對現代化與文化轉型的深層思考。是以，透過輿論文章與新聞報導，知識分子對地方的積俗或病灶，進行了批判性反思，進一步推動了教育改革、婦女解放等現代化議程。總此，作為特定的文化載體，當各種不同來源的文化與現代化觀點在此輸入、輸出時，地方社會的傳統與現代性是如何在其中對話、激盪並交織，是本文所欲抉奧之處。

《顯影》作為知識分子的發言空間，無論是啟蒙話語的發聲還是介入地方事務，無疑皆是不斷地在詮釋「大眾傳媒」（mass media）得以塑造公共空間之特性，其內涵大致如引文中所提及，包含「建構國民意識、創造時尚、影響思想潮流」等。對此，新聞學者蔡博方結合了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兩種命題方式，提出了「報刊現代性」（press modernity）作為一種新的問題意識。

哈伯瑪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是媒介研究領域中常見的分析性概念，用以指涉一種理性論辯與平等交流的社會空間，在文學、法律、政治、商業等不同公共領域之中的平等意見交流，最終目的在於形成「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意在促成衆人對公共政策的共識。此際，傳播新聞的報刊媒介，當然可以視作理性溝通的「公共領域」，不過新聞學者李金銓提醒，「瞭解傳播者（報刊及其主筆）和受眾如何透過文本（內容）而產生什麼互動，引起什麼思想

<sup>86</sup> 班國瑞（Gregor Benton）、劉宏著，賈俊英譯，《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僑匯（1820-1980）》（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2.02），頁 114。

變化、行動、效果、影響」，以及「聯繫到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亦是從事「報刊作為公共領域」的分析者之必要功課。<sup>87</sup>另一方面，若撇除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對於「民族主義」的建構性意向，其對於「新聞報刊如何建構集體認同感」的說明亦值得我們借鑑與參考：

新聞報刊對於更廣泛的閱讀大眾傳播了一種『社會想像』。在這種想像中，原本分屬於不同地區或族群的人，得以透過區別我群與他群，而建構屬於自己的『集體認同感』。<sup>88</sup>

中國（或更廣義的華語）文學的生成與發展，始終是一個持續變動與協商的過程。陳平原所提出的報刊研究路徑，聚焦於北京與上海兩座城市的出版活動，特別是《申報》、《晨報》、《小說月刊》、《新青年》等具有標誌性的報刊刊物。<sup>89</sup>然而，正如張堂錡所指出，當前正是「走出雙城記」的關鍵時刻——以「地方」為方法、進入異質時空下的文學發展軌跡，已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轉向。<sup>90</sup>

筆者認為，《顯影》所展現出的多元欄位設計，已遠非單一新聞傳播工具，而是一種跨越「在地」與「離散」之間的想像聯繫，建構出一個同時涵括宣傳、募款、知識流通、議題倡導與時事評論等功能的文字公共領域。將《顯影》納入媒介研究視野，有助於揭示其作為地方報刊所承載的文化政治能量；然而，更應進一步關注其背後所依憑的知識系統與思想脈絡。此一研究策略，正如陳平原

---

<sup>87</sup>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260-271。

<sup>88</sup> 蔡博方，〈報刊現代性與公民身份：以《申報》為例的反思〉，《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第 2 期（2016.07），頁 144-145。

<sup>89</sup> 陳平原，〈文學史視野中的「報刊研究」〉，《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07），頁 289。

<sup>90</sup> 中國（或是華語）文學的生成與影響，是一個不斷處於變動、協商的過程，陳平原所提及的報刊研究，其目光侷限於京、滬二大城市所發刊的《申報》、《晨報》、《小說月刊》、《新青年》等。張堂錡提醒到，「是時候走出「雙城記」，以「地方」作為現代文學研究的路徑了。」詳參張堂錡，〈走出“雙城記”——“地方”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探索與爭鳴》總第三八七期（2022），頁 70-73；陳平原，〈文學史視野中的「報刊研究」〉，《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07），頁 289。

所言，是一種「裡應外合」的實踐模式。是故，本文擬將時序發生於 1920 年代晚期的《顯影》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邊陲地區所激發的區域性餘波，進而提出「後五四」(post-May Fourth) 作為分析框架。此一用語不僅指涉時間上的繼起，更強調地方知識份子對於五四運動核心理念與文學形式的「遲到模仿」(belated emulation)，其發聲來自一個同時位於文化邊緣、卻又積極參與現代性協商的歷史座標上。金門作為此一現象的具體場域，其文化生產既映照了五四運動所引發的現代性衝擊，也暴露出模仿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時差與位移。

當我們將媒介研究的視角由大型、具象徵性的文化場域，轉向金門這樣一個地緣上「遲到」的地區時，中心與邊陲之間的文化落差與張力當即浮現而出。《顯影》作為一種地方文學制度的具體實踐，其對五四運動的模仿、呼應、追從與影隨，正是這種「後五四狀態」的真實體現。另一方面，我們也應重視《顯影》對中國境內「同步發生」的思想激盪與社會動態的回應。本文在探討其如何呼應近代中國知識型文化的同時，亦將視野拓展至當時的國內外政經情勢，以及金門周邊可能的知識輸入來源——包括距離最近的學術文化重鎮廈門，與「南洋」華僑社群在資金與文化知識上的挹注。這些複雜而多重的知識流動關係，構成《顯影》報刊書寫的歷史地理脈絡，也形塑了其獨特的文學位置。

## 二、現代性

現代性 (modernity)，它很可能是當代學術界在使用上最高頻的術語之一，但它並不是一套的專門的理論，而是一種規範的計畫 (normative schedule)，用來定義一個由思想和信念組成的系統，旨在改善既存的社會。<sup>91</sup>一般而言，現代性 (modernity) 雖然並不完全代表現代化 (modernize) 這個動詞的名詞型態，然而，「進入現代性狀態」(become modernity) 却是普遍學者在談論現代性時，所關注的一種動態性結構 (dynamic structure)，無論如何，一般所

<sup>91</sup> 奈杰·達德 (Nigel Dodd) 著，張君政譯，《社會理論與現代性》(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2。

謂的現代化進程（modernization process），即標誌著「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社會文化變遷過程，其過程大致依循著三個主要的層次：一、器物技能層次（technical level）；二、制度層次（institutional level）；三、思想行爲層次（behavioral level），順序由前而後，彼此牽動。<sup>92</sup>不過，談論這種「現代性」的動機與目的有時也將其視作一種後設而後見的觀點與框架，用來討論一個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或瞻顧在現代化進程中，該地區社會所秉持的共同敘事、核心理念、價值觀念、實現計劃、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與文化思想。<sup>93</sup>故此，當我們使用名詞形式「現代性」的時候，往往接近於針對某段時期的評價或評估，及其所暗示之單一的、最終的事態。<sup>94</sup>總言之，使用動詞形式「現代化」（modernize）時，則專指某種社會文化變遷的時間性歷程；使用形容詞「現代」（modern）時，則更傾向於一種是對立著傳統（traditional）而言，標示著「過渡的」、「朝向未來發展中的」態度與價值判斷。<sup>95</sup>

從歷史的發展脈絡來看，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定義「現代性」乃從十七世紀左右的歐洲所逐漸建立，<sup>96</sup>並在 20 世紀漸漸成為具有全球歷史性影響的行爲制度與模式，它包含了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所乘載的世界觀、經濟制度到政治制度，並在由資本主義市場帶動逐漸全球化的世界中，帶來了傳統與現代、舊世界與新世界的斷裂，而其所造成斷裂的面向不僅體現制度性的變革上，而更是以「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為主的一種文化或生活方式。<sup>97</sup>然而，這種「以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為主的一種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原動力，又該何從解釋？此時，我們便不得不將目光放回到古典社會學理論之中，如從

---

<sup>92</sup>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文化，1990），頁 161-162。

<sup>93</sup> 黃瑞祺主編，《當代社會學》（臺北：東華書局，2011），頁 312-314。

<sup>94</sup> 參見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文化，1990），頁 129。

<sup>95</sup> 不過，「現代化」與「現代」在這個意涵上，大多數時候是可通用的。如金耀基在討論「現代」一詞的定義時，往往將「現代」與「現代性」並舉。參見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文化，1990），頁 126-139。

<sup>96</sup> 奈杰·達德（Nigel Dodd）著，張君孜譯，《社會理論與現代性》（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3。

<sup>97</sup> 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04），頁 4。

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將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拈出一種「現代集體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 的概念，其意味著「個人至上」(the cult of the individual) 與「公民身份」(citizenship) 兩者之間存在的內在張力與整合，並謂這種訴諸「個人道德崇拜」(cult of personal dignity) 的社會整合為一種「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而反對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1723-1790) 過度強調經濟領域的分工、協作與生產力效率的提升，是故將其否定為「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sup>98</sup>

而除了如上述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論述現代社會生成的要件，韋伯 (Max Weber) 則於 1905 年出版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一書，他從現代宗教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清教徒 (Puritans) 將喀爾文主義 (Calvinism) 帶到英格蘭與美洲殖民地 (如 1620 年登陸麻州的清教徒) 的禁慾勞動倫理，<sup>99</sup>在整個 16-18 世紀，從荷蘭、瑞士、英國北部、普魯士等新教國家，皆在商業、金融與早期資本主義發展中崛起，<sup>100</sup>這些地區的企業家、工匠階層展現出韋伯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新教倫理的形成雖起於宗教改革，但真正與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結合，是到了 17 世紀以後，當宗教內在的禁欲力量轉化為一種世俗化的行動動機與制度文化時，才真正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深刻作用。<sup>101</sup>

正是在這樣的新教倫理逐漸脫離其宗教根基、內化為一種社會行動規範與制度精神的過程中，韋伯進一步觀察到「理性化」的歷史趨力。此一「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的進程，指涉的不僅是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

<sup>98</sup> 奈杰·達德 (Nigel Dodd) 著，張君攷譯，《社會理論與現代性》(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13-24。

<sup>99</sup>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著，蘇國勛、覃方明、趙立璋、秦明瑞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08)，頁 92-104。

<sup>100</sup>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著，蘇國勛、覃方明、趙立璋、秦明瑞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08)，頁 110-114。

<sup>101</sup>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著，蘇國勛、覃方明、趙立璋、秦明瑞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08)，頁 116-119。

或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普遍擴張，更是一種價值體系與世界觀的轉變：從一個神祕、整體性的宇宙觀，轉為基於計算、可預測性與科層化制度所支撐的社會秩序。<sup>102</sup>韋伯將此種歷史性轉化稱為「除魅」（disenchantment），意即世界逐漸失去神祕色彩，不再以宗教神話或傳統秩序作為行動正當性的依據，而是進入一種以理性理解與制度操作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在《學術作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一文中，韋伯指出：「世界已被除魅了」，這不只是指自然現象可以用科學加以解釋，更是一種生存意義的轉化：人不再透過宗教獲得終極意義，而是在功能分化的社會中，依賴不同領域（如文學、法律、經濟、政治、音樂、藝術）各自的內部理性邏輯運作。<sup>103</sup>換言之，從韋伯的觀點來看，「現代性」的形成即是社會在理性化與除魅進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結果，在此進程中，行動者雖擁有形式上的自由與世俗化的制度保障，但也逐漸陷入韋伯所稱的「鋼鐵般堅硬的外殼裡」（stahlhartes gehäuse），<sup>104</sup>而人類終究在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體系中，逐漸失去價值指引與精神向度，換言之，現代主體乃是一種被科層制度、資本邏輯與市場效率所規訓，形成一種理性主導下的虛無主體。

因此，若將韋伯的理性化理論與其新教倫理之分析結合來看，便可發現：「現代性」既是一種世俗制度的成熟表現，同時亦蘊含著一種深層的精神危機。個體在從宗教共同體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面臨著意義與價值的荒蕪。在這樣的視角下，現代性不再僅是技術、制度與行為層次的進步過程，更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困境，其核心正是韋伯所揭示的——理性化與除魅之矛盾動力。然而，此種訴諸「除魅」與「理性」的現代性內涵，則暗含了某種單一的終點或目的性，它往往就表示了一種「單一線性的進化論」觀點，這種觀點或許展現在西方種族主義與殖民話語當中所謂「文明的使命」（civilizing mission），或者可謂是「西

---

<sup>102</sup>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956–958, 975–978.

<sup>103</sup> 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trans. Michael John, in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ed. Peter Lassman and Irving Velody with Herminio Martin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13–14.

<sup>104</sup>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蘇國勛、覃方明、趙立璋、秦明瑞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08），頁117。

化」的代名詞。換言之，現代或現代性難以擺脫西方文明史中始自啟蒙運動、新教倫理的高揚，以及工業革命等訴諸經濟、社會進步進化的時間觀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這樣的特質，泰勒（Charles Taylor）謂之為訴諸「理性」的非文化（acultural）現代性。<sup>105</sup>然而，所謂「現代」的過程委實不應完全參考「非文化現代性」觀點，或是以「除魅」（disenchantment）與否，作為單一的檢證框架。

時序進入 20 世紀後半葉，當人們尚未從理性主義與進步神話所構築的現代性甬道中走出，一股批判這種單線性歷史敘事、挑戰普遍理性與主體中心論的思想浪潮便已悄然興起。一場以「後現代」（postmodern）為名的思想轉向，悄然接踵而至。這一波後現代思潮，雖無統一理論體系，但其核心皆質疑「理性」、「真理」、「主體」與「歷史」等現代性所信奉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強調知識與權力的關聯性、語言的建構性、以及主體的碎裂與非本質化特性。自 1960 年代末起，伴隨著後結構主義者對語言符號「任意性」與「差異」的關注，德希達、傅科、克莉絲蒂娃、李歐塔、巴特等一系列批判結構主義的著作幾乎粉碎了所有對「啟蒙」、「現代性」、「理性」的美好願景，他們認為，現代性的理性化進程，非但未能帶來真正的解放，反而導致新的規訓機制、知識體制與壓迫結構。<sup>106</sup>在此一股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哲學狂潮中，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重新審視了現代性的本質，並將其視為一項「未完成的設計」（an unfinished project），在其理論系譜中，西方世界自中世紀以來，逐步經歷了一場由「神學—形上學結構」（theological-metaphysical structure）邁向「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的長時段轉變。宗教過去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提供終極意義、道德正當性與集體秩序的依據——如今已逐漸讓位給法治、科學、民主制度等世俗體系。這一過程固然為現代社會奠定了制度基礎，卻也同時伴隨著「價值真空」的生成，使得原本由宗教提供的正當性功能陷入失

---

<sup>105</sup> Charles Taylor, "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5, no. 2 (March–April 1995): 24–33.

<sup>106</sup> 史帝文·貝斯特（Steven Best）、「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翻譯，《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5.08），頁 40-46。

效狀態。<sup>107</sup>哈伯瑪斯進一步指出，若現代社會僅依賴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來治理社會秩序與人際關係，將無法真正處理價值與正當性的問題，因為工具理性固然在科學與技術層面極為有效，卻不足以回應生活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意義協調與共識建構；<sup>108</sup>因此，他提出以「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為核心的倫理取向，強調透過理性對話與公共論辯，使社會成員能在非強制的情境中共同生成規範，從而重建公共生活的正當性。<sup>109</sup>在本文第三章的分析中，筆者將透過對金門民初地方知識份子對「婚姻」的看法與報導紀錄，探討傳統舊俗與現代觀點在理論與實踐、自我價值與人情世故之中，是如何曾經進行過一場「理性溝通」的歷程。

另一項值得我們關注的，乃是紀登斯對「現代性」在宏觀理論的抽象性建構之不滿，他企圖將現代人的自我認同加入現代性的討論之中，在其所著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一書中，將現代人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作為現代性現象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指標，<sup>110</sup>這一點或許可以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其著名的文章《論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態度」相互映照，亦即他們都認為「現代性」乃是各種社會變化、各種類型制度、各種知識形式——凡此種種現象的一種「哲學反省型態」，而這種最為基礎的作為一個啟蒙的反省模式，乃關涉到「人與當下的一種關係模式」，<sup>111</sup>在該篇文章中最精彩的一段謂曰：

---

<sup>107</sup>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Seattle: Bay Press, 1983), 3-15.

<sup>108</sup>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esp. 85-101.

<sup>109</sup>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102-105, 130-132.

<sup>110</sup> 黃瑞棋，〈現代或後現代——紀登斯論現代性〉，《東吳社會學報》第六期（1997.03），頁287-311；更詳細內容，可參閱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台北：左岸文化，2005.12），頁68-111。

<sup>111</sup>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著，薛興國譯，〈論何謂啟蒙〉，收錄於《聯經思想集刊①》（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5），頁27-28。

我所謂「態度」，是人和當代拉上關係的一種模式；某些人所做的自願抉擇；一種標示歸屬關係，同時又有任務性質的行動與行為方式。毫無疑問，這有點像希臘人所說的 *ethos*（筆者按：希臘文的 *ethos* 原意是指「習性」、「性格」、「習慣性行為的模式」，也可引申為「人所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或「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道德風貌與內在信念」。這個字是英文單字 *ethics* 的詞源之一。）……我將以一個不能不用的例子，也就是波特萊爾，來扼要說明這現代態度的特性；他的現代意識公認是十九世紀最敏銳的一個……波特萊爾形容現代為「朝生暮死，快速飛逝，偶發」，即是此意。不過，在他來說，做到「現代」，不是要承認並接受這種變動不居，而是對這變動採取某種態度；這種精心的、困難的態度，要點是重新掌握某個不在當下之外、之後，而在當下之內的永恆東西。現代性有別於時尚（*fashion*），時尚只牽涉時間；現代性是二種態度，使人能掌握當下的「英雄式」層面。現代性不是一種對稍縱即逝的當下敏於感受的現象，而是一股將當下「英雄化」的意志。<sup>112</sup>

正如奈杰·達德（Nigel Dodd）所述，傅科晚期討論倫理學（*ethics*）的作品，採取了比較人本主義（*humanist*）的立場，亦即將其對於啟蒙、理性等等的關懷，環繞在人類內在行動力的概念，<sup>113</sup>而對於本文而言，這種將「現代性」訴諸於「人如何感受、存在於當下，並對其所身處的世界負有責任，而付諸實際的行動」的「態度」，或許可以將之與民初金門地方知識份子對地方現代化的實踐加以對比、對照，以試圖釐清處於 20 世紀初期的他們，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與勞動力大量遷徙的時代下，他們是如何在社會結構遽烈變更的情況中，將其被促發的「自我認同」、「自我實現」之內在原動力，用以改善鄉里的文化思想、社會建設等困境。

<sup>112</sup>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3）著，薛興國譯，〈論何謂啟蒙〉，收錄於《聯經思想集刊①》（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5），頁 22-23。

<sup>113</sup> 奈杰·達德（Nigel Dodd）著，張君攷譯，《社會理論與現代性》（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106。

總結上述，本文之所以採用「重探現代性」作為研究方法之一，乃在觀察一時一地如何自我覺知並實踐「現代」（modern）及其內蘊、特性（quality）與經驗（experience）<sup>114</sup>，並重新定位一種時間、一段歷史。換言之，瞻顧「現代性」的所來之徑，不難發現歷史與先民所壓過的轍痕，依然在吐露著星散的訊息，本文將重探《顯影》報刊中所折射出的，民初金門的現代化過程，並進一步評估其內涵，此將有助於我們在所欲探討的「僑鄉文化」空間中，重新定位金僑社區中所有的現代化參與者，以及他們如何在民初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興盛時期中，借道來自多元文化的啟蒙話語，推動僑鄉社會的經濟文化轉型。

### 三、離散研究

根據牛津大學國際移民學家寇恩（Robin Cohen）在《全球離散導論》（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一書所指出，「離散」（diaspora）原專指猶太人在歷史上的流亡情態，但隨著《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的創刊，離散研究逐漸走向制度化的學術領域。該期刊於 1991 年由哈齊格（Khachig Tölöyan, 1944-）創辦，初期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後轉由多倫多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全球首屈一指專門探討離散現象的跨學科期刊。其論文涵蓋族裔研究、跨國主義、文化身份、記憶政治與流動性等主題，對 1980 年代末興起的全球移民與身份政治理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與實證基礎。尤其是在 Paul Gilroy、James Clifford、Robin Cohen 等學者的理論推進下，「離散」不再僅指涉歷史性的猶太流亡，而是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現代性的文化與政治條件，進一步擴展到全球各類族群的移動經驗與文化再構中。此一學術化進程也促成「離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成為獨立且具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並持續與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領域交織發展。<sup>115</sup>該詞彙在

<sup>114</sup> 「現代性」（modernity）一詞在西方學者的用法包含時期（period）、特性（quality）和經驗（experience）。參見參見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後現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48。

<sup>115</sup>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 Jonathan Grossman 於 2019 年所發表的研究，其針對 74 篇使用關鍵詞「離散」的文章進行數據分析，發現「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和「故鄉導向」（homeland

1960-70 年代間被系統性地延展，用以描繪非裔、亞美尼亞裔、愛爾蘭裔群體的全球遷徙，形構並想像他們在歷史上備受壓迫的群體創傷經驗。到了 1980 年代，「離散」已經被廣泛地、隱喻性地用以指稱各種移外者（expatriates）、流亡者（expellees）、政治難民（political refugees）、居留者（alien residents）、移民（immigrants）以及少數民族（ethnic and racial minorities），自是，「離散」一詞呈顯出更為多樣化的面貌。<sup>116</sup> 寇恩主張，離散的意識與情境並不會在從船上走下來的那一刻浮現，而是當種族群體的成員有了融入當地與克里奧化（creolize）的社會實踐，或者當其對過往身份產生強烈的、再度的連接，或當發生已然和未然的同化障礙（block to assimilation）時，「離散」才成為可能。對此，寇恩歸納了離散群體的九大特徵與六大類型，包括：帶著創傷遠走家鄉、尋求工作或展開殖民、集體記憶與各種神話、理想化的祖輩繼承承諾、頻繁的故土回溯、族群獨特意識、在寄居地的齟齬、在寄居地的同族成員互動、在寄居地的獨特創造性。六大類型則包含受害者型（victim）、勞工型（labour）、帝國殖民型（imperial）、商貿型（trade and business）、去領土化型（deterritorialized）。<sup>117</sup> 其中，在「商貿型」與「帝國殖民型」相關聯的一種中介類型「輔助型離散」（auxiliary diaspora），他們並非是殖民者族群，但卻跟隨著殖民擴張的形式在當地從事商貿行為，這意味著當地土著的敵意也會轉而針對這些在數量上不少的輔助者，他們被視為與殖民政府結盟的「外國人」，如東南亞歐洲殖民地的中國商人、加勒比海和西非的黎巴嫩人，以及東非的印度人，

---

orientation）是使用「離散」一詞的最大公約數。本文將引用這個概念以作為「離散」情境的操作型定義，在此一併說明。詳參 Jonathan Grossman, "Toward a Definition of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2, no. 8 (2019): 1263-1282.

<sup>116</sup> 此外，根據 Jonathan Grossman 於 2019 年所發表的研究，其針對近年來的 74 篇使用關鍵詞「離散」的文章進行數據分析，發現「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和「故鄉導向」（homeland orientation）是使用「離散」一詞的最大公約數，而有關「跨國主義」作為本文的理論框架之一，將於本章第三節說明。詳參 Cohen, R.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 Routledge, 2008, pp.1-2. 以及 Guo, S. "Reimagining Chinese diaspora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toward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8(4), 2021: 850.

<sup>117</sup> 九大特徵詳見 Cohen, R.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 Routledge(2008): 15-19.

皆屬此一類型。<sup>118</sup>此外，在《全球離散導論》一書中，寇恩也扼要地分析了中國海外華人的離散特徵，說明他們並非全然都是商賈，尚有契約勞工（indentured workers）與自由手工業者（artisans），其認為，海外華人離散群體通常秉有勤勉和創業的精神，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找到其生存和成功的機會。<sup>119</sup>此處當可與海外華人研究的重量級學者王賡武對海外華人所做出的

本文欲以「離散」（diaspora）指稱的，指的是一種寓有「僑」之意涵的生命情境。據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A. Kuhn, 1933-2016）所言，「僑」所對應到英文的動詞詞彙為「sojourn」，華語可譯為「逗留、旅居」，而華語語境將「向外移居」的概念約定俗成為「僑」而非「emigrant」（向外遷移）。這樣的語言現象，彷彿暗示著華人一旦出洋、出外打拼，即進入了某種離散的（diasporic）、心向家園的生命情境。事實上，學界對於「僑」的見解委實各異其趣，但筆者並無需在此一一枚舉，僅擬探求「僑」之本義，故參酌此說。氏著《華人在他鄉》以“emigration”一字作為中國近現代海外華人之情感，完整闡述如下：

在英語當中，無論就嚴謹詞義或口語表達而言，「(向外)移民」(emigrant)都意味著「一個人離開本地而（長久地）居住於另一地」。但中文詞彙中找不到能夠完全與之相對應的詞彙。儘管難以獲得確鑿證據，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長期以來，絕大多數中國「移民」的意願並非在外國長期定居，而是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後就回歸故里。而且，數百萬「移民」也的確僅僅是「僑」居（sojourning）他國。長期以來，中國家庭在空間上的分布模式，連同其外出務工、寄錢回去養家的策略，無不顯示出我們正在考察的，是一種假定移民及其家鄉（即「僑鄉」）之間存在持續聯繫的「勞動力分佈系統」(system of labor distribution)。因而，事情的本質不是「分離（separation），而是「聯繫」(connection)。雖然事實上許多移民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安了家，但這並沒有減少先前處境脈絡的重要性：大多數人

---

<sup>118</sup> 不過，也並非所有的並非所有的輔助者都是商人。詳參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8), 83–84.

<sup>119</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8), 84–91.

與其說是確定性地「離開中國」，還不如說是他們正在擴展勞工和家庭之紐帶的空間維度。<sup>120</sup>

沿此思路，本文將以「僑」與「離散」作為「與原鄉密不可分」以及「身在異鄉、心在故鄉」的一種指涉，探討《顯影》僑刊橫亘於離散與在地群體之間的跨國／跨地互動網絡。

#### 四、跨國主義

廿世紀是一個全球勞工移民從發展中國家向高度發展國家大量湧入的時代，它彰顯了自 16 世紀以降從西方為始，高度擴張與臻至成熟的全球資本主義結構，而今邁入全球化的時代，有關公民身份的觀念及其意義，則隨著人類更加高明的移動技術，以及跨國移民趨勢的增長，產生了重要的變化。1990 年代，跨國主義理論（transnationalism）開始在地理、社會、政治和人類學家的討論，以及當代離散議題中掀起波瀾，這批跨國主義理論的基本概念由文化人類學家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以及 Linda Basch 和 Christina Szanton Blanc 等人所奠定，而社會學家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政治學家法斯特（Thomas Faist）則進一步拓展並厚實了跨國主義理論的學術框架。以下將綜整他們對跨國主義理論所做出的定義與闡釋，再將其置於本文的研究脈絡中。

「跨國主義」是一項主張「跨越邊界」的移民研究術語，主要將論述集中在跨國移民的社會關係上，除了用以分析當代跨國移民者多重且流動的身份認同外，也能用以分析一種具備離散意識（diasporic consciousness）的移民社群，<sup>121</sup>並將所謂的「祖國」與定居地聯繫起來，重新構築一種「跨地方」（translocal）的概

---

<sup>120</sup> 詳參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新北：臺灣商務，2019），頁 23-24。

<sup>121</sup> 重要的是，跨國主義試圖指出「同化」（assimilation）與「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的不足之處，強調同化理論學者傾向於聚焦於族群性，並在此過程中忽視了種族問題。詳參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53-554.

念——一種橫跨地理、文化與政治邊界的分析框架。<sup>122</sup>值得注意的是，跨國主義強調的是透過具有時空壓縮意味的全球性互動，來鞏固跨國社會空間的穩定性。此外，跨國主義與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ies）、離散研究、流動性研究（mobility studies）可謂相生相息，其中，移民研究關注人們越過國界的移動，而跨國主義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則不只看人本身如何越境，也涵蓋其他象徵性的流動，包括物品、經濟資本、網絡、文化、知識的移動，而儘管他們彼此看似形成某種辯證關係，然而在學術研究方法與觀察對象上更為分野。

<sup>123</sup>本文認為，「在地」與「離散」的跨國／跨地金僑群體，透過金門大量發行的僑刊連繫起一公共社會空間，此與陳達在其著作《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所述之「華僑社區」之意涵能夠相互解釋，本文將援引此概念，在第三章論證民初金門僑鄉的跨國／跨地社會公共社會空間裡「金僑社區」（Quemoyian sojourner's community）的生成，並以此術語框定跨國／跨地的「金門僑鄉與僑居地」。<sup>124</sup>此外，受到於跨國主義研究對「互惠性」（reciprocity）與情感因素的多面化思考之啟發，筆者認為金門現代化的進程，不應始終被視為單向度的僑匯資本經濟輸入過程。<sup>125</sup>自是，《顯影》見證了在作為推動現代化重要力量的跨國／跨地匯寄系統中，金門原鄉留守者的重要性——他們對僑匯的呼籲，往往不僅僅是緣於個人家庭溫飽或生活品質的需索，而為了地方社會的現代化進步，他們也持續且努力地向僑居地們發出情感的召喚，為家鄉付出了許多心力——這些努

---

<sup>122</sup>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50.

<sup>123</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華語學術界中盛行的海外華人研究，通常在過去不是以「移出國」（中國）就是以「移入國」（海外國家）作為主要的空間場景來分析，這種民族國家主義至上的理論模式，將社會場景的視角固定於單一的國族領土，使得海外華人落致雙重邊緣化以及失卻主體性的危險。新加坡華人移民研究著名學者劉宏認為，透過跨國主義視野的引進，過往的「華僑華人」與「海外華人」在邁入 1980 年代以後，或許能改以一個更加準確的名稱——「跨國華人」（Transnational Chinese）來形容。參見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收錄於《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71 期（2002），頁 120-131；陳麗園，〈近代海外華人研究的跨國主義取向探索——評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收錄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 年 3 月第 1 期），頁 71。

<sup>124</sup> 參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頁 7、62。

<sup>125</sup>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67-568.

力，都需要更加嚴謹地審視與評估。

結合前述媒介研究的觀點，本文將於第三章將《顯影》作為跨國／跨地「金僑社區」中互動溝通的重要通信技術媒介，並以法斯特（Thomas Faist）所提出的「跨國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以便分析這一幅跨國／跨地移民的空間圖景：跨國社會空間是由社會與符號連結、網絡與組織中的地位，以及組織網絡所組成，此處所謂「空間」不僅意指其物理特徵，也涵蓋更大範圍的機會結構、社會生活，以及該特定且有限的地點對移民所代表的主觀圖像、價值與意義。<sup>126</sup>在時間地理學（time geography）的理論支持下，法斯特所謂的「空間」（space）不等同於地點（place），<sup>127</sup>因為它涵括並橫亘於多個地理位置之間，代表動態的社會過程，而非靜態的物理位置與關係。對此，法斯特提出幾種具體形塑跨國社會空間的元素，包括親緣團體（kinship group）、跨國交易網絡（trading circuits）與跨國共同體（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等，這些元素通常建立在互惠的聯繫（ties of reciprocity）、工具性交換（instrumental exchange）與集體認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上。舉凡向家鄉

---

<sup>126</sup> 「機會結構」是一社會學名詞，指在任何特定社會或機構中，人們可以利用的機會是由該實體的社會組織和結構所塑造的事實，通常為傳統和合法的機會結構，例如通過接受教育以獲得一份好工作來實現經濟上的成功，或者致力於某種形式的藝術、工藝或表演以在該領域謀生。而由於這些機會結構，以及那些非傳統和非合法的機會結構形成了一套規則（set of rules），人們就遵循這些規則來獲取成功。當傳統和合法的機會結構無法帶來成功時，人們可能會通過非傳統和非合法的途徑來追求成功。參見 Ashley Crossman, "Definition of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oughtCo*,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thoughtco.com/opportunity-structure-theory-3026435>. (最後瀏覽時間：2024.05.04)

<sup>127</sup> Kivistö 指出，法斯特對「空間」（space）此一術語的運用，受到以哈格斯傳（Torsten Hägerstrand, 1916-2004）為首的「時間地理學」（time-geography）模式的影響，意即將「個人」的地理學狀態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路徑軌跡與互動網絡中，也就是強調社會互動的情境何以定位個人，在這一點上，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加入了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日常接觸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理論，將活動的「場景」（setting）給提示出來，並說明社會互動的情境是不同場所（locales）所聯繫。詳參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李康、李猛譯，《社會的構成》（臺北縣：左岸文化，2002），頁 xxxvi.-xxxvii、114-120；國立編譯館主譯，Richard Peet 著，《現代地理思想》（臺北市：群學，2005），頁 239-252；Peter Kivistö,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66-567.

的匯款行爲——這類聯繫不僅是工具性的交易，更多是出於對留在母國親人的情感依戀，以體現他們對家庭的依附、對分離的悲傷以及持續保持聯繫的渴望。回到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閩粵僑鄉的歷史情境與社會脈絡中，這便如同華人海外會館的建構以及跨國僑批系統的維持，是建立在同方言、同祖籍或講究親緣關係的傳統宗族組織上；在移民研究的系譜與「跨國社會空間」的實證中，筆者將試圖拆解他們是如何將自身與原始母國的傳統繫聯，體現在一個逐漸「去單一領土化」（deterritorialized）的地域觀念中，<sup>128</sup>進一步探討地緣性情結與民族主義話語的興起，是如何交織地鞏固了他們的情感結構。

此外，這些跨國社會空間涉及各類資本的累積與影響，包含：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以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在這些不同形式的資本形式之間，具備一定的可轉換性。<sup>129</sup>本章將分析《顯影》中關乎教育機構「勸募」與「捐款」行爲的背後，離散群體的故鄉情感，與地緣群體網絡中的社會地位、權勢象徵是如何產生複雜而交纏的緊密關係，這方面與法斯特所描繪的「社會資本」能夠對應：首先，社會資本指的是深植於既成社會與象徵性關係中的社會資源，使得個人得以在網絡與組織中進行合作，並以互惠（reciprocity）的社會交換模式、團結（solidarity）的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來呈現。<sup>130</sup>換言之，社會資本是應用其他形式資本的關鍵機制，也是連結不同國家中集體與網絡的傳輸帶，對於那些缺乏經濟資本的人尤其重要，因為它能動員其他形式的資本；是故，移民往往需要與已經建立的移民或中介建立社會聯繫，以找到工作。關於這一點，在本章第二節「前行研究」業已提出孔復禮在《華人在他鄉》所提出的「生態棲位」（niche）可以與此相互呼應，亦即謂離鄉背井的海外華人是如何拖曳於與「原鄉」的藕斷絲連——往往是一份「以勞力為資本」、「以同鄉為基礎」的紐帶關係，踏上異國陌生

---

<sup>128</sup> Thomas Fais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Their Evolution, Signific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InIIS-Arbeitspapier*, no. 9 (1998): 8–9.

<sup>129</sup>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241–258.

<sup>130</sup>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66–567.

的土地。此處之解釋，當與氏著中的另一社會生態學術語「通道」(corridors)共同參酌：

「生態棲位」是特定移民群在新環境中的生活空間，而「通道」(corridors)則是移民舊環境的延伸，這是一條使移民與故鄉（可能是一個村莊，可能是一個宗族，也可能是一個省份）保持有意義聯繫的通道。事實上，此種「通道」的存在，可能與那種「衣錦還鄉的迷思」或「榮歸故里的期盼」是相向而立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移民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家鄉，他們保存了在經濟、文化、親情等不同方面的歸屬模式，以便使自己始終更為堅定地朝向自己的祖籍地，而非自身當下實際生活其中的社會。在移民的心目中，可能從來就不認為自己在情敵上或行動上完全割斷過與自己的故鄉、與故鄉的文化、與故鄉的親人之間的聯繫。儘管「通道」有某種空間屬性，但是，我們最好將其想像為一種社會的、經濟的有機體。

131

社會資本能夠幫助網絡或群體的成員獲得更多的經濟、人力和社會資本。<sup>132</sup>於是，公共資訊網絡的建構與利用，除了維持一定的情感繫聯，也透過各種權力來調節資源的流動。<sup>133</sup>本文第三章將用以對《顯影》中有關僑鄉實業建設的報導展開分析，並試圖闡釋報導內容中所透露出的，華僑社會資本對於地方資源分配的權力暗湧，以及地方知識份子的臧否和微詞。

#### 第四節 本文章節架構

本文除了首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論」以外，茲將其他章節架構簡介如下：

第二章將探討《顯影》的緣起、歷史背景、刊物發展、接收情形，接著介紹

<sup>131</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80。

<sup>132</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21。

<sup>133</sup> Thomas Fais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Their Evolution, Signific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InIIS-Arbeitspapier*, no. 9 (1998): 9–11.

編輯人與投稿者。鑑於目前民初金門時期的史料缺失，獨以《顯影》之保存最是備整，故本章不免以《顯影》為主要史料進行爬梳，從這份僅存的史料中挖掘出《顯影》刊物主事者與投稿者的身份與經歷。當然，由於《顯影》具有較為濃厚的區域特性，這些編投者之身份大多以薛氏宗親、姻親，以及珠山小學校友會的成員為主。不過，亦不乏來自金門在地文化教育界，或僑居於南洋地區的知識份子。本章亦擬兼及探討《顯影》南洋讀者群對於刊物的接受與反應，以及僑匯資本與情感互惠的流通性，以此闡明《顯影》如何透過在地與離散的群體共同生成。是故，第一節當率先敘陳珠山創辦僑刊《顯影》的歷史及社會背景，也將一一細數《顯影》在漫長雪藏後重新出土的契機，以及珠山薛氏宗親會與學者江柏煒推廣、重刊的經過與貢獻。第二節則主要針對刊物的發展及其沿革做出歷時性的整理，並透過表格整理其出版時間、出版資訊、各期欄位、各卷大要，兼及關注背後推動《顯影》的主要知識分子，與重要的地方性組織，最終探討南洋地區之接受與迴響。第三節則將以個案分析的方式，從刊物歷代的編輯者包含薛丞祝、薛永麥（施伍）、薛健椿（澤人）、薛崇武、張夢我、顏西林，以及具備報業背景，對《顯影》的編輯走向進行了多次建議的重要投稿者薛殘白（淡菊）進行介紹。他們大多數身兼編輯人與投稿者兩種身份，本節分別介紹他們，除了旨在統整刊物的主事者、參與者之身份，以俾本文理解《顯影》知識群體的特質及其社會階層，此外，也試圖勾勒出 1920 至 1940 年代金門知識文化份子的輪廓與風貌。

第三章將探討《顯影》的現代媒介功能、欄位內容、變遷，及其社會參與。首先，本文認為《顯影》是僑鄉社會中的重要現代媒介（media，中文亦作「傳媒」、「媒體」），透過不同的欄位發揮不同的功能，包含聯絡跨國地／親緣社群、資訊傳播、時政臧否、推動現代化等。值得關注的是，《顯影》中的輿論文章與報導文章幾乎佔據了一半以上的欄位與篇幅，這些編投者幾乎深深地受到了五四文化啟蒙的論述影響，它們對僑鄉社會問題、實業改革、推動教育與現代化等議題，都提出了頗為深刻的諍言，它們時而深刻、時而沈痛、或懷希望、或慷慨陳詞。第一節首先說明《顯影》如何在 1928-1949 年間作為「跨地互動的媒介」，透過通訊、調查、媒婆、海外資訊等欄位的設置，牽起在地與離散的跨地

訊息交流，結合在地與離散、故鄉與他鄉的音訊，使其在共同時空想像的基礎上，形塑一個跨國／跨地的金僑社區。本章第二節，則從《顯影》作為金門僑鄉時代「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媒介」入手，分析其中有關教育機構倡建、地方開墾與實業建設方面的相關內容，以闡述《顯影》在公共化的版面上，如何透過報導、輿論、倡議與募捐告示，嘗試推動或影響金門現代化的議程。第三節遂緝合前述，以「公共領域」為出發點，總結僑刊《顯影》作為跨國／跨地金僑社區的互動網絡中心，有著什麼樣的媒介功能及特性，並接著分析金門地方的知識分子如何透過《顯影》作為文化與思想傳播的技術媒介，運用多樣化的輿論文章與新聞報導，或批判迂腐舊俗，或反思地方問題，提出包括婦女解放、教育改革、體育推廣等在內的現代化願景。

第四章則擬聚焦於「金門現代文學起點」此一命題，試圖以歷時性的視角進行文本細讀，暨而探討珠山《顯影》於 1928 年至 1936 年間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生產。故此，本章第一節將考察「珠山小學校友會」成立經緯，梳理其與在地鄉民之互動情況，進而論述地方文教／文藝之營造與實踐歷程探討，是如何在保留地方傳統的基礎上，開拓另一種現代化可能，並體現於地社群力量之凝聚。以如此活潑的文化背景為前提，本章第二節將參考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的發展特徵，從白話新詩與傳統舊詩的對讀起始，追溯金門現代文學 1928 至 1932 年間「白話嘗試期」的發端，探及「白話嘗試期」主要之創作母題、創作方法、創作理論、創作實踐等等。而隨著《顯影》出刊的穩定化，該刊之編投者，紛紛將理念目光轉向「大眾文藝期」，是故此處將從發生於《顯影》第六卷第四期（1932.05）至第十卷第五期（1934.07）的「淡、寒」論戰談起，以說明《顯影》在這場論戰發生以降的文藝風格與取向。本章第三節將接續指出，從「淡、寒」論戰中所提出的文學「實用觀」與「環境說」，不啻接合了彼時中國現代文學的「左傾」現象，更與「現實主義」文學遙相呼應，諸皆反應於《顯影》的文學實踐，衍化為「大眾文藝化」的建構與流變。因此，筆者擬執用「如何大眾，怎樣鄉土」的問題意識，去探討學童文藝欄《雛燕》的寓言體書寫，以及在地化文藝欄《濯巖》的社會關懷。並試圖指出，由「珠小校友會」發行的報刊《顯影》，對學童異常重視，將《雛燕》納入「大眾文藝」實踐的重要一環，乃順理成章之結果。筆者也欲探究，

《顯影》中最重要、亦最長壽的文藝欄《灌巖》，是如何展現對地方與鄉土的關懷，或是左翼文學思潮影響，並擬將之參照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餘波，以及探討欄位中對外國文學所譯介的寫實主義傳統，是如何影響了本地文學家的白話現代文學實踐，從第一人稱的「嘗試自我言說」，走向第三人稱的「去自我化」，以及「替集體表述」的文學。

## 第二章 《顯影》創辦、發展與編投情形

### 第一節 緣起、創辦與重新出土



#### 一、創辦及其歷史背景

筆者在第一章曾經提及，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金門先民，因受到經濟與戰爭等因素，以及 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廈門的開港通商，以及 1860 年簽訂「北京條約」之開放華工出洋等影響，造成了金門大量男性青年人口外移。金門方言中「落番」一詞，即特別指向海外金門人前往東南亞一帶的移居，如「走呂宋」至菲律賓，不過，也另有一些人選擇「走東洋」到日本。<sup>1</sup>初來乍到南洋者，往往定居半島的港口，或選擇島嶼與島嶼近海處落腳，如棉蘭佬（民答那峨島）、加里曼丹（婆羅洲）、新加坡或是馬來西亞巴生港的浮羅吉膽。<sup>2</sup>《顯影》發源地珠山的出洋子弟，泰半落腳菲律賓衣里岸（Iligan）、馬尼拉（Manila）、奎松（Quezon），印尼泗水（Surabaya）、東加里曼丹省的麻里巴板（Balikpapan）、三馬林達（金門人又稱為「高低」，Samarinda），馬來西亞古達峇汝（Kota Bharu）與新加坡等地。<sup>3</sup>其中發展較好的，是位在北棉蘭佬衣里岸海灣（Iligan Bay）的衣里岸社群，金門在清末即前往該地發展者，不僅有珠山的薛永南兄弟，還有古寧頭的李水溫家族。<sup>4</sup>

《顯影》的創刊人薛福緣（字永棟，1872-1943）是另一經商有成的珠山子弟，在 1890 年代即出洋，深耕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北部衣里岸以及宿霧（Cebu）

<sup>1</sup> 「呂宋」為金門人對菲律賓的代稱，故所謂「走呂宋」、「賺呂宋錢」應為到菲律賓發展，而非專指到呂宋島。見江柏煒，〈近代菲律賓金門移民社群及其文化變遷：以鄉團及家族為主〉，《海洋文化學刊》第十九期（2016.04），頁 77。

<sup>2</sup>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九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314。

<sup>3</sup> 參考《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277-287。

<sup>4</sup>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九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497-498。

兩地；<sup>5</sup>另一位創辦人薛永乾（筆名惕齋）則是鄉里間優秀的知識份子，<sup>6</sup>畢業於福州英華書院，曾執教於宿霧中華中學、鼓浪嶼養正小學和珠山小學，《顯影》之得名即來自於他「有一天在暗房沖洗底片時，浸泡在顯影液中的相紙，漸漸顯現所拍攝的景物」。<sup>7</sup>《顯影》第一期的〈發刊詞〉旨在說明刊物目標，為提供海外金僑通曉家鄉信息之管道，以免與故鄉久別生疏。：

吾族自建遺公奠基珠山，已歷十有三世，瓜瓞聯綿，人丁七百有五，而所佔耕地，只近百萬裁聲，年獲不過六千左右。當此生活程度日高，只供三十人衣食之費，而待哺人口，勢不得不迫出南洋，以圖彌補。試為一查吾鄉最近人口之調查，除卻婦孺而外，所有出洋謀生者，少壯間十去八九，其中克踐素志者固在多數，然而久別家鄉，親情冷淡者，亦有其人。推求其故，皆由信息鮮通，有以致之。全人有鑑於斯，爰有通訊社之組織，益是刊之出版。此後鴻來去燕，準期不斷，是即吾人之責，苟非有特別事故，斷不敢妄效嵇康，而勞鄉親翹望也。<sup>8</sup>

文中說明了珠山鄉民多「勢不得不迫出南洋」之理由，是出於「耕地不夠」以及「生活程度日高」，並將僑鄉與僑居地之間的鴻來雁往寄託於《顯影》，而又提及了

<sup>5</sup> 據〈六六回顧〉，可知薛永棟曾於衣里岸經營商號「永昌」、宿務（宿霧）經營「永芳」。見薛福緣，〈六六回顧〉，輯錄於《金門薛氏族譜》，頁 310-317。

<sup>6</sup> 永乾筆名「惕齋」，筆者推其乃取自《周易》「朝乾夕惕」之典故，值得一提的是，鼎鼎大名的新加坡僑領陳嘉庚於 1894 年曾於其家鄉集美開辦「惕齋學塾」，此後這裡成為了囊括小學、中學和大學的集美學村，這和永乾是否自我取其筆名為「惕齋」，是否有關係也未可知；此外，《顯影》的小學生文藝欄位「雛燕」，亦由他大力推行與主編；然天不假年，薛永乾先生英年早逝（推測為 1929 年 9 月逝世），身後遺二女一子，長女黎明女士嫁與《顯影》後期重要編輯顏西林（紫峰）。詳見《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465-3466；劉婷婷、黃瑾，〈他創辦了廈門大學，組織華僑支援抗戰，被毛主席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來源：<http://www.chinaql.org/BIG5/n1/2021/0326/c437203-32062110.html>，檢索日期：2025.05.24）。

<sup>7</sup> 見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頁 244；李金生，《雞庵山頂談珠山歷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1998.07），頁 47。

<sup>8</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1。

「是即吾人之責」，此間的「吾人」即指其創辦組織「珠山小學校友會」。爲了應付《顯影》油印所資，校友會的經費需要大量仰賴鄉民與校友：

本刊經費，原由校友會支用，近因校友會財政缺乏，幾乎無力出版，幸得福緣君捐助國幣壹拾元，紹杪君捐助參元，前發君捐助伍元，日前方得照常刊出，謹此道謝，尤望愛閱本刊諸君，與以一臂之助，則獲益不特同人已也。<sup>9</sup>

《顯影》於 1928 至 1937 年的十年間，見證並參與了珠山家鄉與金門地區的現代化發展，1937 年後值中日戰爭，同年 2 月主編澤人南渡後，從此《顯影》鴻斷雁杳，同年 10 月 26 日，日軍攻佔金門，直至 1946 年才重新接續發行第十六期的「重光號」。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對金門島佔領的歷史，被金門人稱作「日本手」時期，而對金門島的侵佔，是有意將金門做為「南支南洋」政策之一環，以便進一步控制廈門島，乃至於福建，甚至整個中國華南地區。<sup>10</sup>值得一提的是，《顯影》在復刊後的第十六卷一～六期以及十七卷一～三期所刊登薛福緣的〈八年滄桑錄〉，詳細記載了其於「日本手」時期的所見所聞，不僅是在極度艱困的環境下秘密進行的寫作，亦是今日作為研究八年日佔金門時期，以及 1945 年政權轉換時期等滄桑歷史，一份極為珍貴的史料。<sup>11</sup>

## 二、重新出土及重刊

1949 年，國共內戰如火如荼，國民黨搖搖欲墜，10 月 12 日中共解放軍攻

<sup>9</sup> 如第六卷第三期，編輯部即呼籲海外同鄉最近為捐資者出一臂之力。見《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1361；另外，所捐資費，大抵用於珠山小學校務、設備、人事等費。可見其「年度收支表」，然並未列出《顯影》編輯與人事之詳細支出，僅作如下說明：「設備及什用費，因細目太繁故不逐條詳錄，惟經手人之細目單，蓋有存據備查。」見《顯影 (Shinning)》第四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843；《顯影》第七卷，1551。

<sup>10</sup> 參見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19-20。

<sup>11</sup> 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13。

陷大、小嶝；17日，國軍失守廈門；25日，座落金門島西的古寧頭爆發了戰事，金廈兩岸水路斷絕。《顯影》中也不乏相關記載，如早在同年5月4日、5月8日，大嶝即曾發生兩起土共偷襲事件，顯是早已人心惶惶。<sup>12</sup>當此風雲變色之際，1949年5月31日發行了《顯影》最後一期。其〈編後話〉云：

歇了一個月不與讀者相見，好像隔了一年半載的久，我們枯坐了一個月，是非常苦悶的。顯影雖然接續的出版，為什麼會輟期呢？豈不是為了物力的問題嗎？不是；我們經費充足，基金穩健，參加月月活動的朋友，把三十八年度的月份，都已預定一空了！那麼為了人力的問題嗎？也不是；我們的編輯委員，有很多位，通訊網部各鄉鎮，消息可說靈通，每期編輯的工作，只消一兩日的時間，就可完成，其實；是為了現在時局不甚安定，給我們無心工作，那說不出的苦衷，只有請讀者原諒。

對照當時內戰情勢，乃是南京政府失守，國軍一路南撤，渡江戰役正進行的如火如荼之際。礙於部隊的漸次轉進金門，島上實施箝制言論與思想的「軍政一元化」，《顯影》與其他島上的所有刊物如《湖峯》、《古岡》、《塔峰》、《浯江月刊》等面臨了相同命運，不僅自動停刊，甚至先行銷毀，文中所述「說不出的苦衷」，當此之謂也。<sup>13</sup>不過，時值戰地政務時期的1981年，為重修《金門縣志》，曾經向顏西林先生借用所珍藏的孤本，以補民初史料之不足，<sup>14</sup>可惜被以紅筆圈畫，使其染瑕。殆及1992年，終於迎來金馬戰地政務時期的結束，1996年，正是本文第一章開頭所敍述之「完璧歸薛」的場景，當時決議由薛氏宗親會重印30冊，以饗後人，由保管這分刊物將近五十載的顏西林先生親撰序言如下：

---

<sup>12</sup> 見《顯影（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3759-3760。

<sup>13</sup> 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頁205。

<sup>14</sup> 顏西林〈影印顯影月刊合訂本感言〉謂曰：「民國七十年金門縣政府重修「金門縣誌」缺少民國十七年至三十五年資料，商借《顯影》合訂本參考，負責編修大事記為金門日報總編輯郭某，摘要《顯影》地方新聞，用紅筆圈畫，借人書刊，不加珍惜，信筆塗鴉，殊為可惡，今影印副本定有瑕疵，實為憾事。」全文原刊於1996年重印《顯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卷頭，本文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273。

金門叢爾小島，四面強鄰環伺，自清末至民國，金門無日安寧，緣政府昏庸無能，貪墨腐敗，加之外受大陸強梁劫掠，內則弱肉強食，民不聊生。

翻閱二十年來《顯影》島訊，無時不有匪盜綁架消息，政府毫無保護人民能力。光復末期，時局動盪、混亂至極。《顯影》負全民喉舌之職，公正執言，不怕權力，幾與槍口對立，於今思之，於有餘悸。

三十八年國軍進駐金門，這部「顯影」孤本，寄存我處，軍管時期，人人自危，我四十八年來秘密收藏，冒白色恐怖之險危，為保存珠山「國寶」，如今得完璧歸趙，遂我心願，亦珠山之幸也！茲以金門薛氏宗親會有影印之議，給這孤本不致孤獨，十分慶幸，願同仁珍視之。<sup>15</sup>

其後，《顯影》受到各方重視，並得到教育部顧問室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經費支持，醞釀重刊。2006 年，由時任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的江柏煒教授率領其團隊，以重新建立目錄、編輯校對、數位照相製版等方式重刊《顯影》，總計二十一卷、二十五冊。<sup>16</sup>

## 第二節 刊物沿革及其迴響

### 一、編輯、組織與發刊情況

1928 年 9 月由「珠小校友會」所成立的《顯影》，是由一群志在改造家園社會、著手地方教育事務，以及對文化知識啟蒙有著共同理想的青年所齊心編纂的，該時機點與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之勢遙相呼應，值得注意。《顯影》在初期以至第十五卷，主要由薛丞祝、薛健椿（澤人，又名「健吞」）、薛永麥（施伍）承

<sup>15</sup> 顏西林，〈影印顯影月刊合訂本感言〉，原刊於 1996 年重印《顯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卷頭，本文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273。

<sup>16</sup> 金門縣薛氏宗親會，〈珠山《顯影》重刊序〉，輯於江柏煒編輯，《顯影（Shinning）》總冊。



任編務，<sup>17</sup>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卷第五期起，各欄位標題旁皆比先前多出了插畫，想是美術專業的施伍為《顯影》增色了不少。施伍於第五卷第二期之通訊短言〈寄承爵〉（按：承爵即薛丞祝）說道：

親愛的祝：我回來金門已有十天了……我到故鄉的時候，芳埭健椿二君已寄出第一期，第二期又在進行中，不料編好文藝而已，而健椿的學校要開課，芳埭又因事去浦，我為著免去顯影多緩起見，而接繼編下……。<sup>18</sup>

從這段書信中，可見《顯影》在早期編務上雖在大方向上依賴常常赴海外「考察商業」的主編薛丞祝，其他的校友也不吝幫忙。不過，其他編務人員如施伍、澤人因求學故，不便時時刻刻留守於珠山，只能盡量避免「顯影（出刊）多緩」，<sup>19</sup>

《顯影》起初大致上由薛丞祝與施伍主編，施伍直至 1934 年 4 月因接任《浯江》月刊總編輯而無暇顧及《顯影》，<sup>20</sup>由澤人承攬著編務，根據澤人自述，自十三卷第一期起，澤人正式成為刊物當家主，一直編至第十五卷第四期。<sup>21</sup>1946 年 4 月重光後的第十六卷第一期起，至 1949 年 5 月的第二十一卷第五期止，由重光後擔任珠山小學校長，<sup>22</sup>日佔時期以前即有編務經驗的薛崇武主編。<sup>23</sup>值得一提的是，自《顯影》十八期第一卷起，加入了曾任浯江小學校教師的張夢我以及薛氏姻親顏西林共同編輯，使《顯影》的新聞報導由對島南的偏重，而漸漸擴

---

<sup>17</sup> 根據施伍與澤人於第十五卷第三期之自述，施伍並非一開始即負責編輯顯影，推算施伍加入編輯《顯影》的時間，其開始幫忙編輯《顯影》之時間點應始於 1929 年 7 月左右的第二卷第三期。見《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66。

<sup>18</sup> 見《顯影（Shinning）》第五卷，頁 1025。

<sup>19</sup> 從引文所述，可以確定澤人在第五卷第一期、第二期應即已有幫忙著手編務之經驗。見《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 1916。

<sup>20</sup> 〈本刊啓事〉，《顯影（Shinning）》第十卷，頁 2185。

<sup>21</sup> 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41；以及澤人，〈告別讀者〉，《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67。

<sup>22</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202。

<sup>23</sup> 〈整年的會事記：廿四年十月十二日〉：「幹事長兼顯影總編輯丞祝，辭職赴菲考察商業，同時為顯影籌謀資金。編職澤人崇武代。」《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838。

及全島<sup>24</sup>，另外，自第十九卷第二期至最後一期（第二十一卷第五期），皆於版權頁標明發行人為薛崇武，社長為顏紫峰（即顏西林），他們不僅是推動《顯影》從「鄉辦刊物」往「島辦刊物」的幕後推手，也更是積極推動金門光復後「金中（金門中學）復校」的教育家，此外，崇武在金中復校後聘為庶務主任，得該校董事之延請，一度將《顯影》編輯室設於後浦金門中學校內。<sup>25</sup>

2006 年《顯影》的重刊，也從原稿中找出了三本未曾問世的，與珠小校友會有關之刊冊，分別是發行於 1930 年，共計五期的《新村》周刊以及《六周年紀念刊》，以及發行於 1931 年的《珠山學校週季工作紀念特刊》。其中，《新村》周刊乃是在《顯影》於 1930 年 2 至 10 月間因人手不足而無以為繼之時的一種替代性刊物，以簡要的新聞、文藝作品、論著作品代替《顯影》較為龐大的刊物編輯，保留了海外通訊聯繫與基本告知鄉情的功能。<sup>26</sup>不過，《新村》周刊僅經 1930 年 1-2 月的三期即停，乃因該刊編者施伍入廈赴學而致，<sup>27</sup>後又於 8-9 月連出二期即停，直至同年 11 月，《顯影》第三期捲土重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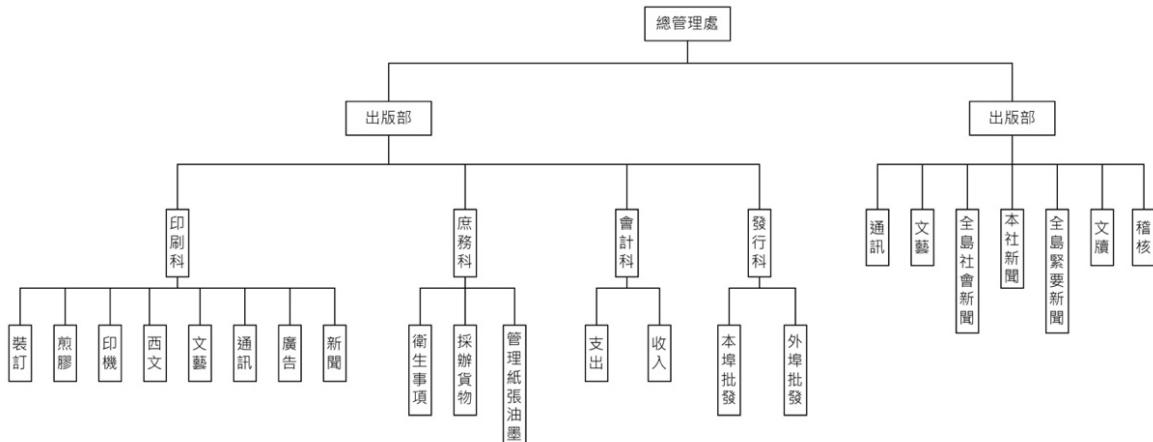
<sup>24</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47。

<sup>2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433。

<sup>26</sup> 《顯影 (Shinning)》新村卷，頁 3-4。

<sup>27</sup> 在珠小校友會六週年紀念刊物的〈會史〉中，乃曾介紹該刊始末：「新村周刊——這時繼顯影而起的一種刊物，為校友永麥君一手所獨創的，然後乃歸本會印刷發行，故實際又是會的附辦刊物之一種，是刊為週的性質，創立於十八年末、十九年初之寒暑假間，經三期而停，因時又藉學校之開課，麥君到學去，而刊就暫與眾告別，是即謂之寒暑二假期的一種定期刊物也……。」詳見《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40-141。

在《顯影》第六卷第六期之「四週年紀念號」，曾以圖表呈現其編務組織如圖：



依此可見《顯影》在分配各庶務時自有其組織性，然而在第八卷以前編輯室時常發表的聲明可得知，《顯影》的負責人員往往是處於調動的不穩定狀態，推測各在組織運作上，應當是沒有固定的人員。

在印刷方面，在第十一卷第三期以前，《顯影》採用手寫稿油印方式，<sup>28</sup>為八開大小，在金門珠山印製。<sup>29</sup>後改為鉛字排版印刷方式，開數不變，十一卷第三期至第五期交由廈門明明印務公司，但因「明明」在印製作業上時程過久，以致「姍姍來遲」；為防止報導失卻即時性，故自第十一卷第六期起，改由大同路風行印刷社負責。<sup>30</sup>而自第十三卷第五期起，又逢風行印刷社內部改組，復業遙遙無期，以致延緩了半月才出刊，最終交由新民智印務公司接手。<sup>31</sup>抗戰後復刊，第十六卷第一期起雖一度倒回手寫稿油印方式，然十六卷第六期始，則改回鉛字編印方式，並委由位於廈門大中路的大道印務公司印刷。<sup>32</sup>此處先以表格化之方式交代《顯影》刊物之歷時性發展狀態：

<sup>28</sup> 事實上，在第五卷第四期至第六期時，作為編者之一的施伍早已透露鉛印之計劃，見《顯影 (Shinning)》第五卷，頁 1119、頁 1171-1172。

<sup>29</sup>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ning) 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 (2005.03.01)，頁 176。

<sup>3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17。

<sup>3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723。

<sup>32</sup> 前水頭金水國小刊物《塔峰》，創刊於 1934 年春，初由郭師儀編輯，光復後於 1947.04.15 復活，該刊亦委由大道印務公司承印。詳見《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43。

表一：《顯影》卷期、發行時間、欄位及重刊後頁碼



卷期	頁碼 <sup>33</sup>	發行時間	欄位
第一卷第一期	p.1-p.22	1928.09	論著、鄉聞、社團消息、浯島新聞縮寫、調查、快郵、氣象報告
第一卷第二期	p.23-p.78	1928.11	論著（未標明欄位）、文藝（未標明欄位）、浯島新聞縮寫、鄉聞、社團消息、雛燕、郵差、調查、氣象報告
第一卷第三期	p.79- p.152	1928.12	論著（未標明欄位）、文藝（未標明欄位）、浯島新聞縮寫、鄉聞、社團消息、雛燕、快郵、調查、問答、氣象報告
第一卷第四期	p.153- p.232	1929.01	論壇、文藝園、浯島新聞縮寫、鄉聞、社團短訊、雛燕（新年號）、媒婆、快郵、調查、通訊問答、氣象報告
第一卷第五期	p.233- p.308	1929.02	序文、文藝園、浯島新聞縮寫、珠山鄉聞、雛燕、介紹、郵筒、調查、問答、氣象
第一卷第六期	p.309- p.364	1929.03	文藝、浯島新聞縮寫（無標明欄位）、鄉聞（無標明欄位）、雛燕（無標明欄位）、介紹（無標明欄位）、調查（無標明欄位）、問答（無標明欄位）、氣象（無標明欄位）
第二卷第一期	p.365-390	1929.05	珠山消息、浯島新聞
第二卷第二期	p.391-432	1929.06	前三堡各學校聯合運動會專號、迎城隍特刊、新聞錄

<sup>33</sup> 本文引用《顯影》之頁碼，皆對應至由江柏煒編輯重印之《顯影（Shinning）》（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



第二卷第三期	p.433-448	1929.07	島中的新聞、鄉裏的消息
第二卷第四期	p.449-466	1929.08	島中的新聞、鄉裏的消息
新村第一期	p.1-p.19	1930.02.02	鄉聞、文藝、浯江消息、閒話、編後的話
新村第二期	p.20-p.39	1930.02.09	鄉聞、文藝、浯江消息、小花園、公開通訊
新村第三期	p.41-p.76	1930.02	鄉聞、文藝、浯江消息、小花園、編後話
新村第四期	p.77-p.96	1930.02	我鄉的事、朝霞（按：即文藝欄）
新村第五期	p.97-p.120	1930.09.07	里中消息、文藝
校友會六週年紀念刊	p.122-243	1930.08.31	前言、會史、章程與職員、六年來會務摘要、比較圖、統計表、文話、六週年紀念大會紀、預算及鳴謝、編者餘筆
第二卷第五期	p.467-498	1930.09	島內事、文藝、里中景、無稽之談、帶信使者、編者瑣言
第二卷第六期	p.499-540	1930.10	鄉的古人傳、島事、文藝、里聞、無稽之談、公開的批信、編完以後
第三卷第一期	p.541-p.576	1930.11	卷頭語、鄉的古人傳、浯江消息、文藝、我們的鄉事、公開通訊欄、編完的話說、編者講話
第三卷第二期	p.577-p.602	1930.12	鄉的古人傳、浯江新聞、文藝、里中景色、編輯的話
第三卷第三期	p.603-p.630	1930.12	鄉的古人傳、浯江消息、文藝、鄉聞
第三卷第四期	p.631-p.664	1931.01	金門雜訊、文藝、鄉聞、珠山通訊社放送室、
第三卷第五期	p.665-736	1931.01	編者的話、島事、文藝、鄉的新聞



第三卷第六期	p.737-766	1931.01	編輯者話、島中消息、文藝、鄉聞、長途電話
第四卷第一期	p.767-804	1931.02	言論、浯島新聞、文藝、鄉聞、長途電話
第四卷第二期	p.805-846	1931.02	短評、島事、文藝、鄉聞
第四卷第三期	p.849-878	1931.04	浯江新聞、文藝、鄉中消息、長途電話
第四卷第四期	p.879-904	1931.04	珠山的消息及浯島、長途通訊、論著、文藝
第四卷第五期	p.905- p.945	1931.05	珠山與浯島、長途電話、論著
第四卷第六期	p.946-990	1931.05.10	新聞、文藝、長途電話
週季工作紀念特刊	p.245-352	1931.06	發刊詞、題詞、序言、珠小概況、前言、論著、學生名錄、編後
第五卷第一期	p.991- 1028	1931.08	論著、浯島之聞、文藝、鄉聞、專電
第五卷第二期	p.1029- 1064	1931.09.10	里中、浯江、文藝、新式話箱、編輯室
第五卷第三期	p.1065- 1083	1931.10	編者、里中、浯江、通訊
第五卷第四期	p.1084- 1120	1932.01	浯江、本社（按：即「鄉聞」）、文藝、航空通訊
第五卷第五期	p.1121- 1168	1932.1.20	浯江消息、里中、文藝
第五卷第六期	p.1169- 1214	1932.02.15	編者的話、浯江雜訊、鄉的事、文藝、電報
第六卷第一期	p.1215- 1264	1932.03.15	開卷頭、浯江、里中、文藝
第六卷第二期	p.1265-	1932.04.18	第壹頁、浯江、里中訊、文藝、航空郵



	1324		電
第六卷第三期	p.1325-1367	1932.05.15	文藝、浯江、珠山、通訊
第六卷第四期	p.1369-1425	1932.06.15	首頁、浯江、文藝、介紹（歌謠）、本社、通訊
第六卷第五期	p.1427-1482	1932.07.15	寄淡菊（代前言）、論著、雛燕、浯江、珠峯、通訊、編輯室
第六卷第六期	p.1483-1548	1932.08.24	前言、鄉聞、文藝、編後、社聞、聲影錄、體育協進社
第七卷第一期	p.1549-1579	1932.09.30	編輯室談話、言論、浯島新聞、鄉聞、通訊欄
第七卷第二期	p.1581-1617	1932.10.31	編輯室話、浯島新聞、鄉聞、通訊欄、
第七卷第三期	p.1619-1648	1932.11.30	編輯室談話、漫談、鄉聞、通訊欄、
第七卷第四期	p.1649-1679	1933.01.03	鄉聞、浯島新聞、通訊欄、雛燕
第七卷第五期	p.1681-1719	1933.02.01	小言、希望、浯島近聞、本鄉新聞、雛燕、通訊
第七卷第六期	p.1721-1749	1933.03.01	浯島新聞、鄉之新聞
第八卷第一期	p.1753-1785	1933.04.01	島之聞、鄉聞、氣象報告、文藝、雛燕
第八卷第二期	p.1787-1820	1933.05.06	島聞、號外、鄉聞、文藝、氣象報告、通訊
第八卷第三期	p.1821-1862	1933.06.01	論壇、島聞、鄉聞、創作、通訊、氣象報告
第八卷第四期	p.1863-	1933.07.01	星洲特約通訊、論著、本島島聞、本鄉

	1892		鄉聞、文藝、通訊、氣象報告
第八卷第五期	p.1893-1922	1933.08.01	論著、浯島、鄉聞、文藝、通訊、氣象報告
第八卷第六期	p.1923-1975	1933.08.24	論著、浯島、珠山、校友會九週年紀念特刊
第九卷第一期	p.1977-2006	1933.09.30	論著、浯江、文藝、珠山、通訊
第九卷第二期	p.2007-2036	1933.10.31	論著、金門島、珠山社、新聞拾零、郵箱
第九卷第三期	p.2037-2066	1933.11.30	言論、浯江、文藝、珠山、島聞補遺、通訊
第九卷第四期	p.2067-2096	1933.12.31	談話、浯江、文藝、珠山、通訊
第九卷第五期	p.2097-2126	1934.01.31	言論、浯島、文藝、珠山、通訊
第九卷第六期	p.2127-2156	1934.02.28	浯江、文藝、珠山、通訊
第十卷第一期	p.2157-2186	1934.03.31	浯島消息、珠山鄉聞、公開通訊
第十卷第二期	p.2187-p.2216	1934.04.30	島聞、珠訊、信箱
第十卷第三期	p.2217-2246	1934.05.31	文化卷之始末談、新聞、浯江集事、通訊
第十卷第四期	p.2247-2290	1934.06.30	浯江潮、珠山事、通訊
第十卷第五期	p.2291-2320	1934.07.31	島中錄、珠山事、通訊
第十卷第六期	p.2321-	1934.08.31	公開談論、浯江消息、文藝、珠山事、

	2342		通訊
第十一卷第一期	p.2343-2374	1934.09.31	時事談座、島誌、論戰、里訊、轉載
第十一卷第二期	p.2375-2416	1934.10.31	著述、島風、雛燕特輯、鄉景、轉載、通訊
第十一卷第三期	p.2417-2436	1934.11.30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公開論戰、浯江波濤、鴻雁
第十一卷第四期	p.2437-2456	1934.12.31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雛燕、金門傳說、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一卷第五期	p.2457-2478	1935.01.31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金門傳說、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一卷第六期	p.2479-2498	1935.02.28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二卷第一期	p.2499-2518	1935.03.31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二卷第二期	p.2519-2540	1935.04.30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二卷第三期	p.2541-2562	1935.05.31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二卷第四期	p.2563-p.2584	1935.06.30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編者話
第十二卷第五期	p.2585-2604	1935.07.30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
第十二卷第六期	p.2605-2620	1935.08.31	灌岩、鄉村即景、吳江波濤、鴻雁
第十三卷第一期	p.2621-2636	1935.09.30	短論、鄉村即景、點心、浯江波濤、鴻雁
第十三卷第二期	p.2637-	1935.10.31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雛燕、浯江波

	2656		濤、海外風情（新增）、金門華僑小傳
第十三卷第三期	p.2657- 2676	1935.11.30	短論、鄉村即景、點心、浯江波濤、鴻雁、海外風情
第十三卷第四期	p.2677- 2696	1935.12.31	短論、鄉村即景、灌岩、浯江波濤、鴻雁
第十三卷第五期	p.2697- 2720	1936.01.31	瞭望、珠村一月、點心、初春的金門、大眾 BOX、椰影留連
第十三卷第六期	p.2721- p.2740	1936.02.29	瞭望、珠村一月、灌岩、仲春的金門、大眾 BOX、椰影流連
第十四卷第一期	p.2741- 2760	1936.03.31	瞭望、珠村一月、點心、季春的金門、金門風俗談座、大眾 BOX、椰影流連
第十四卷第二期	p.2761- 2786	1936.04.30	亞林臭水、灌岩、珠村一月、初夏的金門、金門風俗談座、椰影流連
第十四卷第三期	p.2787- p.2806	1936.05.31	亞林臭水、珠山、點心、仲夏的金門、金門風俗談座、大眾 BOX、椰影留連
第十四卷第四期	p.2807- p.2830	1936.06.30	亞林臭水、珠山的事、灌岩、夏的金門、大眾 BOX、椰影留連
第十四卷第五期	p.2831- 2854	1936.07.31	紀念專輯、珠山、點心、金門各屬通訊、椰影留連
第十四卷第六期	p.2855- 2876	1936.08.31	瞭望、珠山、灌岩、金門各屬通訊、金門風俗談座、椰影留連
第十五卷第一期	p.2877- 2900	1936.09.30	金門風雨談、灌岩、珠山、史料、金門
第十五卷第二期	p.2901- 2924	1936.10.31	金門風雨談、亞林臭水、珠山、灌岩、金門、寄語、椰影留連
第十五卷第三期	p.2942	1936.11.30	亞林臭水、珠山、灌岩、珠山
第十五卷第四期	p.2943- 2968	1936.12.31	寄語、金門風雨談、珠山、灌岩、金門海外消息、金門、本刊九週年紀念特輯



第十五卷第四期 (珠山運動大會 特刊，與12月刊 合刊) <sup>34</sup>	p.2969- 3008	1937.02.30	金門海外消息、金門、珠山
第十六卷第一期	p.3009- 3044	1946.04.30	浯江、八年滄桑錄、里聞、調查
第十六卷第二期	p.3045- 3080	1946.05.31	浯江、本月份物價、八年滄桑錄、故 鄉、調查、海外僑訊
第十六卷第三期	p.3081- 3116	1946.06.30	履淚痕（抗戰史料）、浯江、八年滄桑 錄、故鄉
第十六卷第四期	p.3117- 3152	1946.07.31	履淚痕（抗戰史料）、浯江波濤、八年 滄桑錄、故鄉
第十六卷第五期	p.3153- 3186	1946.08.31	履痕淚痕記、浯江、八年滄桑錄、故鄉
第十六卷第六期	p.3187- 3208	1946.09.30	復校特刊、浯江、故鄉麟爪、八年滄桑 錄
第十七卷第一期	p.3209- 3228	1946.10.31	浯江波濤、故鄉景色、八年滄桑錄
第十七卷第二期	p.3229- 3248	1946.11.30	浯江潮汐、故鄉、八年滄桑錄
第十七卷第三期	p.3249- 3268	1946.12.30	浯江、故里、八年滄桑錄
第十七卷第四期	p.3269- 3288	1947.01.31	金門談座、六六自述、浯江之春、如此 故鄉
第十七卷第五期	p.3289-	1947.02.28	金門談座、答問、六六自述、浯江的消

<sup>34</sup> 有關「合刊」之資訊，見於該期編者〈談談本刊〉一文中，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3008。



	3308		息、天氣報告、故里花絮
第十七卷第六期	p.3309- 3328	1947.03.31	金門談座、六六自述、浯江消息、簡郵、珠小建校、珠小一月、本月天氣報告
第十八卷第一期	p.3329- 3348	1947.04.30	專論、島聞、鄉訊、島上簡聞、本月氣象報告
第十八卷第二期	p.3349- 3370	1947.05.31	論壇、金門島上、本月物價表、本月氣象、故鄉、珠山海外人事調查、海外通訊
第十八卷第三期	p.3371- p.3391	1947.06.30	畫報、論壇、金門島上、島上鱗爪、簡郵、珠山海外人事調查
第十八卷第四期	p.3393- p.3413	1947.07.31	畫報、論述、島聞、珠山花絮、本刊收支報告、珠山海外人事調查、月月運動
第十八卷第五期	p.3415- p.3435	1947.08.31	畫報、論述、金門新聞、島聞拾納、珠山花絮、月月運動
第十八卷第六期	p.3437- p.3466	1947.10.31	特寫、金門消息、島聞鱗爪、珠山鄉聞、珠山海外僑訊
第十九卷第一期	p.3467- p.3495	1947.11.30	畫刊、金門消息、珠山事
第十九卷第二期	p.3497- p.3511	1948.01.05	特訊、金門消息、珠山的消息、月月運動
第十九卷第三期	p.3513- p.3534	1948.02.05	金門島聞、珠山里聞
第十九卷第四期	p.3535- p.3548	1948.03.05	畫報、顯影文摘、金門島聞、珠山小誌、專載、附表、月月運動
第十九卷第五期	p.3549- p.3564	1948.04.10	論著、金門島訊、新聞鱗爪、珠山鄉聞、轉載、月月運動
第十九卷第六期	p.3565-	1948.05.10	社評、公開文件、文藝、金門島聞、島



	p.3580		聞鱗爪、珠山鄉聞、月月運動
第二十卷第一期	p.3581-3598	1948.06.10	特寫、島聞、珠山
第二十卷第二期	p.3599-3616	1948.06	畫刊、金門島聞、金中校聞、珠山、月月運動
第二十卷第三期	p.3617-3633	1948.07	論著、金島風光、金中校聞、珠山、
第二十卷第四期	p.3635-3649	1948.08.31	告讀者、金門消息、島聞集納、學府風光、海外通訊、珠山、詩葉
第二十卷第五期	p.3651-3667	1948.10.15	論著、金門消息、島聞拾納、學府風光、珠山、詩文
第二十卷第六期	p.3669-3683	1948.11.30	特載、金門筆談會、金門消息、島上集聞、本月市情、珠山
第廿一卷第一期	p.3685-3702	1949.01	月月運動、意見表、金中校聞、金門島聞、島聞集納、土產市情、珠山
第廿一卷第二期	p.3703-3716	1949.02	小說、金門島訊、海外僑訊、壹月市情、珠山花絮、月月運動
第廿一卷第三期	p.3717-3730	1949.02	言論、燕南碎語、金門島聞、代郵、簡訊一束、海外僑訊、珠山花絮
第廿一卷第四期	p.3731-3748	1949.03.31	燕南碎語、金門新聞、島聞納集、金中校聞、市情概況、珠山花絮
第廿一卷第五期	p.3749-3766	1949.05.31	燕南碎語、金門初夏、島聞集納、各鄉通訊、特訪、五月金風、經濟之頁、金中校聞、珠山花絮

不難注意，以上整理的「欄位」資訊看似雜亂無序，然若以「功能性」為繩準，這些顏色各異、名稱不一的欄位可粗分為：輿論、新聞報導、文藝、通訊、調查，此處先簡介這些欄位的概況與功能。首先，本文將所有以臧否時政為當務

（而非僅作快訊報導）的文章，統一視為「輿論」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大多配有醒目的欄目標題和較大字體，但也有少數輿論性的內容未標明欄目，應為例外。<sup>35</sup>這種欄位命名的「隨意性」反映了，每期在編輯上是否專設「輿論」一欄，端視稿件之有無，以及編者的個人取捨。總言之，「輿論」欄位雖非《顯影》常駐專欄，卻可視為金門史上第一個公共政治評議平臺，展現出對地方社會建設高度重視的基調，並使其成為知識份子理念傳播的平台，呼籲海內外金門人關注家鄉的發展，鼓勵僑匯資金往家鄉挹注。

《顯影》的新聞報導欄位，主要分為鄉聞與島聞，前者在主題上大致包含：婚喪喜慶、旅外消息、社會風俗、活動紀實、教育新聞、鄉里軼聞、地方建設、治安事件、地方農業、市場行情、天候氣象等；後者則主要是有關社會風俗、政商情形、地方消息、教育建設、公共衛生、治安事件。這些報導最初應海外珠山同鄉對故鄉資訊的需求而設，篇幅主要集中於鄉聞，與《顯影》面向海外讀者的自我定位相契合。隨著《顯影》在海外金僑社區的知名度提升，該刊物逐漸被視為金門僑商必讀的刊物，<sup>36</sup>此反映了其文化與社會功能的轉變。淡菊（薛前璧）在 1932 年 6 月的〈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中指出，當時金門未有正式報業存在，而《顯影》實際上已承擔地方報紙的角色。他提倡《顯影》應增加新聞報導與輿論內容，啟迪民智，讓島內民衆瞭解世界大事，以務去「醉生夢死」之狀態。<sup>37</sup>此論述不僅重申了報紙作為文化啟蒙的重要媒介，也象徵著《顯影》漸漸從服務海外僑商，轉變為面向島內大眾的時事消息刊物。

《顯影》文藝欄位在由丞祝、施伍、澤人主編的第一至十五卷時，是亟力經營的一塊，其內容以白話新文學創作為主，包含新詩、散文、小說，兼具浪漫與寫實主義之作品，亦不乏民間歌謠之蒐集、南洋文化實態之網羅，並引介多

<sup>35</sup> 此處，筆者整理了符合「輿論」實質內容之欄目標題如下：論著、論壇、言論、漫談、公開談論、時事談座、短論、瞭望、著述、亞林臭水、論戰、公開論戰、金門風俗談座、金門風雨談、金門談座、專論。

<sup>36</sup> 隨著《顯影》的聲名在海外金僑社區的傳開，使《顯影》作為「一切金門僑商者的讀物」一度成了編輯的主要方針，詳見《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479。

<sup>37</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375-1377。

國外文之譯作，僅有少數為古典詩作品。相關文藝欄位有以珠山著名地標為命名的「灌岩」，署名「浯花文藝社」所共同經營的「點心」等，此外，亦開闢了「雛燕」作為珠山小學學生作文的發表園地。本文認為，《顯影》中的文藝作品，是當今碩果僅存的，有關民初金門現代文學之重要文獻，當可視為金門現代文學之起點，相關論述將於本文第四章進行。不過，自 1946 年第十六卷由薛崇武主編的「重光號」肇始，至 1949 年 5 月底所發行的第二十一卷第五期止，文藝的篇幅悉遭蠲去。

如〈發刊詞〉所云，為著「鴻來雁去，準期不斷」之效，「通訊」欄之創辦，提供了僑鄉與僑居地的鄉民之間魚雁往返的功能，此即前述珠小「通訊社」設置之本意，此不贅敍。而除了書信功能，通訊欄也扮演了類似「佈告欄」的角色，以便於校友會這樣的宗親機構發布鄉親勸募之新聞，或刊登捐款的收支明細，以表謝誠；這類的欄位如發佈於第一卷第二期的「郵差」，<sup>38</sup>文中報導珠小修造會計劃修築入鄉要途之宮橋潭墘，請列位海外徵收員向同鄉徵收相關之營運款項。有時，也增加如「問答」這類的欄位，提供海外人士對故鄉資訊之詢問；<sup>39</sup>或是所謂的「媒婆」欄位，讓海外同鄉互相分享地址，以便互報旅況。<sup>40</sup>

另一個承任「互通聲息」任務的欄位是「調查」欄，為回應旅外鄉僑對故鄉訊息的渴求，特地蒐集統整當前之物價資訊，這部分不僅包含菜價與民生用品，<sup>41</sup>甚至聘請勞工、娶妻之開銷皆在記載，<sup>42</sup>此外更有當月氣象調查、人口調查、<sup>43</sup>全縣小學常識測驗分數等，<sup>44</sup>各式琳瑯奪目的資訊皆刊載於「調查」欄位。

<sup>38</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73。

<sup>39</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143-150。

<sup>40</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71。

<sup>41</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17。

<sup>42</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75-76。

<sup>43</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357。

<sup>44</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卷，頁 455-458。

## 二、南洋地區的接受與迴響

《顯影》創刊初期，廣泛得到鄉僑的歡迎與迴響，如來自菲律賓衣里岸的薛永浪，即於「郵筒」欄位留言道：

通訊社執事先生：

你們努力創辦珠山月報——顯影——引動旅外同鄉有了思鄉的念頭！對旅外僑子利益多矣，因念初次成立，對於經濟方面，當然缺乏，我按每期津貼貳元（全年貳拾肆元）以作永遠經費，此刻先寄上半年之額拾貳元，到此查收……。<sup>45</sup>

薛永浪（1872-1944）為創刊人薛福緣之弟，跟隨兄長赴菲經商。<sup>46</sup>從其對於《顯影》的資助，可見《顯影》對旅外鄉僑有其重要的情感意義，這份情感的基礎無疑支撐了僑居地的洋客願意投資僑刊資金的動機。不過，《顯影》的支持者與主要閱讀者，應也不僅僅是珠山的同鄉，從第八卷第六期的「校友會九週年紀念特刊」所描寫得見一斑：

惟是同鄉去國日久，對於故鄉事物之演進，關懷殊切，因有顯影之刊行，各方狀態，得以知悉，故每當《顯影》抵星之日，金門僑胞索閱者，紛至沓來，區區則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然則顯影之見重於人，詎容忽視哉？<sup>47</sup>

此不僅可證實《顯影》在僑居地受歡迎之程度，文中更描述「金門僑胞索閱者紛至沓來」，可知索閱《顯影》者應不限於珠山薛氏里人，也包含金門其他聚落的僑民。在南洋金僑社區如此受歡迎的一份刊物，讓人樂意主動捐資，協助運作，甚至推薦通訊社更新印刷設備：

<sup>45</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92-293。

<sup>46</sup> 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97、3316。

<sup>47</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1955。

通訊社先生鑒：近日顯影月刊其中種種設施堪稱完善，惟用舊式印刷機刊印，甚緩且多費時間，為便利計，最好須置一較敏捷形式印刷機，西名（momeograph），但要置此機，須賴XXX方易辦到，XXX等曾共商一種辦法：先向里中熱心者募捐，無論多少，若是不敷，藉由爾等三人負責，望XXX，敢於諸位竭力進行，俾得早觀厥成。<sup>48</sup>

不過，《顯影》的受衆並不拘於海外僑居地，作為維繫僑鄉與僑居地的重要公共交流平台，《顯影》受衆也包含了本地居民以及金門全島，而作為珠小校友會的「校刊」，其受衆亦應當將珠小的學生納入。<sup>49</sup>

「重光」後的《顯影》，由於刊登薛福緣《八年滄桑錄》、《履痕淚痕記》等與「日本手」時期相關的文章，在南洋的金僑社群中引起巨大迴響，能見度大為提升，自是，《顯影》的發行量有如指數型飆漲，受歡迎之程度甚至超越了停刊以前。根據1933年8月第八卷第六期中所刊載之統計，從1928年首發刊的其後五年，發行數量僅從原先每期發行的45本，增加到65本，計寄發到菲律賓22份、印尼15份、國內9份、島內6份、馬來亞與新加坡6份、暹羅2份。<sup>50</sup>十一卷第六期時已改為鉛印，並增加到100份，<sup>51</sup>又據第十三卷第三期的「鴻雁」欄位，可知其時的發行量是150份，<sup>52</sup>十四卷時增至200份，<sup>53</sup>重光以後，至第十九卷第二期，其發行數量已激增至600份，甚至目指千份。<sup>54</sup>面對日益龐碩的發行量，《顯影》於第十七期第五期發起了所謂的「月月運動」，期能另闢一欄位以便募款，其規則如下：

一、一人獨捐菲幣五十元，除在顯影刊登鳴謝外並特別指定某一期為某先

<sup>48</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355。

<sup>49</sup> 《顯影》不僅是提供海外僑胞與金門僑鄉通訊的橋樑，也是珠小校友會的「校刊」。

<sup>50</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1950。

<sup>51</sup> 詳見該期最末頁左下角「印數」欄，《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頁2497。

<sup>52</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2674。

<sup>5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2832。

<sup>54</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九卷，頁3506。

生紀念號，且在封面封背刊登其個人行述（小史）。



二、二人或二人以上（最多不過五人）合捐菲幣五十元，除刊登鳴謝外並特別在某一期之封面印明某某先生紀念號。

三、如捐助菲幣十元以內者除刊登鳴謝外，並享有本刊長期閱讀權利。

四、如有各商店樂助菲幣五十元者，可得用顯影第一版全面介紹該商號之營業範圍，全體職員以及一切……。

五、其他如節省各種喜慶賀儀移充顯影之出版經費者，我們更要加以特別褒揚，以永流萬芳。<sup>55</sup>

在經過兩期「月月運動」的呼籲後，終於第十八卷第二期募得捐獻，乃由惠安埭村莊建成響應捐贈三十萬國幣，以感念家叔父曾與珠山華僑薛福緣合夥創辦岷埠泰記公司的情份。<sup>56</sup>往後每期《顯影》皆響應「月月運動」，不僅讓捐助人得獲「名利雙收」，<sup>57</sup>使他們有機會宣傳自營商號，並刊登玉照以資紀念；另，「月月運動」亦旨在紀念珠山薛氏知名僑紳，如第十九卷第五期紀念於菲律賓創設永昌協記公司有成的薛永棟，<sup>58</sup>同卷第四期為其長兄薛永南先生之紀念號，<sup>59</sup>第十八卷第六期則紀念《顯影》創辦人薛永乾先生。<sup>60</sup>月月運動的推行，不僅使《顯影》解決了資金來源的問題，也增進了刊物與讀者、僑胞之間的情感繫聯。自是，《顯影》的編者與讀者群體，不會僅是單向的關係，透過跨國訊息與僑匯資本的雙向流通，《顯影》的刊物運營，帶有情感與資金互惠互利的性質，支持著一個跨國僑公共空間的形成。

---

<sup>5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08。

<sup>56</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50。

<sup>57</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48。

<sup>58</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564。

<sup>5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548。

<sup>6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466。

### 第三節 編輯人與投稿者介紹



本節將從刊物歷代的編輯者包含薛丞祝、薛永麥（施伍）、薛健椿（澤人）、薛崇武、張夢我、顏西林，以及具備報業背景，對《顯影》的編輯走向進行了多次建議的重要投稿者薛殘白（淡菊）進行介紹。由於他們大多數既是編輯者，亦是刊物裡投稿的常客，本節將以個案分析的方式分別介紹他們，期能透過對參與刊物的知識分子展開較為深入的介紹外，也試圖勾勒出 1920 至 1940 年代金門知識文化團體的輪廓與風貌。

#### 一、薛丞祝

薛丞祝（又名「承爵」），生於 1903 年，<sup>61</sup>為薛福緣之子，與薛崇武為兄弟，畢業於廈門集美商科，<sup>62</sup>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二卷第六期止擔任總編輯之職，並兼任校友會幹事長，致力珠小校友會會務多年，並曾擔任珠小 1933 學年度校長。1935 年，因菲律賓商況不景氣，決意南渡考察，同時為《顯影》籌謀資金。<sup>63</sup>丞祝南渡後，澤人屢次透過刊物中的通訊欄位向其詢問編務之事，顯見其之於《顯影》的重要性。<sup>64</sup>中日戰爭後，於衣里岸擔任「建國匯兌信局」代理人，並囑咐《顯影》儘早恢復鉛印。<sup>65</sup> 1948 年，珠小正籌措新校舍的興建，其時丞祝任職於菲律賓同鄉會，同里人薛芳城向菲律賓同鄉大力勸募，集得工程款共計美金二萬多元，作為遠在異鄉的「洋客」，他們時時心心念念著故鄉，對於珠山的教育事業不遺餘力。<sup>66</sup>

<sup>61</sup> 《顯影 (Shinning)》第九卷，頁 1991。

<sup>62</sup> 《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52。

<sup>63</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41。

<sup>64</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十五卷，頁 2719、2922。

<sup>6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149。

<sup>66</sup> 參見林麗寬主編，《中華民國八十六年金門縣珠山社區總體營造采微成果專輯》（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06），頁 49；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頁 203-204。

## 二、薛永麥



薛永麥（1906-1984），筆名施伍、施偶、琳等，其生於 1906 年，父薛如岡在清末即赴衣里岸經商致富，<sup>67</sup>卻不幸早逝；<sup>68</sup>其曾祖父薛師弼為知名鄉紳，曾勸募建設後浦育嬰堂，曾叔祖薛師儀則為清咸豐年間金門總兵，無怪乎施伍自傳中稱其家境為「滿清時曾為官樣門第」；<sup>69</sup>兄長薛永叡曾任新加坡華僑中學校長多年，期間經歷中日戰爭，為傑出的華僑教育家。<sup>70</sup>施伍自言九歲進入「珠山塾學」讀書，其時塾中施以舊式教育，令其惡讀書而愛繪畫，越六年丁母憂，進入鼓浪嶼小學就讀三日，因初次外出不慣，旋返故里珠山小學，其後輾轉就讀於鼓浪嶼養元、普育小學。小學畢業後，入鼓浪嶼尋源書院，肄業，入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攻研美術，<sup>71</sup>師從東亞知名畫家楊賡堂。一年後轉入菲律賓大學美術科，成績卓越。<sup>72</sup>1928 年，再轉入廈門大學法律系，同年假期返鄉，患熱病近半年，自覺不久於人世，不意竟與《顯影》結下緣分，如其自述：

記得很清楚，當時我是萬急的病中，從門外送來了一本印刷品，勉強提起來了一下，知道是故鄉的出版物出世了，頭雖說很痛，但是為了一點的熱望便把牠一口氣閱讀下去……《顯影》不但我沒有功勞，反倒我受顯影的恩惠實在不淺，當時我病癒在故鄉休養，自己進修中國文學，每天都有一個時間閱讀和習作，於是我一些練習的幼稚文章，使得在《顯影》月刊發表……為了現在我要表露我和顯影有密切的關係，使我不說我也曾經編過《顯影》的一個時期，記得那時我從廈大放暑假回來，《顯影》的缺

<sup>67</sup>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九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468。

<sup>68</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1777-1778。

<sup>69</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1810。

<sup>70</sup> 其兄永叡曾留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教育學士學位，1936 年底以前，已在廈門大學高中部任會計部主任十餘年。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56。

<sup>71</sup> 施伍在自傳文章〈我的生活〉中稱其時為「鏡同畫室」，見《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1852。

<sup>72</sup> 江柏煒，〈文化漫遊者：藝文創作家施伍（薛永麥）〉，《金門日報》，2019.09.23，第六版（參考自：<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310596>，檢索日期：2025.07.07）。

乏人去編輯，我不得不暫時充任，我敢斷定我所編的幾期，是很壞的，因為我對於中國文還未有相當的把握。<sup>73</sup>

在施伍的自傳〈我的生活〉中可以窺知，其童稚時期的入塾生活不甚順遂，再加上天性嗜繪畫、浪漫不拘的個性，「中國文學」顯然是未能在童稚時期掌握。碰巧病滯珠鄉，于他接觸《顯影》之機會，不曾想其中文藝欄能激發他對文學的喜好，於是「自己進修中國文學，每天都有一定的時間閱讀和習作」。也因此，1930 年重返廈大時，施伍選擇轉入文學系。其後某次學校放假返珠山時，又因「戀愛」而滯金，後參與金門自治區籌備，以及金門地區的訴訟案件，時時出入縣府，儼若政客。後自忖於政界格格不入，遂返廈大轉入社會系，最終順利畢業，取得廈大社會系文學士學位。<sup>74</sup>

施伍於《顯影》中承攬編務工作應從第二卷第六期主編文藝欄始，<sup>75</sup>從《顯影》逐期的編後言來推斷，其主要的編務應著重在文藝欄位。<sup>76</sup>不過，主編薛丞祝因商務需要時常往來南洋之間，施伍有時也須全權承攬編輯全刊之務。如在第五卷第四期卷頭，施伍即自我鼓勵式地，寫下自身擔任主編的期許：

我相信我自己如果得久住故鄉，我總能記得要離開渡斐的祝君（按：即為薛丞祝）的話：『伍啊！離別是暫時，顯影是海外的嚮導』，我能負這個專職吧。<sup>77</sup>

其時當施伍往來金廈之間，忙於學業與編務之時，主編承祝與施伍年齡相差三歲，又同為珠小校友會發起人，二人情同兄弟、相互提攜，這種同鄉情感的鞏

<sup>73</sup> 參考施伍〈我與顯影〉，《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66。

<sup>74</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2341。

<sup>75</sup> 〈編者瑣言〉，《顯影（Shinning）》第二卷，頁 497-498；《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 2121。

<sup>76</sup> 《顯影（Shinning）》第三卷，頁 727；《顯影（Shinning）》第四卷，頁 825；《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 2121-2122。

<sup>77</sup> 《顯影（Shinning）》第五卷，頁 1085。

固，是珠小校友會、僑刊《顯影》等同鄉組織最重要的維持。



而除身肩《顯影》編務外，施伍亦闖蕩金門文化界，積極從事文化事務，於《顯影》、《埠廈報》、《浯江》等報刊上發表文學作品、評議文章與翻譯文學，尤其更擔任由「金門建設協會」所創辦之《浯江》月刊的總編輯，<sup>78</sup>金門初中（金門私立初級商業職業中學）1934學年度教員，<sup>79</sup>以及該校成立的「南洲文學研究社」社長。<sup>80</sup>任《浯江》編輯之同時，施伍亦積極於該刊引介金門本土文人邱葵（號釣磯）、蔡復一、林豪以及明末遺老盧若騰等之古典詩作，並有計劃地編選、出版《釣磯詩選》。<sup>81</sup>除了對金門文史的引介與推廣，畢業於廈大社會系的施伍也善用其所學，撰有《金門社會》一書，<sup>82</sup>書中多部分內容推測為發表於《浯江》月刊之一系列文章，如〈金門人口概談〉、<sup>83</sup>〈閩南婚姻問題之研究〉等。<sup>84</sup>

1936年2月，施伍兼任珠山小學校長，<sup>85</sup>1937年，施伍南渡新加坡，根據第十六卷第二期的記載，其在「重光」後曾任職於星洲浯聲貿易公司，<sup>86</sup>亦擔任《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新國民日報》等報館編輯和通訊記者之職，並以施伍、南鰲、林似吾等筆名發表文學作品、美術創作於星、港等地報章雜誌。<sup>87</sup>施伍曲折的生涯探索歷程，不僅反映了他的浪漫天性，其從一個遠赴菲律賓求學、「洋裏洋氣」的知識青年，如何因受到《顯影》與中國文學的感召，而產生對地方的認同，並展開其文化建設事業，是本文嗣後繼續關懷與研究的重點對象。

<sup>78</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19。

<sup>7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卷，頁 2341。

<sup>8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73。

<sup>8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416；《浯江》月刊第二卷第四期（金門：金門建設協會，1934.06.15），頁 9。

<sup>82</sup> 《顯影 (Shinning)》第六卷，頁 1476。

<sup>83</sup> 施伍，〈金門人口概談〉，《浯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金門：金門建設協會），頁 9-10；《浯江》月刊第二卷第一期，頁 10-11。

<sup>84</sup> 《浯江》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 4-5；《浯江》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 2-3。

<sup>8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728。

<sup>86</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078。

<sup>87</sup> 江柏煒，〈文化漫遊者：藝文創作家施伍（薛永麥）〉，《金門日報》，2019.09.23，第六版。

### 三、薛健椿



薛健椿，筆名澤人、冰、秋痕，又名健吞，廈門同文書院肄業，<sup>88</sup>為《顯影》五卷一期至第十五卷第四期之主要編務人員。<sup>89</sup>在鼓浪嶼求學期間，澤人自言因受到國文講師「對舊文學與新文學的詳解」，而開啟對文藝的興趣，同一時間正好接觸了故鄉《顯影》的文藝欄，便躍躍欲試。從其自述中，可以窺見《顯影》對珠山留外學子所造成的影響：

那時「顯影」的徵稿對於鄉留外青年文藝的注意，可達最高點，同時各個留外青年在影刊方面是感到新的氣味，所以每期的副刊都是極形的活躍，我那時因為自己筆端薄弱，作品的爛調，是我自愧不敢寄投文詩，於該刊的庇股，到後來因為影刊編者要留外學生都寫稿，我那時以極幼稚的詩篇寄去，但是不久我就自悔不該寄牠，……，可是有時我也寄去一兩篇，不過這可謂無聊的塞責吧！<sup>90</sup>

此外，在第十五卷第四期《顯影》九週年紀念刊上，澤人的〈我與顯影〉一文，詳細地記載了他對《顯影》的經營始末：

暑假放後，影刊的編者祝君渡菲，那時我正因身體欠佳不想重登「黃金時代」之宮，我算是失學，該刊的編務正起了恐慌，於是我就毅然約了里人，共同負起這任務，但是那種油印與謄寫的困難，幾乎難倒了我們這幾個人，當出版五卷一期，我發現印務上與編輯許許多多缺點，不覺志為之鈍，及後二期三期漸漸的純熟，我就放心的做下去，然而那時的謄稿與編輯真可謂之稚子嬉筆了，最困難的是當缺乏文藝材料的時候，自己要動筆來寫，平素對於筆是感到缺乏營養素的我，在勉強的掙扎中拖泥帶水的一篇又一

<sup>88</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卷，頁 2335。

<sup>89</sup> 在施伍〈寄承爵〉中提到澤人「已寄出第一期，第二期在進行中」，見《顯影 (Shinning)》第十卷，頁 1029；澤人自云在十二卷第六期承祝去職後，自云「這給我以極大的打擊，煞像是失去了一個臂膀……。」見《顯影 (Shinning)》第十卷，頁 2656。

<sup>9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63。

篇，這真是以增自己的醜陋，到了六卷來編有點而慣了，抄印的工夫也進一步，於是我就實行雙色印，在插圖方面也比較新穎，可是在文詞筆法，我終感到生疏，那時海外讀者漸漸增加，我親自謄寫親自印釘，每天的大部分工作，都費掉在刊的方面，我終是以毅然的精神，跟著準時出版，雖然有時篇幅不定的增縮，如此，接續到六卷六期，因為我向學的心尚未全死，於是再勉強的方下影刊入廈續學，在 T 校（按：廈門同文書院）我每念起我們的鄉刊，幸虧一些剛從南國回鄉的鄉親，代我肩起這責任，並且每期都寄給我，使我無任的欣慰，我默祝，願我們的刊得以長生不死。

從澤人的自述中，不僅處處顯露其對《顯影》的喜愛與不懈付出，亦得見《顯影》這樣的鄉僑刊物之於培養地方文學青年的關係。此外，該文也描繪了《顯影》在欄位與編輯方式上的變遷，而《顯影》在十五期第四期以前針對文藝欄的苦心經營，也大半經由澤人之手。1937 年，澤人南渡新加坡，<sup>91</sup>據第十六卷第二期的記載，其在「重光」後曾於印尼爪哇島南眉包芝埠任中華學校任教師，<sup>92</sup>而又據族譜載，其後則再次轉往定居蘇拉威西島（Sulawesi）的望加錫（Makassar）。

93

#### 四、薛崇武

薛崇武（1916-2004），筆名魯魚、鯀文、阿迪、迪明，為薛福緣之子、薛丞祝之弟，自幼就讀於珠山小學，並在《顯影》的文藝欄「雛燕」中發表文章。在《顯影》第一卷第一期中，同級（秋五級）的學生由兩位教師帶隊至廈門旅行，獨他留校代做「臨時教師」，因作〈臨時教師〉一文，內容展現其早熟與早慧的形象。<sup>94</sup>珠小畢業後，崇武入廈門集美中學、<sup>95</sup>廈門大學高中部、<sup>96</sup>廈門廣濟大學

<sup>91</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95。

<sup>92</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078；《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85。

<sup>93</sup> 參考《金門薛氏族譜》，頁 280。

<sup>94</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63-64。

<sup>95</sup> 見〈留外行蹤〉，《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231。

<sup>96</sup> 見〈一九三六年留外一批〉，《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726。

預科，<sup>97</sup>以及廣西大學農科。僅讀一年便遇上中日戰事，戰後，返珠山任珠山小學校長，並致力於推動珠小新建校舍，並致力推動《顯影》的復刊，是《顯影》第十七卷至二十一卷之總發行人。1947 年金門中學復校，受聘為庶務主任；1950 年，出任金門縣金山區區長；1958 年八二三砲戰時，由政府安排疏遷至臺。<sup>98</sup>

崇武對珠山的文化教育事業頗為關心，可說是畢生職志亦不為過。在其 21 歲旅桂留學時，便時常投稿《顯影》，其中〈廣西的教育事業〉一文對作為「廣西六年計畫」的國民基礎教育、幼兒教育與成人教育以及廣設學校機構的教育事業多有推崇，也特別關注各領域專業人才的培育，<sup>99</sup>此番取經，對其後來於珠山的教育事業構想，影響深遠。此外，崇武於文藝欄「點心」與「灌巖」上筆名「阿迪」或「迪明」，亦發表「地方通訊」之類的文章，旨在介紹其留學遊歷之見聞，如〈廣西的一般觀察〉；<sup>100</sup>又，他亦發表些許文藝作品。作品在光復後，其不僅擔任珠小校長，更致力於金門中學教育事業，以及籌措珠山小學新校舍之鳩工庀材等事宜。其夫人王錦羨女士在珠山社區總體營造訪談時說道：「崇武很愛孩子讀書」，一句簡單的話，道出了珠鄉先輩一生的犧牲奉獻的形象。<sup>101</sup>

## 五、張夢我

張夢我（1900-1948），本名張維熊，是民初金門教育界泰斗，出身北平燕京大學，曾任吉蘭丹（Kelantan，位於西馬北部）華僑銀行行長，金門縣教育局長、金門中學校長、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金門縣立小學校長等。<sup>102</sup>1937 年，張氏被派赴福州校長訓練團受訓，是年金島淪陷，其為營救淪陷區的家眷，故由榕奔廈，隱居於鼓浪嶼。翌年廈門失守，日軍搜捕抗日的知識分子，張氏三

<sup>97</sup> 見〈留外學生總計二十三人〉，《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861。

<sup>98</sup> 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頁 206。

<sup>99</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881。

<sup>100</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821。

<sup>101</sup> 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頁 203。

<sup>102</sup> 張夢我先生逝世於 1948 年 11 月 4 日，詳參《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76。

度被捕，苦受毒刑。金島光復後，積極於籌備金門中學復校事業，是民初金門地方重要的文化知識份子。<sup>103</sup>

《顯影》自第十七期起，於刊物封面加入西文名稱「Shinning」，即為張夢我之相贈，不僅含有「耀光燦爛，或作顯著、昭彰，使奸邪無所遁形」之寓意，更契合刊物名「顯影」之音譯。<sup>104</sup>此外，自《顯影》第十七卷第一期至第十八卷第六期，張夢我皆掛名為《顯影》之編輯者，此段時間，其將《顯影》視為島上立場最公正的定期刊物，並致力於《顯影》在島聞上的增加，故亦協助擔任《顯影》記者之職。

<sup>105</sup>

## 六、顏西林

顏西林（1919-2012），筆名紫峰，為薛福緣之外甥、薛永乾之女婿，<sup>106</sup>與珠山淵源甚深。顏西林不僅在《顯影》第十八卷第二期至第二十一卷第四期身兼記者與編輯，亦是在金門軍事管制時期保存《顯影》的最大功臣。據珠山耆老薛芳千所言，身為珠山鄉外甥兼女婿的他，對於珠山村中任何修橋鋪路乃至於公益事業，往往是一諾無辭、二話不說。<sup>107</sup>與薛崇武同樣有著教育家關懷的他，在「重光」後大力發起金門中學復校，加上身為《顯影》編輯暨記者，善用刊物提供的公共發言空間，發表呼籲復校的文章〈談談金門中學生〉，<sup>108</sup>擔任金中（金門中學）復校委員會之董事；此外，其亦撰文統整了金島光復後的小學教育概況，<sup>109</sup>並為珠山小學籌建校舍事致詞催妝。<sup>110</sup>1949年，顏氏加入金門民防

<sup>103</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3677。

<sup>104</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3210。

<sup>105</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3210；《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3677。

<sup>106</sup> 參閱《顯影》報載：「永乾之女黎明今日與存德（按：中藥房之名）顏臣宦之三公子顏西林訂婚。」《顯影（Shinning）》第十六卷，頁3061。

<sup>107</sup> 薛芳千，〈緬懷賢達顏西林〉，《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17048>，檢索日期：2024.07.05）。

<sup>108</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3314-3315。

<sup>109</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3331-3334。

<sup>110</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3372。

組織消防隊，並於 1951 年擔任隊長，<sup>111</sup>其後三代咸投入義消行列，<sup>112</sup>在金門近代史上留下了彪炳的功績。

## 七、薛殘白



薛殘白（1911-2002），原名前璧，筆名淡菊（殘白亦為筆名），少時赴廈門同文書院求學，父親薛紹窩（又名薛廷鍋）在當地經營名為「金振興」的火鋸廠，英年早逝。為接收父親遺留下來的資產，十七歲的殘白（1928）偕母親南渡新加坡，甚至向同文書院請長假，<sup>113</sup>不料此行以後，再回到金門已是 1935 年，從此便未回過故鄉。<sup>114</sup>後輾轉至《南洋商報》擔任校對員與記者，出入於中華商總會、怡和軒俱樂部與福建會館之間，培養了廣大的文化界人脈。其後轉至《星洲日報》任職，並協助《星洲日報》、《匯總新報》、《星中日報》撰寫新聞稿，期間於《匯總新報》發表華人報業研究史研究論文《星洲華僑報業叢談》，堪稱新加坡華人報業研究史先聲。除外，殘白亦在星洲當地「工商補習學校」擔任教職，<sup>115</sup>並擔任新加坡金門會館之幹事，<sup>116</sup>以及星洲「浯聲勵進社」所創辦之《浯聲》月刊總編輯。<sup>117</sup>而除了致力於新加坡華人文教事業、金門同鄉會務外，殘白也協助擔任《顯影》駐星洲記者，<sup>118</sup>並不吝以筆名「淡菊」在《顯影》上發表文章，給予草創期的《顯影》諸多改善建議，包括：建議鉛印、多增「實用文藝」、加強海外與金門島內各地的通訊報導，以及「介紹南洋土人習俗文化」，「多寫學校日記」與紀錄金門歌謠等，並獲得《顯影》編輯之採納，著實影響了《顯影》的刊物運作

<sup>111</sup> 金門縣消防局，〈義消人員介紹〉（來源：<https://kmfb.kinmen.gov.tw/cp.aspx?n=5372310519D558A8>，檢索日期：2024.07.05）。

<sup>112</sup> 李金鎗金城報導，〈消防局表彰顏西林生前傑出貢獻〉（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17070/>，檢索日期：2024.07.05）。

<sup>113</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39。

<sup>114</sup> 楊樹清，《金門族群發展》，（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 323-326。

<sup>115</sup> 參見許振義主編，《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2015.03），頁 171；《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41。

<sup>116</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0。

<sup>117</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卷，頁 2192-2193。

<sup>118</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792。

與構思。<sup>119</sup>以上可見，身為報人的薛殘白，深知報刊之於地方建設、文化啟蒙的重要性，自然願意將其自身在新加坡從事報業的經驗回饋家鄉，而除了提供稿件外，在資金贊助上也時時身體力行。<sup>120</sup>

根據金門報導文學家楊樹清於 1996 年清明時節親赴星洲訪談薛殘白的專文，1942 年日軍南侵新加坡，殘白與其時同在《南洋商報》服務的著名文人郁達夫（當時化名趙廉）相偕南逃，在流離印尼諸多島嶼後，最後抵達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巴爺公務（Payakumbuh），薛殘白也見證了郁達夫被日軍秘密殺害的歷史。二戰後，薛殘白返回新加坡，擔任由《南洋商報》所推出的系列文藝性刊物《星期六周刊》之主編，邀來了易君左、徐訏、劉以鬯、李輝英等著名文人定期供稿，儼然其時南洋華人報業文化圈的「文壇大佬」。其自身亦曾撰文抨擊臺灣當局在金門軍事管制期間的政策，被列為「黑名單」。<sup>121</sup>後新加坡金門會館在 1986 年出版《金門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一一六週年紀念特刊》以及 1990 年出版《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時，皆邀請其擔任主編，為新加坡的金門裔華人貢獻了許多心力。

122

## 小結

本章敘陳了金門珠山創辦僑刊《顯影》的歷史以及社會背景，包含珠山鄉人「下南洋」的歷史因素，而僑刊《顯影》的發行，即始自珠小通訊社之與海外鄉民之間的互通有無；南洋地區讀者的熱烈迴響，乃至於鄉僑對故鄉發起贊助、建議、關注，則說明了《顯影》使得遠在異地的遊子在那個通訊科技尚不發達的年代，仍能透過僑刊建立起與異鄉與故鄉的聯繫。故此，遠在南洋的出洋客樂意響應如「月月運動」這樣的刊物資助活動，使《顯影》這樣的僑刊成為了跨國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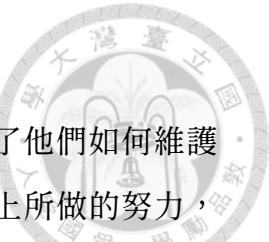
<sup>119</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373-1380。

<sup>120</sup> 參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40；《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28。

<sup>121</sup> 楊樹清，《金門族群發展》，（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 323-326。

<sup>122</sup> 參見楊樹清，《金門族群發展》，（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 323-326。

與僑匯資本的流通平台。



本章後半段透過介紹參與《顯影》的幾個重要編投者，回顧了他們如何維護與運營《顯影》，以及他們對民初的珠山與金門在文化建設工作上所做的努力，無論是三位編者施伍、澤人、崇武之文藝啟蒙到參與故鄉的文教事務，或是張夢我、顏西林這二位對於民初金門教育界有過巨大貢獻的人物，以及遠在南洋報業界，將其專業的報人視野回饋給故鄉僑刊的薛殘白。本章業已勾勒出 1920 至 1940 年代金門知識文化團體的輪廓與風貌，接下來兩個章節，將更仔細地描繪《顯影》這份刊物，如何與民初金門文化、物質、制度現代化的建設歷程息息相關。

### 第三章 作為多元媒介的《顯影》



本文第二章已說明，在電訊通信與國家郵政仍不發達的年代，金門珠山的鄉里自治組織（校友會通訊社）是如何在近代僑鄉社會中承擔起了跨洋的魚雁往返、促進訊息、同鄉情感交流的使命，並孕育了僑刊《顯影》的誕生。到了本章則將運用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的觀點，試圖定位其在僑鄉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與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的建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並將透過三個小節來論證《顯影》作為多元的媒介，其功能為何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訊息交流，而成為了金門僑鄉近代史上的重要文化載體，並參與了地方社會的治理，反映了跨國（transnational）或者跨地方（translocal）社會空間的形塑。換言之，《顯影》從最初服務金門珠山宗族聚落、促進地方教育建設的宗旨，到隨後逐漸擴及全島，並連結南洋僑居地的離散社群，其發展過程無疑體現並記錄了僑鄉社會現代化的多重生成脈絡。

在思考技術媒介如何於僑鄉社會的公共溝通場域發揮其潛在作用之際，本章將延續前章對《顯影》創辦與運作機制的討論，進一步關注其作為跨地訊息交流與情感維繫的媒介角色。具體而言，《顯影》不僅是一份報刊，更是一種在離散條件下維繫家鄉認同與社會關係的媒介／中介技術物（media technics），「離散」，作為一種跨地移動所生成的歷史與社會情境，已在第一章中說明其理論脈絡與操作型定義；而在本章中，筆者將透過《顯影》的報導文本、雜文甚或是編投之魚雁等資料，描繪此種離散情境（diasporic condition）如何被實作為一個栩栩而盎然的跨國社會空間，其中不僅涉及資訊的往返，或曰亦掣肘著地方社會公共事務的集體參與，甚或介入治理的可能。

此致，本章第一節將以《顯影》作為訊息交流與跨地互動的媒介／中介，考察僑鄉跨國／跨地的社會空間與離散情境。第二、第三節則擬梳清在那些公共化的版面上，掌握訊息話語權的報導者是如何陳述他們對美好社會的願景；輿論的倡議者是怎樣建設文化、思想建設的論述；而啟蒙與普遍教育的號角，又是如何隨著時代的思潮而吹起。

## 第一節 跨國／跨地互動的媒介



### 一、在地與離散的對話：跨地訊息交流

本文第二章曾提及，珠山小學校友會為使在地與離散的鄉民得以「鴻來雁去，準期不斷」，遂利用僑刊《顯影》開闢了「通訊」欄，旨在提供僑鄉與僑居地鄉民之間的魚雁往返，實際上這也是珠小「通訊社」設置之本意。然而，僑刊的通訊欄位終究是公共化的版面，私人性的書信問候仍須訴諸行之有年的「僑批」，但為求方便與經濟的考量，不乏有在地鄉親利用《顯影》公開的版面刊登「家書」，如第三卷第二期（1930.11）的一則訊息：

養地吾兒知之：自六月間得汝來書，及今又過數月，未嘗有得隻字，余心殊念，到底近狀若何？兒子務必有以告我，以免余在家之時為念念也。此諭。母李氏示。<sup>1</sup>

這段文字乍看之下，主旨似乎是「作為一名母親的擔心與問候」——有一位叫做「養地」的青年，此刻不知是福是禍、是生是死。蓋當重返僑鄉書信的語境來解讀，則藏在這類問候之背後的，多半是對作為家中經濟唯一支柱的出洋客，所發出的「寄錢回家」的呼喚。一般而言，海外華人透過民間渠道寄回僑鄉的「僑批」，乃以款項為主，問候是輔，在僑批系統的運作機制中，從家鄉向海外寄出的書信多半是逆向且立即的「回批」。<sup>2</sup>是故，筆者認為從這段「家書」的訊息中所暗示的情境，或許是這名「李氏」婦人自從該年6月至11月間都未再收到兒子的匯款，只好利用《顯影》所提供之（類似便民服務）的公共版面向南洋提起「問候」，以代回批之功能。<sup>3</sup>事實上，這些家書的撰寫對於里中未受文字教育的女性來說，

<sup>1</sup> 《顯影（Shinning）》第三卷，頁598。

<sup>2</sup> 班國瑞（Gregor Benton）、劉宏著，賈俊英譯，《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僑匯（1820-1980）》（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2.02），頁8-20。

<sup>3</sup> 第十三卷第六期的通訊欄，可再見此名母親「李氏」向其兒「勇地」（金門話中「養」與「勇」同音）問候的訊息。詳見《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2378。

簡直是望塵莫及的，轉而需仰賴里中的知識分子。



總的來說，「家書」的問候性訊息，始終不適合公共性的版面，是故並非《顯影》所常見，然而在「重光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顯影》除了倒退回手寫油印的通訊欄位，卻一度大量地刊載這類通信，此一現象除了反映出「日本手」時期僑鄉與僑居地之間魚雁的斷絕，也體現了《顯影》以家鄉親友為本位的發行宗旨。<sup>4</sup>此外，「通訊」欄另一種常見的內容，是來自「珠小校友會」向刊物讀者與海外僑胞所發出的各類訊息，包含勸募、捐款與收支明細、組織近況公告與公開邀稿等。<sup>5</sup>

另一承任「互通聲息」任務的欄位是「調查」欄，為回應旅外鄉僑對故鄉訊息的渴欲，編者特地蒐集統整當前之物價資訊，內容從菜價、民生用品，<sup>6</sup>乃至於聘請勞工、娶妻之開銷皆在記載，<sup>7</sup>此外更有當月氣象調查、人口調查、<sup>8</sup>全縣小學常識測驗分數等。<sup>9</sup>但由於《顯影》的發刊幾乎位於珠山當地，其所謂的「通訊」或「調查」，事實上往往僅限於珠山本地所發出的訊息，海外地區的訊息因是闕如；雖如此，我們仍能從某些欄位窺見金僑社區中跨地互動的縮影，如刊登於第一卷第三至第六期的「問答」欄位，提供了海外人士對故鄉資訊之詢問，俾使離散在外的僑胞對國內／島內的近況多加悉知。如第一卷第四期的讀者（來自「菲島荷埠的 T 君」）即針對「國內的青年服裝樣式」感到好奇，他顯然是一名離鄉已久，企望汲取鄉音的洋客；而另一端，則是《顯影》的編者不厭其煩地一一為其解惑：

<sup>4</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149-3151、3185。

<sup>5</sup> 如第六卷由校友會向海外徵收員所發出的收款請求，以及支持校友會運作的常年年費徵集，以及維持《顯影》編印、運送的費用，另外，由《顯影》副刊編者向淡菊的邀稿短訊，亦在此卷中可見。可參考《顯影 (Shinning)》第六卷，頁 1270、1319、1361。

<sup>6</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17。

<sup>7</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75-76。

<sup>8</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357。

<sup>9</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卷，頁 455-458。

## 「男界」

(甲) 體式：1.商界中人大多衣中國式衫褲。2.學界方面洋裝長衫各佔十之三份，中山裝集中式衫洋式褲者即佔十之四份。

(乙) 體裁：1.中國式衫褲均趨重寬闊，袖至狹一尺，褲至狹二尺，度量即不長不短。2.洋裝式褲闊衫狹，西名所謂「倫敦式」，亦即稱謂「美水乎式」也。3.長衫均趨重寬大。

(丙) 質料：盡屬呢絨哩嘅之類，紗織品極少數。

## 「女界」

(甲) 閨女派：1.體裁均尚衫，短袖瀾裙長（最近高領又漸見入時）2.質料以絲織品為多，花草均尚大蕊花

(乙) 學生派：1.體裁均尚旗袍，袖短衫長，至膝部為度 2.質料絲紗參半，顏色以大蕊花鮮艷為時式。<sup>10</sup>

同期關於時裝的問答，尚有針對「近來國內」裁衣鋪「製作洋服」的詢問：

問：數年前國內裁衣鋪，都不能做洋式衣服，雖有一二，所做體式亦極不雅觀，近來若何？

答：講到近來廈門裁衣店，所做洋服體式的新奇美緻，實可令你們一班樸素的洋客，一見咋舌，現在會做的，可說遍地皆是，並且多是能手，工錢也較南洋便宜，勸你們洋客，此後若要回來，千萬要到廈門才裁做，一即會合時宜，又可便宜多多，不特衣服如是，就是皮鞋，亦是廈門比較便宜，體式既優美雅觀，質地之堅固，又不亞於歐美所製造的，每對價數，至實

---

<sup>10</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25-226。

不上十元。<sup>11</sup>

總結以上兩段關於「國內的青年服裝樣式」與「國內裁衣鋪」的「問答」，不啻說明了《顯影》作為通信媒介，使久未返國的洋客在常民生活的層次上，得以知曉故鄉之事，而回答問題的編者顯然對跨國／跨地的情形瞭若指掌，他不僅能夠針對國內的事情做出回答，也能夠以不同地區的情形加以比對，談及「近來廈門在裁縫多是能手」，而且「樣式新奇美觀」，「工錢也較南洋便宜」，並設身處地地給出「此後若要回來，千萬要到廈門做」的建議。由此，我們也可窺見，其時（1929）的廈門業已作為列強租界逾二十多載，記憶停留在某個故鄉時空的「一班樸素的洋客」，仍然有著「數年前國內裁衣鋪都不能做洋式衣服，雖有一二，體式卻不雅觀」之印象。此際，在地與離散共生共構的「金僑社區」，正是由《顯影》這樣的前現代技術媒介，促成了跨地的資訊交換，而一旦有了共同的資訊基礎，在地與離散的時間便得以「同步」，正如湯普森所述：技術通信媒介的使用改變了社會生活中空間與時間的維度，使人們超越了面對面互動時所特有的時空界限，亦即重新組織了社會結構的時空。<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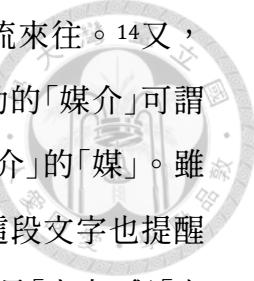
除了由「通訊」和「問答」組成僑鄉與僑居地之間共同的時空，另一個旨在促進同鄉音訊交流的欄位，名之曰「媒婆」，由《顯影》編者說明如下：

俗話說得好：「良緣由天定，世人難推移」，其時我們媒界中人，最不贊成這句話說的，……我們新組織的主旨是為著珠山同鄉一出了外，和家鄉通訊是有的，若各人互報旅外的消息，可絕見少的，這無非是個人難知相互住址，那末，間雖有一二試投郵，亦均不得其門而回返。全人等是大有感覺到這的，所以由本期起，總要盡所知的，逐期介紹出來，好使南洋同鄉，都會同時進行互報旅況，並暢談隨時的衷曲……。<sup>13</sup>

<sup>11</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27。

<sup>12</sup> 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95, p.31.

<sup>13</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71-72。



文末是以附上三則繪有信封圖樣的「地址」，以利海外同鄉的交流來往。<sup>14</sup>又，正如文中編者以「媒婆」自居，其中「媒」字的使用與本文所欲勾勒的「媒介」可謂互文見義——無論是作為地址「媒合」的「媒」，或是通信技術「媒介」的「媒」。雖曰衆人皆知金門「落番」的僑居地大多數位於東南亞地區，不過這段文字也提醒了我們，他們的落腳處各不相同，跨國／跨地金僑社區事實上不是「本島」與「南洋」這兩個如此籠統的概念所能全然地包攝，而是橫跨了數個殖民國、數十個殖民地。

爰此，想像中的金僑社區應是多點對多點的，撒豆成兵式的連結，如此衆多不同的地點，在過去在沒有通信技術媒介的時代，因著音信流通程度的不同，對每個不同落腳處的「洋客」而言，「故鄉」作為一種想像，勢必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印象與時空落差，此際，《顯影》卻牽起了多點跨地互動的訊息交流，弭合在地與離散、故鄉與他鄉，使他們透過音訊的同步，宛若身處相同的時空。

另外，有關海外資訊在《顯影》上的刊載，則主要來自離散社群的投稿，如來自新加坡的報人薛殘白（淡菊），即曾於《顯影》發表〈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獲致《顯影》編輯之贊同，在該篇文章裡其中一則改良的建議是希望「僑居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sup>15</sup>其後他本人身體力行，分別於第六卷第六期與第七卷第二期投稿了〈伊曼土番之奇俗〉。<sup>16</sup>此後的《顯影》文藝欄承襲了這個提案，這一方面除了滿足了金門本地對旅外生活的好奇，也能夠使得各旅埠的「洋客」交換不同地區的訊息，加固了海外不同的社群，各自離散他鄉的身世連結感。

## 二、從鄉訊到僑刊：《顯影》的自我定位和任務

過去有幾位《顯影》的研究者曾提及「從鄉訊到僑刊」這個關鍵句：無論是謝

<sup>14</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72。

<sup>15</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373-1380。

<sup>16</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515-1518；《顯影（Shinning）》第七卷，1611-1615。

佳玲以報導欄位篇幅為一側重點切入，論及「故鄉感」在想像尺度上的游移；<sup>17</sup>或是李昀駿分析了《顯影》報導中，從治安維護、公共衛生議題乃至「公權力的出現」、「我群—他者」的區分……。<sup>18</sup>他們顯然都意識到了《顯影》作為想像跨國金僑社區的重要技術媒介，其刊物自我定位勢必隨著迴響的擴大而有所變遷。不過《顯影》是否真的在 1928-1949 年的金僑社區之間，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以技術媒介的角度來看，某份刊物是否能在某個社群中具備影響力、話語權，或者作為資訊的主要來源，其關鍵應當在於是否累積了一定的「流通性」（circulability）與「獨佔性」（exclusivity）。流通性，即意味著發行的數量，或寄發的地點是否達到了一定的覆蓋度，以滿足該社群的接收人口；獨佔性，即必須觀察相同的流通市場或受眾群體中，是否尚有其他得以取而代之的競爭者。依現存資料來看，其時金門島中除珠山《顯影》外，尚有其他通訊刊物存在，但已無從透過確切的數據來比對《顯影》與其他刊物的流傳與影響，現今筆者所能掌握的，唯有《顯影》中所記載的出版紀錄，這方面包含《顯影》所載的珠小閱書報社 1930 年度圖書雜誌目錄，以及散見於《顯影》各期的「本地刊物資訊」，筆者根據這些刊物的流通的環境與背景，按年代粗略分為「日佔前」（1928-1937）與「重光後」（1946-1949）兩階段：

在「日佔前」階段，<sup>19</sup>金門創設的本地刊物包含《箭社週刊》、<sup>20</sup>《水雷週刊》、

<sup>17</sup> 謝佳玲，〈《顯影》中金門番客故鄉感形構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07），頁 58、66-67。

<sup>18</sup> 李昀駿，〈《顯影》敍事中的金門治安、公共衛生及地方意識的浮現〉，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22.07），頁 87-88。

<sup>19</sup> 此處資訊主要參考珠小閱書報社 1930 年度圖書雜誌目錄，以及第十二卷第三期（1935.05）的〈鴻雁：寄殘白叔〉，詳參《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82-187；《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

<sup>20</sup> 由「金門箭社」創辦，詳參《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84。

21《人之初半月刊》、22《晨曦半月刊》、23《X 週刊》、24《金聲旬刊》、25《浯江月刊》、  
26、《顯影》、《金中學生》、27《塔峰月刊》、28《古岡校刊》、29《浯濤》、30《湖峰學  
生》、31《獅聲座談》、32《金波》，<sup>33</sup>以及若干非由本地發行，但由旅外鄉親所創  
辦之刊物。<sup>34</sup>此一階段，另有金門縣政府的「新生活促進會」偕國民黨黨部曾發

<sup>21</sup> 由「金門水雷社」創辦，詳參《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84。

<sup>22</sup> 《人之初半月刊》為人之初月刊社發行，於 1934.10 創刊，許可主編，每期約五百本，內容著重幽默與小品文字，號稱是金門唯一的小報。《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

<sup>2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卷，頁 2213。

<sup>24</sup> 發刊於 1933 年，為「後浦青年讀書社」發行，參見《顯影（Shinning）》第七卷，頁 1698。

<sup>25</sup> 為金門縣「指委會」發行，詳參《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84。

<sup>26</sup> 為金門建設協會發行，施伍主編，每期二百本，內容注重島聞，除分送島中各機關外，半數以上寄贈海外金門人，創刊於 1934.03，第一卷由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親題封面，第二卷起邀請到民初著名考古學家顧頡剛親題封面；據第十卷第二期的〈浯江創刊〉所載：「金門建設協會，自上月間聘任薛永麥為該會秘書兼浯江月刊編輯，而後各種手續即行積極辦理，經三五日間之籌備創刊號，麗在三月卅日實行出版，內容尚稱豐富，現聞今後該刊之出版期將改定於每月之十五日，預料二期材料必更可觀」。《顯影（Shinning）》第十卷，頁 2196；《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

<sup>27</sup> 由「金門公學初中部」創辦，詳參《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86。

<sup>28</sup> 為金水小學校刊，於 1934 年 3 月由水頭金水國小教師郭師儀創刊，與《顯影》同身為僑刊，初三期為油印出版，由林友雲負責謄寫、印刷，第四期始改為鉛印，每期二百本，內容著重鄉聞、校聞與學生文藝，專寄海外金水人。參考《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郭師儀〈金波社史之略述〉，刊載於《浯江》月刊第二卷第三期（金門：金門建設協會，1934.10），頁 11-12。

<sup>29</sup> 為古岡小學校刊，於 1934.03 創刊，每期約百本，廈文華承印，內容著重鄉聞、校聞、學校文藝，專技海外古坑人。《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

<sup>30</sup> 為浯江小學發行，第二期即停刊。《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

<sup>31</sup> 為湖峰學校發行，第二期即停刊。《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59。

<sup>32</sup> 為歐厝歐陽氏發行，見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2005.03.01），頁 163。

<sup>33</sup> 《金波》為文藝月刊，由「金波社」（《塔峰》月刊創刊人郭師儀）創設於 1930 年的金門文藝團體，成員有李庭富、尼尼絲、逸儂、影隨、絮、陳清華、一葦等，曾創辦不定期油印刊物《金波》，共出刊五期。詳見郭師儀〈金波社史之略述〉，刊載於《浯江》月刊第二卷第二期（金門：金門建設協會，1934.09），頁 8-9。

<sup>34</sup> 根據筆者搜羅到的資料，並非本地發行之刊物，但由旅外鄉親所發行之刊物有：（一）《初響半月刊》，由「上海泉漳金門學生」所創；（二）《微光》，由「金中僑生會」創辦；（三）由新加坡青年金僑團體「浯聲勵進社」所創辦，報載其旨在「溝通海內外金人之情感消息，及指桑梓之興革事宜」，並邀請新加坡《南洋商報》知名報人，同時也是珠山子弟的薛前璧（淡菊）擔任總編輯。

出 1937 年 1 月出版《金門旬報》的呼聲，<sup>35</sup>或者地方文藝團體「金波社」亦在 1933 年曾欲出版專載金門新聞的定期刊物（擬命為「一週消息」），並設定讀者群為海外僑胞，可惜有關這幾種刊物的發行，後來皆不了了之。<sup>36</sup>而在「重光後」階段，則有《浯島風訊》、<sup>37</sup>縣政府《金門導報》、<sup>38</sup>《浯青》、<sup>39</sup>《新月》、<sup>40</sup>《金山》月刊，<sup>41</sup>籌備中的「古寧校刊」與「瓊林小學校刊」、<sup>42</sup>以及復刊的《塔峰》、《古崙》。

上述它例看似不少，但《顯影》畢竟是現存唯一在地出版時序最長，期數也最多，紀錄民間最詳實的一種刊物。<sup>43</sup>在第十二卷第六期中的一篇紀念《顯影》出版七週年的文章中，其所言應當不虛：

顯影這個刊物，辦到忽忽已經七年了，這種長期奮鬥的精神，實在不可不紀念一下，現在我們來胡亂同諸位談一談吧。

顯影的出版那時金門文化正是低落的可憐，那時出版的刊物，一個也沒有，

---

詳參詳參《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85、187；《顯影 (Shinning)》第十卷，頁 2192-2195。

<sup>35</sup> 見《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60。

<sup>36</sup> 「金波社」為《塔峰》月刊創刊人郭師儀創設於 1930 年的金門文藝團體，成員有李庭富、尼尼絲、逸儂、影隨、絮、陳清華、一葦等，曾創辦不定期油印刊物《金波》，共出刊五期。詳見郭師儀〈金波社史之略述〉，刊載於《浯江》月刊第二卷第二期（金門：金門建設協會，1934.09），頁 8-9。

<sup>37</sup> 由「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金門分團」所創辦，內容專載本島消息，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115。

<sup>38</sup> 為縣府工作報告刊物，除了政治工作內容外，以本島海外華僑為對象。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79。

<sup>39</sup> 為青年團第一區隊純文藝壁報，因種種關係停刊。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79。

<sup>40</sup> 為女青年隊壁報，出版三期，編輯顏暮影出國後即停刊。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79。

<sup>41</sup> 官裏村官山小學校刊，由大道印務公司承印，島聞詳實。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79。

<sup>42</sup> 據該期記載，皆為「籌備出版」，但不可知是否最終真有出版。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79。

<sup>43</sup> 據《顯影》第十一卷第三期〈編後話〉所云，《顯影》當是其時金門「歷史上最久的刊物」。詳見《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435。

珠小校友有鑒於斯，遂提倡這與海外鄉親互通聲氣的刊物，起首是自己油印，但在日益進展之中，竟由油印而鉛印了。到今日已整有七年歷史了……

你們要負起促進全島文化自任，不要畏怕人們的咒詛，應該的說的話，要不徇私情地說出來，偉大事業，往往是要遭一小部分私立者反對，但是也不要受人家稱讚一兩句，便要感覺心滿意足而懈怠，弛怠起來，由傳達海外鄉親的聲氣，轉而為民眾的喉舌才好。<sup>44</sup>

文中已經明確點出《顯影》之於「金門文化」之重要性，且點出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一小部分私利者）之反對，最後則提出「要負起金島文化自任」、「轉而為民眾喉舌」。自是，「從鄉訊到僑刊」的刊物自我定位軌跡躍然紙上。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與持續追蹤的，還有《塔峰》、《浯江》這兩種刊物，他們皆巧合地創刊於 1934 年 3 月。今時今日，《塔峰》餘僅一期，由私人保存；<sup>45</sup>而另一個尚未被其他論者討論，卻已有完善保存的刊物，是目前存放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浯江》月刊，它是作為《顯影》編輯之一的施伍（薛永麥）在擔任金門自治組織「金門建設協會」之秘書時期，以該會名義創辦。推測是施伍作為橋樑的緣故，該刊與《顯影》在刊物的自我定位上，可謂是聲息互通，其端倪見於（第一卷第二期）：

我們這個小刊物，是專心地負著海內外的通訊使命，為了讀者得到消息的敏捷，所以得到了珠山《顯影》月刊編者的意見，马上就改定每月十五日就出版，因為讀本刊的人，有一部也看得《顯影》，那麼他們每月間曾得兩份的消息。<sup>46</sup>

對照《浯江》月刊發行的時間點，《顯影》大約正發行到第十卷第二、三期，該二

<sup>44</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609。

<sup>45</sup> 據江柏煒訪問，《塔峰》由金門水頭黃啓政先生保存唯一的一期（四卷三期）。詳參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2005.03.01），頁 163。

<sup>46</sup> 見《浯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金門：金門建設協會，1934.04），頁 13。

期皆透過〈編後話〉向讀者發出了告知：

《顯影》太微渺，尤其是拘守在珠山的區域中，自出刊以來，絲毫未敢希冀在金門之談話界站一席，當過去《浯江》未現之時，我們對於浯島之消息，雖隨時隨地也曾加以搜羅，只是太勉強吧！茲有《浯江》來矣、《浯聲》將至，僭席的《顯影》，今後似可以將大盤的買賣讓出，而原退處於珠山之域，專理其零星業務矣。……我們的《顯影》本是無立場與無主旨的，今後除按一向所持「村夫談俗」式的態度，多載一點珠山的消息外，對於島聞即只能到街頭路尾去採訪一些小新聞與夫《浯江》所不及載者之外，餘即多刊小品文字，聊充海外人士商餘之消遣，於願足矣……。<sup>47</sup>

本刊此後對於新聞之刊載或將著重珠山鄉聞，蓋以現在浯江月刊每期對於島聞刊登極詳，本刊除重要訊息，今後絕少重載以輕工作有之，或者於每下半月之新聞多登一點……。<sup>48</sup>

作為時間最早、歷時最長，發行於跨國金僑社區的《顯影》，起初侷促一隅，僅當作珠山在地的「鄉訊」或「校友會刊」來運營，<sup>49</sup>流通於珠山薛氏的海外僑居地，然正如引文所言，《顯影》因曾幾自認「僭席」為「僑刊」，故在 1934 年初當《浯江》與《浯聲》即將出版，預告著兩種刊物將分別要作為金門島內與海外主要的報導來源時，《顯影》編者又擬將刊物重新定調為「刊載珠山消息」的社區型刊物。不過，《浯江》月刊的發行並不長久，僅僅一年便即告停，而《浯聲》也終歸是「無聲」，並無實際出刊。

相反地，《顯影》並未因此減少島聞的篇幅，反倒從第十一卷第三期（1934.11）起將刊物改善為排字鉛印，又自第十一卷第五期（1935.01）起，在每冊封底左下角處加上「本刊歡迎海外金僑索閱」，又自第十一卷第四期（1934.12）始，發起「金門華僑名冊調查表」，並於第十二卷第二期（1935.04）

<sup>47</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卷，頁 2189。

<sup>4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卷，頁 2289。

<sup>49</sup> 可參考《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1；《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37-139。

起刊登「金門華僑名冊」，以上種種皆可見得，《顯影》在刊物自身的定位上，依舊承擔著聯絡海內外金門人的任務，並在「鄉聞」、「島聞」以外，企圖開闢海外的「各屬通訊」，以及「海外通訊」。如第十二卷第三期的〈編者話〉，便曾發起對《顯影》海外讀者的呼告，希望能有各屬的鄉親「悉力每期寫些鄉聞」。<sup>50</sup>日佔前夕，《顯影》編輯群對於海外通訊記者的徵求更加顯得念茲在茲，且見第十五卷第一期於「通訊」欄所發出的徵人啟事：

本刊發刊以來，承海外讀者的愛護，業已出版到十五卷第一期，趁此我們除籌備於近期編九週年紀念刊外，同時根據一部分讀者的建議，預備做更進一步的努力，形式和內容，益加改進，因此我們著意添設海外金僑消息欄，報告住海外的金門人不同的消息，既可互通聲氣在不同的地域，就是這對於金僑觀摩與認識上，可更加一層的印象，……，我們從困難中想找得一條出路，就是徵求海外各屬的駐地通訊員，請他將該地的金門人的消息，著月寫點新聞寄惠本刊，如此顯影就可擴大海外的地域，作為海外每個金門人的電話線網……。<sup>51</sup>

經這次呼籲，《顯影》終於該卷第四期徵集到來自新加坡的許應夢，以及來自邦加一勿里洞（Bangka Belitung）地區由薛水火所寄的海外通訊稿件，<sup>52</sup>可惜其後旋即遭遇日佔，「重光後」亦未能賡續。

不過，自淡菊（薛前璧）在第六卷第四期所發表的〈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後，<sup>53</sup>版面中漸漸出現來自南洋地區的生活、風俗的介紹，以及珠小畢業校友將其在中國各地求學的事蹟連綴成文，闢為專欄。此致，第十三卷第二期起，

---

<sup>50</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61。

<sup>51</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898。

<sup>52</sup> 第十五卷第四期為 1936 年 12 月至隔年 2 月合刊，其中，許應夢共寄出〈新加坡金門會館調查〉、〈星洲華僑中學聘請薛永泰任校長〉、〈浯聲勵進社舉行盛大歡宴：熱烈慶祝蔣公蒙難脫險〉、〈金門公路敬告海外各埠鄉僑書〉，薛水火共寄出〈邦嘉金僑近況〉、〈邦嘉華僑生活總調查〉等文章，詳參頁 2955-2956、頁 2992-2995。

<sup>53</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373-1380。

增加了「海外風情」欄位（後改為「椰影留連」），該期由來自印尼巴厘巴板署名「剪」的作者，以〈荷印過客問題〉短文介紹前往荷屬印尼地區觀光必須「登岸稅」的經緯，以及署名「卿」的作者撰文〈海外婚俗談奇〉，介紹「拉姆島」、「馬來半島」、「罷白脫島」上特殊的婚姻風俗。<sup>54</sup>同一期也新增了「金門華僑小傳」欄位，該期介紹金門籍的知名商賈、革命黨人洪耀國在東婆羅洲縱橫捭闔的事蹟，並附上「華僑小傳徵稿啟事」。<sup>55</sup>類似的邀稿，是編者團隊在第十三卷第六期所發起的「海外金僑生活回憶錄」，以及自第十五卷第二期起所新增的「珠山留外生活訪問記」欄目。<sup>56</sup>

本文第二章曾論及《顯影》得名來自創辦人薛永乾「有一天在暗房沖洗底片時，浸泡在顯影液中的相紙，漸漸顯現所拍攝的景物」一事，當中所謂的「顯影」，意味著洋客透過刊物的文字與通訊功能，與家鄉互通有無，使「閱讀刊物」的當下就彷彿是沖刷底片，使故鄉在心底「顯影」一般，以免與故鄉久別生疏。顯然地，在 1928 年底的草創初期，《顯影》的重點讀者僅止於海外同鄉，1933 年，隨著發行數量漸增，讀者群也自然而然地，漸次不僅於珠山的同鄉，於是編輯施伍開始自信地說「此刊是海外金僑的命脈」。洎乎 1936 年的第十三卷，刊物編者（薛健椿）已然將受眾群體鎖定於在地與離散所串聯起來的「金僑社區」，這時所要「顯影」的，或必不僅限於金門在地，而更是一種被視為整體的跨國／跨地離散群體（diasporic community），這種構想另可見於「海外金僑生活回憶錄」的徵文啟事：

我們覺得《顯影》給通訊於僑親而外，同時也要帶點顯得出僑親生活影子

<sup>54</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54。

<sup>55</sup> 內容說明道「本欄歡迎海外讀者寄稿，無論是上至名人偉士，下在庶人流氓，凡為金門旅外鄉親皆可舉筆描容，既資為未來者之借鏡，且是亦投金門病社會之一服聖劑，更願有以自傳，或代他人寫傳，皆在歡迎之列，敢冀競相惠稿是盼。」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55。

<sup>56</sup> 該系列文章，計有珠山小學校友計有薛金民、薛金蓮、薛新吟三人在廈門「救世醫院」擔任護士實習的〈我們的護士一年〉、〈不盡長江流水滾滾向東來〉，薛秀尊赴廈門「助產職業學校」的〈安知必林〉（按：應為西藥「阿斯匹靈」（Aspirin）之當時音譯），以及薛彩鳳、薛翠蓮在鼓浪嶼毓德女中所撰〈姑姑！記得買皮球〉。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10-2914、2932-2933、2950-2951。

的必要，金門人在外四佈，生活的鞭子，每個人都領受過，在過去的過程中，我們金僑苦鬥的精神，和強力的收效，及不幸的失敗，只有自己理會，這未免甜酸的神秘了，因此同人鑒于斯，為欲使有志的青年得浸浴于苦鬥的精神，了有借鏡，求金門社會一點新光，我們覺得有此種徵文的必要，既茲借影，是亦使金門人得體會旅外的生活狀況，敢求凡屬金僑，無論其成失，設能一般的追述已往的生活狀態，暴露於筆端，惠寄敝刊，無任感激之至。<sup>57</sup>

引文中對「金僑苦鬥生活」的關注，委實體現了《顯影》報刊目標讀者群想像的擴大，在這當中，編者與讀者對「僑刊」的期許，已經不再是家鄉訊息的單純提供，諸般金門人在外打拚的共同謀生經歷，以及「浸浴于苦鬥的精神」，成了每一份刊物的閱讀者所能共情、共感，甚至是共同敍述、共同撰寫（co-writing）的。

換言之，《顯影》對旅外生活者發出的邀稿，改變了僑刊只能被動閱讀的性質，在書寫和閱讀的兩造，一個跨地／跨國的共同體在同樣的媒介上被想像。這樣的想像，從「日佔前」階段一直延續到「重光後」，支撐著《顯影》在 1946 年 4 月的復刊，並承載了更多來自金僑群體的期待，如重光後曾任編輯的張夢我在〈我對於「顯影」的看法估價及期望〉一文中，便提及《顯影》所貢獻的不僅是鄉音，他甚至認為在重光後所刊載薛永棟的遺稿《八年滄桑錄》，對「他日金門縣志之輯，不無資助，此為《顯影》具有史料價值者也。」而作為一份在金僑社區具有影響力的刊物，他也希望《顯影》能夠負起社會責任，勇於以客觀的態度刊載事實，以利海內外金僑明白社會真相。<sup>58</sup>

《顯影》「從鄉訊到僑刊」的自我定位軌跡，宛如金門近代僑鄉歷史的縮影，它體現了同鄉血緣組織對地方文化、教育、實業建設的投入，更見證了近代金門的僑鄉時代，從地方宗族社群到整個島內的共同體的想像，1948 年《顯影》第

<sup>57</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738。

<sup>5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11-3313。

二期編者「把吾金島上的刊物冶成一爐」的構想，<sup>59</sup>再度印證了這一點。值得進一步比較的是，曾經計畫定期出刊的幾種報導刊物，包含《金聲旬刊》、《浯江》月刊、《浯島風訊》、《金門導報》，以及未能出刊的《浯聲》、《金門旬刊》等，它們多半無疾而終，然而這份來自金門島西一隅的「鄉訊」卻能夠在接近 20 年間近乎是固定地發行（除了中途遭遇戰事即斷刊），這無疑呼應了姚婷所論——在其對於僑刊參與社會治理功能的分析中，當僑鄉中宗族自治與民間資金在社會治理上所發揮的效力與話語權越大，就越顯得地方官辦政府在管理上的無能。<sup>60</sup>梅偉強也指出，僑刊或鄉訊大多數具有強烈的民間性質，其經費實際上幾乎主要來自海外鄉親的捐助。<sup>61</sup>《顯影》之得以維持穩定的經費來源，除了依賴同鄉組織「校友會」的勸募，也必須再次述及本文第二章曾提及《顯影》在重光後所發起的「月月運動」，揆諸參與其中的僑商群體，他們多半來自共同僑居地菲律賓的依里岸埠，包含來自依里岸由惠安僑胞莊建成所營業的「義成號」，<sup>62</sup>以及「永昌公司」、<sup>63</sup>「金山公司」等。<sup>64</sup>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生態棲位（niche），<sup>65</sup>持續與家鄉透過各種方式保持聯繫，一種最直接的辦法便是持續地對宗族或地緣社會紐帶，進行著帶有公益慈善性質的出資。<sup>66</sup>他們共享相同的人際關係網絡，更閱讀相同的刊物，分享著相同的資訊，在這個情境下，《顯影》作為金僑共同群體的特定通訊技術媒介，亦是孔復禮所說的「通道」（corridors）——是為原

---

<sup>59</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00。

<sup>60</sup> 姚婷，〈僑刊參與華南僑鄉社會治理的實踐初探〉，《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2017 年 3 月第一期），頁 29-37。

<sup>61</sup> 梅偉強，〈富有特色的“集體家書”——五邑的僑刊鄉訊〉，《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一卷第三期（廣東，1999），頁 74。

<sup>62</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50。

<sup>63</sup> 同是依里岸金僑所創辦，公司職員包含來自後浦、盤山、古寧、禾山、珠山（是為《顯影》曾經的編者薛丞祝）、后山的鄉親，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91。

<sup>64</sup> 同樣位於依里岸，《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413。

<sup>65</sup> 所謂「生態棲位」，即指移民群體所發現、所創造之得以生存、興旺發展並防禦其他移民群體、在地居民與外國勢力競爭的環境或空間；詳見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21。

<sup>66</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73-76。

鄉環境的延伸，亦是具有意義聯繫的歸屬，<sup>67</sup>這種通道維繫著本文所欲指出的「金僑社區」，也指向江柏煒所謂的「分散社群」（diversed community）。<sup>68</sup>正因為如此，他們相信在贊助《顯影》的過程中，捐款能夠有效地轉換為一定的名譽——社會資本，這無疑也反過來印證了《顯影》在當地僑居團體中，應當也有著一定的獨佔性與流通性。<sup>69</sup>

### 三、「家」「國」攜手：愛國情境與民族主義的浮現

前二小節筆者業已從《顯影》作為一份跨國／跨地互動媒介的內裏（訊息交流）和外緣（社群形成）來說明金僑社區基緣於「同鄉／同島」的地緣共同體，是如何在其中展開對話與交流。不過，若將《顯影》放進更大的僑鄉歷史情境來看，其中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共同體意識，往往與愛國情境的打造、民族主義的話語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一脈絡，勢必是本文討論所謂的「跨國金僑社區」及近代僑鄉歷史時，不可繞過的理路。肇此，本小節旨在透過對《顯影》報導和輿論文章的分析，說明地方知識份子如何在其中靈活地調度、切換「愛鄉」與「愛國」的情感，藉此呼籲「洋客」在飛黃騰達之餘，切切不可忘記「齊家治國」的古訓。

不過，對於長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來說，究竟什麼是「愛國」呢？嚴格來說，20世紀以前傳統中國的海外華商與華工，因著異族（滿族）統治的緣故，並無

---

<sup>67</sup> 「通道」（corridors）一詞係孔復禮（Philip A. Kuhn）在其移民社會研究中所提出的重要術語，原用以描述移民離開原鄉之後，仍與其出發地（如村落、宗族、甚至省籍單位）持續維繫有意義聯繫的社會通路。此「通道」不僅具地理或空間向度，亦應被理解為一種涵蓋經濟、文化與情感交換的社會機制。本文第一章第三節〈研究框架與理論運用〉中已就此概念進行初步說明，於此再度援引，乃為鋪陳僑刊在構築離散社群間資本動員與認同情感之間扮演的傳輸角色。詳參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80。

<sup>68</sup> 江柏煒所謂的「分散社群」（diversed community）之所以成為可能，亦即透過僑刊，將僑居地與僑鄉之間聯繫起來，以達到分享資訊，凝聚共同體意識之功能；詳參江柏煒，《新加坡的出洋客》（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1.12），頁 22。

<sup>69</sup> 有關海外僑商這種透過捐款，以換取某種與故鄉的聯繫性以及社會名聲的活動，將在本章第二節有更深入的探討。

所謂愛國的觀念，對方言群體的認同以及與故鄉連結的社會紐帶，多半才是他們所依歸的。<sup>70</sup>然而，從晚清洋務派開始有意識地開啟僑務政治，到維新派以保皇為導向的「滿漢同種」民族主義論述，乃至於孫中山從辛亥革命前的「排滿」口號，到中華民國成立後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觀，<sup>71</sup>無不在揭示著 19 世紀末近代民族主義的潮流，已然悄悄地成為全球政治論述的重要基調。<sup>72</sup>這些口號與政治策略在實踐上，往往重視海外華人對「國內」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奧援，說明他們期待著一個現代化且富強的國家之到來，好作為他們在海外的依靠——而這種遠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的浮現，<sup>73</sup>乃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之肇始。<sup>74</sup>此外，自 1909 年《大清國籍條例》頒布以來，該法以血統主義

---

<sup>70</sup> 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04），頁 121-126。

<sup>71</sup> 王柯對孫中山從「五族共和」到「大中華民族」在思想上的策略性轉變曾有詳細討論。詳見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215-228。

<sup>72</sup> 莊國土、劉文正著，《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09），頁 152-174。

<sup>73</sup> 有關「遠距民族主義」之譯法，乃參酌自廖炳惠在其 2003 年編著之《關鍵詞 200》中「imagined community」條目之說明，而陳信宏於 2024 年所譯著出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比較的幽靈》，則將其譯為「長途民族主義」，筆者在本文將選擇採用《關鍵詞 200》之譯法。參見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2003.09），頁 138-140；班納迪克·安德森著，陳信宏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新北：衛城出版，2024.05），頁 89-114。

<sup>74</sup> 此外，「遠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一詞最早由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於 1993 年提出，指涉那些身處海外的離散群體如何透過言語、儀式與象徵行動持續參與對祖國的政治想像與民族情感實踐。Nina Glick Schiller 隨後對此一概念進行深化，指出「遠距民族主義」是一種跨境的政治專案，其運作機制建基於非領土性的族群敘事、象徵性網絡與情感連結，並不依賴於居留地的法律公民身分，而是藉由血緣、語言與歷史記憶等文化資源，強化對祖國的政治忠誠。她進一步歸納此類跨境政治參與的四種實踐類型，包含反殖民運動、分離主義、政權更迭與選舉參與，此理論不僅揭示了民族主義在全球移動中的持續生成性，也點出其可能導致的暴力、排他與正當性危機。在本文所提出的「『家』『國』攜手」之概念，正可視為這種遠距民族主義的具體展演，這些內容表面上以「家」的倫理感召為出發點，但實質上卻是一套藉由情感動員與道德規訓，重新召喚「國」的政治位置的象徵工程，使得「家／國」成為離散語境中可被疊合與操作的動員單位，亦進一步突顯報刊作為技術中介在離散社群政治建構中的關鍵角色。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The New World Disorder," *New Left Review*, no. 193 (1993): 3-13；Nina Glick Schiller,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in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jus sanguinis*，又作「屬人主義」) 為原則，確立了華僑與祖國的法律聯繫，使其國籍身份趨於固定。<sup>75</sup>雖如此，無論是北洋政府在一戰歐洲缺工的背景下，於 1917 年所成立的「僑工事務局」，或是廣州國民政府為了與北方分庭抗禮，於 1924 年所成立的「僑務局」，均無法從民初軍閥混戰的膠著與內耗中脫身，加上北方人事的頻繁變動，與南方政府的不被國際承認，其兩方終皆難以達成保護僑民與吸引僑資的任務。<sup>76</sup>此際，南洋華人的主要家鄉——閩粵連年飽受了兵燹之苦，至於 1928 年甫創刊的《顯影》，正在國內南北戰事結束之際，文中可見地方知識份子對政府僑務不利的控訴：

金門這個地方，雖不夠算得多麼寬，多麼大，……，近年來雖這麼經營，這麼擴張，結果又是如此如此，全無發達之可言，……因此遂致一般生不得死不能的窮漢子，……步出金門而飛也似地一直翻到南洋掘金去了。……哎，到了現在，那裡能夠知道南洋的金礦，已不單讓我們華僑採掘了，不但是洋鬼子，就是連那些渾渾噩噩的土番兒，也已不像先前那樣的可欺了，他們不僅是自己覺悟起來，力求進展，一步連合一氣，向我們華僑進攻，而更要下逐客令了！……至於我國的政府呢！不但不能夠護助他們，保衛他們，有時反要對他們捐了一筆錢子，來施行他的……呢！至於他們如何的輾轉在外人鐵蹄之下，政府總是一向默然不關心的。……呀！遺憾失衛的僑民！<sup>77</sup>

文中先是刻畫了金門人不得不下南洋的歷史情境，是以從「金門人」的角度展開，

---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ed.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and Ian Skoggard (New York: Springer, 2005), 570-574.

<sup>75</sup> 這樣的法理 1912 年被北洋政府所頒布的「國籍法」，以及 1927 年甫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所承繼。莊國土、劉文正著，《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09），頁 176-180。

<sup>76</sup>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1997），頁 44-57；莊國土、劉文正著，《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09），頁 176-180。

<sup>77</sup> 穎顯，〈洋客〉，江柏煒編輯，《顯影（Shinning）》第一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 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101-103。

但接踵而來的自稱詞，卻不自覺地擴大為「我們華僑」，並感嘆東南亞海外華人在礦業開採遭受到的制裁與排擠。<sup>78</sup>此際，其所遭遇的民族主義危機／轉機，是由僑居地華人在生存環境的逼迫下所生，而所同仇敵愾的對象，則不僅面朝僑居地的殖民統治者，也指向在地的原住民族群（indigenous community）。

另，從文中「渾渾噩噩的土番兒，也已不像先前那樣的可欺了」一語，除了可見自古以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華夷意識作祟下，華人與生俱來所抱持的民族自豪感，也反映了 20 世紀初期東南亞民族自決風潮的興盛。另一篇發表於 1935 年署名「絮」的〈談談南洋華僑〉，也秉著相似的論調：

以前番人是較為愚蠢，一切都可諒我們居中搾利的，現在他們不但知識開化了許多，就是教育也進步不少了，以後恐怕又是我們受淘汰的結局，而他們也將崛起，侵取華僑的地位而代之了……。同時义义义义商人亦將因不景氣益越利害關係，<sup>79</sup>因而實行直接與土人交易和可能的範圍內儘量雇土人職員及工人，那麼我們華僑的運命，豈不是即時宣告破產了嗎？……處在廿世紀的時代，我們難道能不受「天演公例」的裁判，而於商戰場上大敗而回嗎？我們的民族又是思想十分頑固，同業之間不但不知團結反而互相傾軋、互相破壞，……還有各該地當政府的移民限制，繁重的稅收，貨品進口限制，在在都足使我們華僑感到「行不得也」的苦悶。綜上以觀，為賑救我們華僑地位的衰落，挽回華僑面的光榮，我們是需要從速覺悟過來，無論在工在商均須聯絡一氣的。不要再做那種無謂的省分、派別、宗族等等的封建畛域之分，而和衷共濟以渡過此「物競天擇」的生死難關，也是自救之人和民族復興的最重要關鍵哩！……此外又凡是稍有資產於南洋的人，往往倦倦於祖國，幾乎欲老死於異國而後甘心，或謂故國地方

<sup>78</sup> 以荷屬加里曼丹（Kalimantan）與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地區的礦業而言，以華人為主的發展在 18230-30 年間達到巔峰，到了 20 世紀初期，荷蘭政府業已全面地接手了這些礦產，並以近似剝削的薪酬聘僱華人礦工。詳參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139-163。

<sup>79</sup> 「义义义义」指的是當地的殖民地政府，或許是當地報刊審查制度的緣故，在此以「义义义义」的方式以隱蔽其所控訴之對象。

亂不可安由充分，然而需知社會之惡劣上有賴於改革，匪盜之擾亂，非無法使之綏平。假使我們勇作海外逃亡之想，不把南洋經營之盈餘，集腋成裘，作為祖國之投資，興辦實業、開設農場，樹立學校，使農村變為富腴之土，城鎮成為繁榮之區，而人民得各安其業，各榮其職，麵包問題既已解決，尚何人願挺為盜匪呢？<sup>80</sup>

1930 年代的南洋華人，在面臨東南亞民族主義的興起、殖民政府的壓迫，以及經濟不景氣等危機時，仍然憑藉勤奮的工作態度與經商天賦，在當地取得一定的經濟優勢，<sup>81</sup>這些不僅招來了當地原住居民的不滿，也無不醞釀了南洋各地排華的浪潮。<sup>82</sup>放眼此文，雖處處充滿華族自豪感的種族歧視言論，<sup>83</sup>然若仔細

---

<sup>8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66。

<sup>81</sup> 〈談談南洋華僑〉一文中提及的「各該地當政府的移民限制」，事實上反映了 1930 年代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如荷屬東印度政府頒布新移民條例，限制外國工人移入，以避免與本國工人競爭。參見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1997），頁 227。

<sup>82</sup> 實際上，有關僑居地土著對華人的態度，也有殖民地政府的影響參雜其中，以印尼為例，荷蘭殖民政府的政策深刻影響了印尼社會對華人的態度。在殖民統治下，華人被歸類為「外籍東方人」（Foreign Orientals），在法律與經濟上享有比印尼土著更優越的地位，卻又被排除在歐洲人特權階層之外，而又，荷蘭善於透過「分而治之」的策略，強化華人與印尼人的社會隔閡，例如通行證制度、居住區隔離政策，以及在法律上將華人群體與印尼人區分開來；這些政策使印尼人普遍認為華人是「外來者」，並對華人的經濟優勢和特權產生敵意。同時，華人自身也受到殖民社會階級劃分的影響，傾向於維持族群內部的獨立性，而非與印尼土著建立更緊密的社會聯繫，此外，華人民族主義運動在 20 世紀初的興起，使華人更強調自身群體認同，進一步加深印尼社會對華人的「異質性」認知，並導致華人在印尼社會中始終未能完全融入。詳參 Charles A. Coppel. "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83, pp.5-30.

<sup>83</sup> 此類帶有華人民族優越感，以及種族歧視意味的內容，亦可見於《顯影》刊載的文化風俗介紹，以「椰影留連」專欄為主，呈現出一種對異地生活的強烈好奇與凝視姿態，涵蓋了從宗教、婚俗、生活習慣到奇風異俗的廣泛描寫，然而其中不乏帶有異國獵奇與種族歧視的筆調。例如淡菊筆下的〈伊曼土番奇俗〉，除了強調其「獵首文化」之外，更對其洗澡習慣與古瓷喜好進行嘲諷，甚至以「請婦女出來賣淫」描述其待客方式，將其文化習俗簡化為性別與野蠻的凝視物件。在描寫南洋土著方面，則不斷強調他們「茹毛飲血」、「光怪陸離」的刻板印象，內容囊括「異域神殿」、「女體」、「食人樹」、「和尚偷懶」等元素，形成一套強烈的「異聞奇說」敘述框架，刻意凸顯了生活的粗野、荒謬與色情方面。另外，婚姻與家庭制度亦是常見主題，如〈爪哇人的婚姻〉一文詳述結婚後，男方要先至女方家中居住滿二週等婚俗步驟；〈巨港土人的離婚〉則指出只要夫婦分居滿月便可與酋長提出離婚。若干篇章聚焦於宗教與神秘信仰，例如〈木神〉一文則記述有關喪禮與「猴子為神物」的特殊風俗，強調如不虔誠則猴子不會出現；〈神秘的「降頭」〉則細緻描述降

地辨識貫穿其中的思想，到底為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的論調；這種以「自強保種」、「物競天擇」為口號的種族 (race) 概念，與對「富國強兵」的強力鼓吹，由清末嚴復 (1854-1921) 與梁啟超 (1873-1929) 所引進及推廣，是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理論所本。<sup>84</sup>

19 世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上半葉之間的歷史，是歐洲帝國主義大行其道之時，他們利用來自全球的廉價勞工，在美洲與亞洲的殖民地與新大陸，實行大規模的資源掠奪。那是資本主義高度擴張的階段，正值中國經歷滿清帝國的陷落、世界列強的威逼、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國共內戰等風雨。伴隨著全球民族自決風潮的興起，孔復禮認為，20 世紀初期海外華人的自我認識，在長期處於異族 (others) 環伺的離散情境中被彰顯出來，形成了一種融合中華文化與種族血緣的共同體意識，這種民族概念，不僅有助於消解海外華人內部的方言群隔閡，在其所生存的異國土地上，這種民族主義訴求也用以營造無論是個人

---

頭術施行與解降過程；〈暹羅之月光浴〉則以文言語體描寫當地上流人士的裸體派對，並對參與者之好色予以道德批評，表面嚴肅，實則流露一種獵奇式觀看。喪葬與儀式文化方面，包括〈火葬〉、〈剃頭禮〉等作品，呈現對其生死觀與儀式實踐的體察，但書寫語調仍往往流於戲謔、嘲諷。其他零星內容如〈荷印過客問題〉則涉及逃稅與港務法令。總體而言，《顯影》中的文化風俗類文章固然收錄了廣泛的地理與民族資訊，表面上構成一套海外文化知識系統，堪作滯閏生活的調劑，但其敘述策略與語言態度，經常游移於帝國知識模仿、種族歧視話語、性別凝視與庶民異聞之間，使這些書寫始終帶著華人看待東南亞民族的文化優越感。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六卷，頁 1815；第七卷，頁 1611；第十三卷，頁 2654、2675、2720、2739；第十四卷，頁 2760、2786、2806、2830、2854、2876；第十五卷，頁 2924、2942。

<sup>84</sup> 該二人分別代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對西學譯介的兩大途徑，一是嚴復直譯西文原著赫胥黎 (Thomas H. Huxley, 1825-1895) 《天演論》，將「evolution」譯為天演，傳進中國，其二為留日學人如梁啟超等人藉助「和製漢語」所引進的新觀念與新詞彙，如「evolution」透過日譯傳為「演化」。此外，梁啟超即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在其 1906 年所撰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以歷史上自明永樂以降，來自閩粵地區向南洋地區（包含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馬來半島）開拓的幾位的海外移民的事蹟為本事，拈出其所欲刻畫的中國海外移民圖像——一群勇敢開拓、充滿冒險精神的國族先民，該文甚至提出「吾國若尤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則彼兩省（按：指閩粵兩省）人，其猶可用也。」此際，一種藉助南洋海外華僑，以強大中國民族利益的論述已見雛形。參見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收錄於《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期（2014.09），頁 130-132；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316；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八·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收錄於《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1-5。

或群體的形象，來增進他們的團結意識。不過，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並非是單一的框架，而是依據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社會環境而呈現出不同樣態，<sup>85</sup>他們的民族主義論述，啟蒙於他們對辛亥革命的參與，其時來自中國國內的改革者們，向南洋華人闡述中國的危機，並提供民族復興的願景，使南洋華人將民族主義視為解決自身困境的答案，此類王賡武稱之為「被教導的民族主義」(taught nationalism)，<sup>86</sup>誠如許多論者指出，在南洋華人群體內部的接受，往往視「是否受過華文教育」、「土生／客／新客」等不同背景而有不同結果。<sup>87</sup>對照前引〈談談南洋華僑〉一文呼籲海外華僑放下「省分、派別、宗族等等的封建畛域之分」，而「稍有資產於南洋的人」則務須「報效祖國」，以改善國內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 的論述，這些以僑居地華人為主要群體，希望不同的「省分、派別、宗族」務必團結的精神，或許可以呈現出 1920-50 年代在愛國主義與危亡意識驅動下所興起的海外華人民族主義論述，旨在改善過往以方言群、省籍為分群法則的共同體意識。<sup>88</sup>

《顯影》創刊的 1928 年，，正值山東濟南慘案激起強烈的反日情緒之際，一波以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為導向的愛國響應，隨即席捲海內外華人社會，「抵制日貨」運動亦應運而起。<sup>89</sup>此際，南洋華人的民族主義也由此朝向了更為明確的愛

---

<sup>85</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310-405。

<sup>86</sup> Gungwu, Wang.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edited by C. D. Cowan and O. W. Walter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08.

<sup>87</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310-333；林平、林東余，〈為什麼合作不容易？二十世紀初期荷印華人政治的一些推測〉，《民主與治理》第 8 卷第 1 期 (2021.02)，頁 45-46；Gungwu, Wang.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edited by C. D. Cowan and O. W. Walter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405-408.

<sup>88</sup> 該年代由王賡武所提出，參見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04），頁 126。

<sup>89</sup> 近代中國的抵制洋貨運動可追溯至鴉片戰爭前後，而 1905 年前後的抵制美貨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洋貨運動。1908 年，二辰丸案引發了中國首次的抵制日貨運動，此後 1915 年的「二十一條」問題、1919 年的「山東問題」、1923 年的旅順與大連回收問題、1925 年的滬案問題、1927-1928 年的山東出兵與濟南慘案、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1934 的華北

國主義，如新加坡華僑陳嘉庚發起的「山東慘禍籌賑會」，不僅受到商人團體的大力支持，亦更加廣泛地深入了中下層的南洋華人群體。<sup>90</sup>在此歷史氛圍下，南洋各地僑社紛紛展現對中國局勢的高度關注與資源動員能力，金門社群亦不例外，即體現了僑社內部不同世代（「土生／新客」）對於民族主義的差異想像。據江柏煒研究，該會館甫由同鄉組織「孚濟廟」改組而成，內部分為來新不久、主張應當資助祖國的「唐山派」，與早已深耕當地二三代，強調地方關懷的「僑生派」。前者主張以「匯款」形式響應募捐，後者則認為慈善事業不應「捨近求遠」，且「公款收入不易」，依據會館章程反對此舉。兩派爭論，實則映照出華人僑社在家國情感與僑居現實間的糾葛與政治分歧。<sup>91</sup>

另據 1928 年《顯影》記載，當 9 月 25 日「廈門反日會」甫接獲「金門反日會」一件關於金門商船私下載運日貨的線報，便隨即雇「金星輪」驅往「嘍囉港」（按：應即為「料羅港」）巡緝，一舉查獲「金振泰」之裝載日貨的帆船五艘，總值國幣二萬元。船貨一併扣押後，除以大洋二千元具結贖回，後命其立將運返臺灣，船貨不得再往中國一帶起卸；<sup>92</sup>此舉不僅展現反日網絡的運作效率，也證實抵貨行動已然制度化。當是時，中國抵貨運動初由商人發起，五四運動後則轉由學生主導，進而遍及全國埠口，亦常引發商學對立與社會秩序動盪。1925 年以降，國民黨逐步整合地方抵貨力量，設立如「反日會」、「抗日會」、「反日援僑會」等組織，並統一規約，實施組織化運作。<sup>93</sup>在上引的《顯影》報導中，廈門「反日會」查緝日貨之迅速，便即驗證了其時已然十分制度化的抵貨機制，而正如周石峰所揭示，1927 年以降的抵貨運動已經不再由學生和商人所掌握，而轉由南

---

侵略，先後引發了規模不等的抵制日貨運動。參見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上）》（新北：花木蘭文化，2015），3-5。

<sup>90</sup> 莊國土、劉文正著，《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09），頁 186。

<sup>91</sup> 江柏煒，〈“兩座島、一群人”：1949 年以前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跨境運作〉，《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七卷第二期（2015.12），頁 14-16。

<sup>92</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15-16、33。

<sup>93</sup> 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上）》（新北：花木蘭文化，2015），147；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5），頁 287-305。

京政府掌控，這凸顯了國民黨在「寧漢分裂」與「清共」、「清黨」的政局背景下，蔣介石主導之國民政府積極伸手地方社會組織，奪取對「愛國」的詮釋權，意圖將自身塑造成唯一合法的民族主義代表。<sup>94</sup>

接踵而至的中日戰事、國共內戰，以及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使不靖的態勢與不安的情緒如形隨影，在這段充滿戰亂與動盪的歷史背景下，僑鄉知識分子往往將同舟共濟的民族情感，泛化並轉移到對地方的關注，自此，一種「家鄉」與「國族」共同攜手抵禦外侮、打造家園的論述應運而生。<sup>95</sup>在《顯影》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召喚民族主義情感的敍事模式，是如何從前線告急、對抗日軍的背景，延伸至一種以「家」——故鄉金門為核心的關懷模式，如發表於第十四卷第一期（1936.03），署名「珍」所發表的〈破碎山河話故鄉〉：

暴日自從實行其大陸政策，便蠶食鯨吞東三省，「九一八」淪亡之後，還不滿足其獸欲，得寸進尺，這回殷賊汝耕所組的變相「冀北自治會」，其中的背景，我們可以看得出秘密，我們一方面再看到台灣自劃入暴日版圖，台與閩僅一衣帶水之隔，野心勃勃地牠便以我閩為侵略的唯一焦點，所以現在的福建所處地位已和華北同站在最前線危機四伏的環境中，……況加現世經濟到處都在鬧著恐慌。閩人生命線的南洋群島，已覺有些不通，兼之國內的天災人禍，農村破產已不可收拾，繡麗的閩山，已在這幾重危機之下，漸漸的褪了色，變了淒涼的場所。吾金位置介乎期間，孤懸大海，無所依倚。況又地皮瘦瘠，農田寥寥三五丘，所產者蕃薯、落花生耳，糧食全賴乎他縣之供給，觀之丘陵，野草叢生，燃料又是賴乎漳碼，設而一

<sup>94</sup> 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5），頁312-313。

<sup>95</sup> 如發表於第十一卷第五期的冷月〈登上新的途程霸！為廿四年之元旦作〉，便回顧並反映了1932年國事蜩螗的景象，內容除了批判外貨輸入，也以「青年們」為號召，期許「革命青年」能以建設國家為己任。有趣的是，文中所提及「掀起了過去廿三年來的歷史，真是不堪回首，自從革命先烈不惜留他們的血：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以作中華民國的代價！中國算是命革過了，可是廿餘年來的國運怎麼樣？國民有享著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太平景象嗎？不是什麼國恥，就是什麼天災橫禍，整天說不盡……。」可以見得地方知識分子對於「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的犧及其無意義，民間觀點在可見一斑。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頁2468。

一旦非常時期的發生，勢必使我金門四萬餘人將為餓殍。而漁業又是墨守成法，不加科學改良，因之魚產額很少，茫茫大海與我金門何？……這破碎的山河，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的福建，大海浮懸的金門，一旦發生不幸，金人便先受鐵蹄下的踐踏！金門人！猛醒吧！<sup>96</sup>



文中先是對「獸欲不滿」的「暴日」大力地撻伐，<sup>97</sup>敘述一種危機四伏的情境，並告誡鄉人「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的道理，<sup>98</sup>以激勵一種「及時雨」式的現代化，否則敵人一來，覆巢之下定無完卵。<sup>99</sup>

在這種外患當前、內必自強的論述下，一種以地方開發為當務的思維不偏不倚地參雜於茲。這種將傳統海外華人所依歸的地緣性情結，與民族國家情感連為一體的實踐，可以陳嘉庚為例——如孔復禮即認為，陳嘉庚的民族主義與愛國運動乃是建立於其所由來的福建方言群之上，加之以傳統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最終無由地推及而為更加普遍的公民責任與華人社會視野。<sup>100</sup>引文中將「華北」與「福建」並列，視「中國」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整體」，將「已淪陷」的華北與「將淪陷」的福建聯繫起來，使「大海浮懸」的金門被包裹進整個戰爭風暴的邊緣，正是這種僑鄉愛國情境的體現之一。<sup>101</sup>

「日佔前」的《顯影》，以日本作為共同他者，勾勒出一種僑鄉的愛國情境，到了 1936 年 9 月的第十五卷第一期起，曾短暫地在刊物上規劃了「金門風雨談」的欄位，在戰情告急的當口，是為一種帶有「風雨共濟」性質的公共性文字空間。

<sup>96</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743。

<sup>97</sup> 鮑文（薛崇武）的〈談談華北〉，是《顯影》中另一篇分析日軍侵略情勢的文章。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744。

<sup>98</sup> 語出《管子·牧民》篇。

<sup>99</sup> 同樣論調的文章，另可見矢毅〈倘家鄉被侵佔，我們怎樣？〉，載於《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02。

<sup>100</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348-352；Gungwu, Wang.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edited by C. D. Cowan and O. W. Walter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409.

<sup>101</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 348

<sup>102</sup>「重光後」，則因國共硝煙再度燃起，使「家」「國」攜手的地方建設策略，在國內動盪的局勢下，仍舊被刊物編者所秉持，如其發表於 1948 年 6 月的〈復刊二周年小言〉：

在這最近的二十四個月中，以言人事，是如何的變遷；以言國是，又是如何的動盪。由勝利的狂歡，轉入內戰的悲戚，經濟苦崩，民生塗炭，今雖訓政結束，行憲開端，事實上還是愁雲黯淡，佈滿了陰霾，距離光明安定的境遇，似乎為塗尚遠。這二載光陰，實際上比八年抗戰的艱苦長途，還要沈重……處今日的國勢，做今日的國民，我以為只有一條生路可走，那就是大家收拾起空洞的侈談，恪守實際的崗位……與其侈談國家大事，毋寧實談家鄉小事……譬如我們珠山人，珠山，就是我們的崗位，把我們的力量集中起來，……珠山是金門縣治的一村，金門是中華民國的一環，……自本期起，決注全力側重珠山小學校舍之建築，……願珠山海內外僑親人士，大家協力同心，步調一致……共促珠小建設的實現！<sup>103</sup>

「與其侈談國家大事，毋寧實談家鄉小事」，是重光後《顯影》編者對刊物的自許，時值國內戰事延燒之際，「家」「國」攜手的論調持續貫徹，在這世紀變局之中，編者認為「恪守實際崗位」的方式便是鞏固這小小的珠山、小小的金門，是以要從文化、教育和地方建設入手，以「處今日的國勢，做今日的國民」。順是，本章第二、三節即將說明，這種「家」「國」攜手的地方建設觀點，是如何作為《顯影》中推動現代化建設，以及引入新文化與新思想的論述基礎。

## 第二節 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媒介

根據徐元音〈讀刊宛如上大街〉一文，以「籌募」為刊物主軸的僑刊在 1920-30 年代大量湧現，籌募的款項主要為地方學校的興建計畫，如廣東台山《浮山

<sup>102</sup> 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878、2902、2945。

<sup>103</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584。

月報》、《文疆月報》、《東坑月刊》等。<sup>104</sup>這些僑刊創設的脈絡，銜接了《顯影》在1928年9月由「珠小校友會通訊社」創辦的歷史摺痕，作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媒介，他們的首要之務當屬地方教育機構之倡建。「珠小通訊社」正是由一群志在改造家園社會、著手地方教育事務，以及對文化知識啟蒙有著共同理想的青年所組成，他們齊心編纂《顯影》，透過各種功能性欄位來維持校務、推動社區現代化的過程，是本節即將展開探討的主題。

## 一、教育機構的籌募與倡建

有清一代，金門珠山鄉中設有學塾兩所——「頂書房」和「下書房」，前者座落於雞庵山麓、東宮後方，後者乃位於鄉中祭祀中心「大道公廟」與「大宗宗祠」之間，為一落二檯的舊式平房，<sup>105</sup>民國時期珠山小學成立後，則連同大宗宗祠暫且作為學生上課之地點，不可不謂簡陋。<sup>106</sup>此故，珠小校友開始倡議新校舍的興建，如1928年9月這則署名「珠小校舍建築籌委會」的告示，向海外同鄉發起了「勸捐」、「認捐」的懇求：

列位同鄉：

珠山小學校舍之建築園，差不多是晚近最要緊之事，吾海外同鄉，平素號稱里中先進，對公又屬熱心慨慷，關於前所托向同鄉勸捐，及請認捐之事，諒可得列位努力進行，成績優良，料可盼也，如何？望速下示，是所盼！

107

為了喚起里人對校舍建築的重視，除了透過「通訊」欄向海外僑胞公開發起

<sup>104</sup> Hsu, Madeline Y. "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000, pp.145-147.

<sup>105</sup> 袁興言，〈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07），頁「附 9-3」。

<sup>106</sup> 《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03-304。

<sup>107</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1。

勸捐、認捐的告示，「報導」欄位也擔綱了類似宣導的角色，如 1929 年 2 月一則〈行將近近相對〉的報導：

古賢全堡，<sup>108</sup>自古岡學校捷足先蓋新校後，鄰近設有學校之鄉，亦盡齊皆躍躍欲試，金城起手等備，珠山籌備無成，獨金水人人踴躍，即果見不落人後，在里一倡，僑胞齊和，不數月立得頭緒，近且在測劃校舍地址矣。似此進行之快捷，即不久間，金水新校，又將巍巍矗立，與古崗新校形成遙遙相對矣。盛哉，古賢堡又聞水頭僑外之人，此次努力建築鼓吹外，近且決在南洋之適當商埠開設一規模極大之金水商店，暫以所存之學校基金充作資本，而已逐年所得盈利抽幾成做該校之每年常年費用，計振興而垂永久。法善乎否？此時無從見得，惟由是以可灼見金水海外僑胞及里人之為公如是，大足吾金人士作榜樣也。<sup>109</sup>

報導中，對於故鄉興建校舍的渴求展露無遺，而文中不甘落居人後的心態，有如展開軍備競賽，「大足吾金人士作榜樣也」一句更顯其欲藉此喚醒里中僑胞「見賢思齊」之心。

其後，里中熱心份子相繼透過《顯影》「輿論」欄發表校舍建築的重要性，如署名小樵之作者發表於 1932 年 9 月之〈鄉人對於校舍倡建聲中應有之認識與努力〉——時值水頭金水國小校舍竣工之際，這鼓動了珠山人從善如流之心。文中也重申了〈行將近近相對〉的論調，將皆以過往的榮光——珠山作為古賢堡中首辦學校——作「豈可落居人後」之砥礪，呼告鄉民出錢出力，好及早建成校舍。1933 年 2 月 19 日，「珠山小學校舍建築委員會」召集里中長老與鄉衆，一同討論校地選址問題；<sup>110</sup>《顯影》第七卷第五期則刊出〈校舍建築收支一覽表〉，呼籲

<sup>108</sup> 民國四年金門設縣後，延續了清代的土地行政區域劃分「保」制，計有六都、十保。如金門島西的後浦保、古賢堡、古湖堡，位於島中部的劉浦保、瓊山保，以及位於島西的陽田保、汝沙保，島南的滄湖保，與烈嶼保、大嶝保。詳參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二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40-41。

<sup>109</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61-262。

<sup>110</sup> 《顯影（Shinning）》第七卷，頁 1683-1684。

海外同鄉「再加把勁」，此際，校舍興建的輪軸似已開始轉動，然直至 1937 年的戰事爆發，這個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金島「重光」後，《顯影》於 1946 年 4 月復刊，其中，「第十六卷」（重光號）從重返油印到恢復鉛印的過程，見證了金門全島和珠山鄉梓的重整與復甦。發行於該年 5 月底的第十六卷第二期，頁首特別刊載了一則〈凡事非財莫舉〉的告示，要為珠山小學復校一事籌措「壹佰萬」，<sup>111</sup>接踵的第三期亦刊出〈珠小復校如何？〉一文向讀者大力勸募。<sup>112</sup>第十七卷第一期，署名「鈴」之鄉民發表〈籌備建築校舍之呼聲〉一文，同期，署名「逢」者則發表〈我們需要一座校舍〉，<sup>113</sup>文章中指出「我們現在的校舍為兩三間破陋不堪的民房」，並深入探討校舍建築的「圖樣設計」、「費用捐募」應該如何具體地進行。同卷第二期，則刊登了建設委員會成員薛崇武與薛春田二人赴廈訪問廈門海軍造船所雷文錠工程師，向其徵詢校舍建築草圖之意見，並附上所規劃之工程時間、預算等。<sup>114</sup>同卷第四期，報載建設委員會於珠小閱書報社公開展覽該草圖一事，標題為「里中男婦老幼都說好！可是萬般事業全靠錢。」同卷第五期，由署名「餘生」者發表〈我們甘落後嗎？為珠小校舍建築事情更進一言〉，意在為校舍經費勸募，<sup>115</sup>而「祝」〈關於校舍二三語〉一文則提出「校舍需要有設計，其中禮堂、辦公室、遊藝室應具備不同風格之建築設計」之建議，<sup>116</sup>然此事似乎不了了之，直至第十八卷第三期，署名「沙崙」者發表〈為珠小建設催妝〉一文向僑胞勸募，<sup>117</sup>待到第十九卷第一期，方又見報載〈完成珠山文化大堡壘：珠山小學薛氏宗祠聯合大建築〉，內容提及薛崇武先生召集全鄉父老賢達假閱書報社召開第一次座談會，徵求校舍建築之意見，歸結衆意，乃決定改大宗、小宗及下書房為「珠山小學與薛氏宗祠聯合大建築」，

---

<sup>11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046-3047。

<sup>112</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082。

<sup>113</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12。

<sup>114</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39、3248。

<sup>11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91。

<sup>116</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92。

<sup>117</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2。

<sup>118</sup>於是 1948 年元月三日禮聘廈門張坤生工程師蒞鄉勘查可行性，最終該生以為若將「小學」與「宗祠」聯合建築，有失教育旨趣，同時該區域腹地不大、地勢不平，無益於展示學宮之莊嚴，且若以一新造建築替換三座歷史性建築，無疑得不償失，是故該提案最終亦作告吹。<sup>119</sup>



1948 年 3 月第十九卷第四期，《顯影》於卷首亮出最終版本之「珠山小學設計中的新校舍正面圖」，<sup>120</sup>並刊登〈請參加珠山小學校舍之建築『顯影之友室』運動〉，邀請《顯影》讀者共同為珠小校舍盡一份心力：

有珠小而後纔有《顯影》，有《顯影》而後纔有「顯影讀者」；珠小、《顯影》與顯影讀者，三者譬如三位一體，不但分開不得，簡直不容分開。……因此，《顯影》同志（同然包括讀者在內）為求永久而且加強保持與珠小不可分開的聯繫，特發動一種「運動」，即由《顯影》全體讀者裘集一筆鉅款，為珠小建築一座教室，而額之曰「顯影之友室」，如一班熱心家的甚麼堂、甚麼館，留著永遠的紀念，這是多麼有意義的舉動。<sup>121</sup>

這段文字透過闡釋學校建設、刊物、讀者之間緊密不分的聯繫，使遠在他鄉的讀者於閱讀刊物之時，興生一種油然的「責任感」；而參與「顯影之友室」的建造，勢必使捐贈者之名永久地在該建物中留下，這種在紀念物上銘刻（inscribe）的舉動，使鄉僑不必然得經歷實際意義上的衣錦還鄉，也得以在捐款以後，使故鄉將他銘記；就在那以他為名的建築中，一個離鄉背井的幽魂在鄉音無改的故土上，無懸念地取得了安生的憑券，並重新錨定了魂歸的念想。自是，與原鄉之間的親緣紐帶不消說是更加地牢固了，隨之而來的殊榮與名譽，卻不會只是

---

<sup>118</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480。

<sup>11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498。

<sup>120</sup> 珠山小學校舍於 1948 年 10 月 1 日正式與廈門「雲燦」建設公司簽署動工，總工程營造費為六萬七千元金圓券（流通於 1948-1949 年間的貨幣）。值得注意的是，「雲燦」建設公司當時似乎承攬不少金門學校校舍，如《顯影》第二十卷第二期刊載預計興建的金中中學第二校舍。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11、3653。

<sup>12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537。

錦上添花，而是僑居地社群裡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



二十卷第一期起，《顯影》開始刊登「顯影之友室徵信錄」，該清單詳細羅列了捐款人的名錄，<sup>122</sup>而相關的勸募訊息，則一直持續至《顯影》的最後一期（第二十一卷第五期）。<sup>123</sup>值得一提的是，新人結婚節去相關糜費，併合賀儀以資捐助，亦為一種特殊的捐款形式，如第二十卷第三期便刊出〈薛芳城為長男永美結婚鳴謝親友！〉之版面，詳細紀錄了里人薛永美的結婚賀儀款項併節糜費，合計當時國幣陸億元（折合美金六百元），全數移充珠小校舍作為建築費。<sup>124</sup>根據 1949 年第二十一卷第五期之報導，該年四月底已全部完成校舍之禮堂、教室與辦公廳，已大致完成百分之九十之進度，其後《顯影》停刊，具體竣工日期不得而知，根據《薛氏族譜》與口述歷史資料顯示，校舍大致竣工後僅正式啟用一學期，1950 年春便被國軍佔用作為營房，更將剩下尚未完成之部分建築材料搬去做碉堡，直至民國七十八年，方才交還薛氏宗親會。<sup>125</sup>

正所謂從善如流，珠小校舍勸募的成功經驗並非個案，《顯影》中同樣記載了許多關於教育機構倡建的新聞，如金門中學於戰後的復校，此事經緯，在顏西林〈談談金門中學生〉中，曾記載 1946 年底由幾位海外僑領召集社會賢達，假鼓浪嶼中華路某宅舉行座談。<sup>126</sup>1947 年 6 月 26 日，正式成立金門初級中學復校委員會，翌日發表〈為「金中」復校告海內外鄉親書〉，刊登於《顯影》第十八卷第三期，除了向海內外鄉親說明金中復校的原委，也發出勸募的消息，以助維持正常校務。<sup>127</sup>消息一出，新加坡鄉僑立時應者雲集，除了成立金門初級中學駐星董事會籌備委員會，亦推選常務委員十五名，包含新加坡僑領鄭古悅，薛

---

<sup>122</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583、3632、3682。

<sup>123</sup> 如《顯影 (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31、3636；《顯影 (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 3717、3745、3764。

<sup>124</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19。

<sup>125</sup> 《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26-328；李金生，《雞庵山頂談珠山歷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1998.07），頁 77-79。

<sup>126</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14。

<sup>127</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90。

永忝、薛殘白等人；<sup>128</sup>旅菲宿務同鄉會亦群起熱援之。<sup>129</sup>成功復校後，爲了學校經費的永續來源，署名「金民」者曾提出基金計畫，<sup>130</sup>而《顯影》主編薛崇武則受到金門中學之聘擔任庶務一職，權將刊物移至後浦辦公，又得金中董事會之請，將《顯影》設於金中校內，權做金中校刊。<sup>131</sup>是故，自第十八卷第六期起，至第二十一卷第五期，《顯影》中一直保有「金中校聞」之欄位。

除了珠山小學與金門中學外，作爲旅外金僑共同刊物的《顯影》，亦記載了許多校舍建築的捐款名錄，如第二十卷第三期所刊載的〈金城小學建築校舍捐款鳴謝〉，便謂「本校此次籌建校舍蒙《顯影》代為向海外宣揚並蒙撥寶貴篇幅為本校向捐者鳴謝，尤深感佩。」<sup>132</sup>其他相關紀錄如〈蓮滄學校鳴謝啟事〉、<sup>133</sup>〈浯山小學鳴謝啟事〉、<sup>134</sup>〈金山小學校舍建築董事會鳴謝啟事〉、<sup>135</sup>〈湖美小學鳴謝啟事〉等。<sup>136</sup>諸般鳴謝啟事中，除羅列捐款人姓名外，亦詳細地記錄了具體的款項數目，或是特殊的捐贈佈置（如捐贈圖書、時鐘、風琴、體育器材等物）。

總結《顯影》刊物作爲敦促地方教育建設的重要媒介，其特徵主要展現在下列幾個面向：

（一）勸募之告示與廣告：所謂「告示」（bulletin）的形式，在《顯影》尚未發展爲鉛印印刷時，多出現於通訊欄位，而後交付鉛印，則或佔據若干欄位版面，或單開一頁篇幅。這樣的勸募形式不單單出現於校舍倡建的告示中，另如珠小校友會之常年會費或《顯影》的印刷與營運費用，亦是重點勸募內容之一。

---

<sup>12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3404。

<sup>129</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3427。

<sup>130</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3418-3419。

<sup>131</sup> 薛崇武、張夢我、顏西林同爲金中中學復校之發起人，詳見《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3433、3439、3464。

<sup>132</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3627。

<sup>133</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3643。

<sup>134</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3646。

<sup>135</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3675。

<sup>136</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3746。



(二) 捐款芳名錄：隨著《顯影》在南洋金僑社區發行之廣布，其影響力漸漸增加，如前所述，無論是以個人名義或發行商號輯錄於捐款名冊，一來是有利於增進在南洋華人社區中的社會地位或商譽，二來在如此注重原鄉地緣關係的華人社會中，則得以維持自身與家鄉的聯繫。

(三) 輿論文章：如本小節前述署名小樵之所著〈鄉人對於校舍倡建聲中應有之認識與努力〉，文中深切地指出了珠山教育「逐漸萎微、一蹶不振」乃是源於校舍倡建不效之故，文末則鼓勵鄉里衆人出財出力。<sup>138</sup>這類文章主要由里中主持校友會機構的知識份子撰寫，針對地方建設之實際面與前瞻性，提出有效的建設方針與時程規劃，此一實踐不僅正當化了教育機構建設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也在理論上提出了有效的支撐。

(四) 工程進度報導與收支報告：如刊登於第二十一卷第三期的〈我們不患寡而患不均——再告海外珠江鄉僑——〉一文，先是向讀者報告了當前珠小校舍營造之進度已進行了「十分之五六」，接著以「我們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詞指稱大多數的捐款者「幾為旅菲鄉僑所獨佔」，邀請他地之鄉僑亦應有責無旁貸之精神，一同響應桑梓之大事。<sup>139</sup>總言之，對工程進度進行的報導，不僅能使已捐款的鄉民了解當前的施工狀況，對於尚未捐款者，也能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同理，詳細的收支情形報告，對於捐款者而言，亦是不可缺少之部分。

## 二、地方開墾的觀點與批判

在出洋風氣興盛的金門，青年子弟正是迫於家鄉百業蕭條、土地貧瘠，難以出人頭地，種種無奈下才不得已遠走他鄉、謀求更好的發展；此際，當以什麼樣的契機、誘因或條件，才能喚起人們回頭關心家鄉的拓墾與實業發展？翻

<sup>137</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94-295。

<sup>138</sup> 《顯影 (Shinning)》第七卷，頁 1555-1558。

<sup>139</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 3717。

開《顯影》第一卷扉頁，可見在〈創刊詞〉的後一篇文章〈對洋客們談談幾句〉，誠已試圖給出答案：

……我們中國人，處於地瘠人眾、工業不振的境內，謀生特覺困難，所以很多的人，為了這些事來忍住淚、傷著情，和他們的父母、愛人共嘗生別之苦味、出國的軫懷，到那言語不通、顏色不同的民族的地方做買賣去，……洋客非絕對不能夠享受故鄉的風味和天倫的樂事，不過是時間和經濟的問題而已，照珠山的洋客中調查出來：有業經營的只佔百分之三，其餘的都是店夥，營業的性質和賭博相去不遠，終有失敗經濟恐慌的一日，這且不要說，單說那夥計，最好機會的也要三五年的功夫，才得回來顯祖耀宗，這只是滿足了一時的需求，並不是作根本上的解決，做夥計所賺的錢是有限的，拿到家裡，不上一兩年就會花盡，那時候不跑又是不成得，如此一回一往，將歸是落空。要滿足精神上的需要，固然不要離家鄉別故人，才不興悲懷傷感之念，孤寂失戀之慘，……想破此萬重牢圍，就有在祖國建立謀生機關的必要。謀生機關可由合資組織而達到實現，力實業、設工廠，均聽其變，這幾句簡單的空談，諸君未使不是老早知道的，不過是缺少建設的力量和合作的精神，以致至今渺無聲色，殊堪惜哉！<sup>140</sup>

這篇由惕齋（薛永乾）所撰之文章，以「離鄉背井造成精神生活的不滿」為基調，要「對洋客們談談幾句」，文中指出：對於未持有個人資本的跨國勞動者而言，即使下了南洋，也絕非長久之計。文中除了反映了僑鄉知識份子對跨國移／勞動的批判性觀點，字裡行間也透露出傳統的華人家庭主義觀；而鼓吹有為青年留於家鄉建設機關、發展實業的解套，與對收入不穩的「夥計」所提出的反省，似乎無不在批判著「下南洋」的過度神話，與對僑匯之過度依賴。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對於洋客徒勞辛苦、精神不能滿足的分析，類於馬克思哲學中「異化」（alienation）的理論脈絡，該術語指的是勞工階級在資本家的剝削中，其勞動成果與所應得的報酬不符合之情形。

---

<sup>140</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6。

總結此處之論述，來多半乃自於這些或多或少有過「出洋」經驗的知識份子，他們往往將「出洋」視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生涯抉擇，並將勢迫要出洋的遠因，歸咎於國內環境之惡劣與現代化的不足，此際，打造一個新的故鄉，勢必成了最為顧及根源性的方案。是以，「『家』『國』攜手」的情境再次浮現，這些視「建設祖國」、「建設家鄉」為當務的論著文章，可見發表於第五卷卷首的長沙（薛長沙）〈開墾故鄉的荒地〉：

現正在訓政開始的時期——建國大綱第七條說：「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對於一切破壞建設的工作，也應著緊進引，那來，地方自治也更要先打個基礎，……這回調查全鄉人口的總數，總共七百五四人，住鄉實額不過五百三八人，餘者概往南洋謀生，這點最可奇怪，江山這樣廣大，堪說是個安樂的農村，何用離鄉背井的奔波呢？其原因甚多，茲略加剖解分述為下：

- (A)政治腐敗，惡劣環境造成生活上的困難。
- (B)教育未得普及全鄉，缺乏科學常識。
- (C)物價騰貴，生活不易維持。
- (D)家族觀念存在，風水墳地加增，農村食物的生產減少。
- (E)南洋華僑襲延的傳統觀念，仍尚存在。

可見文中從政治、教育、經濟、傳統社會、華僑等面向，對「為何青年被迫下南洋」這樣的問題展開質詰，觀點如下：

近世科學，日益昌明，這是世人的福音，美國西部昔日蓋為荒地，自有機械發達以後，一變而為很膏腴的農產地……我國人民生計困苦……各科學理也漸漸的輸入，那末，墾荒的事業也應該早日著手。……海通以後，中國人每年對外貿易的統計，總是超入（按：即經濟學術語「入超」（trade deficit，或作「貿易逆差」）），況且近年來金融突然轉變，一切外貨價值高

增數倍，我們每年進貢於帝國主義者的金錢幾乎達到數百萬的總額，這大宗的金錢，也都是間接由農民負擔的……現在我們先觀察全鄉的消費概況，是否自給自足的地步呢？現要從糧食及薪料問題來討論，對於日常用的米、麵粉、石油、豆糖，以及一切無不由外地轉運供給，每年總是運出數萬金錢，可是現鄉人在南洋的商況，不比早年，金錢的來源斷絕，一般農民，自然是債台高高的建築起來了……照上面話說的，看來可知墾荒實在是目前最需要事業……。<sup>141</sup>

文中從「重視科學」的角度談起，指出工業化在現代社會之必須，並從對外貿易與經濟金融等面向，拈出鄉村農民階級與世界資本經濟之間嚴重的結構性剝削，而一切的根本，則歸結於國內對於基礎建設與實業開發之不足。

根據謝重光等著《金門史稿》對於近代史上金門農業環境的分析，可知彼宋元時期，自然生態環境稱可，尚利水稻與麥作種植，明中葉以降，人口過量移入，壤質日漸貧瘠、不堪負荷，加上嚴重的濫墾濫伐，最後轉至旱作，如蕃薯、花生云云。<sup>142</sup>為改善如此惡劣、不利於農的自然環境，從清末以降，人們開始意識到植樹造林、重整沃壤的重要性，如《金門志·風俗紀·耕漁》便指出：

宜沿溪裁竹木雜樹，障斷海風，使沙不簸揚，便可多辟腴園，利賴無窮。

或挑壘沙岸，種刺藤雜草，沙隨風墜草際，自然日增高大焉。<sup>143</sup>

據《顯影》在 1929 年 2 月所刊出的〈問答〉可得知，金門植樹造林之工作雖然來自政府的提倡，<sup>144</sup>但實行的人不多，在珠山則有所響應，植栽以秋絮與梧桐為主。<sup>145</sup>客觀而言，這些地方的知識分子對於「植樹」之概念，顯然並非是單純地將政府的口令照單全收，或對「綠化」持有直觀片面的印象，如薛長沙刊登於

<sup>141</sup> 《顯影 (Shinning)》第五卷，頁 993-997。

<sup>142</sup>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著，《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頁 125-132。

<sup>143</sup> 轉引自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著，《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頁 142。

<sup>144</sup> 據《顯影》第二十卷第三期報導，縣政府於「重光」後曾制定護林辦法數則，通令全縣民衆切實遵守，否則送司法機關核辦，詳見《顯影 (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24。

<sup>145</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304-305。

第四卷第五期的〈我們為什麼要提倡植樹〉中，便如數家珍地羅列了許多科學化的專業知識，包含利用植樹以中和土壤鹼值，或植樹於特定坡地以增進水土保持，農地植樹以涵養水源等，文末附上的「中國國民黨造林運動宣傳標語」，展現了遵循國策響應植樹，意在增進全體國民利益的決心。<sup>146</sup>另一篇發表於第十二卷第一期的秋痕〈鄉園植樹的商榷〉，亦提出具體可實踐的建議：一、應種植符合閩南水土的相思樹；二、珠山聯外道路，應實踐「二十步一樹」的願景。

147

### 三、實業建設的推動與困難

當這座水貧土瘠、稼穡維艱的小島，開始加入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腳步，展開基礎建設與產業更新之時，首要克服之困難為何？衆所周知，工業化的基礎建立於完善的內陸交通建設（即鐵路、公路），而金門如要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公路建設看似是首要之務。《顯影》中散見一些有關公路開辦的記載，而從這些報導可得知，金門公路之開辦，主要在 1930 年由時任縣長李敬仲會同縣黨部倡辦，<sup>148</sup>他們以類似工會組織的「後浦金門商會」為主要召集地點，在不下十餘次的會議協商後，選出十五名籌備委員，審查通過後成立「金門民辦車路股份有限公司」，路線主要議定為「後浦同安渡至官澳」、「後浦至古寧頭」、「後浦至金門城」三種。<sup>149</sup>一切看似底定，實際卻屢屢停頓，不是因為政治首長幾經更迭，就是金援不濟，遭致停工；<sup>150</sup>在當時，財政方面仍須仰賴南洋的僑匯，不巧時值世界遭遇經濟大蕭條之際，對南洋商業的情況影響甚鉅，有礙款項之籌措，而願意承擔款項者，亦幾度易主；1932 年 2 月，已粗略完成路基胚模，<sup>151</sup>但直至 1934 年 2 月，仍舊維持路胚狀態，甚至「失修而見毀壞」，且「不見有車開行」，

<sup>146</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頁 905-908。

<sup>147</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01-2502。

<sup>148</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71。

<sup>149</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62-263；其他的路線則需由該堡代表自行協商規劃，如刊登於第十二卷第四期之報導〈古賢代表請測路〉，見《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2580。

<sup>150</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卷，頁 390；《顯影 (Shinning)》第三卷，頁 582。

<sup>151</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頁 775-776。

<sup>152</sup>反倒有人利用該路胚做起腳踏車出租，或從廈門購入馬車載客等營生。

<sup>153</sup>1935年11月，新加坡金門會館特派員回鄉考察，認為此事不容再緩，便上呈省建設廳，轉飭廈門工務局代為測量，倡辦公路的巨輪看似再度轉動。

<sup>154</sup>1936年4月，具體的興築計畫重新由工務局起草，並計畫橋樑、涵洞、水管等施工細節。<sup>155</sup>然而，由於縣政府經費不足，1936年年底，由新加坡金門會館發起了公共捐款，於《顯影》第十五卷第四期發表〈金門公路敬告海外各埠鄉僑書〉，鼓勵海外各埠同鄉共同響應，以填補不足的款項；該文不僅詳細說明了工程具體的招標細項，並預估在六個月內完工，屆時將招商承租行車，並「應得租金，委任機關代管，專做養路之用」。<sup>156</sup>

金門公路的興建過程，是僑鄉現代化的現實寫照，一方面反映了民初時期地方政府的力不從心、左支右绌，另一方面卻展示了海外同鄉組織（金門會館）對家鄉公共建設的熱心和推動現代化之不遺餘力。然而，這幾條道路終於「日本手」時期大致由「金門行政公署」建成，<sup>157</sup>成為今日金門島上幾條重要幹道「環島北路」、「環島西路」等路之丕基。根據薛福緣〈八年滄桑錄〉1939年8月23日載：

偽行政公署通令各鄉開闢公路：第一線後浦至金門城；第二線後浦至古寧頭；第三線瓊林至料羅；第四線沙尾至山后。<sup>158</sup>

由「日本手」時期所成立的「金門行政公署」所留下的《金門行政公署週年紀念

<sup>152</sup> 然而，根據《顯影》第三卷第三期之記載，金門民辦汽車路公司於1930年底允「陳智澤」購買汽車兩駕，先行開駛之權。見《顯影（Shinning）》第三卷，頁608。

<sup>153</sup> 《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2137。

<sup>154</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2671。

<sup>155</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2782。

<sup>156</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2992-2993。

<sup>157</sup> 金門行政公署在1939年由日方成立，初直屬臺灣總督府，後改隸南京汪精衛的「國民政府」（1941-1945），但實際上由日本興亞院廈門聯絡部控制，詳見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15。

<sup>158</sup> 原刊於《顯影》第十六卷，此轉引自已整理資料，見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57。

特刊》「建設科工作概況」一條則云：

島內道路崎嶇難行，交通阻礙，運輸上感覺莫大困難，而地方上種種事業亦因而難發展，經島人理解，願出任義務工作，各鄉自動派人踴躍參加，不一月而完竣。新關紀念道路四段，計全線長有 2 萬 1 千 5 百米突（筆者按：meter，即公尺）。<sup>159</sup>

此處姑且不論文中所謂的「島人願出任義務工作」，是否實際上為日本方施以強迫動員之結果，<sup>160</sup>然可確定的是，透過修竣後的公路，日軍在島上的開發事業勢必更加通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手」佔領時期所啟始的實業開發，具有高度官民合作的性質，其中關竅，當可注意擔任行政公署之署長王廷植，<sup>161</sup>這位諳日語、能與日人合作，並曾擔任後浦金門商會理事長的王廷植，於 1941 年 1 月在後浦成立「金門開發公司」，<sup>162</sup>據《臺灣日日新報》報載，該會社社長即為同時擔任署長的王廷植，經理則為曾任臺北市役所水道課吏員的三溝文八。<sup>163</sup>其成立資本額

---

<sup>159</sup> 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144。

<sup>160</sup> 日軍佔領金門島時期，曾於 1942 年 4 月 8 日起，規定島上居民自 13 歲至 55 歲之壯丁須集中照相製作島民證，凡持有島民證的居民必須接受徵役、開墾、築路、興建機場及建工事等勤務，並召集全島的農民及驃馬為日軍搬運軍需等勞務工作，最廣為人知者當為 1944 年底興建安岐飛機場的強制勞役。詳見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24-25。

<sup>161</sup> 《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 2109；王先正，〈閩王祠的故事〉（來源：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254623?cprint=pt>，檢索日期：2024.12.27）。

<sup>162</sup> 筆者推測另一則日本佔領時期刊登於金門的「金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廣告，即為此「會社」之廣告，該廣告詳列其「本店」設於「金門後浦」，而其業務介紹列有：「一、主要物產之交易事業；一、製鹽，海草採取，石灰製造等開發事業；一、島內自動車交通運輸事業海上交通；一、金融信託業；一、其他前項附帶事業。」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36。

<sup>163</sup> 「三溝文八，1924- 1934 擔任臺北市役所水道課 吏員／書記；昭和四年（1929）擔任臺北市役所財務課書記」，詳參《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頁 284，此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105。

共四十萬元，其中金門公署出資 10 萬元，「福大」出資 10 萬元、「宏發」公司出資 5 萬元、剩下 15 萬元則由當地居民出資、旨在「建立島上的製鹽業、汽車、金門與小金門間的海上交通、信用組合，廈門與金門產品交易等等」，該報導更敘述：

金門島最具潛力的製鹽事業，目前僅使用原始的採取方法，前些日子總督府森田技術員前來，並針對種種實情調查後，第一期計畫為設置大金門 25 甲步、小金門 23 甲步的鹽田，第二期則擴充到 120 甲步，大致上第一期的計畫已開始執行，希望完成後，可完全滿足廈門、金門方面的需求。此外，島上的開發企畫，還包括番薯的改良和增產，以及雞、豬等飼養事業的改進等。<sup>164</sup>

此中所提及之「製鹽事業」，則為另一項日本方於佔領時期極力推行的實業建設，如 1940 年金門行政公署公賣科科長黃宏源的一篇報告〈創設鹽場之計劃〉：

顧金門地質，砂礫多而膏腴少，農作物不足自給；然東沿海之漁獵與西濱灣之鹽場，未始非天惠也。漁獵非關本題，故不提之；鹽則為本島最有發展、冀望之事業。蓋本島鹽場，自元大德創始歷明清迄至民國，具有悠長之史，佳良之成績。雖被廢場，歷時未久，堤岸尚不致大崩圮；鹽埕畛畦尚明，足資利用之材料，猶散在其間，是以著手較易，可收事半功倍之効。不但此也，是事業之計劃實現後。則鹽場附近村落，失業鄉民，得獲就業之機，庶免終墮懶惰之習。而生產充實，免賴外鹽，漏卮得塞，固不待言。更足供給廈、鼓之消費，綽綽有裕。而將所得益以樹地方建設，則顯成畸形之農村消費地，或得一變本來面目達成健全之生產地也。有此種種之條件在，故本事業之創設為所必行之勢，無待著蔡而定也。<sup>165</sup>

<sup>164</sup> 原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 月 6 日（14663 號）第 01 版，此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105-106。

<sup>165</sup> 原載於《金門行政公署週年紀念特刊》，此轉引自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頁 167。

文中所提及「鹽場之創設」，有助於提供在地居民就業機會，「庶免終墮懶惰之習」，而根據《顯影》重光卷第六期之報導〈西園鹽埕設備最新式：縣民請勿剷除〉中所述，可知所言不虛。該文提及重光後，西園鹽場曾遭福建省鹽務局「奉令剷除」，<sup>166</sup>此事一出，金門縣政府、參議會與其他民意機關紛紛以「縣民靠該場生活者有兩百多戶」，特電中央籲請准予繼續產鹽。<sup>167</sup>然而，即便各方人士奔走，省鹽務局終究不予復曬，<sup>168</sup>

自此，鹽業開採在金門實業的歷史上，再次留下了一頁舊章。同樣於「重光」後遭停擺或可謂「遭清算」者，尚有前述「金門開發公司」所留下的四輛卡車。據《顯影》第十七卷第六期載，此四輛卡車原於「日本手」時期用以往返沙尾、後浦與碼頭間，用於載貨與載客，「重光」後卻被縣府成立的「敵產處理局」列為「敵偽產物」，「每輛以七十萬元售與廈門某汽車行」。在《顯影》報導中，可見報導者秉吁嗟之口吻，無奈嘆道：「查目下汽車每輛值三四百萬元，乃僅以區區幾十萬元賤售，對於金門交通前途，反漠視不顧，殊可嘆也。」<sup>169</sup>

同樣對該事感到惋惜的論調，見於《顯影》第十八卷第三期由署名「金民」的作者所撰之社論〈試談金門建設問題〉：「可惜敵人遺留的幾輛卡車，全都給拍賣到外地去，現仍用驃馬權宜。」<sup>170</sup>該文完整闡述了戰後金門現代化與實業建設現況，文中先分享了地理、歷史、人口、產業與治安概況，接著便提出「解決民生問題，莫重於『發展經濟建設』」一言。文中也提出公務員薪水不足，以及日漸嚴重的治安問題，針對文中的每個議題，作者皆能提出詳細數據，包含：金門面積大小、農地面積大小、人口數量及職業、警力數量、學校數量等，文末，則謂「經濟既無問題，則政治建設也好，軍事建設也好，文化建設也好，都可以

<sup>166</sup> 依據《財政年鑑：三編》記載：「福建區曾接收金門敵關鹽田 242 坎，因無保留必要，予以廢除。」轉引自陳炳容、吳秀琪，《古地圖與金門史研究》（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22），頁 328-383。

<sup>167</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六卷，頁 3199。

<sup>16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55；第二十一卷，頁 3696。

<sup>169</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21。

<sup>170</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4。

迎刃而解」。<sup>171</sup>言下之意，便是期許金門能夠早日走上現代化與工業化的道路，實質的內容，包含（一）礦產的開發、（二）水陸的交通、（三）農田水利設施、（四）漁業的發展。總結〈試談金門建設問題〉一文，其首段便以「建國」作楔，意在喚醒鄉僑的民族認同，舉起國家興亡之大纛，號召海外離散的鄉僑們投入地方建設。此外，對當前政治實況的針砭，同樣也是喚醒商僑為鄉投入的談資之一，如該文於全文最末所謂：

你說金門政治腐敗嗎？這是事實。可是你得知道，在我國貪污舞弊已是「天下烏鵲一般黑」了。公務員為什麼貪污舞弊？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都有；主要的是待遇問題沒有合理解決……一位科長薪水以一百五十元計算，每月纔得十八萬元，還不夠買米一担，他們倘使還得負擔家庭，你叫他怎樣維持生活？生活既無法維持，「老到」的設法兼商，膽大的索性貪污，「老實」或膽小的公務員，就只好活活等死！在這情形之下，你要希望政治修明，別無他法。第一要公務員的待遇提高。第二要把人民的生活改善。要做好以上兩點，祇有促進經濟建設。<sup>172</sup>

乍見這段文字，依稀劍指政治腐敗與公務員的貪污，文中亦花費許多篇幅來檢討地方政府過度騰高的稅制與苛捐，故全文看似聚焦於對地方治理與政治環境的批判，意在言外的是，設乏商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這些苛稅之繁重，或貪污之嚴峻，皆無改善之可能，要能改善文中所提出的「政治」、「軍事」、「文化」等問題，端賴海外資金對經濟建設的挹注。

有關現代化與工業化的記載中，《顯影》也隱隱地描繪了地方政治與權力糾葛暗湧的圖景，如在《顯影》重光號後的 1946-1949 年間之報導與社論，<sup>173</sup>便刊

---

<sup>17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4-3380。

<sup>172</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9-3380。

<sup>173</sup> 在「日本手」時期前於《顯影》便有關於金門礦產開發之文章，如第十三卷第一期之秋痕〈礦產與金門前途〉，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22。

登了兩個重要的嘗試項目——漁業與礦產。<sup>174</sup>有關金門地方漁業於《顯影》之記載，可參考第十三卷第五期〈本島漁業總調查〉，以及第十八卷第三期之〈復興故里的漁業〉，該文敘述珠山籌組「珠山水產合作社」之情形，旨在共同開發捕魚方式「豎網」之建設與開發。而關於礦產方面，載云島東「金沙江」地帶發現了「玻璃砂」（即「矽砂」、「石英砂」或「二氧化矽」 $(\text{SiO}_2)$ ，為製造玻璃之原料），礦脈深約六尺至一丈，<sup>175</sup>長達兩公里，計超過有超過三萬噸以上之礦藏，<sup>176</sup>十分有利可圖。其初次開採，便以兩千噸供應於華北秦皇島玻璃廠，賣價高達一億七千萬元。<sup>177</sup>1947年2月10日，由時任金門縣參議會議長林清池，召集全金社會士紳討論籌組「金門企業公司」開發。<sup>178</sup>從實際角度來看，在金沙江玻璃沙礦區的開發中，涉及多方利益的糾葛，凸顯了地方政治與經濟利益之間的複雜關係。據《顯影》第十七卷第五期的記載，<sup>179</sup>玻璃沙的開採利益分配中，股利之25%為「地方公益金」，而「酬勞仲介金」佔15%，其中，林清池分得8%，吳廷振分得5%，陳文麟分得2%。仔細爬梳此三人所分別代表之利益背景：首先，林清池是金門本地人，具律師與上海經商背景，時任金門參議院院長；<sup>180</sup>陳文麟則為福建南安人，廈門海軍總部航空處長，<sup>181</sup>他們作為具有濃厚政商背景的地方政府官員，相較於造福桑梓，他們是否更可能以短期利益為考量，將資源

---

<sup>174</sup> 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718；《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8；另可參閱第十八卷第五期之〈故里建設中漁業〉，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432。

<sup>175</sup> 《金門縣志》則載其礦層厚度約 1.5 公尺，表層為棕色或淺黃色之顆粒較大的砂土層，厚約 30-40 公分左右。詳參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二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219。

<sup>176</sup>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六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484。

<sup>177</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97。

<sup>178</sup> 詳見《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02；又據《金門縣志》載，報導中所謂「仕紳」應為趙友元、張西湖、柏永堯、黃天生、張蓬萊、張榮祥等人，詳參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六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34。

<sup>17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19。

<sup>180</sup> 參考許晚成主編，《上海百業人才小史》（上海：龍文書店，1945），頁 144；《上海律師公會會員錄》（上海：上海律師公會，1936），頁 33。

<sup>181</sup>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頁 393。

的收益導向個人或特定集團的利益？

另一方面，新加坡華僑第二代的吳廷振也可得一杯羹，<sup>182</sup>是否也顯示出海外金門家族資本與僑商網絡對金門地方資源的涉入？上述這兩種分配架構在在突顯出外來政商勢力利用地方資源進行權力、利益交換的事實，而地方居民所獲得的利益卻看似微乎其微。於是投稿於《顯影》第十八卷第四期，署名「一言」的論者如是批評：

為爭執地權開採權而糾紛，為爭購股額組織公司而糾紛，四五月來寂寞的沙浦道上，為了玻瓈沙而僕僕的人，大有絡繹不絕之概。這些奔馳忙碌的人中，除了本縣的人士而外，還夾有什麼外縣的幾位社會聞人呢！於是，第一個公司、第二個公司，新公司，舊公司以及所謂聯合公司，便應運而興地出來，在這些公司的組織與產生下，艨艟般數千噸巨大輪船發現於金門海面，銀色燦爛的玻瓈沙便從數尺深層土底下挖了出來，送上了輪船，一次次的載了出去……這偌大的財富，使之經營於私人或小數人，殊屬可惜，假定此項歸於私人之玻瓈沙，他們的經營是廠家，是增加物質效用的製造者，由可以增加地方人民的工作機會，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增進地方經濟福利，如果單是從幾天得鬆土下羅掘了出來，傾運了出去，由地皮所有人去分些利潤，撐腰講話的人來打些秋風，結果地方所獲之利無多，未免太糟蹋了先代祖宗遺留的寶藏，……這樣金門十年八年之後，貧窮的情形仍是依舊，所遺留的恐怕只有幾個覺去的銀沙的大窟窿，而所謂新事業恐怕亦只有由實踐黃金夢的人，建設到廈門或大上海去了！<sup>183</sup>

這段論述，除了精準地指出了 1946 至 1949 年間金門礦產開發事業的弊端，也反映出玻璃沙開發過程中，群雄割據、爭鋒傾軋，乃至於地方家族勢力的地權爭執、股權分配，或者不斷有外來的投機客也來分一杯羹，甚至是地方政要的

<sup>182</sup> 參見李建緯，《金門地區傳世總宗畫像普查與研究計畫·結案成果報告》（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21），頁 87。

<sup>18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97、3399。

「搓圓仔湯」等亂象。<sup>184</sup>種種弊端，終究對當地人民社會福祉的增進幅度有限，更別說有效地解決失業問題、提升地方經濟紅利，因此作者認為，金門的自然資源應以有利於當地居民的方式開發，避免短視的掠奪性經濟模式。

可惜正如荀子曰「人生而好利，爭奪生而辭讓亡」，當我們翻閱《顯影》的多次記載，可以發現不僅是金沙江礦區，其後亦被發現有玻璃沙藏量的官澳礦區，皆曾發生相關的地權爭奪情形。<sup>185</sup>其後在金門多處所發現的鋁礦礦脈，<sup>186</sup>亦曾發生不肖外地業者濫採濫運，誓言會幫助地方基礎建設，最終卻開空頭支票之情形：

自該寶藏被挖掘後，土地日受其蝕，而對地方事業，則未有任何貢獻，唯有少數人從中漁利而已，……其所諾言使金門重放光明之電燈機件，迄今「惟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似此輕諾寡言，類似騙子，地方人士，嘖有煩言。查鋁礦在台（按：指台灣）每噸可值美金數十元，而該處僅以幾斤白米之代價換取一噸鋁礦，村人不知，受其所愚，甚為可惜，希當局自謀出路，直接採運，則獲利不鮮，滿地黃金，何患縣庫之空虛！<sup>187</sup>

文中或明或暗地將矛頭指向地方政府在治理資源開發上的失職與放任，並指出自然資源的開採不僅未能帶來實質的地方福祉，反而成為少數人漁利的工具。

<sup>184</sup> 詳情可參見第十九卷第二期之報導〈金門實業公司：再度運沙赴秦——開採永春天湖山煤礦（沙尾訊）〉，該文記載截至 1948 年元月，金門玻璃沙先後由「華僑企業公司」運銷一千二百噸，金門實業公司開採六千噸，全數七千二百噸，運銷「秦皇島耀華玻璃廠」，淨利二億元云云；報導中另一項消息是「金門實業公司」之業務，聞將前往開採泉州永春天湖山之煤礦。詳見《顯影（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499。

<sup>185</sup> 詳參報導〈縣參議會籌組金門企業公司開發金沙江玻璃沙〉，《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02；〈華僑企業公司開發玻璃沙，地方公益金多一來源〉，《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319；〈為爭執礦區所有權：陳黃兩姓列成陣容〉，《顯影（Shinning）》第十九卷，頁 3574；〈玻璃沙美糾紛多：張李兩族涉訟〉，《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24；〈玻沙寶藏又來開採〉，《顯影（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 3756。

<sup>186</sup> 有關鋁礦發現以及開採之文章，詳參第二十卷第四期報導〈（本刊訊）鋁質化驗優良，藏量可廿萬噸〉，《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38；第二十卷第五期報導〈（本刊訊）金島鋁礦情形，先採二百噸提煉〉，《顯影（Shinning）》第二十卷，頁 3661。

<sup>187</sup> 詳參〈（浦訊）鋁礦寶藏，付諸東流〉，《顯影（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 3724。

自玻璃沙與鋁礦等資源被挖掘後，金門的土地受到嚴重破壞，而地方基礎建設的承諾則淪為空談，像「使金門重放光明」的電燈計畫，最終卻「惟聞樓梯響」，這些輕諾寡信的行為令地方民眾深感失望；另一方面，鋁礦也被以極低價賣出，使地方居民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被無情地愚弄。在第二十一卷第五期的另一則報導中，甚至記載了鋁礦公司的職員因態度蠻橫，而與地方居民所發生的交通爭執事件。<sup>188</sup>種種不可多得的無奈與困蹇，或許便是民初金門在實業建設的推動上，於資源開發與地方利益分配之間，難以消弭的膠葛與兩難。

《顯影》作為面向金門島內部與南洋僑商一最為普及的刊物，無論是輿論文章，或是記者針對諸開發項目的即時報導，誠然，資訊的詳細刊載，首要之目的當然是消息傳遞，其次，此類報導文章的對話對象，或云包含相關的地方仕紳或政要人士，如前述礦區地權爭奪文章〈為爭執礦區所有權：陳黃兩姓列成陣容〉，在該報導標題旁以小字附註著「土地國有希政府嚴制執行」，隱隱然是呼籲政府該當補偏救弊，行使其理所應當的公權力。<sup>189</sup>而除了透過報導來表述知識分子對地方建設的憂心忡忡，他們也往往在年底透過所謂「短論」的專欄，思考與評述著金門這座小島的「年中行事」，如發行於第十一卷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元旦號）的秋痕〈一年來金門大事述評〉、秀〈新年來的新冀望〉、冷月〈登上新的途程霸！為廿四年之元旦作〉、珠小全人〈站在一九三五年的戰線上〉，內容主要以「新年新希望」作為口號，做如下的批判：

大多數人的心裡是這樣——過去一年多事情種種，可是已結帳於除夕，方來的一切，當然要再於歲朝伊始，是以人一至「爆竹聲響」時而新的計劃也從此開始，這種朝氣，可謂之發揚踏厲的精神……我以為乙亥這個年頭，已是給我們以奮求的一條新途徑，我們切不要再因循歲日，而徒費時光，我們要向前努力進取，才算得人。我們回憶過去的一切，農村凋零給予我們深刻的印象，工業商業的敝疲受予社會以極猛的大創擊，再有國家外患

<sup>188</sup> 詳參〈（浦訊）鋁礦職員，蠻無道理〉，《顯影（Shinning）》第二十一卷，頁3755。

<sup>189</sup> 參閱報導〈為爭執礦區所有權：陳黃兩姓列成陣容〉，《顯影（Shinning）》第十九卷，頁3574。

日亟，內憂頻生的今日，這種種昭示的時事，益發使我們深應有奮鬥前進的刺激……。<sup>190</sup>



文中對「農村凋零」、「工商業疲弊」、「國家外患日亟，內憂頻生」等批判，不單單為金門僑鄉時代所遇到「現代化推動」之難題下了註腳，也再度印證了本小節之上述。歸根結底，無論是以訊息媒介的形式，使海外鄉僑對故鄉的困境多作瞭解，或是以言論媒介的形式，呼籲「洋客」的僑匯資本，甚或是對地方實業開發之弊端有所揭露、抨擊，具備消息傳遞與新聞輿論功能的《顯影》，在推動金門在地實業建設與現代化的過程中，顯然已經嘗試發揮影響力。

### 第三節 新文化與新思想的媒介

#### 一、文化與思想的變遷：對舊社會與舊慣的批判

《顯影》發行於 1928-1949 年，該階段正是中國歷經軍閥割據、帝國主義侵略、國共內戰等重大社會變革的飄搖年代。衆所周知，在中英戰爭（或稱「鴉片戰爭」）搖落所謂「百年國恥」的歷史布簾後，洋務運動鼓吹起「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等口號，撼起了中國的工業化、科學與西式教育發展。而「五四運動」在陳獨秀、魯迅等人強烈的思想革新風氣所喊出的，是更加激進、帶有反傳統主義（anti-traditionalism）的口號，如「打倒封建遺毒」、「吃人的禮教」……，這樣的集體意識，使得中國社會逐漸地走上更加全面化的變革。<sup>191</sup>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顯影》所反映的便是金門地方的普遍社會觀念「由舊到新」的文化及思想變遷。總的來說，當金門地方的這些知識分子，接收過民初中國新式學院的洗禮，有了西方現代性的知識，搭上了這條後五四的列車，他們對地方社會的傳統窠臼有所思、有所惡，遂將所學所想連綴成文，投稿於《顯影》這樣

---

<sup>190</sup> 秋痕，〈短論：論做人與運氣〉，《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481。

<sup>191</sup> 所謂的「反傳統主義」，亦即對社會、思想和文化傳統中的成分有所抨擊，參見林毓生著，楊貞德等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新北：聯經出版，2020.09），頁 209。



的新式報刊，以圖鄉里人士、海外鄉僑的關注，喚起他們對舊慣的批判，並力圖社會與思想的更新。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章在將論述焦點定位於地方之前，往往不忘分析世界情勢，乃至於國家體制皆有所臧否。如惕齋（薛永乾）在〈珠山的一瞥〉所云：

二十世紀的世界好像雨後春筍般的到處勃發，是以科學之發達、文物之昌明，以及人類生存競爭等，觸目皆是。……「現代人應當明瞭現代事」這句話，我想誰也不能否認的，因為明瞭現代社會才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我國受數千年專制政體的壓迫……所釀成那堅如城圍、害弱毒蛇的政治制度和吃人的禮教，……我們怎不加倍努力，把這破舊的屋子改造做華麗巍峨的，立著成功的旗幟。……自民國成立以後，凡略具智識者都深慨這國內的參差腐敗，極想要把她整革訓練起來，可是大部分人的腦海深刻著封建時代社會的印象，經了幾番的排斥侮辱，還是割捨不去，而且盤據著從中醞釀遺毒，破壞大局，這就是我國進展遲鈍的一大原因，尤其是那鞭長莫及的鄉民，教育不振，智識渾噩、思想頑固，更不知道惡社會、舊禮教是人類的地獄，和手扣瘋狂麻醉的特效劑，他們無意氣的不知好壞，也不覺得有所差異，情願步那無意識的後塵，不期擴展這自由場地，此無他，祇是奴隸性成，不但不濟事，而且是社會進化成上的障礙物，應在打倒之列。<sup>192</sup>

文中點出「二十世紀」是「現代人」的世紀，中國籠罩在「數千年專制體制」的遺毒中，尚未進入所謂的「現代」。「舊禮教」、「破舊房子」、「打倒奴隸性」等言，是五四時期如《新青年》雜誌等常見的批判話語，有了這番鋪陳，文中後半段方能漸漸進入正題。首先，接續著前文「舊禮教」、「惡社會」的批判，惕齋認為珠山首當改進的是「組織」：

珠山原為同姓聚居的，分作「仁」「義」「禮」「智」「信」五個房份，由各房份推選幾個房長，共同主持鄉中事務，他們就是鄉長了。在封建時

---

<sup>192</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79-81。

代，鄉長的威權是何等凜烈、何等尊重的，可是推選的方法卻以高年為尊，不以品格為準。這種不合理的從事便要弄得模糊不清，且因時代的關係，盡失了威信。於是識時務者，多免費手續地默然避退，近年來鄉中公益糾紛等事故，所以乏人提倡調解者，職是故也。就是他們得勢的時候，也祇是敷衍從事，並未見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蹟出現，反要下句無意識「舊例莫除、新例莫設」的嚴令，唉！下開倒車式的命令，倒不合理論，不應潮流，快也就無聲息的消滅淨盡了，既無存在的可能，就可置之不理，但恐要引起人家高呼「打倒」之第一聲。<sup>193</sup>

可見惕齋不僅延續了五四時期的思想批判路線，亦將現代性想像具體投射於金門地方社會。他們以報刊為言論場域，批判專制政治與封建宗族制度，形塑出「奴隸性」、「舊禮教」、「破舊制度」等應予打倒的對象，並進一步指出宗族基層組織的運作弊病與失能，反映出地方治理在面對現代社會轉型壓力下的遲滯與困境。這樣的批判不僅針對制度與價值，也隱隱提出了現代化改革的需求。惕齋筆下的「房長」不再是威權與穩定的象徵，而是落伍與頑固的守舊者；他們代表著一個正逐漸失去主導權的舊秩序，亟待更新與重構。那麼，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又是誰取代了這些傳統宗族長老，成為新的地方治理主體？

近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所呈現的治理組織型態，鑑於清末保甲制度的逐漸崩潰，以及民初政府在地方治理上的無能，一般所呈現的往往是一種自治的狀態；<sup>194</sup>文中所提及之「房長」，反映了金門傳統社會以宗族組織作為地方基礎治理單位之寫照。此外，作者也將他們塑造成「不合理論，不應潮流」，甚至守舊、不思進取的形象，並指出隨著「時代的關係」，這些宗族長老們的權威性終將逐漸減弱，是需要被「打倒」的一群。然而，是誰漸漸地取代傳統宗族長老？曾有論者指出，在傳統宗族社會中，一般所謂鄉紳通常由以下幾種群體組成：（一）擁有科舉地位者、（二）擁有經濟實力者、（三）熱衷於家族事務並有所貢獻

<sup>193</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83。

<sup>194</sup> 參見張鳴，《農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07），頁 24-30。

者組成，他們往往致力於宗族事務的改善和強化。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福建僑鄉，這類具有菁英性質的鄉紳階級，以南洋華僑佔比最多，這些透過出洋打拼累積外匯資本的「成功」洋客，他們不僅對家族公共事業展現了一定的貢獻，也在現代化、工業化等方面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新型的鄉紳人物一方面擁護著宗族事務，並維繫著傳統的宗族關係，另一方面也將海外的現代化事物、價值觀、生產知識與工具等帶回家鄉，推動了閩南僑鄉社會的近代化。<sup>195</sup>如《顯影》創辦人薛福緣在回鄉後不僅創辦報刊，更積極推動地方基礎建設、防衛自治、文化事業等事蹟，顯然扮演的便是新一代的鄉紳角色。此亦正如同江柏煒所說的，「他們扮演了一種不完全等同傳統社會仕紳 (gentry) 服從朝廷的角色，而是一種具有公民社會與現代意義的商紳 (merchant-gentry)。」<sup>196</sup>

除了上述的「組織」問題，惕齋在「家庭」、「教育」、「禮制」、「風化」四點議題上，亦提出了許多帶有反傳統主義的觀點。首先，在「家庭」方面，惕齋除了批評大家庭制度，亦從家庭經濟學的角度切入分析，認為珠山的婦女「無職業」，多依靠男性出洋工作，是具風險的。而在「教育」方面，則批評村里「消極儒化」的風氣；「禮制」方面，則以為自「中世紀」因陳下來的禮制，無論是慶弔或酬謝，都很重虛名、不務實益，這樣的批判委實亦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在「風化」方面，則分別點出三個議題：「婦女」、「迷信」、「賭博」，如下所陳：

說到珠山的風氣是很滑稽的，特是婦女的方面更為好笑，她們是從閉塞環境中淘汰出來的，但是耳邊又常要聽說「開通」二個字，原來耳濡目染，終就刻了多少的印象在腦裡，所以現在特具一種不舊不新的折衷式的態度。折衷式是教人煩悶難過的，對於做事好像在那歧路上躊躇焦急，不知是適是從，終不呆立著不成，真叫人難受了。

迷信也是女界的特性，七月一到，他們花錢的機會便有了。這月的當中常

<sup>195</sup> 陳志明、張小軍、張展鴻編，《傳統與變遷——華南的認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08），頁 18-20。

<sup>196</sup> 江柏煒，《新加坡的出洋客》（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1.12），頁 128。

有三回五次的炊糕縛粽、討好鬼神，三八兩個月又定要為神做醮，演那傷風敗俗、下流社會的舊劇，這麼無代價的破費，他們竟洋洋得意對人誇耀，真是厚顏得甕皮一樣了。



賭博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業，然珠山的婦女、洋客們多視為第二性命，因為終日悠悠的他們，若不這樣遣懷散心，不知道要過得怎樣無味！可見珠山的景象是寂寞煩悶的！沒有適當的娛樂和工作場地，該當人人嗟怨、家家叫苦啊！<sup>197</sup>

文中批判珠山地區盛行一年到頭不間斷的迷信活動，而傳統金門的祭典，無論是與宗族組織相關與否，不消說是包辦了年初的過年祭祀到冬至、清明的「吃頭」儀式，再到七月普渡掛燈等等，此類祭祀活動的頻繁舉行，既是傳統典範的體現，亦承載了豐富的社會與文化底蘊。然而文中批判道，這些歲時習俗在無止盡的炊糕縛粽、神醮祭典，在盲目的迷信中，遂逐漸偏離了原意，成為誇耀與攀比的工具，導致資源的過度浪費與舊習的固化。此一現象的實際記載，可另見於《顯影》第一卷第五期記載了珠山里人素來篤信「天罡」神祇之迷信，謂「五月初九曰天罡生辰」，里中「無事討事的光緒年代出世的婦女們，做其天罡裸，而又大獻其自謂金銀」，雖為報導文章，語氣卻難掩批判之意。<sup>198</sup>

同樣刊載於第四卷第二期，來自海外「獅子島」（按：應為新加坡），署名「海外頑童」所著的「短評」〈天公誕〉，亦批評迷信的信徒浪費金錢從事祭祀活動。<sup>199</sup>另篇值得一提的社論文章，是刊載於第三卷第六期所刊載的情鵠〈信口漫談〉，文中先是以魯迅式的口吻描繪了一個黑暗的場景，描繪人人沉溺於「迎神賽會」，以及生病之人不吃藥、不看病，只懂得求神問佛的景象，該文中段更狠狠地批判：

那些迷信佛教的人，好比訓馴的狗一樣，搖頭擺尾照他們說的做去，他們

<sup>197</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87-88。

<sup>198</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69-270。

<sup>199</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頁 805-806。

卻落得許多酒菜去大吞大嚼。要是那病人仍舊不好，那女巫便說是酒菜不夠，金銀紙不敷的緣故。倘使那病人不幸死了，他便說：『這是天意不可挽回，並且鐵面無私的閻羅王的生死簿中註了名，這一死是不能免掉的。』那些迷信的人，只有唯唯地嘆了一口氣道：『蒼天註定！天命難移！』<sup>200</sup>

文中揭穿了迷信活動中虛偽與欺騙的本質，尤其是傳統江湖術士利用信徒的盲從來牟取利益的現象，而即使面對病人病情未見好轉或死亡，他們也能以「酒菜不足」、「天意不可挽回」等藉口推卸責任，讓迷信者將結果歸咎於命運，而非質疑儀式本身的有效性。這種情形凸顯出迷信對信衆理性思考的壓制，以及對社會資源的浪費，進一步反映了傳統信仰中廣為濫用的迷信漏洞與說詞。其後，文章更將砲口轉向所謂的「基督教」，認為「耶穌教造出那非驢非馬的主義，乃是帝國主義者的無形器械，乃是我國亡國的根苗」。換言之，基督教的傳播被認為是帝國主義者為實現文化滲透和思想控制所設計的工具，其背後的政治意圖遠超於表面上的宗教宣教。這種「耶穌教」的影響，與本地傳統信仰的迷信現象，雖形式迥異，卻在本質上殊途同歸——它們皆以神秘主義（mysticism）為幌子，誘使信衆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最終使其淪為受控的工具。在文章中，基督教被批評為摧毀民族文化、削弱國族意識的外來力量，而這一點也成為知識分子的核心論述之一；文章進一步強調，在中西文化交鋒的時代，如何清除宗教迷信與外來思想的殖民性，以及進一步對抗西方文化霸權，重新建立符合中國現代化需求的文化體系，是時代賦予知識分子的至關迫切的課題。

另一旨在批判迷信的文章，刊載於第十一卷第五期，題如「金門傳說：玉璽受胯下之辱」，該文敍述明末文人盧若騰之官印，被聚賢鄉里人借來借去，後保管人因無暇管理租借，不小心使其受胯下辱，終焉神效失靈。文末眉批道：「編者以其點足以表現當時村人迷信心理之可憐，特筆記之……。」<sup>201</sup>由此可看出，舊俗是固難除，但對這些擁有社會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而言，如何平衡這些迷信、舊俗與祭典所蘊含的文化意義與現代社會的需求，在具體上應當如何提出

<sup>200</sup> 《顯影（Shinning）》第三卷，頁 743-752。

<sup>201</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472。

解決／解放之方案，不啻更是近代金門社會所面臨的一大課題。於焉，自第十四卷第一期起，《顯影》編者另闢「金門風俗談座」一欄，旨在以在地知識分子批判性的口吻，在赤裸裸地點出這些迷信之害之同時，一併顧慮其轉型期間所可能遇到之掙扎，該系列文章包含澤人〈金門舊制婚俗談〉、<sup>202</sup>卡叔〈漫談珠山三月節〉、<sup>203</sup>荒烟〈城隍爺誕〉共三篇，<sup>204</sup>且看該欄〈前致辭〉所言：

擎起嶄新的旗幟，在這科學化的宇宙裡，高呼著打滅無為的習俗，我們需要來一次極力的吶喊。以前所謂固俗，現在讓我們合力來撕碎，將科學的新智識針，一筒一筒的打散腦內這無稽的思想，灌輸著嶄新的意識。金門，需要讓我們來一次振聲的吶喊，讓我們把一些金門人還在渾渾噩噩的當中，喚醒了他們的迷夢……單以「清明節」來說：金門人除了獻排墓紙外，還要來個熱鬧的祖祭，消費的豪闊，自不待言。而處於農村危機四伏，商業凋零的現狀，人們血汗應該是串掛到墓土上去的嗎？墓內的靈魂，一口都不會吃人敬孝的東西，是人們所共知，這種固俗，需要來一次的評擊；還有舊制婚俗的威權，制厭死了許多活潑的青年，弄掉了社會許多的棟樑，這也需要一條一條的撕破；還有的是佛節的破費，人們為什麼要把自己手裡創造出來的木偶，再將一血一汗白花到這不會「有求必應」的木頭人上去，這些事更是需要我們一個驚人的舉動；還有一些些在僻隅小島的金門活躍的腐俗，要讓咱們來毀滅牠。<sup>205</sup>

文中以強烈的批判性語氣指摘金門在地社會中諸多舊慣鄉俗，從清明過度祭祀、婚姻制度的壓迫、佛節的浪費，到廣泛存在的宗教靡風云云；語風激進，明確地揭示出在地知識份子對於風俗更新的急切期待，也延續了五四啟蒙語境中「以文為武」的實踐邏輯，從《顯影》作為傳達新文化思想的報刊媒介特質來看，這種透過報刊開闢專欄、聚焦風俗問題的論述策略，旨在提供一個公開且組織化的

---

<sup>202</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758、2784、2804、2872。

<sup>203</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783。

<sup>204</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803。

<sup>20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757。

文化協商平台，使知識分子的觀點流通於在地社會，企冀能潛移默化地改變讀者的日常判斷或行為選擇。

換言之，與其說他們試圖「毀滅」風俗，不如說是以批評為手段，以推行一場有關生活方式與思想價值的秩序重組工程，儘管這種文化實踐未必即可立功見效，甚至可能面臨來自社會基層（或曰「下層建築」，即“the socio-economic base”）的抵抗，但這樣的論述本身，毋寧仍能構成一種意義深遠的象徵性介入——亦即，在報刊所構成的公共領域中，他們先試圖引進「科學的新智識針」以作為文化論述的正當性，構築一種「何謂文明、何謂落伍」的區分體系，再透過一篇一篇的論述來揭露固俗。<sup>206</sup>

## 二、戀愛與自由的追求：從婦女議題到婚姻儀式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封建社會」的批判，以及對獨立人格的提倡，中國的婦女運動既而如火如荼，旨在反對傳統封建制度對婦女的束縛與基本人權的剝奪，並爭取在政治、教育、經濟、婚姻、社會和家庭方面，獲致與男性同等之地位，此之謂「婦女解放運動」。<sup>207</sup>《顯影》中的社論文章，有許多篇幅皆針對「婦女解放」議題提出意見，如前述〈珠山的一瞥〉一文中，即將珠山女性描繪成「不新不舊」的形象，刻畫他們仍然沈迷於舊社會的陋習——迷信與賭博；另，在《顯影》中另一則〈臺灣戲與金門婦女〉的社論中，則更使珠山女性尚未從舊社會中脫離出來的情境躍然紙上。該文中，作者先是形容在金門搬演的「臺灣戲」多穿插「下流俚歌」與「淫詞俚曲」，而又嚴厲地描繪「島中婦女趨之若鶩，甚為

---

<sup>206</sup> 除了「迷信」以外，有關「賭博」的現象，在前述〈珠山的一瞥〉中，誠已反映出當地缺乏正當娛樂與生產活動的事實，不過，關於賭博與另一項陋習——抽鴉片的管控與治理，從《顯影》中看來，似乎在地方政府雷厲風行的取締下，似已取得不錯的政績。參見報導〈禁賭令下第一聲〉，《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15；〈煙廁末日〉，《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15；〈正月初一無第二〉，《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58；〈破獲煙賭窟——奪犯開槍〉，《顯影（Shinning）》第三卷，頁 631-634；〈八晚煙搜〉，《顯影（Shinning）》第三卷，頁 653-654；卡叔〈誰要自己蓋棺〉，《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85。

<sup>207</sup> 顧秀蓮主編，《20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8.10），頁 243。

迷亂癲狂，或贈物博歡，或受誘而亂節」。<sup>208</sup>此處必須指出，根據金門民俗語言專家洪乾佑先生所言，在近代金門的歷史語境下，所謂的「臺灣戲」並非直指來自臺灣的戲班，欲釋此境，此處簡要回顧 20 世紀初「歌仔戲」的「閩南戲曲回流」：「歌仔戲」發源自十九世紀末的臺灣宜蘭的歐來助先生，其唱念做打固然導源於閩南高甲戲、崑曲，甚至京劇、客家採茶歌謠等等，然而根據洪氏指出，自從 1928 年起臺灣歌仔戲團「三樂軒」回鄉祭祖，途經廈門，於當地「水仙宮媽祖廟」連演三日，廣受歡迎，啟始其他臺灣劇團如「霓生社」、「霓進社」之紛紛赴廈、樟等地巡演。由於廣受歡迎，是以影響了這些地區許多原本專演高甲戲的劇團——亦即令他們「改演歌仔戲」（如漳州本地的「金瑞春」、「新玉穎」小梨園，以及廈門的「雙珠鳳班」、「新女班」等）；易言之，在近代金門的歷史語境中，搬演「臺灣戲」的戲班其實是來自福建的漳泉廈地區，而非一定來自臺灣。<sup>209</sup>

那麼，如何使女子從舊社會的陋習與束縛中解放出來？在許多篇《顯影》社論文章中，皆對此有所討論，如第八卷第三期（1933.06）署名夢凡女士的〈婦女解放之先決問題〉，則是提出「教育」作為方法，「因為沒經受過教育的人，和瞎子無異，眼睛看不見，行動不自由」。<sup>210</sup>接踵的第八卷第四期（1933.07），澤人發表〈關於婦女解放的幾點管見——獻給吾珠婦女〉，則融合了社會心理學的「自我」（self）概念，認為傳統社會中「在家從夫、出嫁從夫」的「自卑心理」與服從性，是「數千年來鞏固的惡習——依賴性」，而唯有使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教育資源與水準，才能使婦女得到解放。該文除了同樣提及新文化運動常見的「身體的解放」，說明傳統的「纏足」、「束胸」、「穿耳」使婦女失去健全的體格，文中另一個有趣的觀點，則大致以「人格的解放」為要領，將女性的人格分為「性人格」與「個人格」，前者聚焦於性別、性行為，認為在傳統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規範與性別身份以「性人格」為主導，使女性的「個人格」——亦即涵蓋個體所有行為模式與人格特質遭受約束，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絆腳石。<sup>211</sup>不過對金門的婦女議題分

<sup>20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345-2346。

<sup>209</sup> 詳參洪乾祐，《金門話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12），頁 413-417。

<sup>210</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1823-1826。

<sup>211</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頁 1871-1874；1895-1898。

析最為深入的，當屬畢業於廈門大學社會系的施伍（薛永麥）發表於第七卷第三期（1932.11）的〈五年來的金門婦女〉：

最近百年來，因為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社會的結構，起了急劇的變化，金門的農村經濟方面，不能例外的受其壓迫而歸於破產，所以一般貧困的農民大多經商到南洋去，同時華僑金錢的輸入，形成社會上佈滿著資本主義的色彩，封建制度在形式上歸於消滅，但是，金門的經濟組織沒有經過產業革命這個時期，所以實質的封建制度、封建勢力卻依然存在，……在農業手工業發達的金門社會，婦女是生產勞動的機械，農家多得一個婦女，便是家庭多得一個長工和火夫，所以那時候社會需要的婦女，是強健的身子，會耐苦會耐勞，才會對於家庭中在農業上多得一點的生產，……然而，這幾十年來的金門社會，因為南洋華僑資本的輸入，帝國資本主義的壓迫，農村社會受其影響，日趨崩潰，婦女在男子的眼光裡變成玩物。華僑的家庭多娶一個婦女，便是多得一個家妓，我們要知道，在今日社會的矛盾，男子到妓院去嫖妓，社會上的人士，以為是多麼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多養幾個家妓，社會上的人士，卻以為多麼榮譽的事情，所以呢華僑的家庭對於婦女要求的條件，是年輕、貌美、修飾和媚態，會使他們家庭生活的和性的滿足……五四以後婦女運動轟動的全國的婦女界，金門婦女多少也受影響，但是可惜不能深刻的明瞭，譬如婦女跑到學校去，大多是父母投機的指使，至於婦女自身，對於教育只有皮毛的認識而已。農村經濟崩潰的金門，家長送他們女子到學校去，既然是投機的指使，那麼最大的目標也脫不了是要提高女子的價值，利用將來在婚姻買賣上多賺一分的利潤，換句話說，就是預備將來做個富裕家庭的玩物。學校教育造成婦女的裝飾品，造成婦女商品化的價值，假使金門婦女，家庭不是這樣他們的女子最後歸宿是家妓，那我指摘的就算錯誤了。<sup>212</sup>

文中分析了 20 世紀初金門社會的變遷，尤其聚焦於資本主義對農村經濟和性別

---

<sup>212</sup> 《顯影 (Shinning)》第七卷，頁 1623-1628。

角色的影響。隨著農村經濟的崩潰以及華僑資本的輸入，婦女的角色從早期農業經濟中的「勞動機械」轉變為「家妓」或裝飾性角色，這一轉變反映了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對婦女剝削形式的重新配置——從以「勞動力」為核心的剝削，轉向以「學歷」為主要的物化體現 (the embodiment of reification)，緣此，在資本主義與父權結構的雙重作用下，僑鄉的婦女正在經歷著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壓迫形式。於是施伍一語道破金門家長送女兒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並非提升她們的自主性或地位，而是基於婚姻市場的考量。顯然將女兒嫁與事業有成的華僑，是當時僑鄉社會普遍的風氣，是故縱使金門社會的婦女在受教的權益上有所提升，然其核心的剝削本質，仍舊賡續。施伍的文章，除了引來菲律賓同鄉的反響，<sup>213</sup>也開啟了《顯影》副刊文字空間對婦女議題的關注。<sup>214</sup>

縱觀《顯影》中對婦女議題的討論，主要以施伍鑑取於社會學的理論與分析為嚆矢，牽動並激發了其他撰稿人的衆聲喧嘩、百花齊放。不過，從婦女議題的討論中，可以得見其時對於任一議題的探討，都出自於對金門在地社會的體察與理解，換言之，「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或許是中國在民初「追求現代化」的風氣下，可供援引與模仿的論述脈絡，然而，設乏金門在地知識份子對於僑鄉本質的深入研究與探討，這些啟蒙與現代化的思想，終究無法產生出一個屬於僑鄉的版本。

此外，環繞著婦女解放的周邊議題，尚有對「婚姻儀式」與「自由戀愛」的探討，如在第四卷第二期的一則報導〈正式成婚——自由戀愛不算，交拜天地才成〉，寫的是里人永頭透過自由戀愛實行同居、生子等夫妻之實，但在家父長制

<sup>213</sup> 詳見署名「獨釣生」的〈讀「五年來的金門婦女」〉，文中針對施伍的〈五年來的金門婦女〉一文提出意見，認為以巨觀的角度來看，施伍「以社會加的眼光責備半開化式的金門家庭。是驢頭不對馬嘴的」，但期望施伍可以拿出真正的組織的方法來「帶領金門前行」，詳見《顯影 (Shinning)》第七卷，頁 1723-1726。

<sup>214</sup> 除上述文章外，《顯影》中針對婦女議題的社論文章，包括第十一卷第二期的冷月〈女子解放問題的前奏——從職業方面著想〉，以及第十二卷第五期的弗朗克〈看圖有感——致誠摯的姊妹們〉，詳見《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377-2384；《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87-2588。

的鄉里社會氛圍中，仍得行交拜天地之禮，始為夫妻。撰寫者謂云「可為精神形式兼有矣，……是亦美哉。」可見其對於婚姻舊俗儀式等態度，並非全然地抗拒與批判，故曰此處亦有折衷之辦法。<sup>215</sup>換言之，若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舊俗似乎亦能被接受，不過履踐新式婚姻的新娘，依然較為《顯影》編輯所推崇，如第五卷第六期所刊出的報導〈文明結婚〉，便以「文明」二字作為特別標題，報導了金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場盛大的禮堂結婚。<sup>216</sup>然而署名鏡心〈關於婚姻底儀式的我見〉一文，又提出了更為激進而前衛的看法：

「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這些「人生慾」是與生俱來的，一旦長大到成年底時期，生理上發生了特徵的變化，心情上也就感覺著有「性慾」的需要了。故人們熱烈地在性的追求的當兒，兩情如果發生了戀愛——澈底的戀愛，彼此認為有同居的必要，何妨把兩底精神融化在一起，自然地營個共同的生活，那豈不直截痛快嗎？……填請帖、設酒食、賀客盈門、鼓噪宣天，以及其他種種無謂的儀式，這些動作，……這樣地野蠻，試問在人生活上還有什麼真的夫妻底感覺和興趣呢？且「夫妻」只是兩性同居的形式上的名稱罷了。澈底句說，兩性同居。乃愛——心意一致的愛——的表現。設沒有牠把那兩塊赤沉沉的桃形的東西貫串通，那禮教上的夫妻名義……也只限在形式上耀武揚威罷！……我們要知道惟情愛才造得夫妻，夫妻是情愛底結晶，決非呆板的名稱和無謂的儀式可代庖的。……客歲我自南洋回國，眼看著我們金門底婚嫁，還真是沿著那「自古有之」的半開化的儀式，要些什麼媒婆說合，父母代定，換花、插定、紅燈四籌、大鼓吹和其他等，無謂的喧鬧，做他們鳴鑼打劫、對象宣淫的張本，唉！文明國民就是如此了嗎？<sup>217</sup>

文中批判了傳統婚姻儀式的繁瑣與形式化，並列舉幾種金門的傳統婚俗，如「換花」、「插定」、「紅燈四籌」、「大鼓吹」等，他認為這些舊式婚俗，以及講究媒妁

<sup>215</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頁 827。

<sup>216</sup> 《顯影 (Shinning)》第五卷，頁 1175。

<sup>217</sup> 《顯影 (Shinning)》第九卷，頁 2041-2045。

與長輩代定等舊慣，是「半開化」的野蠻表現，與文明社會的要求背道而馳。

另，鏡心進一步肯定性慾和戀愛的價值，認為這是人性自然的需求，應作為婚姻的基石，不像傳統儀式和束縛的禮教，往往扼殺婚姻中的真情實感；這樣的論調，早在五四時期重要的《婦女雜誌》中，便會被討論與提出，是為「性的新道德」。<sup>218</sup>那麼，若要使這種主張文中所謂「澈底的愛」，便要拋棄「婚姻」這種「無謂的」形式，實施「同居經營生活」，此方為夫妻關係之核心意涵。在《顯影》第九卷第五期的報導中，便會特地發出一則「預告」，乃宣布編輯之一的施伍將與其女伴同居：

本鄉唯一之廈大社會學系文學士永麥（號施伍）為本刊自創刊以來之文藝編輯……茲查此新文藝青年已定此廢曆元月初六日與後浦公學校之女教員林彩娥女士宣布同居，定大禮一對，新人物之新結合到時必有一新式禮，足為本刊所採訪，而詳告於讀者之前，希各待之。<sup>219</sup>

在五四以降新式知識分子崇尚戀愛自由的觀念影響下，<sup>220</sup>如此「摩登」的作派，是備受推崇與標舉的，文中特別指出施伍「新文藝青年」之身份，恰恰是強調了其對於新式風潮的戀愛與婚姻觀不僅僅在紙上談兵，而是能夠躬行踐履，作新社會風氣的表率。<sup>221</sup>

---

<sup>218</sup> 如署名「雲鶴」所發表的〈性的新道德之基礎〉，便會言：「是故真正之兩性道德，發端於身心之一切有機的衝動，認調和之相互作用時。蔑視肉體者，背乎自然；忽略精神者，不合道德。輕視人之性的行為者，不明之尤者也。……戀愛起於肉體，而淨化於精神，此性的道德之真諦也。」原刊於《婦女雜誌》第八卷第五期（上海：1922.05），參考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雜誌》資料庫」（頁碼依此庫所編），頁 20-23。

<sup>219</sup> 《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 2121-2122。

<sup>220</sup> 當時在《婦女雜誌》上大量援引西方思想家如愛倫凱為精神導師，並透過胡適、周作人、章錫琛等人展開對戀愛道德（「性的新道德（或云貞操）」）之討論，而夏丏尊亦譯有廚川白村之《近代の恋愛觀》。參見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收錄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六期（2008.12），頁 29-90。

<sup>221</sup> 同時，《顯影》中記載了施伍所創作之許多關於「戀愛自由」以及「衝破封建禮教與傳統婚姻觀」的散文與小說作品，將於第四章有更為深入的探討。

然而，這種由五四以來所激發的個體情感自主與社會風氣改革，在 1930 年代中期，亦開始面臨來自「國家治理」層面的整飭與規訓壓力，尤其是在戰爭陰影逼近的背景下，國民政府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開始將婚喪禮俗納入倫理與物資管理的雙重治理範疇。1936 年 12 月，「金門縣新生活運動會」，發起了「改良婚喪禮俗辦法」，旨在抑制傳統婚喪喜慶中過度的宴饗、鋪張與餽贈。<sup>222</sup>在楊英的〈改良婚喪禮俗有感〉一文中，也再次將其意義緊扣於「『家』『國』攜手」論調，認為「孤懸海上」的金門民衆，應當未雨綢繆地考慮到糧食供應問題，在婚喪禮俗的用度上，保以共體時艱之態度。該改良辦法中提及「凡違反本辦法確有實據者，得由縣政府予以懲戒或處以相當之罰金」，顯然並非僅由民間獨立發起，而是帶有官方運作的色彩。<sup>223</sup>

### 三、打造良好公民身體：教育與體育運動的推廣

金門地方知識分子在關注思想文化轉型之同時，也將目光投向了教育理念及體育運動的推廣，此一現象映照出他們對於「現代公民身體」建構的期待，因為唯有培養健康的國民身心素質，才能支撐現代化社會的全面發展。<sup>224</sup>在《顯影》第九卷第二期澤人所撰寫的〈我對於珠山的新村展望〉一文中，便明確指出國民教育的進行，在學校接受知識的汲取、技能的學習以外，若缺少了家庭的支持，

<sup>222</sup> 《顯影》第十一卷曾轉載晉江南都百五十餘鄉組織風俗改良會，旨在改良生男女儀式、喪葬、應酬、普渡、勝跡日等，可參考《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369-2371。

<sup>223</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45-2946。

<sup>224</sup> 揆諸民初教育思想的演進，應當溯源於 1912 年南京臨時政府所成立後，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發表的〈對於新教育之意見〉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說」，這些觀點對 1912-1913 年教育部所頒布的「壬子癸丑學制」產生極大的影響，是為民初國民教育的重點綱領。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則加入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與「改造國民性」等根本宗旨，由此直接帶動了批判根除封建遺毒、白話文運動興起、婦女解放以及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引入，並間接促成了「壬戌學制」（1924）的定型。詳參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 3-48；于述勝著，《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 21-36

終究是窒礙難行的。<sup>225</sup>而其實早在《顯影》第一卷第二期的惕齋〈告珠山的父母們〉一文中，業已點出了珠山鄉村中「家庭教育」的現況及困難：

家庭與學校，在表面上雖是分離，在事實上卻有連鎖的關係，好的家庭教育多由學校產生出來，學校又須得家庭的輔助，才能湊美滿的效果。我國處於黑暗的時代要有數千年，女子受教育的絕少，苟有，也是那機械式奴隸性的教育，不足以應世，反足以亡國，邇來都是教育較為發達，家庭中的男女長者也受過多少的教育，祇那鄉僻的家庭，仍是由一般沒受教育的婦女主持著，她們對於日常生活的瑣事，卻堪說是略知梗概，甘心操作，至若起居衛生、兒童心理、經濟教育、社會狀況、時勢潮流，多者是不研究的，所以她們的教育子女，是憑著她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脾氣，有情無理的亂教一翻，會死沒活的亂打一場，就算盡了教兒子的職務了，這麼蠢頭蠢腦的人，希望教好兒子出來，也太矛盾不過了，所以教育要竭力吹噓，才有好的家庭產生和健全的國民出世。<sup>226</sup>

文中除了強調家庭教育的基礎性地位，也指出鄉僻地區婦女缺乏智識所導致的教育方式，在普遍缺乏衛生、心理、經濟與時事等知識的情況下，阻礙了下一代健全國民的養成。他認為，唯有經過家庭與學校的雙重努力，並改變機械式、奴役性的舊式教育模組，才能真正培養出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的健全公民，進而助力金門現代化的全面實現；這樣的觀點一方面指摘了鄉村教育施行，因著家庭功能的不彰所呈現的困窘現況，另一方面則指出了平民教育的必要性。

毋庸置疑，風行於 1920-30 年代的「平民教育」在辛亥革命後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衆多蔚為風尚的教育思潮與社會主義思潮結合所帶來的結果；從蔡元培的普遍教育思想中對於「國民」的打造，<sup>227</sup>到陳獨秀「惟民主義」的施教思

---

<sup>225</sup> 《顯影 (Shinning)》第九卷，頁 2009-2011。

<sup>226</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3-28。

<sup>227</sup> 民國元年（1912），蔡元培在參議院宣示政見演說時說：「教育方針應分為二：一是普通，二是專門。在普通教育，應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

想，<sup>228</sup>乃至於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華講學時對「平民主義」（democracy）教育的提倡，<sup>229</sup>皆可視為平民教育思潮的在中國的歷史脈絡。1923年，著名教育家晏陽初、陶行知等人組織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則是這一脈理論之實踐者。初始，他們僅將平民教育的對象鎖定在城市下層階級的識字教育，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普及，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所開啟的「農村包圍城

---

<sup>228</sup> 詳參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303。

<sup>229</sup> 「democracy」一詞在今日通常譯作「民主」，但在五四初期，「democracy」不僅會被翻作「平民主義」，甚至是「德謨克拉西」等；這些不同譯名的演變，折射出這一詞彙在不同時代所承載的意義。在杜威的著作《Democracy and Education》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平民主義與教育」成為其早期中文譯名的主流，這一譯名的普及與杜威1919年至1921年來華講學密切相關。杜威訪華期間，他的學生如陶行知、胡適、蔣夢麟等人積極參與了對其思想的推廣。他們在翻譯「Democracy」時選用了「平民主義」這一詞語，契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平民」、「民主」的訴求。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強調反對封建主義、追求民主與科學，這些理念與杜威實用主義中的教育民主思想高度契合，因此「平民主義」被視為最能體現其思想精髓的翻譯。杜威的平民主義教育思想以「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為圭臬，將現實生活與教育連結起來，這使得教育在階級上有了衝破的可能，一般人民皆有受教機會，換言之，教育的對象已經普及化。這一理念尤其適應當時中國社會對平等教育的強烈訴求，也因此被知識分子視為改造社會與推進現代化的重要途徑。1919年杜威受邀來華，在講學和著作中多次提及民主與教育的重要性。蔣夢麟在翻譯杜威演講時，首次將書名譯為「平民主義與教育」，並獲得廣泛認可。同時，陶行知、胡適等人以文章和譯作的形式進一步推廣了這一譯名。例如，陶行知在《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中，將「Democracy and Education」譯為「平民主義的教育」，並通過《教育潮》等刊物使這一名稱深入人心。此外，杜威訪華期間的講學影響了諸多中國學者，例如常道直，他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聽取杜威講座後，將其講課內容翻譯整理成《平民主義與教育》，於1922年出版，成為該書的最早中文編譯本。在五四運動提倡平等、自由的社會思潮下，「平民主義」的翻譯契合了當時中國社會追求民主、反抗封建的精神訴求，並成功傳播杜威的教育哲學。這種平民主義教育思想，影響了民國十一年（1922）由教育部所頒布的「學校系統改革案」（後稱「壬戌學制」），其中所新設之七個改革標準為：（一）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能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於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從這七個改革標準中，可見平民主義教育思想對中國教育體制的重要影響。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平民主義」一詞逐漸讓位於其他譯名，如「民主主義」，以更全面地詮釋杜威的思想內涵。但在杜威來華和五四運動的交匯背景下，「平民主義與教育」的譯名不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思想選擇，也深刻影響了杜威教育理念在中國的早期接受與發展。詳參馮加漁，〈民主的多重面向：杜威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中文譯名的世紀流變〉，收錄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9），頁29-36；另參考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311-314；《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頁15。

市」策略等因素，1920 年代後期至 1930 年代初期，平民教育思潮進入了農村，被視為振興農村經濟的手段。晏陽初的教育理念特別強調「掃除文盲」作為基礎，認為唯有讓平民具備基礎的閱讀與計算能力，才能開發其「腦礦」，提升個人的生產力與社會責任感，使他們成為「新民」；同時，他結合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等教育哲學思想，<sup>230</sup>主張教育應與農村的實際需求相結合，重視施行前的調查與制定，可以說具有「因地制宜」的特質，唯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善農村的整體面貌，拯救凋敝肅殺的農村氣象。<sup>231</sup>

《顯影》第十一卷第三期由署名「凌影」所發表的〈關於民衆教育的一點意見〉（1934.11），便是在這樣的思潮下所展開的一篇社論文章：

教育問題，與經濟，政治，是不能截然分開，誰都承認的，目前中國的政治，日益陷入殖民地的狀態中，農村經濟的崩潰，日益加繁，要來談民眾教育，實有點近於空想。因為誰也不敢說民眾教育可以單獨發展；而不受到政治紊亂與經濟恐慌之影響，然而我們卻不可將這個嚴重的問題棄之度外，聽其自滅，試觀無數的文盲，及那些受點教育，而一知半解的份子，在愚昧的狀態中，實在可痛。如果要加速推進至中國民族的解放，喚起成千成萬的勞動大眾來發揮他們的勇敢，那麼，我們至少要有這種民眾教育的注意，因為，不這樣，即談不到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以及其他一切無理的壓迫。不過這個任務，並不是單單聰明的教育當局所能擔當的，必須由一輩關心民眾教育與新興的教育者，來提倡和促進，並要一班下層的民眾，自動聯合起來，共同運動，然後才不致落空，不然的話，就是空勞無補。……總之，我們應該要深切了解群眾需要是智識，所以我們應當以集團的精神，共同出而建立民眾的學校，如此，即得消滅文盲的群眾，至少亦可使一班未受教育的群眾，因此而獲得多少實用技能——如閱報寫算等——

<sup>230</sup> 有關「教育即生活」概念如何被晏陽初運用，成為其鄉村教育的理念基礎，詳參喻本伐、熊賢君著，《中國教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5.12），頁 777-782。

<sup>231</sup> 詳參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 331-342。

那時，民眾有了智識，帝國主義可以打倒，中國的政治之腐敗，和經濟之恐慌，或可稍為修明與有辦法，而民眾教育在中國，當更能振作精神起來！

文中瀰漫著濃厚的「教育治國」思想，這種帶有「國民教育」或「軍國民教育」性質的思想在清末所形成，旨在透過教育來「救亡圖存」、拯救民族危機，<sup>232</sup>到了該文的寫作年代，則更加入了民國軍閥動盪、帝國主義入侵以及經濟恐慌等因素。由此，作者更指出民眾教育與政治、經濟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是在當時中國政治逐漸陷入殖民地狀態、農村經濟崩潰的背景下，普及教育遂成為了推動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造的重要手段。該文不僅精確地指出社會上大量文盲和片面受教育者的愚昧狀態，並指出民眾教育「並不是單單聰明的教育當局所能擔當的」，此言隱隱然批判，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固然使得地方有所依歸，<sup>233</sup>然而在民初軍閥戰亂等因素加成下，地方辦學在經費上，委實往往處於籌措無度之情形，師資來源也是一大問題。

《顯影》中關於平民教育的社論文章，尚有淡菊（薛殘白）發表於第四章第一期的〈金門應實行農村教育〉（1931.02），<sup>234</sup>將目光放回金門在地的教育需求：

……吾國現在所謂學校教育，當係側重商學等科，而對於民生關係且深且鉅之農村教育，反付缺如故也，畸形發展馴致社會供過於求，失業問題從而叢生。苟不急起直追，實行農村教育，以培國本、以利民生，則未來教育事業可危孰甚。金門為滿目田畦，蕞爾之小島，言商業，則生氣毫無；論文化，則窳敗不堪。故所謂金門人者，除洋客外，概係耕作謀生，乃實為斯。實行農村教育，誠為當務之急，蓋農村教育為克實行，因時因地，兩得其宜，且種植耕鋤，為當家本色，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耕讀兼施，

<sup>232</sup> 詳參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49。

<sup>233</sup> 如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制定，以及1922年融合平民教育思想的「壬戌學制」等。

<sup>234</sup> 祖求發表於第十一卷第二期的〈我對於故鄉的前夢〉一文，亦提及要創辦「平民夜學」，以救濟失學的青年。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頁2399-2400。

又可一雪貴族式教育之恥。……吾期從今而後，吾金學生，侵晨有叱牛上山之聲，日午有鋤禾田中之影，舍養優處尊、無縛雞能力之陋習，而趨於勞動者之境地。<sup>235</sup>



文中強調農村教育之於金門的重要性，並指出當時的學校教育過於重視商學等學科，而忽視了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農村教育，導致社會結構畸形發展，換言之，金門地區普遍以農業為生的社會現況，使農村教育的推行成為當務之急，其辦法是結合農業勞動與教育，以期在提升生產力之同時，也要擺脫「貴族式教育」的弊端。文章最後展望金門學生能結合勞動與學習，展現自給自足、務實進取的精神，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陋習，這樣的教育理念，與晏陽初的「四大教育」體系中的「生技教育」互相呼應。<sup>236</sup>根據第九卷第一期（1933.09）一則〈大有小農夫之概〉的報導記載，珠山小學會將理念付諸實行：

……逐日之早晨和傍晚間，一群小學生俱荷鋤鑿掘、執桶灌溉，勤勤不息，大有小農夫之氣概，想他日成績必大有可觀也。<sup>237</sup>

除了凌影、淡菊所提倡的農村、鄉村教育觀點，要提升金門地區整體的智識水準，首要之務還是當從「識字」下手，如發表於第十二卷第二期的〈談談金門的識字運動〉，便提及金門鄉村的識字率大約僅有百分二十，<sup>238</sup>同期署名「卡叔」的〈我們要從識字去破除迷信〉，則認為識字運動可以破除鄉人迷信的現象。<sup>239</sup>而署名「秋痕」於第十二卷第三期所發表的〈怎樣剷除金門文盲〉，便批判「金門本是村野斷續」、「智識程度過低」，故文中提倡普及於大眾的識字運動，並視其為「公民訓練」之一環。<sup>240</sup>實際上，早在 1928 年 11 月，金門縣政府教育局便曾接

---

<sup>235</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頁 767-769。

<sup>236</sup> 晏陽初的「生技教育」理念主張文化教育與農業科學技術的結合，置教育於農民生產、生活之中，並進行科學知識技術之推廣等。詳參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頁 335。

<sup>237</sup> 《顯影 (Shinning)》第九卷，頁 1997。

<sup>238</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22。

<sup>23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27。

<sup>24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頁 2543-2544。

得省教育廳飭令的識字運動，並在後浦舉辦遊行活動，並召集全金小學代表商討創設民衆學校與補習夜學，<sup>241</sup>於 1929 年 5 月開辦。<sup>242</sup>1936 年 11 月，經縣政府再度飭令全金各公私立小學附設民衆識字學校，共計十四所。<sup>243</sup>



平民教育的理想，除了農村教育和識字運動以外，根據民國十一年（1922）由教育部所頒布的「學校系統改革案」（後稱「壬戌學制」）之第五點「注意生活教育」，<sup>244</sup>則以「壯遊」的形式落實在珠山小學的教育實踐當中。如《顯影》文藝欄「灌巖第十四期」，便專闢「珠小旅行專號」作為一期，並以〈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次的旅行〉一文說明：

平時學校對於生活的試驗和專向，使我們注意到「生活教育」方面去，我們認為機械在教室裡枯向書本上尋求智識，多半不能和社會生現生活互相混合，於是我們為要實驗「社會生活」，也就不厭勞而組織了這「珠小旅行隊」，從鄉村而到都市，由狹的思想的生活裡，轉而廣闊的社會上去求實際生活的智識，同時是要利著建築我們集團生活的基礎。<sup>245</sup>

平民教育的實踐，旨在於村野中拓植起識字、啟蒙與生活技藝的基礎，〈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次的旅行〉一文意在將此一理念擘展於校園之外——將教育帶出課室，轉化為行動與觀察。文中指出，校內學習「多半不能和社會實生活互相混合」，因此須組織「珠小旅行隊」，走出鄉村、走入都市，從「狹的思想的生活」之中，轉而投身「廣闊的社會上」，以求取「實際生活的智識」，其所揭示者，正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哲學的在地實踐，也回應了晏陽初「因地制宜」之教法精神。在此，「壯遊」不再僅是青年自我鍛鍊之浪漫想像，而是被導引為一種制度化、集體性的學習過程，其意義在於讓學生於真實社會中辨識問題、感受他者、並建立群體生活的倫理基礎。與其說這樣的旅行是一場教學的延伸，毋寧說它是平民教

---

<sup>241</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35-36。

<sup>242</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卷，頁 378。

<sup>24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39。

<sup>244</sup> 參見《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頁 15。

<sup>245</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765。

育理念中關鍵的一環：將智識的獲取從抽象的文本轉向具體的經驗，將教育的目標從傳統的知識灌輸推向現代的生活實踐。在此，我們可以看見珠山小學的「壯遊教育」對於現代化社會之想像：其欲培育的，不僅是識字的國民，更是能在日常與公共之間穿梭、擁有實踐能力與社會感知的「良好公民」。此際，旅行既是地理的跨越，也是「公民社會化」的良好引導——引導學生自村落的封閉視域，走向一個更具公共性與複雜性的現代世界。

前述之平民教育、農村教育等理念，在地方知識分子的倡導中，展現了強烈的現代化意圖，以及構建理想現代化社會的美好願景，追根究底，這股教育風潮的影響還包括了「體育」的推廣。「體育」一詞為和製漢語，在清末民初期間，梁啟超於《新民叢報》曾多次使用，初期主要與「尚武」和「體魄」等軍國民主義相關，直至民國建立後，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參議院提出了將「體育」與「兵式體操」混用的新教育主張。<sup>246</sup>以上足以解釋，為何從 1912 至 1913 年頒布的「壬子癸丑學制」以降，直到 1922 年「壬戌學制」正式頒布之前，小學與中學基礎教育課程中無「體育」一科，僅設「體操」，並以「兵式體操」作為教育重點。<sup>247</sup>爾後，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揭橥的科學、民主被奉為圭臬，杜威來華所帶來的實用主義之思潮也廣為新知識份子接受，他們便大力地主張體育運動的發展，以強化國民體質，並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如 1917 年《新青年》雜誌中署名「二十八畫生」的作者，在其〈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體育不僅能促進身體的均衡發展、增強筋骨，還能增長知識、調節情感、鍛鍊意志，展現其多重價值與功能。<sup>248</sup>

平民主義的體育思想，使國內教育課程以普及化的「自然運動」（如遊戲、田徑、球類運動）作為主要推廣內容，擯棄了舊式的體操、拳術這類以「保家衛國」為號召的樣板化活動。這些由西方引入的新式體育運動，如籃球在 1924 年

---

<sup>246</sup>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頁 12-15。

<sup>247</sup> 參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頁 59-61。

<sup>248</sup> 詳參二十八畫生，〈體育之研究〉，收錄於陳獨秀主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海：群益書社，1917.04），頁 52-62。

便引入珠山，其籃球場之建設開全島風氣之先。1927 年珠山校友會組織「體育協進社」，並擴建運動場，添購各類運動器具，另立排球、網球場等運動設施，甚至一度倡建游泳池。<sup>249</sup>所成立之籃球球隊，時常與「金門公學」之間舉辦籃球友誼賽，<sup>250</sup>種種蓬勃發展之態勢，可見新式體育風氣之盛。值得一提的是，珠山所成立的籃球球隊不僅有男子隊四隊，甚至包含女子隊兩隊，<sup>251</sup>此類女子體育的提倡，也是平民主義體育思想重要的一環。<sup>252</sup>

平民主義的教育思想主張，是在美國民主政治背景下所形成，故其主張「機會的均等」以及「自由的競爭」，強調適合兒童天性與引導其學習興趣，而競爭好勝為人之天性，這樣的精神進入到體育思想中，便演變為各類競技型的比賽活動與運動會。<sup>253</sup>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降，各式體育競賽活動與運動會十分盛行，中國各省亦開始辦理全省運動會。<sup>254</sup>1929 年 5 月，金門縣教育局局長黃召英召集前三堡（後浦保、古賢堡、古湖堡）各學校籌組「前三堡各小學聯合運動會」，<sup>255</sup>並於同月月中假後浦金門公學及浯江小學體育場舉行，據《顯影》第二卷第二期的「前三堡各學校聯合運動會專號」報導，<sup>256</sup>該次運動會，當為其時金門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次運動會，<sup>257</sup>專號中完整紀錄了大會宣言、大會簡章、報名規則、報到手續、活動流程表、工作人員名單、成績總表、活動實況、大會簡章等訊息，從中可見參加的學校有金門公學、浯江小學、珠山小學、金埔小學、金水小學以及古寧小學；競技項目琳瑯滿目，包含田徑、鉛球、跳高、

---

<sup>249</sup> 然而迫於「南洋商況」的不景氣，該計畫最終告吹。詳見《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205；《顯影 (Shinning)》第八卷，頁 1817；《顯影 (Shinning)》第十卷，頁 2181。

<sup>250</sup> 《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35-137。

<sup>251</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67-268。

<sup>252</sup>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頁 304-308。

<sup>253</sup>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頁 299-300。

<sup>254</sup>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頁 308-310。

<sup>255</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卷，頁 377-378。

<sup>256</sup> 《顯影 (Shinning)》第二卷，頁 392。

<sup>257</sup> 該次運動會開了金門全縣舉辦聯合運動會的先聲，在此之後，《顯影》也記載了則於 1931 年元月舉辦的「金門第一區運動大會」，以及於 1936 年 12 月所舉辦的「珠山運動大會」。參見《顯影 (Shinning)》第三卷，頁 667-718；《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70-2987。

跳遠、撐竿、接力、籃球、足球、排球、體育表演（疊羅漢）。<sup>258</sup>從大會宣言中，可以一窺其時的金門教育界對體育運動的看法：

為什麼要開運動會呢？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明白體育在教育科上所佔重要的位置……體育乃發育身體無上補養品……若使要避免東亞病夫的渾號，就要養成健全的身體，西方諺語不是告訴我們嗎？要得健全的精神，必定有健全的身體……體育是發展好群良好的本能……體育科上不論任何運動，至少要集合幾個人以上才可以達到運動的目的，各校比賽更是彼此聯合感情，所以體育真足以養成民眾聯絡合作的精神。<sup>259</sup>

學者楊瑞松在《病夫、黃禍與睡獅》一書中，曾對「東亞病夫」一詞做出系譜學式的爬梳：這個詞彙原先在西方政論文字中，只是用來形容中國積弱的「國體」，然而經過中國民族主義「受害者敘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的話語構建，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民初中國的盛行，「東亞病夫」在中國公共輿論的使用上，漸漸轉為對中國民族「身體」的指涉，並廣泛用於體育相關的論述文字中，自此爾後，以體育競賽的成就來「雪恥」、「擺脫東亞病夫名號」等論述也就隨之蔓延開來，甚至延續至現當代。<sup>260</sup>在上述的運動會宣言中，首將體育納入國民教育的重要一環，並以其時盛行於中國的「東亞病夫」一詞激勵民衆參與體育活動，最終目標，當然往往是訴諸更大的「體育救國」。<sup>261</sup>

對此，檢視《顯影》中有關提倡體育、批判金門體育風氣之文章，可發現往

---

<sup>258</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卷，頁 391-418。

<sup>259</sup> 《顯影（Shinning）》第二卷，頁 393-394。

<sup>260</sup>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04），頁 17-67。

<sup>261</sup> 在《顯影》中，尚有署名「仲馨」者曾寫〈游泳於教育上之價值〉，該文認為游泳是很好的運動，建言國內應該要多設游泳池，並列舉游泳國手楊秀瓊女士作為示範，認為推廣游泳這門體育運動，不僅能「雪」東亞病夫之恥辱，更能促進性別平等，「以新力量去克服封建思想」。詳見《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頁 2824。

往往有此論調，如施伍〈珠山人對於珠小應有之認識〉<sup>262</sup>、荒烟翁〈關於金門參與省運動會的漫話〉<sup>263</sup>、荒烟翁〈讀譚金門的體育——關於不振及補救問題〉<sup>264</sup>等。有趣的是，在後兩篇署名荒烟翁所著的文章中，特將評議範圍設置在「金門」，除了回顧金門參加福建省運動會的經過，也極力檢討、反省金門的運動風氣與競技成績。此處，原本的「體育救國」話語在同樣是「擺脫病夫」的敘事脈絡中，成為了「體育揚鄉」，換言之，在運動競技上的出人頭地，不僅被視為金門地方現代化建設進步的象徵，更通過彰顯地方實力與活力的表現，激發了居民對家鄉的自豪感與認同感，進而強化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鄉民心中的體育觀念並非一蹴可幾，施伍在〈珠山運動空氣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中坦言，<sup>265</sup>地方長輩初對運動頗多疑慮，甚至以「損壞鞋襪」為由反對學童運動，但這種觀念隨著體育實踐的積累與象徵性活動的展開而逐漸鬆動，1931 年《顯影》第三卷第五期就已推出「金門第一區運動大會專刊」，該次運動會涵蓋範圍非限於珠山，乃屬整個第一區（古賢堡）性質之體育盛會，珠山亦有代表參與，該專刊用於刊出各類比賽成績、來賓演講、隊伍介紹與長達一週的大會記事，完整呈現運動會過程，成為公共記憶與榮譽建構的媒介。<sup>266</sup>第十五卷第四期亦記載 1937 年舉辦的「珠山第一屆運動大會」，不僅為珠山村內首度大規模、具制度性的體育賽會，更動員全村男女老少共襄盛舉，從競賽項目到幼兒園表演、男女拔河與接力賽，場面熱鬧非凡，顯示體育作為公共儀式的嶄新位置逐漸被鄉間社群所認可滲入日常文化之中。

自此，運動競技在金門，不再僅僅是一種體育活動，而成為了一種僑鄉社會的文化實踐，透過集體參與、成果展示，地方社會的榮譽感與歸屬感在此凝

---

<sup>262</sup> 該文檢討民國二十年度（1931）珠山聘請無體育觀念的外地籍教師，導致學童體育風氣低落之現象，呼籲道：「如果會從後天訓練去著手，不論如何總會有『化病夫為武夫』的希望……。」詳見《顯影（Shinning）》第六卷，頁 1435-1438。

<sup>26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39-2640。

<sup>264</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頁 2659-2660。

<sup>265</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第四期，頁 2972-2973。

<sup>266</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三卷第五期，頁 667-718。

聚，同時也肯定金門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努力與價值。如在第十五卷第一期郭師儀〈金門人的榮譽〉一文中，便提及 1935 年的福建省運動會，金門在籃球項目上勇奪季軍之事：



好久以前，有兩件事令人很快慰，那便是家鄉籃球隊在全省運動會得第三名及珠山人薛領袖在全國運動會表演，博得讚譽。這兩件事可值得是家鄉運動的榮譽，也未始不是我們金門人的榮譽，我相信這消息傳布給海內外的金門人知道，誰都會覺得一種親切的快慰，……我們不惟在中國運動界要露頭角，我們應在任何事業上都顯出金門人的本領來！不惟只有運動健兒，我們還要有政治家、教育家、文學家、實業家等專門人才，……就以這一次家鄉運動界的榮譽做起始吧！在任何事業上，在任何學術上，讓我們競技的精神來造出金門人更大的榮譽吧！<sup>267</sup>

綜觀《顯影》對體育運動的重視及其在地書寫，我們不難發現體育不僅僅作為一項教育政策或競技活動被倡導，更被作為一種現代國民建構與地方認同凝聚的文化實踐。金門地方知識分子所提倡的體育精神，與五四運動以來的「體育救國」論述密切相關，從「東亞病夫」的反轉想像出發，意圖透過鍛鍊健康強健的身體來重塑民族「國體」與「精神」。然而，在金門這樣的僑鄉語境中，這股身體政治論述被重新轉化為地方層次的「體育揚鄉」，亦即透過參與省運會、舉辦地方競技活動，來展現地方現代性與群體榮譽的象徵工程；藉此，金門不僅擺脫「落後鄉鎮」的刻板印象，更在教育與體育的雙重路徑中，嵌入現代國家話語，完成自我主體性的再定位。在此過程中，平民主義的教育思想亦扮演了關鍵角色。來自杜威實用主義與美國進步主義的思潮，使得體育教育被賦予更多集體性、參與性與競爭性的價值，不再僅止於軍國主義式的體操訓練，而是強調人格發展與社會連結的訓練場域。

是以，《顯影》作為地方文化報刊，不僅詳實記錄運動會的活動編制與成績成果，更提供了言論場域，使地方知識分子得以從體育活動談及教育體系、社

---

<sup>267</sup> 《顯影 (Shinning) 》第十五卷，頁 2877-2878。

會風氣、地方榮譽等宏觀議題。從施伍對珠山小學體育建設的期待，到荒烟翁對金門參與省運表現的反思，無不體現出體育作為地方現代化象徵的高度政治性與文化意涵。進一步來看，這些論述也揭示了體育如何作為金門僑鄉社會連結「國民身體」與「地方感」的重要媒介：它既是近代國家意識形態所投射的載體，又是凝聚海外鄉僑認同、激發在地自豪的文化工具。在集體參與與成果展示的儀式性實踐中，金門人透過身體、紀律與競爭，生產出對「現代」的感知與認同——正如郭師儀所言，地方運動隊伍的成績不僅是體育之榮，更是金門人於全國、乃至全球僑鄉網絡中發聲的重要契機；因此，《顯影》不僅見證了體育運動在金門的蓬勃展開，更記錄了地方現代性如何透過身體文化與平民教育，實踐於每一場競技、每一聲喝采之中。

## 小結

本章旨在將湯普森（John B. Thompson）所提出的「文化技術媒介」與法斯特（Thomas Faist）的與「跨國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等理論資源，以《顯影》視為前者的抽象體現（abstract embodiment），以及後者作為具體實證（empirical instantiation），闡述作為多元媒介的僑刊《顯影》，何以生產出豐富的意義與功能。肇此，本章第一節首先說明《顯影》如何在 1928-1949 年間作為「跨地互動的媒介」，透過通訊、調查、媒婆、海外資訊等欄位的設置，牽起在地與離散的跨地訊息交流，結合在地與離散、故鄉與他鄉的音訊，使其在共同時空想像的基礎上，形塑一個跨國／跨地的金僑社區。接著，本文為驗證這樣的跨國／跨地社區之生成，因而透過資料的爬梳，將其與共時的其他刊物加以比對，並以「從鄉訊到僑刊」的自我定位軌跡，來推導其是否具備一定的「流通性」與「獨佔性」。最後則以「『家』『國』攜手」為主題，從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追索到僑鄉在地的愛國響應，探討《顯影》作為一想像的跨國／跨地金僑社區，如何在「日佔前」與「重光後」的動盪歷史中，將建設家鄉的倡議與論述模式，與愛國情境、民族主義的話語交疊共構，激發出知識份子對「推動現代化」與「啟蒙」的思索與論述。

至於本章第二節，則從《顯影》作為金門僑鄉時代「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媒介」入手，分析其中有關教育機構倡建、地方開墾與實業建設方面的相關內容，以闡述《顯影》在公共化的版面上，如何透過報導、輿論、倡議與募捐告示，嘗試推動或影響金門現代化的議程。首先，本節探討了《顯影》在推動地方教育機構建設上的努力，並著重於地方的熱心份子如何向南洋僑匯資本「勸募」的過程，故此，筆者分析了《顯影》在勸募告示、輿論文章、進度報導與芳名錄等措施上的運用，此處已能大致廓清《顯影》作為通信媒介在推動地方建設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某種意義上，報刊作為技術媒介的可複製性 (reproductive capacity) 及其隨之而來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增值化 (valorization) <sup>268</sup>，無疑在此顯現，如「顯影之友室」之興建活動，以及捐款芳名錄的刊登，即是利用大眾傳媒可供宣傳版面之特性，增加勸募的誘因。一方面，順利成為顯影之友，以及獲致鳴謝登報的捐款者，得到了象徵商品——在以地緣、親緣社群關係為主的金僑社區中，此一方面被用以轉換為相對應的社會資本——亦即達到個人或商號宣傳的目的，另一方面，《顯影》的經營者則得以順利籌款，可謂雙贏。接著，筆者爬梳了《顯影》中有關地方開墾的輿論文章，並重新釐清了金門僑鄉時代的現代化軌跡，發現這些知識份子在地方開墾與現代化的論述中，不僅延伸了「『家』『國』攜手」的情境或策略，也從中國與世界的政經情勢展開，重新審視跨國勞動者的精神狀況及出洋動機。在此前提下，他們對國內／鄉村勞動力嚴重的空缺也不吝予以批判，是以建設祖國／地方的經濟與產業環境，遂為間不容緩的宏願，如此，一種長治久安的想望在其中浮現。<sup>269</sup>此外，地方知識分

---

<sup>268</sup> John B. Thompson. "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95, pp.27-28.

<sup>269</sup> 如署名「友植」所發表的〈「回農村去」的小議論〉便云：「影響於村民生活的，莫如種種事業，以目今村民對農產不但不曾有過量的表率，反多受虧於不及自活的狀態中，於最乎多數人另跑上『當番客』的路，任家園蕪廢在所不顧，他們的心意以南洋容易謀生，抱著空拳去而衣錦歸的象想，殊不知經濟的恐慌都趨於深刻與尖銳化的今日，商業上已是備受極大的襲擊，裁員倒閉的風潮，直使我們行不得也哥哥。既然我們深感覺景象的不對，我們又沒有策力可圖，除非我們跑回農村，得確牠還有恢復的量力，同時須先認識，種植的根要，以科學化改良，這是第一。步驟造林與興水利，我們更須轍底進行，將來生活的源流定可滔滔，我相信較之離鄉背井、寄人託飯實勝數籌不計。」參見《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頁 2420。

子也往往能融入科學化的知識背景，針對該地現況展開可行性評估，提出具體計劃與建言。最末，筆者亦鉤沉了《顯影》中有關實業建設的文章，內容涵括公路興建、鹽業、漁業、礦產等，並嘗試揭露隱藏在諸般報導和記敍中，雲譎波詭、各方角力的海內外政商經要，是如何在暗處裡牽纏著可圖之地利。而這些針對弊端所揭露、抨擊的輿論文字，無疑體現了《顯影》在推動金門在地實業建設與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如何嘗試發揮其作為報刊媒介的輿論影響力。

本章第三節分析了金門地方的知識分子如何透過《顯影》作為文化與思想傳播的技術媒介，運用多樣化的輿論文章與新聞報導，或批判迂腐舊俗，或反思地方問題，提出包括婦女解放、教育改革、體育推廣等在內的現代化願景。首先，在反傳統主義等五四批判話語的影響下，他們批評地方宗族組織的落後、迷信與賭博的問題。其次，具有大學教育背景的金門地方知識分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對「戀愛與自由」的議題展現了獨特的關注與廣泛的討論，這些討論既反映了對西方現代性與五四思想的吸納，也突顯了知識分子試圖以本地化視角重新解構與詮釋的努力，內容甚至包羅了社會學、經濟學、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等學說，無不展現了他們在學識涵養上的廣度與深度；此外，《顯影》中對婦女解放運動與婚姻儀式的討論，從迷信、舊俗到自由戀愛的倡議，亦印證了金門知識分子如何將現代化議程落實於在地的社會與文化場域。總言之，他們以教育與人格的解放為核心視角，批判傳統性別規範與婚俗對女性自主的壓制，同時肯定戀愛自由作為現代婚姻的核心意涵，這樣的思想啟蒙與社會批判路線，不僅旨在推動女性從舊有的性別規範與社會束縛中解脫，也推動了金門僑鄉的地方化現代性與文化新秩序。

最後，金門地方知識分子從教育理念到體育運動的推廣，展現了對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與構想。在教育層面，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引入促進了識字運動與農村教育的推展，強調以因地制宜的方式解決地方經濟與教育結構失衡的問題；而在體育層面，透過新式運動項目如籃球的引入及運動會的舉辦，充分體現了健康國民與現代公民素質培養的理想。無論是運動會中從「體育救國」到「體育揚鄉」之理念的接軌，還是對「東亞病夫」話語的批判與擺脫，都彰顯了金

門知識分子試圖以體育競技塑造強健國民身體、提振地方聲譽的願景。運動競技不僅是身體素質的展現，更成為金門文化、社會現代化實踐的重要環節，透過集體參與與競技成果，傳遞出對現代化進程的期許與對家鄉榮耀的追求。此外，本章最末所述的教育與體育運動的雙重推動，除了再次回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科學與民主的核心價值，也凸顯了金門知識分子試圖在地方層面融合現代性思想與在地需求，為僑鄉現代化的過程勾勒出一幅更加鮮活的寫照。

大抵而言，《顯影》作為「新文化與新思想的媒介」，除了展現其在後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重要角色，當中也間或浮現「『家』『國』攜手」的論調，並反映出地方知識分子如何透過《顯影》，針對舊社會陋習、婦女解放、自由戀愛及教育體育等議題提出批判與實踐策略，他們試圖推動地方現代化進程，更引介西方思想與學術，使之作為現代化理念的載體，亦將五四運動的主張挪用並轉化為具地方性的文化改造方案，成為連結傳統與現代的橋樑，總言吾鄉先輩之彪炳，他們除了為金門僑鄉塑造了一個深具現代啟蒙意義的思想平臺，也不啻留下了那個屬於金門僑鄉時代的歷史聲音。

## 第四章 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顯影」



在探討「金門現代文學的起點」這一宏大而複雜的命題時，筆者深知所涉者甚廣，蓋難於一章中齊整全豹，然考量《顯影》資料之豐富，與本文之研究旨趣，本章仍嘗試從《顯影》刊物內容、文體轉型、文藝論戰、文學觀點，乃至政治傾向等層面切入，提出初步觀察與討論。就歷史定位言，《顯影》既上承清末民初古典文學作家林豪，又下接 1949 年以後，胡璉將軍經由「怒潮學校」系統，將黨政軍報體系的《正氣中華》引入金門之文學政宣脈絡。<sup>1</sup>此際，《顯影》看似民初僑鄉文學遺緒的吉光片羽，對於理解金門白話文學如何從散漫無端，到逐步構築其現代語體，尤具史料價值。在本章所欲展開的考察中，筆者將試圖拾掇這些珍貴的羽毛，還原彼時珠山聚落作為「模範之鄉」的文化風氣，並嘗試以文學史觀點來建構「金門現代文學的起點」。

本文用以剖析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顯影》，雖發行於 1928-1949 年間，但其文藝欄僅從 1928 年 10 月的第一卷第一期開始刊行，至 1937 年 2 月第十五卷第四期止。在 1937-1945 年的「日本手」時期過後，《顯影》成功在 1946 年復刊，雖一度擬重設文藝欄，<sup>2</sup>最後卻不了了之，僅留下少許社論雜文，但還是比不上「日佔前」，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左翼思潮而起，蓬勃發展的文學生產 (literary production) 與「文學活動」 (literary activity)。此處筆者所謂「文學生產」，乃根據漢學家賀麥曉 (Michel Hockx, 1964-) 對 1920 至 1930 年代之間的「文學團體」及其雜誌之認識論 (epistemology) 所言：

<sup>1</sup> 有關 1949 年後，金門文學系譜由地方批判性較強的《顯影》過渡至右翼色彩濃厚的軍報《正氣中華》等相關論述，詳參黃美娥，〈反共抗俄時代的金門文藝論述——以《正氣中華》為分析場域 (1949-1964)〉，收錄於陳益源主編，《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4.12)，頁 54-56。

<sup>2</sup> 據第十七卷第三期由編輯室所發出的〈說幾句送往迎來話〉，詳細地報告了「重光後」包含從退回油印到鉛印的印刷情形、刊登〈八年滄桑錄〉、〈履痕淚痕記〉、「海外通訊」，以及恢復文藝欄「灌岩」與「雛燕」等計畫，不過有關文藝欄的重設最終並未實現。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七卷，頁 3250。

「文學生產」可定義為：「印刷文本的製造，這文本被視作實際上存在的文學（物質生產）或者被視作有助於確立文學價值的文學價值（符號生產）。」

「文學活動」則指：「具體的、有記錄的、包括文學生產者在內的活動或事件，它們被視作實際上存在的文學，但並不直接導致印刷文本的製造。」

3

簡結賀麥曉所言，有助於我們理解「物質和符號的運作與發生」，與「民初時期的新文學生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換言之，「文學生產」指的是「印刷文本」的製造行為本身；隨著文學雜誌的刊印，及其所連帶的集體創作活動；一些具備史料價值的文本，亦可用來考察當時的「文學活動」（literary activity）實踐。此上二者旨在闡釋，具有物質性，以及針對雜誌印刷出版行為而言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生產，是如何得以建構一時一地「實際上存在的文學」本身，這種認識論，也有助於我們透過回溯《顯影》的方式，動態化地呈顯出民初金門現代文學史的發展及其風貌。故此本文即將著力探討的，即以珠山小學校友會與其印刷文本《顯影》所呈現出的金門現代文學生產與文學活動。為求將此一「金門現代文學起點」做更加細緻與歷時性的考察，將以肇始於 1932 年的「淡、寒文藝論戰」作為重大現象級事件，闡為兩期，分別是：一、「1928-1932：白話文學的嘗試與摸索」，以及：二、「1932-1936：文藝大眾化」。

筆者以為，本文既然旨在關注「現代文學起點」，便不得不忽視「白話」之於「現代文學」在文學史意義上的重要性。<sup>4</sup>此際，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觀念與系譜源流，可參考夏曉虹在〈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形成說略〉一文中所闡釋——甫矗立的「中華民國」民族基礎的「國語文學的誕生」。但「國語文學運動」之翕然興起於 1917 年 1 月胡適於《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若非藉助晚清以來

<sup>3</sup> 賀麥曉（Michel Hockx）著，陳太勝譯，《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1），頁 83、115。

<sup>4</sup> 是此，筆者也不得不將「白話文學」所蘊含的「現代性追求」，扣合進五四運動及其後思想史之發展，正如李澤厚對於五四運動那句最經典的評價——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那樣。詳參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修訂本）》（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頁 1-47。

的「西風」以開展「新文體」、「新名詞」，這場運動不會發展得如此順利。<sup>5</sup>其實從晚清白話報刊的蓬勃發展觀之，隱隱可預見中國白話文運動史的走向——據統計，從 1897 年開始至 1919 年前夕，中國出現了不下兩百種的白話報。李孝悌也指出，白話文的發展與勃發，並非胡適先生 1917 年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登高一呼，便一蹴而就的。<sup>6</sup>不過李氏也公允地指出胡適在白話文運動的貢獻與定位——完成了文人／上層階級在書寫文體上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所以胡適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最大貢獻，就在他把清末已經蓬勃發展的白話文重新定位，將它的對象從下等社會或中下等社會，擴及到每個層面；將它的使用者從「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提昇到大學教授和文學、藝術殿堂的守衛者。……清末仍然帶有泥土味的白話在胡適的反覆辯難和大力提倡下，終於升堂入室，發展到一個新的境地。<sup>7</sup>

那麼，「白話文」之於這個僻處中國東南沿海一隅的金門小島，有何干係？在這片島的土地上，民衆日夜所操的「白話」，無非是閩南語泉漳片同安分支底下的「金門話」，<sup>8</sup>可金門在地知識份子所書寫出來的「白話文學」，卻是官方統一以北京方言為主的「國語」。從金門走到北京，是一段什麼樣的荊棘之道？從文言走到白話，又是如何現代，怎樣文學？總結上述，本文所探討的「金門現代文學」，

<sup>5</sup> 在政治改革上以魏源、李鴻章等革新派，甚至是康有為的保皇維新派吹起號角，而在文學思想界則有黃遵憲、裘廷梁、梁啟超、嚴復等人透過報刊文體、新小說、新文體、翻譯等提倡。然而此一部分已有太多重量級學者的研究在前，此不宜再度贅述，相關論述，此處主要參閱夏曉虹，〈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形成說略〉，收錄於夏曉虹、王風等著，陳平原主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0），頁 5-19；另可參閱王德威，〈翻譯現代性〉，收錄於《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1998），頁 43-76；以及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收錄於李歐梵，《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12），頁 267-296。

<sup>6</sup> 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周策蹤、唐德剛、李孝悌等作，《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05），頁 1-13。

<sup>7</sup> 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周策蹤、唐德剛、李孝悌等作，《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05），頁 18-29。

<sup>8</sup> 參見洪乾祐，《金門話考釋》（臺北：稻田，1999.05），頁 3-4。

事實上即指「現代白話文學」（Modern Vernacular Literature），期待透過「白話文學的摸索與實踐」，再思「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尺度和縱深。



## 第一節 文學活動及文學生產的社會環境因素

民初金門社會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生產，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及物理環境下所促成，並由具備啟蒙意識的新式知識份子，將焦點放至於「在地」的組織與實踐所致。因此，本節擬先就《顯影》當中透過珠山校友會同人所帶動的在地文教風氣談起，進一步考察在其中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相關文藝實踐。

### 一、從「珠小校友會」所帶動的文教風氣談起

誠如前兩章所述，珠山聚落的文教風氣乃是以「珠山小學」為中心，不過，在民國初年的時空背景下，所謂的「小學教育」，事實上走過一段漫長的過程：1912年，教育部於北京召集臨時教育會議，九月公布「壬子學制」，<sup>9</sup>但經歷復辟歪風、軍閥混戰，中國人民仍舊苟生於水火，影響了辦學成效。<sup>10</sup>1922年9月，國民黨於濟南再次召集會議，11月1日由大總統公布「壬戌學制」，該學制參照美國學校系統，是底定民初國民教育重要變革，設小學校前四年為初級，後二年為高級，中學教育六年，亦分初高二級。<sup>11</sup>

金門自南宋以降，在志書中記載著有燕南、浯洲、金山、浯江四座書院，

<sup>9</sup> 該學制制定了初等教育七年、中等教育四年、大學連預科六年至七年的學校系統。詳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國史館編印，《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06），頁13-15。

<sup>10</sup> 批閱國史館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可見1912年9月，教育部雖成立，卻並無教育政策，所記載之第一份教育政策，竟是1915年由袁世凱總統所頒布的「教育綱要」，內容充溢封建遺緒，以尊孔孟為主，甚至推崇陸王學，比之清末新政廣開新式學堂，西風東漸之盛況，其行儼然大開教育風氣之倒車。詳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國史館編印，《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06），頁2。

<sup>11</sup> 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國史館編印，《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06），15-18。

惟尙存其址者，浯江書院而已；該書院於 1908 年（光緒三十年）改設為「縣立小學堂」，金門於 1915 年設縣後，根據《金門縣志》所載，又改制為「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成為金門民初唯一政府立案的小學。該志亦記載其他小學之成立紀錄，不過皆為各村私立，經費仰賴當地村落籌捐，據《顯影》第一卷第四期（1929 年 1 月）載，已設立者包含縣立第一小學、珠山小學等凡二十五間。<sup>12</sup> 透過《薛氏族譜》記載，珠山自古設有頂書房、下書房學塾二所，<sup>13</sup> 另有關珠山小學設立的記載，因《縣志》與《族譜》所述詳情不符，故此略不敍（詳可參註）。

<sup>14</sup>

區區地方小學校，當此國內局勢動蕩，缺乏官方加持之際，如何自立自強，帶動起地方的文教事業與文藝精神？以珠山為中心進行考察，便可發現為當地文教風氣注入活水的，當為「珠山小學校友會」。該會成立於 1924 年，發起人為李摯松（時任校長）、薛永麥、薛永亮、薛承爵、薛汝評等，贊成人為薛永忝、薛永乾、薛福緣、薛芳熙、薛汝琛、薛春霖等，成立宗旨為聯絡鄉親感情與促進教育。<sup>15</sup> 不過又根據《顯影·六週年紀念刊》所載，該會實為施伍（薛永麥）於 1924 年暑期返鄉時所號召，當時他年僅十八。初創之時，成員不過二十餘人，

---

<sup>12</sup> 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一卷，頁 229-230。

<sup>13</sup> 《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03。

<sup>14</sup> 縣志載其原名「珠山學校」，1916 年 5 月設為「第二區第一國民學校」，後因事停辦，重又於 1921 年 2 月復設；《族譜》則記載珠山小學成立於「民國二年」（1913），為當時「縣立第二國民學校」。筆者傾向採縣志所載為佳，因 1913 年金門尚未設縣，是《族譜》一說之陋也。另，有關 1921 年 2 月復設之事，於《顯影》第十八卷第三期刊有其時赴任校長之伍遠資本人回憶錄佐證，該文內容翔實，洵可信也。而有關聘請泉州籍教師伍遠資做小學校長，主持校政，為珠小立下教育丕基之事，則《族譜》亦載。詳參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五冊：教育志）》（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45-50；伍遠資〈一萬日前的影事〉，載於《顯影 (Shinning)》第十八卷，頁 3375-3377；《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04。

<sup>15</sup> 該會利用位於雞庵山西麓的薛氏小宗宗祠作為辦公室，「小宗宗祠」配置為一廳兩房，廳中置一閱讀桌、四張閱讀椅、報架兩座、什誌架一座、至中至深處置祖龕，右廂房為「音樂室」，擺放音樂器材與體育器材，左廂房則為辦公室，擺放寫字桌、書櫥，亦作為《顯影》油印室使用。參考《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29；《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19。

然各自竭力而爲，並於該年初闢「閱書報社」，奠定了後來「校友會」的組織雛形。其後，隨著來自遠地的校友陸續來函響應，會務逐漸擴展。至 1926-1927 年間，聚會人數日增，活動由原本的疏落轉向常態，並開始規劃體育場之重興、藝園之開闢、通訊社之設立，以及《顯影》的創刊，形成了校友會運作最爲興盛的一段時期。<sup>16</sup>

「閱書報社」設址於雞庵山西麓之薛氏小宗宗祠，目的在於提供村民接觸知識與報刊之管道，初期經濟拮据，書報僅能簡約選購，日報以《申報》爲主，配合廈門《新聲報》與學校原有報刊。不過，透過多次募捐，以及旅外校友與學生寒暑假歸鄉時等捐贈，甚至發行「珠山閱書報社文化獎券」等方法，<sup>17</sup>逐漸充實館藏，藏書三至四千冊，頗具規模，包含小說、叢書、兒童讀物與雜誌等。並另訂《良友》、《文華》、《東方雜誌》等什誌，形成珠山社區自營型的小型圖書館。<sup>18</sup>尤有甚者，此處不設管理人，村民皆能自律閱畢歸位，未聞遺失，充分反映地方學養素質與文化自覺，<sup>19</sup>每當新學期開始，皆重新整理，添購新的什誌與

---

<sup>16</sup> 其經緯整理自〈珠山小學校友會會史〉，原內容爲：「會之創立，是在民國十三年前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是許時還在鼓島養光小學的永麥君，乘暑期回來時所倡議，得汝評、承亮、丞祝等附和，而聯名發起召集的。回憶到當日之校友，為數不過二十有餘，然端奈個個罷（筆者按：爲「疲」之通同字也。）拼幼稚而又學術尚淺的命，竭力鼎起，且著手組成個鄉未曾有之閱書報社，隨之「校友會」三個字開始浮頭，並引得人家之注意，順而遠地校友更接踵來函聲請參加，會務因以漸漸前進焉。……進而十五年之冬末，四處校友作一時間聚合十幾，越年春更又加添五六，因之一齊攏合，會務立由消沉而呈煥發，內部整理之不足，體育場於又一年春且重興，繼而闢藝園，成通訊社，並刊發《顯影》以至於等等之進行，真開會務之最盛時代也，……。」載於《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31-132。

<sup>17</sup> 透過《顯影》，校友會會以「獎券」形式募款，以籌募閱書報社訂閱雜誌、購買書籍所需要之「基金」，詳參《顯影（Shinning）》第九卷，頁 2001-2004。

<sup>18</sup> 其收入圖書類別包含「小說」、「叢書」、「兒童用書」、「雜類」共 444 部，1761 冊，「雜誌」、「週刊」則共計 88 種，共 1080 冊。詳參《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77-187。

<sup>19</sup> 整理自〈珠山小學校友會會史〉，原內容爲：「追想到十三年（按：即指民國十三年，爲 1924 年）以前，珠山人們思想之幼稚，俯視到目前個個潮流化，這字難免歸點功於本會初創時之斤斤於是圖，不外當時為因經濟關係以至於種種原因，故書籍只擇其切者，而先為購置什誌自必不上幾份，日報方面，即更因許時民情不大需求，故除把學校定有之廈報、民鐘移為充數外，旁的只加定了上海申報而已，然經此雛形粗具，社會民情以至於小部分青年的民智，似漸見得較前為活躍，緣此會中全人，大感收功之偉，因乃不自謂牢騷，而三番五次之計發捐冊，果也僑外同鄉至校友不

報紙，並分配由高年級生擔任管理庶務，其形可見於《顯影》第十五卷第二期載其「每日小朋友爭先借閱，極為踴躍」。<sup>20</sup>值得一提的是，《顯影》第十一期載金門第一座公共圖書館設立乃於 1934 年 9 月 1 日假當時後浦西門金門縣黨部，由盧水玉、卓凡、施伍共同成立，該篇報導提到「金門現無圖書館之設立，一般民眾無從閱覽書報，……金門民眾教育不普及，是亦一大原因」，珠山閱書報社顯然是早於此一公共圖書館之設立，甚至可堪金門鄉親模仿之典範。<sup>21</sup>

同樣由校友會主導設立的「通訊社」，則是在 1928 年（民國十七年）為因應多數校友旅居外地、無法時時往返，而設立的聯繫機構。早期由專人手寫抄信向校友通報會務，惟內容繁瑣，既費人力又難周詳，故而醞釀出版刊物以代替書信，遂有《顯影》之創刊，其以刊物統整校友動態、鄉里大小事，寄發至各地，迅速獲得廣大校友與旅外鄉親之首肯；此舉不僅節省溝通成本，更在無形中奠定了《顯影》作為跨地域知識交流與文化連結的平台。<sup>22</sup>

---

約而同的相贊許，物質疊連的需供，事後即凡有關於民智之圖書，添補更豐，什誌日報亦都重再分別添定，特別是十六、七兩年之間，各種書類補充最多，而呈現有之數。」另，於《珠山薛氏族譜》中亦對當年之情形有所追憶，內容如下：「珠山圖書報社，藏書約三、四千冊，均為旅外學生所捐贈，每年寒暑假，每人將在校所購書籍，盡量帶回以供村人閱讀，因此彙集而擴大為一小型圖書館，另以徵收會費向上海訂有『申報』，廈門的『新聲報』，菲島的『華僑商報』，什誌圖刊有『良友』、『文華』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東方什誌』等數十種。這個場所，不設管理人，里人自動自發，遵守閱後放回原處，亦未聞有失竊現象，這一點可見村民有高度學養，亦是被稱為金門模範村的所由來。」詳參《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33-135；〈珠山學校校友會創立〉，《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18-319。

<sup>2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頁 2907。

<sup>21</sup> 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金門：金門技術學院，2006.09；原 1928 創刊，現重印），頁 2352-2353。

<sup>22</sup> 整理自〈珠山小學校友會會史〉，原內容為：「為因校友是外出的居大半，隔離遙遠，若非有一專責者，時時來造訪報告，似于聯絡生氣之無可言，爰乃於（按：民國）十七年秋成立此社，以負不時與遠地校友通問好之責，初時負責者，極受作信抄寫之困，並且會、鄉之事以至於種種，而又也舉不勝齊，且難周到，因則合而倡議出版刊物，而代零碎麻煩之信札，不數日果《顯影》之創刊號出，寄發後，大得各地讚美之反應，因之，會中人更明瞭海外對此渴望之急、需求之切……。」詳參《顯影 (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137-138。

## 二、現代「新劇」與傳統「南曲」的文化實踐



除了透過「通訊社」以維繫在地居民社群、離散僑居社群之間的情感紐帶，校友會亦於每年八月下旬定期舉辦「週年紀念大會」，此中「新劇」的演出尤為全會之盛事。所謂「新劇」，即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所提倡、強調戲劇必須面向群眾、反映時代人生，並承擔社會啟蒙責任的「文明戲」。<sup>23</sup>該活動發起人施伍如是說：

改良風俗，啟蒙民智，非言語可達，文字及至，我嘗共祝君作百般之討論，結果乃我找出當向新劇一路著手，然以劇員問題，於是乃由我們出校的校友與在校的學生，聯合而織成個劇團，於會的每年各紀念會或其公共性的慶典在社公演，因此，里中的村民對於現在的趨勢，已經得達到相當的認識矣。<sup>24</sup>

文中「改良風俗、啟蒙民智」的志願之情溢於言表，顯示「新劇」在珠山的推展，乃是在地知識份子有意識主導的一項文化實踐。從薛丞祝所記〈六週年大會的盛況記〉可知，該屆大會兩晚的排程中便安排了多達五齣戲劇演出，內容除引用現成劇作家的作品，如趙景深的《天鵝》（歌劇）<sup>25</sup>、新文學刊物《小說世界》所載之獨幕喜劇《誤》，<sup>26</sup>亦包含三齣由表演者自編之節目，包括獨幕舞劇《新舊交拼》、滑稽舞劇《小小畫家》與獨幕話劇《偶像》。

據載，臺下觀眾人數達六百人，歌舞參差、熱鬧非凡。其中，《新舊交拼》

<sup>23</sup> 參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179-187。

<sup>24</sup> 內容出自施伍，〈校友會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希望〉，刊於《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205。

<sup>25</sup> 該歌劇劇本為五四時期劇作家趙景深之名作（邱文藻作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作者自述該劇唱詞「過於高深」、「過於悲哀」，並說明道「大約高級小學和初級中學一年級表演此劇為適宜」，曾於在上海、無錫、紹興等地小學上演。參見趙景深《天鵝歌劇》（長沙：商務印書館，1928.10），頁iii-iv。

<sup>26</sup> 薛丞祝〈六週年大會的盛況記〉，刊於《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215-217。

一劇由鼓浪嶼英華書院的九位菲律賓僑生子演出，因其僑生子身分，人人擅長「西洋式之舞術」，其表現「活潑潑、軟綿綿之無比」；甚至「某君所表演的 Hola-Hola 舞，真大博臺下觀眾六百人同聲讚美叫絕也」。<sup>27</sup>



以上可見，該大會的表演性質並非嚴肅莊重，毋寧更近似一場鄉里人士的「同樂會」；然而，正因知識份子的介入與提倡，使此一場合得以被賦予啟蒙與教化的色彩。根據「六週年大會」所安排的節目流程，首日活動始於鳴砲集會，其後搖鈴開會，全體肅立，向總理遺像與黨國旗行三鞠躬禮，並恭讀總理遺囑，隨後由主席致開會詞，內容包含回顧一年來的會務與財政狀況外，以及正式介紹下一屆珠山小學教職員人選云云。<sup>28</sup>此一結構可謂展現了「在地知識份子群」如何在表面上以「校友」的身分為名，實則為珠山小學的制度、校務運轉等方面，提供相當的支持——面對民初官方資源供給的匱乏，他們以鄉里自治之名義，編織出一套囊括地方社區治理功能的文化實踐場域，並以此維繫在地共同體的文化生命。

回到該會的節目單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演劇、致詞、校務報告外，現場演出的形式其實更加多元，且多為自動自發參與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表演多以「歌」、「舞」為主體，例如「形意舞」、「紅族孩兒曲」、「雷夢娜曲」、「雙蝶戀花舞」、「螢火蟲歌舞」、「查理士頓舞」、「東施效顰滑稽舞」等；較為可惜的是，當時並未留下這些舞蹈實際演出形式的具體記錄。不過，其中一部劇目尤值關注——即「滑稽舞劇」《小小畫家》。該劇是中國最早的流行音樂家黎錦輝於 1927 年創作的知名兒童舞劇，全劇歌舞皆為原創，誠未採用中國民間音樂或西洋音樂素材。其內容反映 1920 年代的現實生活，諷刺封建家庭壓抑兒童個性的氛圍，主張解放天性、因材施教，頗具啟蒙意味，並且有助於國語運動的實踐與發展。<sup>29</sup>根據尤靜波《中國流行音樂簡史》所述，中國流行音樂發展的第一個濫觴期在 1927 年至 1936 年間，其基礎主要來自民間小調與地方戲曲，又

<sup>27</sup> 薛丞祝〈六週年大會的盛況記〉，刊於《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218-220。

<sup>28</sup> 薛丞祝〈六週年大會的盛況記〉，刊於《顯影（Shinning）》六週年紀念刊，頁 210。

<sup>29</sup> 李罡主編，尤靜波著《中國流行音樂簡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09），頁 24-33。

融合美國爵士樂、百老匯歌舞劇等西方流行音樂元素而成。<sup>30</sup>由此觀之，《顯影》在校友會「週年大會」中，讓小學學童演出此類音樂作品，可以說極為成功地發揮了兒童音樂之於國語運動與教育啟蒙之功能。<sup>31</sup>



除了由校友會領銜推動的「新劇」與歌舞表演之外，從《顯影》卷帙浩繁的四千多頁中，我們亦可窺見傳統戲曲在鄉里間依然具有強烈影響力。例如，《顯影》第一卷第六期中標題為〈古賢連鬧演戲〉的報導，即記錄 1929 年二月間，古賢堡各村落為慶祝佛誕而大演戲劇，謂曰「除聚賢演戲仔外，餘即概演戈甲」。<sup>32</sup>然而，此類以酬神賽佛為名而大肆鋪張的野臺戲，如傳統高甲戲、歌仔戲（又稱「臺灣戲」），則看似為大半新式知識份子所抗拒。如第六卷第二期中的一則名為〈大興戈甲〉的報導，其語氣便極為鮮明：

和風送暖，青草知春，當此溫和世象，已各鄉佛誕時期，鄉民興高采烈，不知東北同胞已在顛沛流離，更事演戲設醮，以媚神祇，歐曆鄉陰初十、十一演戈甲雙雙，十三十四賢聚、十五十六古坑，十八十九東沙雙雙，可謂一時之盛矣。<sup>33</sup>

無論是標題中的「大興」，抑或文中將「興高采烈」對比「顛沛流離」的反諷語氣，乃至「事演戲」、「媚神祇」等字眼，其批判與譏諷之意皆顯而易見。然而，儘管《顯影》對於「大事演戲」、「媚飾神祇」等迷信性消費提出批評，但對於傳統曲藝如「南管」的保存與傳習，地方知識份子則並未一味否定。

早在第一卷第四期（1929 年）中，即已有記錄指出校友會添購傳統樂器，如北絃、桐蕭、月琴等數件。<sup>34</sup>至第八卷第五期，更記載 1933 年 6 月由校友會

<sup>30</sup> 李罡主編，尤靜波著《中國流行音樂簡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09），頁 1。

<sup>31</sup> 此外，校友會第十一週年所演出的〈桃花江〉，同樣為黎錦輝的創作，亦可視為上述趨勢的延續。《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第六期，頁 2613；李罡主編，尤靜波著《中國流行音樂簡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09），頁 10。

<sup>32</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六期，頁 331-332。

<sup>33</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二期，頁 1278-1279。

<sup>34</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四期，頁 199。

正式發起成立「南調研究社」，除學員外，「其各攜講義在傍參加者，不只十餘人」，並聘請古寧頭曲師「李烏」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指導，<sup>35</sup>其學習曲目包含〈心頭傷悲〉、〈因為荔枝〉、〈不良心意〉、〈啟公婆〉、〈聽見機房〉、〈我為他〉、〈心頭歡喜〉、〈一路安然〉、〈孫不肖〉、〈赤壁上〉、〈早起日上〉、〈聽見杜鵑〉、〈出漢關〉、〈幸逢元宵〉、〈誰人親像〉、〈記得當初〉、〈簷前〉，共計十七首。其後載云因校友會經費有限，僅能短期指導二月，但學員們每晚仍「練習不輟」，盼有朝一日能再邀請曲師繼續進階教習，顯示其對傳統藝術學習之堅持與熱忱。<sup>36</sup>

在《顯影》中，日治前的南調研究社發展如前所述，已呈現相當組織化的輪廓。而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薛福緣在〈八年滄桑錄〉中的回憶，於日軍佔領期間——具體為 1939 年中秋佳節——南調研究社仍持續舉辦公開演出。該次演出特別邀請日後擔任該社指導曲師的邱九如先生來到珠山協助演奏，據稱當晚參與觀賞者多達四五百人，場面盛況空前。<sup>37</sup>由此可見，即便在那段滄桑壓抑的歲月中，南調研究社依然扮演著凝聚社群、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它不僅維繫了地方文化的延續，也成為珠山村民在動盪時期中得以維持集體情感與生活節奏的一項關鍵文化實體。

「重光後」，該社團繼續由里中人士鼓吹並贊助，弦歌不輟，並定期於元宵等重要節日演出。<sup>38</sup>第十七卷第六期（1947 年）刊載標題「銅琶鐵板一夕絃歌」，南調社員初試啼聲，評定結論成績優美」，記該年二月下旬：

本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珠山南調研究社，假閱報社舉行社員試驗，是日聘請吾金南調大師張周元及名蕭許廷年二君，暨姻親桂枝君，前來評定優劣，即席由邱君指導抱琵，許君吹簫，張君彈三絃，桂枝推板，由連川君先行執板，起〈金井梧桐〉。指法分明，座中均稱四絕。繼由崇武先生慢頭接唱〈輾轉〉，一曲告終，再由永權接唱〈前日事〉、丞助唱〈愁人怨〉、

<sup>35</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八卷第五期，頁 1904。

<sup>36</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八卷第六期，頁 1940。

<sup>37</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六卷第六期，頁 3206-3207。

<sup>38</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第四期，頁 3283。

永彬〈鼓返二更〉，思明即唱〈赤壁上〉。最後由顏紫峯先生唱〈你停查〉及〈遙望〉、〈拜告將軍〉戲齣，始休息片刻，繼唱四孔管，及福馬，至十二時正，始行散會。各位評判員對於此次成績，均認為滿意，謂以此短短數月之訓練，有此聲腔韻緻，殊難能可貴云。<sup>39</sup>



該篇報導詳實記錄了當時社團運作與測驗實況，說明南調研究社在歷經戰亂變局之後，得以迅速恢復活動，並在短短數月內培養新社員登臺試唱，表現出「聲腔韻緻，殊難能可貴」之成果，足見其在社群文化延續與地方藝能教育上，依然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與象徵意義，並展現出「重光後」鄉民對於文化傳統復振的熱情與組織能力。

### 三、實用書寫方式的引入：白話字學院

另一項促使鄉里人士投注熱忱並積極投入學習的知識實踐，則是由珠山地區長老薛福緣所創辦的「白話字學院」，旨在促進僑鄉與僑居地之間的書信往來。根據《顯影》第八卷第五期（1933年）記載，薛福緣早在十數年前便自海外學成白話字，歸鄉後獨力創辦「男女白話字義塾」一所，短短數月內即使「全鄉之男女識此種文字者幾達半數」，然由於後續推廣漸趨停滯，福緣遂於該年再度發辦「白話字學院」。<sup>40</sup>第八卷第六期續載此次開課詳情，說明再度由薛福緣擔綱主要教授，及薛芳耀協助授課，學員凡二十三名。課程教材由福緣親自編寫〈白話字小叢書〉，<sup>41</sup>並由校友會負責印行。該記載指出，開課以來學員學習成效甚佳，短短兩個月即能獨立閱讀，於是社內另擬籌措進一步再翻譯若干小說及幾部衛生常識相關書籍，供鄉中女性於家中餘暇時閱讀。<sup>42</sup>

總結而言，珠山在民初所展現出的文教風氣與文藝實踐，不僅限於校友會

<sup>39</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第六期，頁3327。

<sup>40</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八卷第五期，頁1905。

<sup>41</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九卷第四期，頁2092。

<sup>42</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八卷第六期，頁1951-1952。

新劇演出的推動，更深刻體現在對傳統藝術與語文教育的延續與創新。從南調研究社的成立與復振，我們得見傳統南音／南調在地方社群中不僅未被棄置，反而因知識份子的支持與制度化運作，得以在日佔前、日佔時期與重光後的多重情境中持續運轉，成為凝聚村落情感與文化記憶的核心活動。而白話字學院的設立，則進一步說明珠山社群並不僅止於保存舊文化，更主動引介實用書寫工具，以促進未接受過教育者對外溝通與閱讀能力的提升。總此，南調與白話字兩者，一為音聲傳統的保存，一為書寫技術的革新，兩者皆構築出珠山在文化實踐上表達「傳統」與「現代」的平行共構與雙向交流。而在官方教育資源有限的情境下，珠山所築出的文教與文藝活動，正是一種向內維繫社群文化、向外回應現代知識要求的具體實踐；這些社團活動往往由珠山知識份子發起、校友會組織運作，再透過《顯影》作為記錄與散播的平台，是以鞏固了村內的文化連帶，更業已形塑出珠山作為「文化自治實驗場」的地特質。

## 第二節 1928-1932：白話文學的嘗試與摸索

《顯影》中的「文藝作品」大致涵蓋白話散文、新詩、小說與古典詩等類型；而新聞、佈告與論著性文字等應用文體，則多呈現源自晚清梁啟超主張「新民體」以降，那種文白夾雜的散文樣態。縱觀《顯影》的文藝欄僅活躍於 1928 至 1936 年，這「日佔前」的短短九年間，但若將此區間置入中國現代白話文學的整體發展史中觀之，便不難發現這「九年」正不偏不倚地嵌入了中國學界所界定的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黃金期。此一「第二個十年」的重要性，在於它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催生的「救世」與「啟蒙」理想，同時也標誌著文學日趨政治化的轉折點——文學無可避免地走向「左」與「右」的二元對峙。錢理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總結道：

這個時期顯著的特徵有三：一是「五四」所開啟的有相對思想自由的氣氛消失了，文學主潮隨著整個社會的變革而變得空前的政治化；二世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初步的運用，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此後二、三十年間文壇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學發展的同

時，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及其他多種傾向文學彼此頡頏互競，共同豐富著三〇年代的文學創作。<sup>43</sup>

這段評述不僅為我們補白《顯影》白話文學實踐所處的歷史語境，也提供了一條思考其內在文學傾向的線索。

然而，筆者認為，《顯影》中的白話實踐仍再可細分為兩個階段：其一，是模仿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中所倡導之「個人主義張揚」的傾向，筆者稱之為 1928 至 1932 年間的「白話文學的嘗試與摸索」時期（以下簡稱「白話嘗試期」）；其二，則是自 1932 年起經歷《顯影》轟轟烈烈的「淡、寒論戰」後，撰稿者轉而走向群體書寫與政治關懷的「文藝大眾化」時期（以下簡稱「大眾文藝期」）。而這段時期，恰巧可接榫至中國文壇「左翼文學發展」與「文學政治化」的時代走向。

## 一、離散情境中的詩歌書寫：新、舊詩的並存與過渡

本小節擬從《顯影》「白話嘗試期」中所刊載的新、舊詩，考察其「新舊交雜」的文體風貌，及其如何書寫金門文學起點的離散情境。事實上，根據筆者通盤的考察，《顯影》中的白話新詩在「日佔前」的《顯影》文藝欄，稿件數量委實不少，而有關古典詩的刊載，在「日佔前」則可看作「偶一為之」的刊登；又，「重光後」十九卷第六期再次出現的文藝欄，已不是實質意義上的副刊，而似乎僅是為了刊登唱酬詩歌的版面。<sup>44</sup>

---

<sup>43</sup> 參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207。

<sup>44</sup> 且見《顯影》第十九卷第六期（1948.05）對於該欄的介紹：「洪縣長南都先生，行為瀟灑，有名士風，既擅長西洋音樂，亦精於國學詩律，辭職旋歸前後，唾吐珠玉，與僚友及地方人士，吟詠頗多，資篇所載乃與陳書長耀彬先生暨縣府諸僚屬唱和酬答者。」該期該欄所登詩作，輯有洪文舉〈臨別有感〉、陳士新〈南都同志辭金門縣長時附贈一律〉、陳耀彬〈送南都縣長榮旋故鄉〉等，為送別辭任的金門縣長洪文舉。此之後《顯影》也暫無文藝欄出現，直到第二十卷四期（1948.08）會出現一期「詩葉」欄，刊登〈次韻奉和策勳林先生結婚帳詞〉、〈策勳先生與慧貞女

話說從頭，在 1928 年 11 月《顯影》第一卷第二期的出刊，收錄了新詩兩首、雜文一篇，並首次開設專為珠山小學學生創作而設的「雛燕」欄，共刊十一篇作品，為僑刊《顯影》之白話文學書寫揭開序幕。其中一首署名「惕齋」的詩作〈旅心〉可作代表：<sup>45</sup>

幹這似歡猶怨的生涯，／世上萬事渺茫，／如此一來一往，／終究是落了空。／什麼才那家園風味／今兒海外孤棲！／對月亮暗灑傷心淚，／和流水爭吟浪漫詩；／有時願效那英雄步驟，／無如這懦弱心靈卻猶打振不起。／原來時過情會遷！／忘返祇是流連！／明兒起來，／仍將那牛軛情願背上肩。／神憔悴，血虧消／未必就／換點銀兩攜見我爹娘。／幹這似歡猶怨的生涯，／世上萬事渺茫，／如此一來一往，／終究是落了空。<sup>46</sup>

詩題「旅心」所指，正是金門出洋客旅外思鄉的內心寫照，也深刻描繪了僑鄉離散情境中無奈與無助的人生，乃至於世事無常。從語言使用來看，詩中明顯模仿京派白話語感（如「今兒」、「明兒」），再加上標點符號與「落了空」的「了」字句運用，可見其作為白話語法的初試啼聲。然而，這種有意為之的語氣斧鑿與標點節奏，何嘗不削弱了詩歌語言所應講究的凝鍊與美感，再說到句中「對月亮暗灑傷心淚，／和流水爭吟浪漫詩」之對偶工整、意象對仗，則明顯源自傳統詩歌的修辭邏輯；就連「月亮」、「流水」亦因襲自傳統詩歌中常見的象徵性符碼，因其分別承載了「永恆／短暫」與「流逝／不息」等多重寓意。

---

士結婚之慶》、以及二十卷五期刊登的林長椿〈和帳詞／有序〉等詩歌，皆酬唱之作。值得補充的是，新婚的林策勳旅居宿霧，除了是時任菲律賓金門人的鄉團會館「菲律賓南島金門同鄉會」的首任會長，亦曾任戰後臺灣發行的跨國漢詩刊物《中華詩苑》的副社長。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九卷第六期，頁 3571；第二十卷第五期，頁 3647-3666。

《顯影》二十卷六期，再度出現的「詩壇」刊登了署名「越南寓公陳重見」的〈追悼王精英烈士〉，並說明「敬請海內外大雅斧政（正）並乞賜和」。王精英是曾於八年抗戰期間參與金門敵後抗日活動，爾後殉死的金門烈士，此處雖僅是花邊欄位，但在此發出了「賜和」的訊息，則頗有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刊的唱和特色，但也並無後話。

<sup>45</sup> 有關「惕齋」（薛永乾）的人物生平及介紹，詳見本文第二章。

<sup>46</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頁 29-30。

正如李怡指出，中國現代新詩在「嘗試」的階段，尚難以脫離傳統詩歌符碼的比喻語言結構，自然而然地運用了「近取譬」的詩歌創作思維，這種思維雖然內蘊了中國詩歌的歷史傳承性，卻消融了「現代白話」文學中創作主體性之鋒芒。<sup>47</sup>整體而言，《顯影》「白話嘗試期」的新詩創作者於「白話詩」書寫上的初階探索，無論是在情感傳達、語言組織，還是意象選用上，多半不離此貌。其中內容除以敍述「出洋客」漂泊無依、思念家鄉之感為主，另一大部分之詩作，旨在描繪戀愛的心境，或憑景抒情，或有感而發；更有甚者，則結合「戀曲」與「鄉愁」以「深刻化」其個人情感，如署名漂泊所作之〈漂泊者〉：

萬能的上帝呀！／我這渺小的生命，／已如那秋後之花了。／哦！我將死的遺言，／現在不妨對你說明：／假若我死後，愛人渡來，／我的埋骨處，切莫使他認識，／免得，免得損傷了她嫩弱的深心。<sup>48</sup>

詩中以「漂泊者」為視角，自喻其生命已如「秋後之花」，並以祈使語氣對「上帝」發出告白：但願愛人在他死後，無可得其埋骨之處，以免觸景傷情。儘管語言略顯粗糙，詩作尚具敍事與韻律性，並借用西方萬能全知的「上帝」來取代傳統中國的「上蒼」，也運用帶有懺情意味的「告解式」語氣，營造一段虛構情景，進而強化詩末「免得損傷了她嫩弱的深心」所承載的抒情密度。

雖曰《顯影》本質上是一份自許「啟蒙」、試圖「現代化」的刊物，但透過對「白話嘗試期」諸多新詩的整理與考察，<sup>49</sup>筆者發現當中的創作者，多半仍舊沿襲傳

<sup>47</sup> 詳參李怡，《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10），頁38-47。

<sup>48</sup> 《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六期，頁319。

<sup>49</sup> 如冬日〈寂寞〉，《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二期，頁31-32；TC〈自然底微笑〉，第一卷第三期，頁100；英樵〈愛的屑話〉，第一卷第四期，頁165-167；章五〈春樹〉，第一卷第四期，頁168；漂泊〈孤雁〉，第一卷第五期，頁249-250；冬日〈別故鄉〉，第一卷第五期，頁251-252；長冰〈步後有感〉，第三卷第三期，頁612-615；長冰〈春到了〉，第三卷第五期，頁719-720；長冰〈哀幼弟〉，第三卷第五期，頁723-726；似琳〈憶〉，第四卷第一期，頁786；綠影〈你這嬌豔可愛的薔薇〉，第四卷第二期，頁818-820；淡菊〈征鴻倦了〉，第四卷第三期，頁865-867；長冰〈亂塚〉，第四卷第五期，頁921-924；似琳〈為的是怎麼〉，第四卷第六期，頁975-976；心〈無題〉，第四卷第六期，頁976-978；冰岩〈生命〉，第五卷第一期，頁1004-1006；虹〈月下孤憶〉，第五卷第一期，頁1011-1016；冰〈眠影〉，第五卷第四期，頁1109-1111；康陶〈曦晨〉，

統詩歌的語言節奏與抒情方式——如發表於《顯影》第四卷第一期（1931.02），淡菊（薛前璧）所發表的〈給侯君長樂〉：

貫日向虹淡了顏色，／吳市蕭聲嗚咽不息，嗟乎！侯君：／牛鬼人生，何必患得失！／征人泛舟南國去，／寒了羅衾，／孤了綉枕，／歸矣！侯君：／毋使伊人長咿嚶！／聞道故鄉已披了美的都市之衣，／可是牠自然的微笑曾否如昔時？／將歸未歸的侯君呀！／請在故土，重臨的時候為我告之！

50

全詩主題反映出，當時下南洋的洋客並非個個都能功成名就，不過詩中諸如「吳市蕭聲」、「嗟乎」、「泛舟」、「羅衾」、「綉枕」、「歸矣」、「伊人」、「咿嚶」、「為我告之」等造語，無不承襲自中國傳統古典詩歌的遺緒。根據該詩最末的一段附註可知，其乃作於 1930 年 8 月，為淡菊為紀念前一年前南下星洲的同鄉「侯君長樂」，兜轉職場惜未成就，而重歸故里的送行詩作；此誠反映出僑鄉離散情境中「六死三留一回頭」的情況。<sup>51</sup>

這種新、舊詩在語言上的承襲與接衍，《顯影》中偶然亦可瞥見古典詩歌的驚鴻一影。此誠如李歐梵所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雖然一方面自覺地把自己從傳統中分殊開來，口口聲聲要支持寫「新文學」，但當他們要表現內心幽微、纖細的情感時，卻又重回舊詩的懷抱——中國的魯迅若是，<sup>52</sup>同一時期臺灣的賴和亦若是。考察《顯影》中首次刊登古典詩作，在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影蕉」的〈秋風憶故鄉〉：「西風瑟瑟捲沙塵，久別家鄉作嫁人。故里雲山應

---

第五卷第六期，頁 1197-1200；海棠〈悲思〉，第五卷第五期，頁 1205-1206；琳〈重逢之後〉，第六卷第一期，頁 1244-1246。

<sup>50</sup> 前璧〈給侯君長樂〉，《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一期，頁 787-788；原載於《南洋商報》，1930.09.01，第二十版。

<sup>51</sup> 該詩附錄曰：「以上的一首臭詩，作于一九三〇八、廿九夜，曾在敝報——南洋商報——發表，為了顯影的編者跟我要稿件，所以重刊于此，聊以塞責。詩中的侯君長樂，前曾執教於我社小學，他去年跑到星洲來，因為找不到相當的職業，乃賦歸去，小子特作歪詩，為其送行。」詳參《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一期，頁 788。

<sup>52</sup> 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172 期（2019.04），頁 32-42。

無恙，庭花院樹綠如春。」詩中「憶故鄉」的場景，借用傳統邊塞詩中的詩歌符碼如「西風」與「捲沙塵」來烘托離情氤氳，然若將其放回出洋客離散與思鄉的歷史脈絡中閱讀，這樣的書寫語調反倒殊堪翫味。



同卷期中另一則題為〈洋客苦〉的詩作，署名「照」，則更為寫實地映照了金門出洋客的離散情境：「別鄉離井最愁腸。野店荒村當賤庸。鏡破梅妝辛苦甚。隴頭雲海只為窮。」<sup>53</sup>該詩語調沉鬱，慨嘆其夫妻離散之苦，與離鄉背井之辛，惟所換取者，終究只是一場「窮」。此外，「照」的創作及其哀傷，可另見於第一卷第四期題為〈鼓嶼感懷〉之作：「高樓櫛比聳天空。安樂窩藏幾富翁。我是不勝漂泊感。形骸放蕩夕陽中。」<sup>54</sup>鼓浪嶼作為廈門文化重鎮，以其素享書院、中小學林立之勝，遂為許多金門人求學成長之地，詩人筆下「高樓櫛比」、「安樂窩藏幾富翁」的都市現代景象，與自身「漂泊」、「放蕩」的孤影對照鮮明，則愈顯其情感之疏離與蒼涼。

相較之下，第四卷第三期所刊出淡菊之歌行體〈憶故鄉〉，則轉以較為溫暖的墨色來呈示其鄉愁：

皎皎月光涼，淒淒思故鄉。故鄉何所有，馥郁山花香。

復有林中女，嬌嬈動人腸。珠峰看旭日，龜山瞻夕陽。

西池戲釣垂，東宮入球場。場中相逐角，健兒為逞強。

勝者陶以樂，負者神且傷。鬪球雖少道，人間之真相。<sup>55</sup>

詩中既憶寫兒時的「西池戲釣」、「東宮球場」，也刻畫「場中相逐角，健兒為逞強」的競技情境；此詩尤為引人注目之處，在於詩人以古典詩體將現代事物「籃球」入詩，不僅展現珠山聚落的體育風氣，更可視為對晚清黃遵憲以降「詩界革命」

<sup>53</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三期，頁 104。

<sup>54</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四期，頁 164。

<sup>55</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三期，頁 867。

的一種回應與實踐。此外，詩末採人間寬厚的視角來收束競技勝負，雖書寫運動場上令人遙念的童年，卻不僅作喟嘆觀，乃更昇華為一種關於成長，關於人生的追蹤與尋索——那回望中的勝者之陶樂、負者之神傷，既是珍貴的童年回憶，也是使人得以重新邁步向前的情致。淡菊在此詩中展現的記憶之深刻與情感之精細，除了顯示其古典詩法上的技藝嫾熟、語言凝鍊，更構築了一種跨越舊典與新境的抒情形式——對比《顯影》「白話嘗試期」所刊之白話詩作，此處古典詩反倒顯得語言節制，敍事別具情感張力，又準確而凝鍊地傳達了作者原初的心緒。

筆者認為，古典詩不僅代表一種對傳統抒情語式的承襲，更為僑鄉離散情境提供了渾然天成的表達媒介，其所引發的情感昇華與文化迴響，未嘗亞於白話詩歌的「現代化」實驗。然而，綜合以上對《顯影》新、舊詩並存與過渡之考察，無不在在闡釋了《顯影》詩歌所書寫離散情境——「鄉愁」不僅是金門現代文學起點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體裁，更毋寧可作為金門現代文學起點，多數作者原初的創作動機。

## 二、戀曲與鄉愁的交織：從白話散文與小說的嘗試談起

無論是「戀曲」還是「鄉愁」，抑或揉合兩者的文學書寫，在詩歌之外，此二主題同樣廣見於《顯影》的散文與小說；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散文、小說作品，事實上在《顯影》「白話嘗試期」（1928-1932）中篇數並不算少，尤其在篇幅上甚至多半超越了「文藝大眾期」。這些作品的核心出發點，導源於五四話語中「啟蒙」、「打倒封建」的中心理念，也切合著 1927-1929 年中國作家們提倡「革命文學」的時代背景。<sup>56</sup>然而，那座在他們心中腐朽的體制，卻儼然一塊巨大沈重的歷史沉疴，不是那麼容易去「打倒」的——於是乎，頹喪、失意、落魄種種情緒陡生。在第一卷第四期中，署名「呆」的一篇雜文〈留影——從新年而學校〉，即透過諺語式的書寫，將紊亂而難以捉摸的「喪氣」化為語言精鍊不足、焦躁有餘，

<sup>56</sup> 詳參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78-108。

從而滿溢「私語」與「自我意識」的白話文：



年年在家守歲，這是具有家族主義者所脫不了的觀念。

光陰是怎樣駕著無聲的飛機，偷偷地從人們之談話遊戲……之中而略過，如今從這守了次昏然的歲首，移到這人面生疏的村莊裡也過了次！噩噩然三歲過了！喂！我的處世就也竟要不留痕跡地度過了春光嗎？

……可是每在無聊當中，理智制勝不過情感，還時時迫我到多愁多慮的城裡去泛起已往的事故，無論是笑，是哭，是遊戲，是讀書，是朋友……在這無力的心田模糊得時隱時現——時隱！時現！可是神經受刺激時，又叫我念念不忘！於是全副的精神付在茫茫將來的手中，而羞澀不由引起這粗情緒，要時笑時哭！在什麼有意味的感官都把棄我而空茫無色，時來打趣了我，奚落到那憂鬱土窟而掙扎不過地過活，真真地對不住了時光，對於……都在無形中要盡量消滅……。

從前過著學校生活的時期，有失意的同學，時起悲觀而留乎消極，我一些都覺不著悲觀是什麼，反要暗暗地嘲笑著，現在悲觀先生和我很要好而且介紹到消極之宮，如今只好去開始嘗那「精神麻木」、「神經錯亂」、「知覺遲鈍」的味道。

小腦時常要不斷的去惆悵，大腦判斷著「現在感覺的痛是苦」，而羨慕於過去，那所謂快樂和趣味的生活，將來又何嘗不是覺著現在是快樂，意外飛來和思想是矛盾的心聲；我相信矛盾也莫不是尋味之真，啊！過去的！「過去的是夢裡的真，未來的就是歸宿之影」，「現在」的就沒有存生之價值，當真是沒有。當你在說「現在」，而「現在」已在你的話中過去了，簡直就是「未來」罷！

喂！這刺腸的心聲，宣傳到心靈上去運動，那不開管的自流水同情地傾瀉，會傾瀉還幸得，真的苦惱會把那哭的淚泉變成哭的口涎，如今呈演黑影。便是未來明亮的顯影，這照像機開始攝成這半真的相片，於是「留影」在

我的心齋裡要把他印到《顯影》去補空白就是啦！



十八，一，十七，草於恐怖房中<sup>57</sup>

這篇文章刊登於《顯影》首卷，宛如一紙對「新社會」與「新文學」寄予厚望的宣言。題曰〈留影——從新年而學校〉，所謂的「留影」，從文末明顯可知便是要將其滿腹的牢騷獻祭於《顯影》。第三段則刻畫出作者在求學生涯對「進入社會」甚至「改造社會」的複雜情感，是「全副的精神付在茫茫將來的手中，而羞澀不由引起這粗情緒，要時笑時哭」的。第五段則再度回首「過去」身為學生時期的「快樂和趣味」，一面惋棄「現在」的不堪，一面又以極富思考性的口吻辯證道「當你在說『現在』，而『現在』已在你的話中過去了，簡直就是『未來』罷！」此番感言，不僅一掃全文頹唐而苦悶之氣焰，又承接了文末之誓言：「要將刺腸的心聲宣傳到心靈上去運動」。此外，文中提及要將「真的苦惱」變成「傾瀉的淚泉」，隱隱暗示著一份「將內心的沮喪化作文學的力量」之應許。這篇看似青澀卻充滿入世性的散文，好似模仿自 1922 年魯迅著名的〈《吶喊》自序〉，也有如賴和於 1928 年寫下的散文〈前進〉：在那個以苦悶作為文學常態性象徵的年代，文學不單單停留於苦悶，卻隱隱然鼓勵人心，使人萌發興感出面對「生」的勇氣。本文意在傳達，雖僅能勉強棲居於「恐怖房」中，然文學創作始終指向未來，也指向一個始終摸不清、見不著的命運，亦指向那份每個知識份子不斷在心底「顯影」的人間性。

透過上文，我們可以窺見地方知識份子，是如何開始有意識地想要拆散加諸於他們生活中的鐵屋子，並渴望一個更加可期待的社會與未來。值得注意的是，全文開頭明確地對「家庭主義」的批判，及其帶有「私語」意味的行文，印證了其中「個人主義」的發揚。此處筆者所謂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乃至於「主觀主義」(subjectivism)，來自歐洲布拉格學派漢學巨擘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對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學的概括：普氏於〈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指出，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現代文學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心理結構，

<sup>57</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四期，頁 176-183。

其主要特徵在創作者對個人內在生命的揭露——一種近乎告白式的書寫風格。他將此精神複合體歸結為「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亦即：現代文學的創作實踐，脫離了傳統文學中所謂「載道」或「文以明道」等目的，更激進地主張「個人」，乃至於帶領整個社會「從封建傳統中解放出來」，是以，文學創作的本質，乃趨近於重建一種自我言說與揭發內心深層經驗的方式。

當此，藝術作品的核心價值，被轉移至作者個人情感、夢境、幻想乃至心理鬱結的抒發與轉化，其目的不在於反映客觀現實，而在於表現主觀經驗——尤其是那些在現實生活中因倫理與傳統壓抑而無法充分發聲的內在面向，如孤獨、羞恥、恐懼、厭世等「幽暗我」。普氏特別強調，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個體的悲劇意識」，即為一種對生命中不堪的凝視，或是某種經過轉化的「自我感傷」詩學；此一現象，又與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化密不可分。亦即，這些文學趨勢在在反映了個體對傳統宗法秩序的叛逃、舊社會對個人命運桎梏的掙離，並順勢重啟了所謂的「命運自決性」——此乃中國現代社會在精神結構上自我革新的重要象徵之一。普氏指出，在過去以儒釋道主宰的社會中，人的命運多被視為天道輪迴、因果報應的延續，而非個人選擇的結果。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人不為自己的命運負責」，而是以「前定之命」作為人生的合理解釋：佛教將今生貧困歸結於前世業障；儒教則以忠孝倫理置於個體願望之上，將家庭與社會的「整體性」視為高於個體的目的；道教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則主張消解其個體性，與儒釋宛若一轍。這些傳統思想，自古以來無不間斷地箝制著個體對自身命運、自身價值的感知與追問。

但當這些思想束縛逐漸鬆動，一種新的個體意識便開始浮現，普氏將此現象稱為「對存在之獨一性的感受」（the feeling of the singularity of existence）——亦即意識到某種「今生今世」的存在體驗。也因此，藝術作品不再尋求宗教性慰藉或任何倫理教化，而是試圖表現書寫姿態之真實，抵達自我意識的深層：如探索自己為何感到痛苦、憂鬱或孤單。普氏指出，這樣的轉化經常與「悲劇性格」交織，這一點可驗證現代文學對傳統形式的激進化悖離：傳統詩文往往缺乏「存有的悲劇」（the tragedy of existence），而這正是現代文學所特有的情感基

模 (feeling schema) 。

然而，自我書寫並非一味逕直導向逃避現實的情緒洞口。他強調，這種強化主觀意識與個體反省的創作傾向，必須與一種面對現實的誠實態度結合，亦即一種「不戴傳統眼鏡的直視生之存在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look at oneself and at the facts of existence without the spectacles of tradition")。這種態度的出現，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不僅是一場「寫作風格的革新」，更是一場精神結構的革命——是個人自我發現與解放的實驗室，也是空前地對整個社會制度與倫理機制，所提出的總體性質疑。

總結來說，普氏筆下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不僅是一種創作風格上的抉擇，而是中國現代文學如何作為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變化徵候、一種對舊有秩序的顛覆性寫作。他揭示的，不僅是作品內容的「私密化」、「內在化」，更是文學如何承擔起讓「自我」得以被書寫、被凝視、甚至被療癒的任務。而這樣的觀點與框架，恰恰回應了前引〈留影——從新年而學校〉裡那些喃喃私語：對家庭主義的質疑、對自我命運的探問、對生存之苦的坦率表達，以及五四以降「現代心靈結構」的折射與轉化。<sup>58</sup>

在普氏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一文中，首先便言及郭沫若所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於 1922 年），及其學習歐洲浪漫主義時期反映個人主義、悲劇色彩與厭世情緒等叛逆精神的作品：如其小說《葉羅提之墓》與自傳作品《少年時代》。普氏更提出：「事實上，他的作品往往只是未經加工的素材，而不是完成了的藝術作品，只是個人經歷的紀錄和說明，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故事或小說。作品集《橄欖》就有這樣的例子。」<sup>59</sup>筆者認為，郭沫若受到浪漫主義思潮所影響的個人主義新文學作品，與《顯影》「白話嘗試期」中的新詩、散文、小說甚至是「譯作」，其內涵與實踐若合符契，此處可舉《顯影》第二卷第

<sup>58</sup> 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

<sup>59</sup> 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著，郭建玲譯，李歐梵編《抒情與史詩——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12），頁 4-5

六期中署名「寒波」所譯的，由蘇格蘭學者（James Sime, 1843-1895）原著的〈歌德的生活與創作〉（*Life of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888）為例。<sup>60</sup>可惜該文終未譯罄，該卷期後更無端停載（即使依然標註斗大二字：待續）然而，縱使未盡全數譯介之功，對這位歐洲文學浪漫主義時期享譽盛名的文豪之試圖引介，依然說明了譯者對該時代特徵之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推崇。

在第三卷第五期所刊登之散文，署名寒波〈一封未寄的信〉之散文中，<sup>61</sup>文末即徵引〈維特寄與夏綠蒂詩二首〉：「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的至聖至神，／啊！怎麼從此中會有慘痛飛進？」歌德的詩，顯然代表著一種男女至情而至聖的觀點——在誠實無欺的愛情裡，「人性之神聖」與「悲劇感」連番迭衍。該文前半部分描繪作者求學於廈時，思念故鄉的「月麗女士」，向其傾訴其衷曲；然而，全文描寫的心境，並非指向戀愛的個人情慾，更多的感受抒發，更像是在面對一種牢不可破的社會桎梏：

月麗女士：

緊張的風聲已沈默下去，然而我的心靈，還是熱火般地燃燒著。我們未曾聚過與會過，通信確是唐突的一回事，明知而故犯的我，是對你如何地不住，可是你的溫柔，你的慈愛，也許能以相當的原諒來對付，不致使我過於失望，而永遠在這闇淡的途中過著乏味的生活。……我不敢去痛恨於任何人家，惟有詛咒社會如是的環境。禮教如是的威嚴，我始終是找不到一點兒的光明，……。

假中從校回來，滿腹盼望能得你的同情，豈一踏進渡頭，……，竟爾幻成

---

<sup>60</sup> James Sime 出身於蘇格蘭，精通德國文學，曾留學海德堡與柏林。他的《*Life of Johann Wolfgang Goethe*》（1888）屬「Great Writers Series」，詳細探討歌德的生平、作品及其文化影響，為對不諳德國文化的英語讀者提供深刻見解。詳參《顯影（Shinning）》第二卷第六期，頁 513-517。

<sup>61</sup> 該文前半部分刊載於《顯影》新村卷。詳參《顯影（Shinning）》新村卷，頁 62-64。

泡影，然而我還不能從此灰心，滿懷還在實足的希望，……。<sup>62</sup>

無情冷酷的光陰，支配了我們的別離與面晤……，現在竟是我返故鄉的時期，故鄉的景象，雖然帶著慈母般可愛的風味，我都也滿意知足，但是追憶往事，我的童男心靈，剎那間竟塞滿死一般的沉痛，我深知自己是怎樣不幸的人喲！

夜間人靜的時候，多給我加倍愁思，展眼細望，四方的景物，都是佈滿著黑暗，遠近沒有一點星光，……不論宇宙間任何美滿物質也不能來恢復我童年時代的常態。唉！人類給我怎麼趣興呢？社會給我怎麼利益呢？禮教與名譽是一種欺騙弱者的禮物。然而，我已知道而沒有勇氣，唉！……。

過去的平淡空氣，雖然沒有表露我已多者失望，但是我總感著：「如果徹地專誠，也許不致沒有光明的出路」，不料最近傳來的消息，已使我加倍的急著，使我失興到無立足於浯江的可能，唉，上人家之當，如果到了最後，原是一般地下去，任他美麗的浯江，秀景的浯江，恐怕我也要和他暫別，到了別開天地的時候，到了我的目的地的時候，才有使我可戀、可愛的，這般情景，任我縱騎著快馬，恐怕也無處追逐以前的甜夢了。<sup>63</sup>

筆者前述已藉普氏觀點指出，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文學心眼，便是將一切的社會現象與個人在社會中所受過的苦痛，化作自艾自憐的囁語。此處所引〈一封未寄的信〉，誠可見其一面控訴故鄉社會環境的僵固，又一面不斷自我剖析與揭露身在其中的苦惱。有趣的是，作者索性便把這些控訴與苦惱，混合戀愛者「思慕」與「易感」的心境，以「情書」的方式呈現，使其文先是能「緣情」而後「言志」——此誠恰為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文學內蘊。

除了「戀愛」之主題，筆者認為，引文中另一方面也展現出「鄉愁」——此處

<sup>62</sup> 《顯影 (Shinning)》新村卷，頁 62-64。

<sup>63</sup> 寒波，〈一封未寄的信（續新村第三期）〉，收錄於《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五期，頁 721-723。

之「鄉愁」並非單純思念故鄉之意旨，而是一種當個人思想與社會環境格格不入時，所產生的進退失據、躊躇不意之感。換言之，作為文學主題的「鄉愁」，往往曖昧難解，因為知識份子眺望故鄉的眼光，當中既夾雜故土風物的認同，也又不免興生躊躇、無力之傷。如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家周金波的小說〈鄉愁〉，雖題為「鄉愁」，但「愁」的不是「回不去的故鄉」，「愁」的是臺灣人在皇民化運動中經歷的文化割裂感——一種身在故鄉，心卻流浪的無以名狀、無可奈何。總言《顯影》「白話嘗試期」的散文，其主題泰半書寫戀愛、鄉愁，抑或合二主題為一，比如鶴〈故鄉的回憶〉、<sup>64</sup>寒波〈破曉的夢〉、<sup>65</sup>似琳〈明天〉、<sup>66</sup>三S〈歸家〉、<sup>67</sup>似琳〈我們的夢〉、<sup>68</sup>寒波〈淚夢〉、<sup>69</sup>大森〈心靈上一條舊傷痕〉、<sup>70</sup>落伍學者〈倦旅歸次：這張無聊的日記——獻給瓊妹〉等等。<sup>71</sup>

《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小說作品，除了延伸散文與新詩在主題上結合「戀愛」與「鄉愁」的敍事模式，因文體容納虛構所故，作者群們的書寫更加傾向「戲劇化」與「批判化」。重返五四新文學在「第一個十年」的小說創作發展史：隨著 1918 年《新青年》刊載「易卜生專號」，《玩偶家庭》等戲劇作品受到引介、推崇，而小說創作的五四新青年們隨之起舞，在「個人解放」的鬧烘烘裡，「人生問題」躍上舞

---

<sup>64</sup> 該文描述自己在故鄉陷入愛情，對方卻迫於家庭威權，被許配給富有的南洋華僑子弟的故事。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五期，頁 240-249。

<sup>65</sup> 該文刻畫「破曉前的一場夢」，作者夢見自己回到異國求學時期，坐在學校清潔整齊，充滿現代化氣氛的食堂裡，來自世界各國的言語充斥耳際。飯間談話時，友人問起「祖國的事情」，作憤憤然道：「詛咒、憤恨、黑暗，沒有陽光……」，然後夢醒。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一期，頁 553-556。

<sup>66</sup> 該文寫一對戀人在「浯島」渡口離別，女方催促著男方向到廈門去讀書，互相期許著能夠擁有更好的明天。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一期，頁 557-558。

<sup>67</sup> 連載兩期，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三期，頁 609-612；《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四期，頁 641-643。

<sup>68</sup> 《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四期，頁 644-647。

<sup>69</sup> 連載兩期，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二期，頁 820-823；《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三期，頁 868-869。

<sup>70</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四期，頁 879-884。

<sup>71</sup> 《顯影 (Shinning)》第六卷第六期，頁 1519-1522。

臺——是為「問題小說」。<sup>72</sup>這類「問題小說」結合「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發揚，將個人情感世界曝曬於真實世界的烈日下，語氣雖不掩感傷，卻往往流於教訓，這類作品旨在透過「問題」（如婦女解放、教育問題、愛情觀、人生觀、貞操等等）的提出，表達一種「面對現實」（face reality）的態度。不過，正如溫儒敏指出，1920 年代初期「問題小說」的創作者，過於強調文學「教化民衆」、「足救時弊」的社會功能，其文學實踐並未達到 19 世紀中旬歐洲文學史中寫實主義（realism）之高度——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創作者們，終究是抱著「為人生」的態度而創作，他們對寫實主義巨擘托爾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的借鑑，偏重於將文學作為反抗黑暗之工具，旨在說教，缺乏客觀反映的精神，也缺乏細緻與深度。<sup>73</sup>

要領之，《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小說作品，在文字語言的使用上，與散文概無差別，創作意識圍繞在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導致情節的悲劇化，行文雖則兼具感傷、浪漫，卻又要用力批判、揭露。最具代表性的文本之一，當屬署名「超」之作〈慈母心〉，分四次連載於《顯影》，刊期橫跨 1929 年至 1931 年，梗概如下：家境小康的青年「金敏才」，中學畢業後，被父親指婚予一位素未謀面的女子。受過新式教育的敏才，怎可不視結婚為終身大事，蓋當堅信「自由戀愛」開出的幸福花朵。遂決意離家赴滬，投身工廠，嘗盡勞動艱辛。小說中著意刻畫其母相夫教子的溫和，凸顯其在情在理的「順從父命」形象。可是，在家庭權威與情感牽絆中，這種形象顯得格外矛盾與立體。小說結尾拉開悲劇的帷幕——母親日夜思念著逃家的兒，身心交瘁，甚至夢魘發作，夢中敏才攜伴歸來，醒後卻惟睹一床棉被——自此抑鬱而終。篇末草結於敏才返鄉，乍見母親靈堂上，那經幡飄動的淒楚，烘托出家庭倫理與現代個體的互相矛盾、高度張力。

〈慈母心〉的情節，雖以敏才之內心刻畫、離家出走為敍事主線，卻又花費泰半篇幅描寫「慈母」，並著力於對話敍寫。此際，對話是如何突出小說的人物

<sup>72</sup>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64-67。

<sup>73</sup> 詳參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1-35。

性格？回到全篇開頭，敏才的父親祖蔭（這樣的命名方式，儼然溢滿知識份子對舊社會的譏諷意圖）的一句咒罵：「可惡的東西，難道給你念了十年書，花了不少的錢，是叫你來奪我的父權嗎？你這孽畜……。」<sup>74</sup>如此刻意的對白，明顯生硬、斧鑿而不自然，接續其後的，是敏才回到房中落淚的場景：

他的母親，見了這形狀，也只陪著流淚。好久，才嘆氣道：「敏兒呀！順他的話罷！不要觸氣他。他的性子你是知的。兒呀！」……「呀，兒吓！不要悲傷，你看鄰舍的陳振文也訂下了周家的小姐了，你是他的同學，他也是父母訂的。你為什麼反對呢？我勸你順父親的話好……。」

他聽了母親的話，帶著眼淚說：「呀！母親呀！……婚姻是終身大事。什麼能夠胡亂拉一個女人來做妻呢？她的行為性質也不知道，平時也不相識，一但結合起來，萬一性子不合，或言行不端，兒子豈不終身受害嗎？……親愛的媽媽呀！你是痛惜我、愛我，忍心看你的兒子這樣地受苦嗎？……呵！嗎嗎！親愛的媽媽呀！」

「唉！依你父親的性子，恐怕無效力吧！我三翻五次的受過他打罵的！但愛兒呀！做母的總有這種責任吧！」他的母親拭拭了淚痕，就進內室去。

75

首次連載結尾於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見作者極力透過對白，刻畫母親深陷封建父權體制的進退維艱，甚至遭到暴力虐待；另一方面，男性主人翁——敏才，儼然化身為作者的自我投射，一句「呀！母親呀！……婚姻是終身大事」，正與那推崇自由戀愛的五四時代互文見義。

「終身大事」作為嚮往婚姻自由的代名詞，濫觴於胡適 1919 年 3 月發表於《新青年》的劇作《終身大事》，學界對該劇的評價是，「從題材，主題到結構布局，

<sup>74</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六期，頁 315。

<sup>75</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六期，頁 316-318。

都明顯地是對《玩偶之家》的摹仿。」<sup>76</sup>亦即，該劇結局中田亞梅的出走，開啟了中國文學、戲劇仿效「娜拉」的風潮。〈慈母心〉的「出走」，和《玩偶之家》與《終身大事》兩大女性「出走」經典不同，其所刻畫者為男性「逃家」；這樣的寫作，顯然更貼近知識份子「夫子自道」之幻想，卻也讓作者毋須多慮「現代女性」的處境。總言，〈慈母心〉所刻畫之重點，除了逃家的敏才，還有其刻意馴化、溫情化的「封建型慈母」：

敏才胡亂的吃了晚飯，轉入自己臥室，……他坐在椅上吸著紙烟，呆望想著什麼似的，一會兒又踱來踱去，很無聊的踱著。這時天已黑了，他就點上煤氣燈。不久他的母親打開門進來了！他不等她坐定就問著：「對他說了沒有？母親！」

「說了不過……兒呀！你的父親性子固執得很！連我也罵了一大頓，他主張，無論如何，明天就要對姓呂的小姐下聘了！」……。

「兒呀！千萬莫傷心，使做母的也倍了悲酸！……你父年已半百了，再沒有許多日子活著，順他意吧！橫豎是沒法子，做母的沒有不愛兒子好的。我想天定有眼，兒子一定會取個好老婆來，不要淒滄吧！況且咱們祖宗並無遺行，兒子必不致受苦的。兒呀！放心！聽你母親的話，不要使我也傷心……」敏才至是，硬也把眼忍住。

「兒呀！你今天辛苦了一陣，早點睡吧，便做母的也覺寬心。」她說時，跪去替他垂下帳子，一邊又替弄被。停了一會，「人哪裡去……」突然內室發出這個高聲。她說道：「父親叫我了！我要去！你好好睡吧！肚子若餓，就叫秋香——小婢——煮點給你吃好了！」她說完了，就入內是去。

---

<sup>76</sup> 內容出自田本相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此轉引自平田昌司〈胡老師的〈終身大事〉——從「遊戲的喜劇」到「社會問題劇的濫觴」〉。詳參平田昌司，〈胡老師的〈終身大事〉——從「遊戲的喜劇」到「社會問題劇的濫觴」〉，《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九卷第三期（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9.09），頁 145；田本相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頁 146-147。

他等母親一去，又哭起來！不敢高聲哭，恐驚動母親。哭了足有一點多鐘才稍歇，他橫臥床上，腦根在打滾：「咳！怎麼辦呢？從他嗎？……不！我不肯把這終身幸福拋棄的……那末，那末怎樣？」……他決心了，決心離開家庭，從床上跳起來，胡亂的拖幾件衣服，塞在皮篋裡，把大門開，籠中放出飛鳥似跑出來。<sup>77</sup>

上引可見，深陷父權囹圄的「慈母」早已自顧不暇，當「內室」高聲一喊，便必馬上抽身。而當「慈母」一次又一次「兒呀」的深情呼喚，無疑一次又一次地往故事主人翁的心頭上撞擊——象徵著「自我」與故鄉、與家庭、與父母，以及與整個傳統封建社會的愛恨糾葛。但無論這些撞擊的感受，是甜是膩？或厭或棄？在「慈母」一連串的貼心舉動與溫情告白後，主人翁最終選擇「硬也把眼忍住」、「把大門開，籠中放出飛鳥似跑出來」。

小說作者對「慈母」的人物塑造顯然趨於負面，就連看似帶有正面形容意味的前綴字眼「慈」，都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反諷效果（the effects of irony）：「慈」與「雌」諧音雙關，相對於「嚴」父，「慈」在此被視作軟弱無助的象徵——一種被家庭父權嚴重壓迫、綑綁、箝制，可憐、可恨而可鄙的樣態。在溫情對白的背後，自然主義的風格敍事，反襯出一個冷酷而可怕的社會圖景。結局中敏才母親的死，場景設置於佈滿經幡的靈堂，除了塑造出不寒而慄的氣氛，也象徵擁有封建思維的女性，其應然的悲哀、不可挽救的命運。此際，知識份子與傳統舊式家庭關係不是難以和解，而是根本不能和解。其中，「慈母」形象總是既貼順又軟弱，永遠俯首服務於父權男性，無法脫逃。「慈母」之死，不啻展現了這群現代情境詮釋者們自顧不暇，也反映了一種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的逃避型情結——不耐煩為已馴化的封建女性設想更好的出路，只是乞靈於一個世代的終結，縱使要不計親情、不論代價。

《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小說作品，正如其它文章，多半可看出其男性凝視的無賴視角——他們自認為擁有性別意識，卻仍視女性為待改造、待解放，甚

<sup>77</sup> 《顯影（Shinning）》第三卷第二期，頁 584-586。

至待覺醒的客體（object）。正如劉乃慈在《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中所指陳：

正如五四著名女作家盧隱直言不諱地挑明，婦女解放運動首先總是由男性來提倡，而女性總是處於某種「被解放」的地位。在曾為婦女處境代言的新文化先驅者筆下，我們看到女性的問題得以浮出檯面，但是也同時有所側重以及被刪削。五四男性大師只一味地將婦女作為封建罪惡的結果、推翻帝制的理由，至於男性中心的文化環境如何強制著女性的生存，似乎不是他們所關注考察的內容。五四男性知識份子，總是期待女性擁有足夠的勇敢熱情走向社會，很可惜他們普遍地注意到現代女性生活的社會性層面，而對一個性別主體內在實際的需求，卻無法從一個女性主體的視點出發，透徹的理解與細膩地表達。<sup>78</sup>

劉乃慈的觀點反映出五四時期男性知識份子「女性解放」話語的雙重性：一方面，他們以啟蒙者自居，積極將女性問題納入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另一方面，卻始終無法真正從女性主體的視角出發，細緻地理解或呈現其內在需求與日常經驗。當此，女性始終被置於一種既被觀看、又被代表的位置，還要服務於男性敘事的目的與批判立場，最終無法擁有自身完整的主體形象。

《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小說作品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除了上述的「封建型慈母」外，另一部分描述以「年輕女性／女學生」為主角，追求自由戀愛而不可得的故事；如署名「望冰」於第四卷第四期篇幅較短的〈女學生〉，便以女學生「翠英」為主視角，寫其和同班同學「誠義」自由戀愛，忽然某天母親通知「今天就是你和『資生』之婚約！」（按：雙引號為筆者所加，內為小說角色名），翠英雖難過流淚，卻無權也無法抗拒，結尾處以兩封信呈現：

親愛的英妹：

<sup>78</sup> 劉乃慈，《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09），頁 52-53。

黑暗的社會，學者是沒有得到光明的出路，思想像你，何況一般普通的女性，復何望哉？你已於前天完成你的一生大事，我愛你，為喜為慰，別了！英妹！

誠義手上 四月七日

誠義同學：

來信知悉，一般愚笨的青年，句句革命，高樓大廈，山珍海味……沒有得到享受而生嫉妒，造出百般無聊倒亂，現在我覺悟了，我的媽媽，我到這時才覺得不錯，我的資生已備了汽車在門口了，要我一同出去玩，無暇多贅。

翠英謹上 四月八日<sup>79</sup>

該篇小說雖曰篇幅短湊，內容僅四頁，卻在不到兩千字的篇幅內，刻畫了一幅驚人而弔詭的心理變化——在全篇前半段，作者刻畫女學生翠英與另一名男學生誠義的愛之誓言：「不論怎樣的擺佈，她將永遠愛她，她要澈底和家庭拚命反抗到成了成功的一天。」<sup>80</sup>然而，最終的結局卻畫風陡變，使翠英口中所謂的「覺悟」轉眼化為對「青年」、「革命」的嘲笑，坐實了小說作者粗暴的男性視角。這種「形象化」(figuration)，委實是男性小說作者對女性主體的「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甚至是「錯誤詮釋」(incorrect interpretation)，將女性角色降格為男性焦慮與理想的象徵物，更在小說敍事中消解了女性作為「主體」(subject)的能動性，轉而塑造出一個順應社會秩序、認同父權安排的虛構「她者」。其所謂的「覺悟」，實則是一種來自男性敍事者的安排與投射，使女性角色的語言與行動從內而外地服務於男性敍事的合理化；因故，翠英的心理轉折並非出自女性自身的經驗邏輯，而是男性書寫者對女性「應當如何」的想像結果——其背後所潛藏的，是一種簡化女性內在世界的敍事模板。必須指出的是，信

<sup>79</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四期，頁 888。

<sup>80</sup> 《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四期，頁 886。

中揣摩「我的資生已備了汽車在門口了」這樣的場景，無疑暗示著「女性的現代精神」最終「敗給了物質資本」，這種形象建構既無法回應女性經驗的複雜性（complexity），也喪失了文本敘事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在上述〈女學生〉中，我們已可見五四話語中「戀愛自主」與「反封建」之激情，如何最終轉化為「敗給物質」的戲劇安排。但這樣的敘述策略在《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小說作品中從來並未止息，反而愈加朝向心理創傷的敘述結構推進。如第六卷第二期署名「琳」發表的〈重傷〉，即是當中極為典型的例證。該篇小說語氣幾近控訴，一方面怪罪「玲妹」未能抗拒傳統家庭的封建安排，另一方面則直白揭露自己年幼以來所深愛的故鄉，如今卻只剩荒涼與失望。文本中的男性角色表面上試圖體察女性的無奈，甚至慰言「父權是枷鎖」，卻又在女子因被羞辱而落淚之際，突然「瘋狂親吻她」——這一瞬的翻轉，不僅揭示了書寫者所聲稱之「同理」如何轉化為一種佔有欲，更昭示出五四啟蒙者「性別雙重標準」的姿態：他們所期待的女性，並非能主體地說「不」，而是在男性的親吻與凝視中，成為他們道德批判的「拿手好戲」。<sup>81</sup>

類似的情節設計，亦見諸刊載於第五卷第五期至第六卷第一期，分別署名「蘇英」的〈離別〉與署名「冰」的〈慘痛底飛進〉兩篇小說——雖然署名不一，但其二作在情節與人物設計上，宛然可以「照花前後鏡」，應乃同一作者所為。〈離別〉中的 G 妹起初被描寫為戀情中受邀來訪的女性，與男主角蘇英晤言一室之內，談情說愛；但隨著男主角遠行前的焦慮與內心動搖，他開始質疑 G 妹是否真心，直到接獲 G 妹帶著歉意的來信，內容誠懇地敍明其當日未能親赴碼頭送別的無奈，與家庭的阻撓。讀完信後，第一人稱男主角卻道「我看到這裡，心坎中立刻湧現無限紛紜的想像，這些話均是遁詞。」儼然是質疑女方在心靈與「現代化道德」上背叛了他，也背叛了「青年們」的家庭革命陣伍，文後更直斥「唉！我到這時才認出你虛偽的心靈？」<sup>82</sup>

<sup>81</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二期，頁 1295-1299。

<sup>82</sup> 蘇英，〈離別〉，刊載於《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一期，頁 1239-1244。

遺憾的是，小說中女性並無實質反駁的機會，G 妹原初年輕活潑的現代女體，在延伸作品〈慘痛底飛進〉中，她的形象最終被設計為荒山野嶺中的一抔黃土、一縷「芳」魂，還可悲地遺下一封「粉紅色絕筆信」，內容宣稱自己因被迫嫁人，失貞而羞愧難當，已「有死的覺悟」。<sup>83</sup>此際，女性的死亡再次被編排進傳統通俗愛情悲劇裡的「情節高潮」（climax），儼然民初徐枕亞文言哀情小說《玉梨魂》的複調式重現（polyphonic reenactment）。

倘言〈慈母心〉裡的「封建型慈母」死於過度思念，那麼〈離別〉與〈慘痛底飛進〉中的「年輕現代女性」G 妹，則死於一種由內化羞恥所定讞的「自我處決」。這種處決，由男性敍事者一手構築的幻象所造成：死，不是女性對命運的自我抉擇，而是來自男性凝視者的慾望投射；而死亡的女性身體，也僅是典型化情節所反映的敍事能指（signifier）。此際，為文本敍事所驅遣的女性無助身體，最終要不是無端被擺放進經典濫俗敍事裡的鬼魅性空間，就是被用來當作男性知識份子的現代文學綺夢。<sup>84</sup>

更極端者，尚有如署名「少年雷門」的〈麗英〉一作，刻畫一位母親與親姐共謀為成年女子物色有錢「華僑子弟」的情節，<sup>85</sup>此處，無論是封建時代出身，抑或現代年輕的女性角色，皆慘遭全面地被塑造成「封建代理者」。這些角色不再僅是父權結構的受害者，也淪於維持父權價值鏈，難以脫身的階下囚——此種設計進一步消解了「女性言說」的政治潛能，使其終於轉化為令人厭惡的反面教材，用來反襯男性主角所代表的「啟蒙視野」與「情感受傷」。總言這些小說中順從的慈母、虛偽的情人、庸俗的封建代理者，都以「她者」之姿出現，從未被賦予真正主體敍述的位置。就文學敍事的心理結構而言，這些作品中的男性書寫者不斷重複自我感傷與女性悲劇化的敍述套路，幾近形成一套自我療癒的文本

<sup>83</sup> 冰，〈慘痛底飛進〉，刊載於第五卷第五期，頁 1147-1157。

<sup>84</sup> 對典型化情節與濫俗敍事中的身體批判思考，可詳參布魯克斯的《身體活：現代敍述中的慾望對象》中的第一章〈敍述與身體〉及第三章〈標示現代身體：法國革命與巴爾札克〉。布魯克斯（Peter Brooks）著，朱生堅譯，《身體活：現代敍述中的慾望對象》（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04），頁 1-34、66-105。

<sup>85</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二期，頁 1299-1303。



機制。換句話說，在「白話嘗試期」中的散文與小說作品中，女性的身體、死亡、屈服、羞恥，始終典範於男性文學主體的自我建構，留下了一大片漠然又殘忍的，關諸女性主體經驗的陰影地景。

### 三、淡、寒文藝論戰評述：在地化與理念化的觀點激盪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無論是文學、文藝、文章，凡是涉及人／文在觀點上的不同，「爭」往往難以避免。如在劉炎生《現代中國文學論爭史》一書中，序者陳漱渝對「論爭」便有此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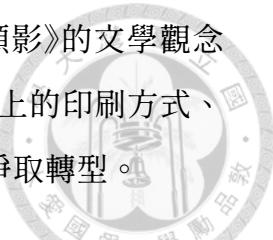
……論爭是人類古已有之的傳統，能展示人類自身的智慧和風采。在論爭過程中，雙方的學術視野、知識水平、思維能力和論辯技巧進行著激烈的抗辯，從而使文化、學術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傳播和推廣。<sup>86</sup>

該序文從「軸心時代」（Axial Age）之古希臘好辯學風，言及中國古代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晚至英國詩人雪萊緣起於與友人論爭，而寫下重要的浪漫主義詩歌理論《詩之辯護》。該文不煩枚舉許多文哲史軼事，在在闡述論爭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論爭本起於學者、作者甚至讀者之間，是言詞的交鋒，也是思想的激盪。此外，論爭也往往發生於文學、哲學等藝術發展的高峰時期——一個時代的重要論爭，應當被視為一個時代的重要註解，如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據劉炎生《現代中國文學論爭史》一書，即蒐集到高達八十餘場論爭，這些論爭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誠然不可忽視也。<sup>87</sup>

《顯影》中可見的文藝論戰，一共發生了二次，首先是起於《顯影》第六卷第四期至第十二卷第二期，時間橫跨 1932 至 1935 年間的「淡、寒」文藝論戰；另一次則是緣起於第十四卷第二期，終至第十五卷第三期，短暫爆發於 1936 年的

<sup>86</sup> 陳漱渝，〈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讀《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收錄於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2），頁 1-9。

<sup>87</sup> 詳參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2）。



「亞林臭水」論戰。<sup>88</sup>這些論戰，有助於我們俯瞰整場發生於《顯影》的文學觀念演變，以及刊物同人是如何汲取其中的觀點，使《顯影》從物理上的印刷方式、編排，乃至於主題欄位的創設，始終不間斷地嘗試變換式樣與爭取轉型。

事實上，發生於《顯影》這場所謂的「論戰」，原初並非起於好辯者之流，而是新加坡洋客——淡菊（薛前璧），為應《顯影》編者之邀稿而作。本文第二章已介紹，淡菊是活躍於新加坡的著名記者、副刊編者，在第六卷第四期開啟這場所謂「論戰」之前，即早已在《顯影》上留下古典詩〈感〉、<sup>89</sup>〈憶故鄉〉，<sup>90</sup>新詩作品〈給侯君長樂〉、<sup>91</sup>〈征鴻倦了〉，<sup>92</sup>雜文〈金門應實行農村教育〉一篇，可謂對《顯影》已有不少貢獻。<sup>93</sup>第六卷第二期（1932年4月），在通訊欄位「航空郵電」中署名《顯影》「副刊編者」的一則短訊「淡菊：祈望自此後時賜大論，以增篇幅」，<sup>94</sup>可見留守鄉中的《顯影》編者對淡菊作為新加坡著名報人之青睞。

很快地在同年六月，第六卷第四期出刊，淡菊的論著〈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以下簡稱〈我見〉）被登載於卷首的「來函照錄：星洲通訊」一欄。該文語帶懇

<sup>88</sup> 這場論戰在本質上，不如「淡、寒」論戰對刊物走向的思考深刻，最初為署名「香大傻」的作者於第十四卷第二期發表了〈掃除「點心」上的污穢〉（以下簡稱〈掃除〉）一文，旨在針對第十三卷第五期署名「木耶了一」所發表的〈哀悼新興樂壇的創造者聶耳先生〉，並指出該文「海龍皇」、「水龍宮」、「波臣」、「靈前」等詞彙運用，有「封建思想」與「遊戲隨筆」之虞。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四卷第二期為了刊登這篇〈掃除〉，竟特意開闢一新欄位，名曰「亞林臭水」，原是上海「五洲大藥房」所生產的清潔劑（應為漂白水或鹽酸之類），此處用以形容「清潔文辭的污穢」之意。筆者在此提及，乃特舉其史料意義，而非其對《顯影》文藝有產生任何建樹。不過其所反映出的史料意義，在於當時編者對「論戰」的鼓勵。我們可以發現，提供「文字平台」、「來者不拒」之態度始終是《顯影》作為集合「評議、文藝、新聞」三者合一的報刊媒介，從一而終的精神。其論戰文章，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第五期，頁2708-2709；《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第二期，頁2763-2764；《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第三期，頁2788、2793-2795；《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第四期，頁2809-2813；《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第二期，頁2903-2904；《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第三期，頁2927-2928。

<sup>89</sup> 《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二期，頁823-824。

<sup>90</sup> 《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三期，頁867-868。

<sup>91</sup> 《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一期，頁787-788。

<sup>92</sup> 《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三期，頁865-867。

<sup>93</sup> 《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一期，頁767-769。

<sup>94</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二期，頁1320。

切，並旨在針對《顯影》作為金門唯一定期寄送至廣大「金僑社區」的報刊，在「時評」、「文藝」、「新聞」上，應當如何才能有更加長足之進步云云，提供其精到的眼光及論述。<sup>95</sup>其中，對於「時評」，淡菊認為「金門現無報紙，故輿論也不興」，應該「多著時評，以啟迪民智也」。並呼籲鄉人重視《顯影》的力量，也期許《顯影》的新聞記者必須「負起天職」，要有將《顯影》看作是「鄉報」的自詡心態，使鄉親對所身處的時局與大勢，得嘗作更深切觀。

而除了「時評」外，淡菊接著主張：「改良文藝，俾切于實用也。」言論一出，不料竟造成論戰的起因，其謂：

現目顯影之文藝，言其量固洋洋灑灑、無慮千言，論其質則又似乎尚未臻於真善美之境也，揆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之義，不可背道而馳乎，故為補救此項弊端起見，可請留外學生將其寫不甚需要之小說或新詩，而改為寫其學校日記或金門歌謠，抑或請各僑居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等，則較以前連篇累牘之小說及新詩，其切于實用，何止霄壤之差也。

站在「文藝實用」的觀點上，其所謂「連篇累牘之小說及新詩」，所指的便是前述「白話嘗試期」中「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之作品。而諸般作品的「不實用」，很明顯地便是體現在前揭諸般，過於浪漫煽情、張揚自我之主觀與個人文學。淡菊其人其作，與過度耽溺、喜怒無常的文學相比，顯然便淡泊而素樸，如其原投稿於《南洋商報》，後載於《顯影》的白話新詩〈給侯君長樂〉，<sup>96</sup>便展現其詩作短小卻情感真摯的特色，本文前既已舉出，此應不再贅述。

在淡菊〈我見〉一文中「請各僑居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方面，

---

<sup>95</sup> 淡菊，〈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載於《顯影 (Shinning)》第六卷第四期，頁 1373-1380。

<sup>96</sup> 原載於《南洋商報》，1930.09.01，第二十版，搜索自「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NewspaperSG 資料庫」（來源：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300901-1.2.46.5>，最後瀏覽日期：2025.07.07）；後刊於《顯影 (Shinning)》第四卷第一期，頁 787-788。

由淡菊親自打頭陣，先分別於第六卷第六期、第七卷第二期連載了有關北婆羅洲土著的〈伊曼土番之奇俗〉<sup>97</sup>。自第十三卷第二期以降，《顯影》更先後設置了「海外風情」與「椰影留連」這兩個固定欄位，以饗對南洋奇俗抱持興味的讀者。而有關「金門歌謠」的紀載，則散見於文藝欄位「濯巖」。<sup>98</sup>另一項實踐則是「學校日記」——自第十四卷第四期起，「濯巖」便著力開闢「留學生活自傳」之欄位，其稿源自留學於中國各地的珠小校友，如迪明〈初學眼科的生活〉、<sup>99</sup>木卿〈銀行實習：離校的一剎那〉、<sup>100</sup>金民等著〈珠山留外生活訪問記：我們的護士一年〉等。<sup>101</sup>這些學校日記之於《顯影》之在地意義，一來有俾於珠山小學在學學生未來升學之借鑑，<sup>102</sup>二則旨在提供給整體金僑社區鄉親，便其參考家鄉辦學之成效。

而除了在「時評」、「文藝」等方面提出建言，〈我見〉一文中，也針對「增加島聞，使顯影普及于金門也」之方面多加闡述，其謂：

夫新聞為報紙之靈魂，微新聞，則報紙將無事可報矣，顯影雖謂為吾鄉之報紙，然在金門尚無所謂報紙之時期，不妨擴大篇幅、增加島聞，使金門人有讀報之機會，至其辦法：

(A) 請各鄉學校教員，將其所在地所發生之新聞筆之于書，寄交顯影社，而以每期出版之顯影為酬報。

(B) 後浦為金門黨政及人才的切合，一切事物之發生必較各鄉為多而重

---

<sup>97</sup> 《顯影 (Shinning)》第六卷第六期，頁 1515-1518；第七卷第二期，頁 1611-1615。

<sup>98</sup> 如刊載於「濯巖」第八期，署名「舞」所採集的〈道情（民間情歌）〉，以及同期刊載的澤人《民間童謠集》。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第四期，頁 2575-2576。

<sup>9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第四期，頁 2819。

<sup>100</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第一期，頁 2880。

<sup>10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第二期，頁 2910-2912。

<sup>102</sup>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珠山小學畢業校友的出路問題，是《顯影》編者與校友會所共同重視的問題，如在第十四卷第五期，「珠山鄉聞」的報導欄位便刊出〈珠小畢業出路問題〉之篇什，內容詳細記載該年度畢業生的升學情況。同期卷首亦刊出永教的論著〈從校友會十二週年紀念聯想到珠小畢業生的出路〉一文，目標讀者為即將離開小學的畢業生。詳參《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第五期，2834-2835；2842。

要，須請一有新聞學識之訪員供給新聞（每月之薪水可酌情形而定，或以新聞之多寡而計值）

(C) 在可能的範圍內，先生最好親自出馬向各方搜集新聞（這種辦法，似乎離開事實太遠，但是各鄉親如肯踴躍認捐款項的話，那也不是難事）

以上所述，特舉其肇肇大者，其他如排印鉛字以求美觀（抄寫不惟麻煩，而且糊塗不明）、新聞寫法需加考究（新聞寫法最好參考上海時報，或購買關於新聞之書籍），惟望先生能在在加以努力而已。

順奉五元，以為顯影紙費，區區此數「羞人答答」，不過忝在鄉親，請勿以其少而小之。

文中先是說明「報紙」之於金門的重要性，與再倡《顯影》篇幅之擴大，使其真正從地方「鄉訊」而走向全島「僑刊」；一句「使金門人有讀報之機會」，展現其對鄉里人士智識汲取的念茲在茲，無論如何也要讓金門當地民衆吸取更多資訊的渴望。然其文卻不止步於理念的提出，而是針對當地的情形加以細究，列舉出 A、B、C 等辦法，諸般具體的建言，如取得金門各鄉學校支援、聘請專業記者、請編者親自搜集新聞，以及改「油印手寫」為「排印鉛字」，與加強新聞寫法云云，立便換來《顯影》編者的迴響，如下引《顯影》編者於第六卷第五期（1932.07）的刊物前言〈答淡菊君〉：

淡菊君：

你的台教到金，我還在廈門生活，《顯影》又是吞君（筆者按：即澤人，薛健椿），不然不能答覆你，及至第四期到廈，其中登載你的〈對於顯影之我見〉一篇，讀完之後，確是萬二分感激你對於《顯影》的誠意，希望《顯影》趨於實際工作，使其得以全金任何鄉里均需要有閱讀，但是我也希望達到目的，不過有很多困難，列下茲將以為研究，望能賜教是幸！

……改良文藝，俾於實用，本刊素絕願望無不與先生全志合，……至於將

不需要的小說或詩改為校中日記或金門歌謠，抑或請各僑居南洋同鄉寫其所在地方土人習俗文化等，此種種實亦編者萬分的同情，盼望以後能得如願吧！



增加島聞普及金門，此實《顯影》根本問題，不可忽略，但是多種原因亦分列在下：

(A) 各校教員確難辦到，素來金門各校，經費困乏，每校教員不過一二而已，除校中事務及工課以外，只剩短促休息時間，覺不會肯而負責。

(B) 請一有新聞學識之訪員供給新聞材料，但念每月薪水無逐，現在顯影之出版費，只僅維持，南洋同鄉所有寄助，熱心者仍屬少數，收入者只供如此小規模之辦法而已。

(C) 最好親出探訪，編者實與先生意同，無可多贅。

(D) 排印鉛字，雖然費用比較起來相差不多，而獲雅見，但是金門無此印字館，往廈又多一番手續，如果自置鉛印機更是空談，至於新聞寫法參究……筆者無不感激容納，除此之外，望時賜佳作，並常賜音指教，編者無不盡其能力樂從。<sup>103</sup>

有關「減少不需要的小說」問題，可看出編者舉雙手贊成，而淡菊的這一項建議，在後續《顯影》進入「大眾文藝期」時，也得到了完全的實踐——再思其所謂的「不甚需要」，應當是指陳《顯影》作為「金僑社區」共同體之刊物，該如何擇選體裁及其語言風格的問題，而不是文體選擇的問題，這在後續所刊載的白話新詩、小說、散文作品中皆可看出，此有待下一節筆者詳加論述。其後，全文最末針對淡菊「增加島聞」之建議一一回覆，容或可見其刊物同人維護與運作等實務之艱難。

---

<sup>103</sup> 〈答淡菊君〉，刊於《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五期，頁 1431-1434。

《顯影》與珠小校友會的會務運作本屬鄉里知識份子與熱心服務者所為，其經費來源亦端賴鄉親自動自發的捐助，在通察《顯影》中多筆所刊之「年度」或「半年度」之收支清單後，可發現所支出者，除發放給學校教師的薪俸、什誌、文具、煤油等施設耗損費用，以及自《顯影》鉛印後的印刷規費、甚至郵寄費外，「編者」與「投稿者」卻幾乎秋毫不取，<sup>104</sup>其克難與不惜個人時間與金錢的精神，尤值敬佩。此情可參考《顯影》第十五卷第四期（1936.12）「顯影九週年紀念特輯」中，重要編輯者澤人的自述〈我與顯影〉，該文自敍其自第五卷第一期（1931.09）始，留守鄉中接下原編輯薛丞祝（為赴菲考察商業）的編輯重擔，甚至不惜「休學」（廈門同文書院）為刊物續命（詳參頁下註）。<sup>105</sup>

回到淡菊〈我見〉一文，及其後編者之答覆，兩方皆展示了《顯影》作為維繫「金僑社區」的公益性質刊物，在作者與讀者、編輯人與投稿者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其後驗證，《顯影》在「大眾文藝期」的整體刊物運轉上，幾乎可說無一處不採用了淡菊〈我見〉之建言。可是，樹大不免招風，鵠張終必矢至，淡菊〈我見〉一文對《顯影》的勤勤懇懇，想必萬沒料到會換來他人的「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顯影》第六卷第六期（1932.08），署名寒冰的〈片言〉恰似天外飛來一枚碎隕，逕直投入原本平靜無波的湖心：

余對目下顯影文藝亦表示非常不滿，現該欄中一切組織及取材即有改善必要，尤其於小說及新詩方面，……。

<sup>104</sup> 查《顯影》下列六次刊載年度／半年度之收支情形，唯第十八卷第四期之「三十六年度上半年收支報告」中登載「稿費支出五萬元」以外，其他卷期中皆無該種費用之記載。詳參《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五期，頁 294-298；第四卷第二期，頁 839-843；第七卷第六期，頁 1741-1744；第九卷第六期，頁 2129-2132；第十二卷第六期，頁 2618-2618；第十八卷第四期，頁 3410-3411。

<sup>105</sup> 「那時海外讀者漸漸增加，我親自謄寫親自印釘，每天的大部分工作，都費掉在刊的方面，我終是以毅然的精神，跟著準時出版，雖然有時篇幅不定的增縮，如此，接續到六卷六期，因為我向學的心尚未全死，於是再勉強的方下影刊入廈續學，在T校（按：廈門同文書院）我每念起我們的鄉刊，幸虧一些剛從南國回鄉的鄉親，代我肩起這責任，並且每期都寄給我，使我無任的欣慰，我默祝，願我們的刊得以長生不死。」摘錄於《顯影（Shinning）》第十五卷第四期，頁 2963-2965。

又淡菊君一對於該期顯影公開之私信題從「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其中對於文藝欄方面亦曾發表若干意見。……淡菊君於小說及新詩之前加以不甚需要等字，余不知淡菊君之意是否指一切新詩及小說均不甚需要？或留外學生因學問關係無寫小說新詩之資格？定寫不好，故雖寫，亦不甚需要？或留外學生日太藐視顯影，故欲投該刊之小說及新詩均故意寫不甚需要者？

良好小說能影響個人性格或社會，是當為世人所公認，顯影文藝欄目下，投稿者大都係初試作，當然是找不到良好作品，然鄉家如能極力鼓吹本刊投稿之興味，久而久之，或不致終無成績，前淡菊君曾在該欄中投下……他也曾寫一首「倦遊的歸鴻」（？）之新詩，曾幾何時，何其語言動作矛盾若是也，余深不解。

余對該刊文藝主張當再努力改革，同時小說及新詩皆當保存，並宜鼓吹鄉眾極力愛護之，不可使其淪沒無聞，此後對於小說及新詩之取材，可偏重於描寫社會之暗黑，或比較能切實增益於吾人者，現尚存在於故鄉之不良風俗或習慣，盡力攻擊之，惟浪漫或空虛無謂幻想，不必加注意，余以為小說詩歌之能力，有時並不亞於評論。

淡菊君謂欲將小說或新詩改為寫學校日記或金門歌謠，此舉可不必有，因小說、新詩、學校日記及金門歌謠，都有其各自好處，金門歌謠恐怕不多，書盡時，若專寫學校日記，範圍未免太狹。

淡菊君反對新詩而不反對舊詩，但余希望該欄編輯者將不以體裁而輕動視之，凡有好稿均當為發表，總之讚美舊詩者，謂曰舊詩音韻鏗鏘，為新詩所不及，讚美新詩者，謂新詩可盡量描寫不如舊詩之太受束縛也，試觀我國現在最大部分刊物，是否新舊詩體均納，但一談到顯影中所登載之新舊詩，直使一切鄉親都臉紅！

以前所登過小說及新詩，其中實有幾篇或者一概因初次描寫工夫太劣，或取材不好，致使讀者討厭，然此種現象均為鄉之太不努力於該刊建設所致，一部有文學天才之鄉親都不願意投稿，又一部不願盡力研究描寫，以致稿

件缺乏，不得不將令人討厭，連篇累牘之小說及新詩均刊登以實篇幅。淡菊君以其太無成績，而思請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等以待之，其實凡一刊物材料愈多，愈表示其內容之豐富，若限制之體裁非為單調而且無味，余希望僑居外地之鄉親均樂於做此種記載，以實顯影篇幅，因此種記載將與吾人以不少之新智識，願大家注意及之，地點不必限於南洋，凡吾人足跡所到之地或見聞均可寫入，但同時對於新詩及小說並望其多所貢獻於該刊，淡菊君以其無成績而欲去之，余不贊成！願大家努力創作，使此後小說及新詩不再同樣現發生。<sup>106</sup>

平情而論，其並未一味執著於實用導向，反而展現了某種開放態度——寒冰雖然強調小說與詩歌應描寫「社會之暗黑」，以「功擊」「現尚存在於故鄉之不良風俗或習慣」，此固然屬於一種強調「移風易俗」的文學實用觀；但同時他也不排斥浪漫文風與個人主觀情感的文學展演，對於古典詩歌，亦敞開不拒之襟，可見其並無體裁之偏見。這種兼容並蓄的文藝取徑與文學觀點，某種程度上，其實也貼合後來《顯影》「大眾文藝期」所呈現的多元化風貌。

肯綮言之，寒冰〈片言〉全文最重要的質疑當為：淡菊的建言，是否有泯除新詩與小說文學功能之虞？這份質疑顯然瞄準於〈我見〉中「可請留外學生將其寫不甚需要之小說或新詩，而改為寫其學校日記或金門歌謠」這一句。但隨後立即於第七卷第二期（1932.10）得到淡菊本人的澄清：

其實吾人之意，簡而言之，即謂：金門歌謠、學校日記及南洋風俗文化等，比較小說、新詩，有價值切于實用，而小說、新詩比較南洋文化風俗、學校日記、金門歌謠等文字「不甚需要也」。（因為環境關係，則當作別論）謂為衡其輕重、別其緩急，容或近之，謂為「一切新詩及小說均不甚需要，或留學生因學問關係，無寫小說新詩之資格」，則吾豈敢。至寒冰君謂余藐視留學生，則吾又豈敢。因余亦為昔日留廈學生之一，設若藐視留學生，

---

<sup>106</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六期，頁 1509-1514。

抑亦何殊豬羣之自藐視其為畜生，而不能為人也。



……淡菊雖然是一位言行不甚高明的人，但何嘗有矛盾的表現呢？以余小人之心，度寒冰君君子之意，大概是說我以前做新詩，而現在竟請編者將新詩及小說改為金門歌謠……等記載而為言行矛盾罷，若然，則寒冰君的誤會之深，雖請胡適來考察，亦不能確知其度數，因為吾人之有此建議，也就是因為新詩及小說因環境的關係比較南洋風俗、金門歌謠等「不甚需要」也。<sup>107</sup>

這篇文章題作〈揮汗欠身之餘：且來談一談寒冰君的「片言」〉（以下簡稱〈揮汗〉），副標題作「誤解淡菊的『不甚需要』／談淡菊的言行為矛盾」。該文句句機鋒，展現淡菊耕耘報界多年的膽量與見識，並箝緊對方之指控，快人快語地還其說法。此處，淡菊已明確點出，其之所以提出「南洋風俗、金門歌謠較新詩、小說更為重要」，乃因金門文藝「環境」故，並非是文體本身價值的好壞使然。

在〈揮汗〉（1932.10）一文發表後，這場「君子之爭」本可到此為止，無端時隔將近二年，寒冰卻於《顯影》第十卷第四期（1934.06）發表〈再駁淡菊君對顯影文藝欄之議論〉一文。論戰至此，寒冰既不針對淡菊「環境說」給予正面回覆，僅默默轉移焦點至談論「短篇小說與學校日記何者孰較通俗」、「新舊詩的形式與內容」、「理論與事實之關係」、「淡菊英文程度之淺顯」云云。<sup>108</sup>文藝欄究竟應該提供什麼內容最合適，看似已不再是二人所關注之焦點。

其後，淡菊於《顯影》第十卷第五期發表〈一封公開信〉（1934.07），控訴寒冰「開口罵人，有失學者的態度」，<sup>109</sup>至此，整場文學論戰已演變成純然的意氣之爭，雙方皆不再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文藝觀點。如寒冰於《顯影》第十一卷一期又發表的〈駁淡菊君「一封公開信」〉（1934.09）、<sup>110</sup>第十一卷第三期再刊淡菊

<sup>107</sup> 《顯影（Shinning）》第七卷第二期，頁 1599-1610。

<sup>10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卷第四期，頁 2263-2276。

<sup>109</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卷第五期，頁 2301-2303。

<sup>110</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2355-2362。

的〈請寒冰君先認清論戰要點〉（1934.11）<sup>111</sup>第十二卷第二期寒冰的〈答淡菊〉（1935.04）<sup>112</sup>



淡菊與寒冰的文藝論戰，其本初在討論「《顯影》應當刊登何種文藝作品」，然其後卻漸漸偏離這個主題。結柢歸根，淡菊的「環境說」當起於其自身打滾新加坡報業多年的經驗，其所關懷者，旨在《顯影》作為一份流通於「金僑社區」的讀物，應當如何服膺在地、離散與現代的讀者之所需。回到淡菊〈我見〉一文，其對「紀錄金門歌謠」與「寫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的建議，在在反映了一種文藝實用觀，揆度這種實用觀背後的思考，則可以反諸筆者於第三章所指出的一「從鄉訊到僑刊」的軌跡；這樣的軌跡，再度回到了《顯影》中在地與離散群體共情、共感、共敍、共寫的特質。此際，對金門歌謠的紀錄，是在地傳統文化香火的傳承；而請「南洋鄉親」對「南洋當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的引介，一則滿足了在地群體對離散群體所身處之世界的好奇，再則完整了離散群體遠在千里之外，對故鄉遙遙招手的渴望。總言淡菊的〈我見〉及其背後之思考經緯，當可謂為一則兩全其美的提案。

此外，相較於淡菊之考慮到讀者群問題，寒冰所站腳的文藝立場，可說具有菁英主義（elitism）的觀點：

淡菊君說話實太糊塗，不清不楚，他說前次小說，多者連篇累牘，不堪穢顯影之篇幅，我叫他譯寫些好的來飽飽我們的眼福，他終產生不出來，他既不懂翻譯，為何將里邊小說都糊糊塗塗的說個在內，這豈不太冒失麼？傅東華去年因翻譯失樂園，凡惹出一場大禍，梁實秋指出他几條錯誤，傅君立請梁君也旋翻譯一本好的給大家看！梁君當即譯一本出來，不樣淡菊君那樣膽小，而又風頭十足。其實翻譯的事情，本是馬馬虎虎的，現在我且引些我國翻譯的實語以告淡菊君，林琴南譯其一部偵探小說，在敘述偵探談話的時候，竟「拂袖而起」，吳稚暉笑他說：「不知道這位偵探先生，

<sup>111</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三期，頁 2429-2430。

<sup>112</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第二期，頁 2530-2531。

所穿的是以前中國官僚所穿的馬蹄袖呢？還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大禮服呢？」又魏易先生翻譯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竟將第三章 The Night Shadow 完全刪去，又馬君武將俄國 Tolstoy 所著的 Resurrection（筆者按：即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所著《復活》）一本十數萬言的大著，且譯成二百十六頁的小小的一本，為譯者要標新立異，也不妨學嚴又陵先生將 Deductive（演譯）為「外籀」或 Inductive（歸納）譯為「外籀」（筆者按：應作內籀，此處為筆誤）或另外再找一個名稱來，翻譯是如此這般的事情，如果淡菊君打起勇氣去幹，在最短期間內一定成功的，淡菊君何不也譯些通「山不在高不相背馳的文章」來飽飽我們的眼福罷。<sup>113</sup>

寒冰的論戰文字，在《顯影》中一來一回地與淡菊辯駁，其狀大致如此。<sup>114</sup>這兩種文學觀點貌似反映出了《顯影》文藝副刊究竟是要往「在地化」（localization）還是「理念化」（idealization）去進行的問題。此中，所謂的「在地化」，其內蘊更多地指向金門在地文學的「讀者反應」（reader response），正如其所提議的「金門歌謠」與「南洋風俗」，我們應當可以預設當整個「金僑社區」的讀者讀到這兩類作品之反應，該是如何產生出一種關乎「熟悉感」（sense of familiarity）的情緒。而所謂的「理念化」，除了認為不斷透過文學技藝的磨練，以提升整體文藝作品的鑑賞價值與眼光（sense），也正如寒冰在此所呈示的——透過大量的「翻譯文學」來擴充金門文學的「眼界」（literary horizon），而從其文中可見，這種「翻譯精神」，本身就帶有冒險與嘗試的意味在其中，並且更加地需要專業文藝知識的積累，如其所列舉的幾個範例：林紓的文言語體翻譯、魏易的勇敢刪削、馬君武對俄國文學的濃縮，以及嚴復「標新立異」的名詞譯法。

筆者認為，以後人的眼光觀之，「淡、寒」論戰之於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終極意義（ultimate significance），乃在其呈現了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多義性（multiplicity）與豐富性（diversity）——無論是往「在地化」走，或朝「理念化」去，這些或博學多聞，或關心鄉里的見地，不僅展現了金門民初地方知識份子

<sup>11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卷第四期，頁 2265。

<sup>114</sup> 淡菊，〈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載於《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四期，頁 1375。



對文學知識系譜的想像，也顯示出他們對報刊雜誌功能的期待。如第十卷第四期中，當寒冰再次來稿〈再駁淡菊君對顯影文藝欄之議論〉之一文，《顯影》編者特地在該文前頁，以斗大字號標示「歡迎讀者俱來參加論戰，為今後『文藝欄』闢一新途徑」，並加註說明曰：

淡菊及寒冰二君，為受著「愛護本刊」的熱忱所驅使，便不惜抽其寶貴之時間，在為今後本欄之改善，專以其遠大眼光而論戰，這是本刊何等榮幸的回事，但我們總希望其他的愛我者，能以其獨到之思想，不吝珠玉，互相指教，以求此刊得因是而有條直道路可跑，那實幸甚！<sup>115</sup>

這種語調誠懇地反襯出《顯影》編者對於刊物編纂之迷惘，並積極地向外尋求協助，此正呼應了金門文學「白話嘗試期」的「嘗試」精神。而文中所謂之「遠大眼光」與「獨到之思想」，或許即為筆者前述所指出的——淡菊的「在地化」與寒冰的「理念化」之文藝觀。又，正是由於這些觀點的交互激盪，饒得以塑造了《顯影》所反映出的——金門現代文學起點之生猛與精彩。

### 第三節 1932-1936：文藝大眾化的推廣與實踐

#### 一、淡、寒論戰遺緒流行的「現實主義」文藝觀

承前述，從「淡、寒論戰」中，我們可得一窺金門現代文學起點，不僅有以刊物環境與讀者為中心的「在地化」文藝觀，亦存在朝向作者文學技藝磨練，帶有菁英主義傾向的「理念化」文藝觀。筆者以為此二種觀點，並不相互衝突，因為無論是「寫作」還是「閱讀」，只要是《顯影》文藝欄的愛好與欣賞者，都期待看見家鄉的文學現代之花，發芽於金門現代之壤。以此作為前提，文藝「朝向大眾」、「面向大眾」的概念便應運而生。於焉，所謂的「文藝大眾化」，筆者欲先回到本章最初提及的「文教風氣」來談——珠山小學「校友會」，奠基於鄉緣團體的情感基礎，透過文藝社團之創設、同人文藝活動的實踐，締造出一種集體的「現

<sup>11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卷第四期，頁 2261。

代化」構想。這種自力更生的營造與實踐，反映了民初倥偬時局下，官方對地方資源挹注不足之情形，迫使這種僑鄉僻隅的在地「小學」，不得不一肩扛起一鄉的文化任務；而反映這種文化「任務化」所誕生的「文學觀」或「文藝觀」，勢必最終走向文藝「目的論」的結果。



回到《顯影》，我們可以看見「寫作」作為一種文化規訓或現代化的「目的」或「方法」，事實上最早便出現於第一卷第二期的學生文藝欄「雛燕」，在該期「雛燕」中的學生作品，以珠山小學師生赴廈「校外郊遊」的經歷出發，要求這些學生在一面學習白話書寫的同時，一面加深其「現代化體驗」的印象及意義。<sup>116</sup>而除了此一實踐，當再度回到《顯影》「白話嘗試期」的訴求，則可見其亦擁有強烈的「目的性」：透過個人主義的發揚，打倒傳統封建禮教風氣。

是以，縱觀作為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顯影》，其本質即在構建一種集體化的現代性參與，只是從「白話嘗試期」到「大眾文藝期」，其所呈顯出來的文學主題與文字形式，隨著刊物本身愈發強調「在地化」或「理念化」的追求，而漸次萌蘖出了許多型態不同、顏色各異的文學之葩。同時，受過新式教育的金門地方知識份子，也往往將其在外地求學時，所接受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緒與思想，化作《顯影》的文學作品。是故，在接下來探討金門現代文學起點「大眾文藝期」之同時，我們不僅不可忽略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發展與思潮演變，且更應該留心在地知識份子是如何對其挪用與模仿。

必須指出，「文藝大眾化」這個口號，實際上帶著十分厚重的左翼色彩，根據〈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歷史意義〉一文對「文藝大眾化」的詞源學考究，1919 年以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已經劍指傳統封建糟粕，卻尚未沾染左翼色彩，而僅在內容和形式上追求革新。而真正帶有左翼意識，提出文藝要「面向勞苦大眾」的口號，則肇始於 1928 年由創造社、太陽社等文學團體所發起的革命文學論爭，最終成熟於 1930 年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

---

<sup>116</sup> 《顯影 (Shinning)》第一卷第二期，頁 43-58。



當是時，「文藝大眾化」實則一躍而爲了左翼作家文學統一指導的最高綱領。<sup>117</sup>這個綱領的終極意識，乃指向左翼作家群體言必計從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是爲針對大多數左翼作家自身出於「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覺察及批判。<sup>118</sup>

又，考察《顯影》中最早提出「文藝大眾化」（或大眾文藝化）這個口號，乃導源於第六卷第一期（1932.03）文藝欄編者的前言〈小談〉。<sup>119</sup>再次出現，則是爲了回應淡菊於第六卷第四期（1932.06）〈我見〉的「在地化」文藝觀提出，如《顯影》編者在該卷期的頁首提及：

很多人在希望把文藝縮篇，及將新聞增加，這點固然是同意的。

不過很少有新聞發現，全人坦白聲明：不是我們有聞不納，在這荒煙俗氣的小島，確難以採訪關於必要的新聞，緣此，本刊篇幅致到很勉強把文藝欄納入，來增實頁數，也可順此來鼓吹「大眾文藝化」。<sup>120</sup>

這樣的聲明，除了再度反映出《顯影》作爲金僑社區之重要報刊，其自身對島內報導嚴厲的自我要求，亦顯示出「文藝」作爲該刊欄位之一，其強烈的目的導向。

根據筆者的通盤考察，《顯影》又再出現「文藝大眾化」的時機點，則是第十一卷第二期（1934.10）的編者前言：

為著文藝大眾化的緣故，本期文藝又至活躍，但願大眾都來參加，使這荒

---

<sup>117</sup> 詳參葉楠、劉文忠、董健，〈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歷史意義〉，收錄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編，《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60.03），頁 44-47；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2），頁 327-334；倪墨炎，〈文藝要走向大眾——紀念“左聯”成立 60 周年〉，收錄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編，《左聯論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頁 65-73。

<sup>118</sup> 湯逸中，〈魯迅與左翼文學運動〉，收錄於左聯成立會址恢復辦公室編，《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9.09），頁 26-28。

<sup>119</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一期，頁 1237。

<sup>120</sup> 《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四期，頁 1371-1372

地，長出可愛有刺的玫瑰花，使每個都不敢任意攀折。<sup>121</sup>



文中所言「文藝又至活躍」，首先可視為第十卷第一期（1934.03）至第十一卷第一期（1934.09）期間，《顯影》「淡、寒論戰」砲聲轟隆的回應；其次，亦再次透露出該刊文藝欄「前言」與「編後話」中頻頻出現的「稿荒」。<sup>122</sup>

返還筆者所欲將金門現代文學起點「大眾文藝期」（1932-1936）用來對照的中國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1927-1937），實際上在文學創作的題材與表現上，便明顯從「個人自我抒懷」而慢慢轉為「個人走向社會」。是故可見，其從文字到聲腔，皆大幅刪減了「我」的張揚；此際，文學雖漸趨於描繪大環境下，普遍人類的生存問題，以及「自我和群治之關係」，但這種從「內心掙扎」走向「環境多變」的態勢，使得「散文」、「人的文學」或「小品文」這類作品光芒略減，而旨在批判現實的雜文，與揭露環境的小說，卻旋爾蒸蒸日上。<sup>123</sup> *返還〈我見〉*一文中所言：

金門如是之沉寂，其原因不一而足，然而一切事物無報紙之宣揚、輿論之啟迪，實為主因。今之顯影，雖非金人正式報紙，然而稱之為鄉報，於情於理亦得其宜，既名之為報矣，著論立說為不可少之事，故菊期望而今而後，先生能負起新聞記者之天職，而作鄉事、島事，以及黨國大事之評論，使一班人有深切的瞭解，俾免是非不明、以白為黑……。<sup>124</sup>

值得玩味的是，文中所謂的「一班人」並非「一般人」之訛誤，而是具有識字能力，有機會投身於社會的人；結合文中更提及要「作鄉事、島事，以及黨國大事之評論」，以「俾免是非不明、以白為黑」，此處隱隱然可看出淡菊對《顯影》評論文字有所期待，甚至盼望其可企及政治批判之高度。

---

<sup>12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第二期，頁 2376。

<sup>122</sup> 如第三卷第四期副刊編者的邀稿，詳參《顯影 (Shinning)》第三卷第四期，頁 652。

<sup>123</sup> 參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224-231。

<sup>124</sup> 淡菊，〈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載於《顯影 (Shinning)》第六卷第四期，頁 1373-1380。

不過，《顯影》編者的心中看似自有一把尺，旨在一種以保護地方公益為出發點的思索：

多做時評，卻因編者無暇顧及，除每次作消息之外，又要擔任印刷抄寫。

對於時評宜有鎮靜的眼光去觀察，不能馬虎從事，且現在中國社會紛亂時期，言論不得一點自由，一失足而《顯影》總會有多大的影響，至於徵文一節，能盡其責有幾人呢？故無形中而使先生與《顯影》諸全人之失望田地的！<sup>125</sup>

文中編者對於淡菊所提及的「時評政治性」，不啻可看作其內心警總的現身，以及對「中國社會紛亂時期，言論不得一點自由」之遠慮。在「重光後」曾編輯《顯影》的張夢我所撰之〈我對於『顯影』的看法估價及期望〉一文中嘗言：<sup>126</sup>「『顯影』月刊，既非機關喉舌，不挾黨派偏見，又非茶餘飯後幫閒小品，自無須無病呻吟。」可謂再度印證了《顯影》編輯在時評方面，不太可能為表達政治傾向，妄自輕犯冒謔，自斷其出刊之手足。

隨著國民黨 1927 至 1928 年「清共」的大發雷霆，1930 年《出版法》應運而生，作為國家機器的合法體現，其內容明確規定了包含著文學出版在內的所有印刷項目，皆必須標明著作人、編輯人、出版者與發行人，以對其所生產的文字負責。其中，包含向政府的出版書面申請，及該法嚴實具訂「政治條款」，諸皆反映出，面對暗潮洶湧的左翼文化傳播，以及一切對「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國民政府」、「中華民國」、「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破壞與妨害，國府可謂擺出了「緊迫盯人」態勢。<sup>127</sup>根據賀麥曉對 1930 年代報刊審查機制的詳細考察，可知在 1930 年代早期，雖然審查制度無所不在，但報刊雜誌的編輯與發行人還是可以想盡辦法來規避，其中，作為全國出版中心的上海，對文學刊物

<sup>125</sup> 〈答淡菊君〉，刊於《顯影（Shinning）》第六卷第五期，頁 1431-1434。

<sup>126</sup> 有關這一點，可詳參夢我，〈我對於『顯影』的看法估價及期望〉，載於《顯影（Shinning）》第十七卷第六期，頁 3311-3313。

<sup>127</sup> 賀麥曉（Michel Hockx）著，陳太勝譯，《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1），頁 238-240。

的審查，在一定的「文學場法則」前提下，便顯得相對寬鬆；<sup>128</sup>但若言及地方審查制度與施行狀況，便混亂與複雜許多，對照到當時國民黨政權對地方權力機構掌握之不穩定，可推測 1930 年代的金門文學環境，其實是處於政治高壓、中國國內局勢動盪，報刊出版受到國民黨嚴格控管與思想箝制的情境中。因是，《顯影》雖未在《出版法》甫一推出時便響其革變，然自第五卷第二期（1931.09）起，亦始在各卷期最末附上出版年月份、卷期，編輯人與出版者（前者為「珠山新村社」，後者為「珠山通訊社」）。<sup>129</sup>

然而，雖然白色恐怖看似無所不在，可左翼的文藝思想，或一切帶有馬列主義、普羅文藝、安那其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等思潮，卻隱約暗潮洶湧——據王錫榮指出，當時許多標榜中右翼傾向的報刊，為廣銷其通路，也會毫不避嫌地刊登左翼文學作品，波逐讀者之隨流。<sup>130</sup>無論是「京派」、「海派」，甚至凋敝農村的小小無名作家，皆可能書寫出諸般內容。《顯影》中，這種帶有左翼色彩的文藝實踐，在「大眾文藝期」的文學作品表現上不容小覷。本節第二小節中將說明的《雛燕》文藝欄是一例，而第三小節將說明的，主張「在地化」與「鄉土性」的文藝欄位《濯巖》更是一例。

作為金門現代文學起點「大眾文藝期」高峰的《濯巖》第一期，編者〈前奏〉曰：

文藝本附屬在顯影，向來是不曾出頭露角，我們深覺自憐嘆，當此鉛印機會，於是我們更想新闢「濯巖」這獨性文藝的意思，這種動機可使大家都

有文藝相當印象與興趣，也就是供給愛護本刊的讀者予以發表文字的場所。

我們既變更體制，篇幅於是我們擴充起來，同時更歡迎外稿的擲惠，因為我們極願意使一切人普及文藝化而盡其發揮的精神，我以為誰應有文藝的存在，更須認清文藝是借文字的媒介，以人物的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東

---

<sup>128</sup> 賀麥曉（Michel Hockx）著，陳太勝譯，《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1），，頁 240-263。

<sup>129</sup> 《顯影（Shinning）》第五卷第二期，頁 1063。

<sup>130</sup> 王錫榮，《“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7），頁 186-190。

西這性質，因為我們以編這「濯岩」是要必然地與大眾發生密切的關係，同時要社會上的惡污點都暴露其真像，使讀者從這裡的激刺中覺醒與反應，因此我們不辭困難將這小小地弄起，毅然向天字的界線去，話雖如此說，可希望大家共責保育，本「濯岩」花草方有向榮的一日。<sup>131</sup>

《顯影》從「白話嘗試期」過渡到「大眾文藝期」的創作關懷，正如同文中昭示的，「使一切人普及文藝化而盡其發揮的精神」，並指出一般大種都應負起「文藝」的責任：作者要透過人物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以及揭露「社會上的惡污點」，讀者要「從這裡的刺激中覺醒與反應」，此中深切的「文藝功用觀」，不言而喻。

此中機杼，當可結合到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過渡到「第二個十年」所發生的轉變，正如同溫儒敏所闡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的高原期，影隨其後的作品沾染極為濃厚的「青春」氣息，在力爭個性解放、社會改革之同時，作品語調卻普遍感傷，顯露出筆者前揭的個人主義、主觀主義調性。然而隨著「五四」的新鮮感褪去，國內情勢動盪依舊，加上國民黨清共後愈發高壓的社會治理，種種態勢，無情地映照出「新青年」理想的破滅。此際，在國民黨無法有效治理的廣大窮苦農村中，馬列主義思想隨著左翼文化的暗湧傳播，另一種蠢蠢欲動的文學觀點漸漸浮現——「realism」。<sup>132</sup>

對「realism」這個西方舶來品的翻譯，在現代漢語與國共對立的歷史脈絡中極其複雜，本文僅擬作最簡要的說明。首先，倘將「realism」視為創作最高原則，其最基本之含義，乃要求「文學藝術對真實的客觀反映」，這一概念最早可溯源於古希臘，下至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時期云云，並最終在 1830 年代作為浪漫主義的反動，蔚為一可觀的文學思潮。<sup>133</sup>此外，「realism」作為文藝批評的專有名

---

<sup>13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第三期，頁 2425。

<sup>132</sup> 詳參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55-56。

<sup>133</sup> 馬新國主編，《西方文論史》（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1），頁 238-239。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文學術語新詮》（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9.11）頁 18-20。

詞，成型於 1855-1856 年間，<sup>134</sup>隨著工業革命的成熟與現代化，來自英、法、俄、美等國的文學批評與實踐者們，要求逐漸增多的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作家們，在描繪自身所處社會之同時，也應開始關注窮苦「大眾」的社會與生活，<sup>135</sup>並且要讓那些「令人不快的污穢之物」攤露在小說中。<sup>136</sup>

然而，作為金門現代文學起點中，「大眾文藝期」所實踐的「文藝大眾化」內蘊，卻並非 19 世紀歐洲傳統的寫實主義——返還前述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可見作為文壇主流話語的左翼文藝觀，隨著 1930 年「左聯」之成立，順道帶動了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們，借鑑以「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學界普遍簡稱「拉普」，即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之縮寫「РАПП」）為首所提出的「唯物辯證創作法」（dialectical materialist method of literary creation）。<sup>137</sup>回到「realism」的翻譯問題，凡參照馬森之見解，便可知在 1949 年以降，當國府「退守臺灣」，中共「掌權大陸」之際，中國大陸方即統一將其譯為「現實主義」，以取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通用的「寫實主義」。換言之，

<sup>134</sup> 參見溫塞特（William K. Wimsatt）與布魯克斯（Jr. Cleanth Brooks）著，顏元叔譯，《西洋文學批評史》（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05），頁 417。

<sup>135</sup> 馬新國主編，《西方文論史》（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1），頁 239-267。

<sup>136</sup> 有關歐洲寫實主義傳統，或可參考此中之最高典範——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在 18-19 世紀俄國「農奴制」悲慘的歷史背景下，他身為大地主，卻對勞苦的農奴們有著深切關懷，並以宗教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寫作。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作為自我投射的第二主角「列文」（Nikolai Dmitrievich Lyovin）同為地主，在從事使身體疲憊的農務勞動中，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從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文學實踐，我們不難發現這種 19 世紀歐洲寫實主義的傳統，其對社會、人性的描寫甚至批判，乃暗含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更多地指向「人生」、「人性」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此際，一種「劍走偏鋒」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從 19 世紀歐洲寫實主義的尾聲（同時亦是 19 世紀的尾聲），經由法國左拉（Émile Zola）的「實驗小說論」（The Experimental Novel）之延伸並倡導出來，旨在透過機械性的筆法，將「人」視作「動物」以描寫，而人在自然環境與社會衝突的任何狀態中，始終無法脫離社會經濟力量的影響，這樣的帶有唯物主義（materialism）傾向的文學，往往呈現空漠、冷酷而愛莫能助的敘事口吻。實際上，自然主義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漸漸在歐洲翕然成風的文學前導。參考自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倪偉譯，〈現實主義與當代小說〉，收錄於《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291-292；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55-71；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7.01），145-161。

<sup>137</sup> 詳參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234-277。

發端自五四時代的「寫實主義」，委實明確地指向緣起於 19 世紀的歐洲文藝傳統，但中共方所譯的「現實主義」，卻旨在暗渡馬列主義信徒仰之彌高的「唯物辯證創作法」。<sup>138</sup>事實上，根據溫儒敏的研究，早在 1930 年代初期，左翼作家如瞿秋白，便已在許多文章中別出心裁地將「realism」譯作「現實主義」，以表其「唯物辯證」的意識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在他的許多文章，包含《地泉》序中，都把 Realism 譯成「現實主義」，以表示與舊譯（筆者按：即五四時期之譯法）「寫實主義」的區別。「寫實——這彷彿是只要把現實的事情寫下來，或者『純粹客觀地』分析事實的原因結果——就夠了。」瞿秋白認為「現實主義」就必須在真實地「描寫」、「表現」社會關係時，顯示歷史的發展方向。<sup>139</sup>

瞿秋白的「現實主義」文學提倡與實踐，深深左右了中國「左聯」於 1931 年 11 月所發表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之決議。該決議首要聲稱，中國的革命文學非但務在牢牢抓緊反帝、反軍閥、反資本家、反白色恐怖等軸心，還必須描寫農村經濟的動搖與變化、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兼沒落、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廣大的失業與貧苦生活等等。<sup>140</sup>

諸般由左翼文藝團體所驅策的「介入性」議程，雖無啻濃厚地反映在《顯影》文藝大眾化的主張，卻亦可遠鑒於溫儒敏所揭示，相繼於「問題小說」的創作風潮，1923 年間上海《文學週報》也會有過一段「鄉土文學」風潮：

「鄉土文學」的創作熱潮……幾乎是緊接著「問題小說」熱而湧現的。「鄉土文學」的作者顯然已不滿那種從瑣屑的生活題材中提出碩大哲學命題的「問題小說」，對當時向壁虛構的文風和概念化的創作尤其膩煩，他們的視線「從狹小的學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波浪轉移到廣大的社會的動態」，寫作興趣更趨向於實際的下層社會生活，這是對前一段創作風氣的

<sup>138</sup> 參見馬森，《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12），頁 9-10。

<sup>139</sup>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111。

<sup>140</sup> 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254-255。



藉此回顧，當「新青年」們對「革除封建禮教」的熱情衰減，這股轉向風土色彩、泥土氣息以描繪國民性、地方性的鄉土文學風尚，便是他們的新去處；此一波潮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當為魯迅 1924 年描寫魯鎮與祥林嫂的《祝福》。而在《顯影》「大眾文藝期」中，重又現於筆者將在本章最後所談論的在地化副刊《濯巖》。

筆者在本小節業已探溯了具有左翼文藝意識的「現實主義」創作論，是如何從 1930 年代的世界到中國，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文學思潮，但站在本文「以今視往」的文學研究視界而言，筆者仍然要指出，接下來用以分析《顯影》「大眾文藝期」的「現實主義」創作成果，筆者將採用盧卡奇 (Lukács György, 1885-1971) 的文學現實主義 (literary realism) 觀，這位受到「馬克思－恩格斯」 (the Marx-Engels tradition) 主義與黑格爾辯證法 (Hegelian dialectics) 深深影響的文藝批評家，其文藝美學觀點，是 20 世紀左翼文化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要在非常短的篇幅中介紹盧卡奇體系龐大的現實主義文論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得益于 Werner Jung、László Illés、Galin Tihanov 等人概要的介紹，<sup>142</sup>筆者試將其簡述於下，以利後續行文的沿用與分析。

盧卡奇的現實主義理論，雖然緣起於馬、恩、黑等龐大理論思想，在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學世界裡，透過參與論爭與許多文論的產出，使其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往往被侷限於 1930 年代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然而透過重探許多其在激情年代過後的文藝理論觀點，可嘗試總結出幾點特徵：

首先，盧卡奇的現實主義文學／文藝觀最主要卻也最令人費解的概念在，

---

<sup>141</sup>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頁 58。

<sup>142</sup> 參考自 Werner Jung，〈盧卡奇與現實主義〉、László Illés，〈論盧卡奇 20 世紀 30 年代哲學、美學、文學批評理論的內在關聯〉、Galin Tihanov，〈重訪盧卡奇的現實主義〉，收錄於張亮主編，《盧卡奇研究指南：第三卷·審美與本體論：後期盧卡奇的理論體系構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08），頁 112-139。

「將抽象把握而得出的聯繫，用藝術的手段掩飾起來，即將抽象加以揚棄」。此中，「抽象把握而得出的聯繫」便即指作家內心直視社會環境現實（*reality*），<sup>143</sup>在腦中抽絲剥繭的過程；而「用藝術的手段掩飾起來」，所指者當為「下筆為文」；最終「將抽象加以揚棄」是創作者內心中有意識的「去自我化」，亦即「去主觀化」的文學。這種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多樣的，它可以嚴肅、譏諷、幽默或冷酷，但卻嚴重拒斥浪漫主義、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喃喃私語，並要旨於一種「典型化」的文藝手法／文藝觀，讓「人」成為時代命運裡的結構化風景，以表達特定時代社會的日常特徵。<sup>144</sup>

其次，在這種對典型化社會的書寫之背後，有一個終極關懷若隱若現——即透過文學對社會環境、典型化的命運與人格之書寫，文學不啻可以用來呈現「既存的社會狀態」，卻要進而以此指引出這個社會發展的階段，如何影響著人的存在——包含「成為人」或「成為非人」的過程，前者指向「人性的清晰成影」，後者則旨在揭示，一種不可避免且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進程中，人的「異化」現象。<sup>145</sup>

---

<sup>143</sup> 有趣的是，名詞的「*reality*」作為西方外來語彙，乃先借道於現代日語之漢字（かんじ）詞（即一般所謂「和製漢語」），根據劉禾的研究，在進入到現代漢語時，被翻譯為「現實」。詳參劉禾（Lydia Liu）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第三版修訂譯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8），頁318。

<sup>144</sup> 雷蒙·威廉斯指出，這種「典型化」特徵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語出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此外，普遍蘇聯的左翼文學觀點中的「典型化」，不能混同於「常見的人物」，真正的典型必須「建立在對未來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前景的理解」上。指出這種強烈的「介入性」文學特徵，有助於我們理解或嘗試批判左翼文學的觀點。參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倪偉譯，〈現實主義與當代小說〉，收錄於《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293。

<sup>145</sup> 「異化」這一概念雖然經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發揚光大，但事實上在歐洲文藝的歷史中可以溯源，它主要表達了「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對每個社會成員的個體性冷漠」，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則將之與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過程連繫起來，「具體而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疏遠於他們的勞動成果，而只是與它們產生契約性關係。這一過程也反過來促使工人們從自己的身體、外部自然、他們的精神生活、人類生活中異化出來。」這種樣態著實體現了在現代社會中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衝突與無力感。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臺北：麥田出版，2013.11），頁4-6。

## 二、如何大眾？——從《顯影》「雛燕」欄談起



承前述，《顯影》第十一卷第二期（1934.10）作為「日佔前」手寫油印的最後一個卷期，其編者前言便早已提出「文藝大眾化」的實踐，以提前諭示下一期的鉛印篇幅的增廣，與《灌巖》副刊的誕生。但編者前言中所謂「活躍的大眾文藝」，究竟如何體現？細讀其文藝欄，不難發現實際上只是一份《雛燕》特輯：

「雛燕」珠小學生作品自彙刊出版後，似乎是不曾在本刊探頭，本期編者選出幾篇，編為「雛燕特輯」文字如何？編者系不敢代為吹牛，現在還是請大家批評、批正。<sup>146</sup>

另，若重返《顯影》中初登場的《雛燕》（第一卷第二期，1928.10），編者便曾評論道：「小學生的文字，是平淡的……由天真的腦海中絞出來的『忠誠』句句話，似也足夠我們無時無地的欣賞吧！」顯現出發行於「校友會」組織的編者，對作為「大眾」重要成員之一的「學童」，確實十分看重。換言之，大眾文藝的實踐共同體，不僅侷限於成年知識份子或青年讀者之間，「學童」無疑亦要廣泛納入。

該《雛燕》特輯所刊作品，包含兩首新詩、一篇雜文與一篇小說：兩首新詩分別題為〈秋月賦〉、〈秋底傍晚——故鄉描素之一〉（以下簡稱〈秋底傍晚〉），<sup>147</sup>兩者皆為藉景抒情的小短詩，仍不脫古典詩之語言及意象運用。雜文則為祖求所作〈我對於故鄉的前夢〉（以下簡稱〈前夢〉），文中以半抒情半議論的語調從珠山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言及在地現代化的進程——期許未來的珠山可以開設平坦車道、游泳池、校舍建築，以及開辦「平民夜學」。此類評議文字，便即如筆者於第三章所說明的，《顯影》作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媒介，旨以文字影響力，挑動該刊讀者愛家愛鄉的情緒，回過頭來協助地方建設與發展。無論是〈秋月賦〉、〈秋底傍晚〉的白話新詩，還是〈前夢〉裡讓小學童開大車的雜文習作，種種無不揭示《顯影》「雛燕」欄位將「文學寫作」視為教化工具，以及透過文

<sup>146</sup> 佚名，〈算是編後〉，刊載於《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二期，頁2376。

<sup>147</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二期，頁2397-2398。

藝來服務在地社群的實用觀點。



以此為出發的學童教化實踐，另一蔚然可觀者是為「寓言」書寫。此際，回到前揭《雛燕》特輯中佔幅比最高的作品，當為署名「秀尊」所發表的寓言體小說〈一個小姑娘的厄運〉（以下簡稱為〈厄運〉）。篇中敘述一名窮苦出身的「小姑娘阿琼」之故事，並極力刻畫其與生俱來的「厄運」。其開頭處僅以短短一百餘字，描繪其卑微可憐的出身，卻馬上便將內容接到「父母染時疫而雙亡」。這種敘事簡單而粗暴，再透過一句「一直長到十五馬齒的時候，那知她的命運是更深一層」，無疑再加深了題旨。接下來的描寫，則更聚焦於阿琼的「女性悲慘命運」：父母死後，家中唯一可維生的「薄田」，因其身為女性不得繼承，只能眼睜睜地讓其叔父奪走，並遭其賣身為奴，受盡東家虐待與折磨。後雖一時得以成功「脫逃」，受「約翰牧師」之照顧，然這看似「轉運」的人生際遇，最終卻逃不過天生的「厄運」。其故事結尾實在僅能用「驚悚」二字來形容：

一次，她上市購物，一輪漆灰色的汽車向她前面飛來，她看見車裡的人，陡的起了一個很大的恐懼，於是拔起腿想逃，豈知那汽車早停住，立刻跳出那人捉住她的肩膀，推她進了汽車裡，嗚的一聲，一忽兒，影兒就隱沒去。<sup>148</sup>

這種對女性命運「全然無法自控」的書寫，很顯然首先要歸咎於《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壞榜樣。所不同之處，僅在於「白話嘗試期」的小說書寫多採第一人稱男性視角，此處則轉向了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並主要以「她」作為敘事稱謂。在全篇中，讀者最初僅能仰賴題目得知：該篇主角是「小姑娘」；其後卻始終在未聞其名的狀態下，不斷地閱讀到第三人稱的「她」，是如何受盡人生之悲苦與磨難。篇中唯一向讀者透露其名之處，僅出現於東家的吆喝：「『阿琼！給我拿盤水來！』主人帶著氣忿的聲音這樣囑咐她。」此際，女性命運的悲慘，再度透過如此悲情的敘事安排，變得更加深刻化——作者看似並不滿足於虐待年輕女性的

---

<sup>148</sup> 秀尊，〈一個小姑娘的厄運〉，載於《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二期，頁 2393-2397。

不過，對「雛燕」欄位的看重，一直是《顯影》編者們的初衷，這樣注重學童教育的風氣，一直保留到今時今日的金門——在每日出刊的《金門日報》上，依然不斷闡有這種讓國中以下的學童馳騁心靈，享受文字書寫快樂的「學生園地」，其內容大致便如《顯影》於第一卷第二期（1928.10）始，至第六卷第六期（1932.08）止的「雛燕」欄。在這段「白話嘗試期」裡，教師讓學童摹倣、熟習的文章，幾乎等同於當代語境的「作文」練寫，內容八九不離學校生活、職涯發展、情意抒發、家庭生活等等。<sup>150</sup>但自受到淡菊在第六卷第四期（1932.06）〈我見〉的「在地化」文學實用觀影響，那些讓學生自我張揚，開展人生未來想像的散文作品，從第七卷第四期（1933.01）起再度刊出的「雛燕」開始，陡然一夕變調，並幾乎化作了〈厄運〉這種帶有警世意味的寓言體書寫。<sup>151</sup>

這些寓言體小說所涉及之題材甚廣，負面者除了有如上述所論之蔚為大宗的「悲慘年輕女性」故事，也有批判人之賭性、貪性、玩性、叛逆性等作品，所描繪者從紈絰子弟、農村少年、富翁、賭徒而及動物；正面處囊括讚揚愛國、孝順、勇敢、智慧等云云，即為盧卡奇現實主義中「典型化」的最佳體現。不過

<sup>149</sup> 值得一提的是，「她」作為第三人稱女性代詞，是劉半農在 1920 年的發明，劉禾曾探討魯迅小說中女性人物的代詞使用，最早使用是在 1924 年發表的《祝福》，此前之作品則經常交替著使用不區分性別的「他」，或被認為是始於吳語的「伊」。劉氏更指出在《祝福》裡，身處上層階級敘事者的「我」，與被描寫的下層婦女第三人稱「她」（祥林嫂），形成了階級和性別共構的差異，這指向了 20 世紀初期中國在尋求現代性時所產生的某種緊張關係。詳參劉禾（Lydia Liu）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第三版修訂譯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8），頁 50-52。

<sup>150</sup> 如第一卷第二期的主題是「旅廈校外郊遊」，第一卷第三期的主題是「畢業出路」，第一卷第四期的主題是「新年情景」，第一卷第六期的主題是「寒假時光」，第六卷第五期的主題是「小學階段的生活」。詳參《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二期，頁 43-70；《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三期，頁 126-135；

<sup>151</sup> 如該卷期之薛彩鳳〈聰明的狐狸〉、薛永淮〈貪心的林華〉、薛素嬌〈貪心的富翁〉；以及賡續此番變革的第七卷第五期（1933.02）所刊出的芳祝〈徐良〉和彩鳳〈勇敢的孩子〉；第八卷第一期（1933.04）的祖求〈一個愛國的少年〉、瑞華〈螞蟻的精神〉、彩連〈悔過〉、春士〈摩登的小子〉、敬春〈賭徒末路〉；第十一卷第四期的伯卿〈為生活而犧牲的佩華〉、秀尊〈寶兒的死〉；第十三卷第二期黎明〈穿破爛的人兒〉；第十三卷第四期冬林〈賣身葬母的寶兒〉。

我們亦可發現，其所刻畫者也有一大部分是年輕的少年少女，正與「雛燕」學童年紀相仿，於心境刻畫上更顯其近身性（relatability）。總言「文藝大衆化」對於珠山小學學童文藝教育的成果，雖說這些極具警世及教化意味的寓言體習作，得讓學童透過特定的「故事」體裁及內容書寫，達到人生觀之引導作用，但此類關諸磨練「特定情節」的作文教育，卻不免讓人產生疑慮：其是否僵化了學童看待人生的觀點，如「相信命運」，或者對特定人物產生「刻板印象」？總言，這些對孩童來說看似過早的世俗化敍事，與社會化摹習，勢必是《顯影》編者讓「文學成為教化工具」與「文學服務社群」的文藝實用觀與現實主義文學觀，必須直面的質詰與哉問。

### 三、怎樣鄉土？——論《濯巖》的實踐及其意義

圭峰，<sup>152</sup>又名「雞庵山」，<sup>153</sup>乃珠山一居高處，其上所矗者，兩大巨石也。兩石相偎上，又覆一石，珠山鄉親雅其名曰「濯岩」，<sup>154</sup>其寬約逾數丈，高一至二丈，憑其下二石之支撐，形為一處天然洞穴。<sup>155</sup>該處曲徑通幽，素為珠山鄉人夏日消暑、聚團言歡之本場。可惜的是，冷戰時期為前線戰略所需，「濯岩」因恐被共軍作為測量目標，是故連帶金門城的「虛江嘯臥」碣石群，以及前水頭「茅山塔」，悉遭拆弭。<sup>156</sup>其原址今已闢為現代化仿中國園林式的「御鳳亭」，筆者嘗得親訪，可謂其當真為俯瞰珠山全貌之絕勝也。第十一卷第三期（1934.11）起，趁當卷期改為排版鉛印之機會，作為《顯影》定番副刊，刊載長達二十期的《濯岩》問世，在其標題「濯岩第一期」之上，標示其同人為「珠山新村文藝社」，不僅散發出其副刊的地方與鄉土氣息，也可視為《顯影》「大衆文藝化」的具體實

<sup>152</sup> 圭峰分別與珠山另一高處「龜山」為犄角之勢，據《顯影》第十一卷第三期載，1934 年為防衛鄉里之故，該年 5 月先於龜山築就小型炮樓，8 月圭峰跟進，並派員駐守，甚至雙雙款其曰龜山「夕照」、圭峰「聽濤」。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三期，頁 2423。

<sup>153</sup> 李金生，《雞庵山頂談珠山歷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1998.07），頁 50-51。

<sup>154</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三期，頁 2425。

<sup>155</sup> 《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頁 322

<sup>156</sup> 詳參李金生，《雞庵山頂談珠山歷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1998.07），頁 128-129。

踐。有趣的是，當該刊走馬至第四期（附於《顯影》第十一卷第六期，1935.02），卻忽爾更其名為「灌巖」，此用法一直沿襲至《灌巖》第二十期（附於《顯影》第十五卷第四期，1936.12），然而究竟是「灌岩」抑或「灌巖」，無端惹人疑竇。筆者擬欲訓詁，是以查索了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中心的線上「漢語多功能字庫」，發現「巖」字「本義為崖岸，即山或高地的邊」，而除了《楚辭·天問》用以表稱高峻的山峰，「巖」字亦通同「岩」（表岩石），《莊子·在宥》則另作「洞穴」義解。<sup>157</sup>總括來說，「巖」字的多義與衍異性，似乎較「岩」更深一層，又因作為副刊的《灌巖》大半時期悉採用此字，故本文當可順理成章地採取「巖」字，以利後續行文。

又據《顯影》第一卷第一期（1928.09）記載，珠山校友會轄下地方建設組織「修造會」，因其上所鐫「一尺四方」大之「灌岩」二字漫漶，為感其有再琢之必要，爰托付校友薛永乾（惕齋）賜墨，銘鏤再成，<sup>158</sup>此誠一種對地方自然文物的續命風骨。正如《孟子·盡心》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格其義也，可謂「灌巖」不僅可供登高望遠，也象徵珠山文化命脈的崇峨巍峻。《顯影》第八卷第四期（1933.07）署名「蔚卿」之新詩作品〈碎的一顆——寄給 C〉嘗云：「冷清清的灌岩，孤單單一恨人」，「向誰寄悲吟」。<sup>159</sup>此可見在地騷人墨客留連曠語之影，宛如歷史扉頁裡靜默的孤芳。該新詩雖不免再啟筆者前述白話新詩體「新瓶舊酒」之虞，卻重又體現了《顯影》的重要史料意義，及該處作為珠山文化象徵場所的傳神寫照。

以一蔽之，《灌巖》副刊對地方與鄉土的關懷，不僅受到左翼文學思潮的影響，也流衍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餘波，並直接地受惠於淡菊「在地化」的文藝實用倡議。如肇端於《灌巖》第二期（刊載於《顯影》第十一卷第四期，1934.12）的「村夫實話」系列雜文，即意在擬造一種「在地小人物」的口吻，以營造泥土氣息

---

<sup>157</sup>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中心，「漢語多功能字庫」（來源：<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B7%96>，檢索日期：2025.06.26）。

<sup>158</sup> 詳參《顯影（Shinning）》第一卷第一期，頁 7-8。

<sup>159</sup> 《顯影（Shinning）》第八卷第四期，頁 1886-1888。

的厚重，與反映現實情境的消沉。<sup>160</sup>這些作品雖然與「白話嘗試期」同為第一人稱視角呈現，但其背後意圖卻明顯高度摻入了「現實主義」的「介入精神」與「教化意義」。換言之，雖然文學作為批判救世的「目的性」雖然不變，但此處「大眾文藝期」的寫手們，卻自覺地換上了一種新的「佯裝的客觀」——亦即前述在盧卡奇現實主義文學觀念中的「下筆為文的去自我化」，以取代了「白話嘗試期」文學特徵中「主觀對社會現實的好惡」和「自我抒情」。對於《濯巖》「村夫實話」系列雜文中在地化、鄉土性的意圖及詮釋，此以第十一卷第四期的〈談寄家信〉為例：

煙捲啄啄的拋完了灰，曬於陽光冷氣也驅走不少，本好多言多語的我，無聊提話當柄；情形越來得糟談到南洋客寄來家信的問題，多數由每月幾十元而湊足幾元的甚至不寄的現象，怎不使人悶煞！虧得我識幾個字眼兒，厝邊鄰右要我覆信也不算少，嬸姆們回話中總是苦衷心話，「叫他多寄回來，免我伸手摸壁。」把情形來探討，的確也在緊急中，年關節多，應花的銀錢更多，不比常日蕃薯跟鹽菜，設不跟人忍痛鋪張，自家情形且不管，巷頭壁尾卻難禁，真是實事勝于雄辯啦！話說回來，聽說南洋商情，真不比從前，什麼裁員啦！倒店拉！失業啦！鬧翻一片，使得咱僑民坐臥難安，不覺給我老喉情塞，替番客吹不出怨氣，實在他們自身且艱計，信且由她封封寄怨咒語，權當充耳不聞，自己也明白不是「阿木林」，橫直三五塊錢是寄不得，著實也不雅氣，索性一年半載暫停寄通寶。<sup>161</sup>

文中的「阿木林」，作為某種人物形象或代稱，應指涉一類具有穩定寄匯能力的「理想番客」典型，村夫以此作為反向對照，自況其困窘與無能為力。<sup>162</sup>然

<sup>160</sup> 在《濯巖》二十期中，一共刊載了十二篇，內容除了〈談寄家信〉，亦有〈漫談冬至〉、〈歲新談博〉、〈從村民生活的救濟著想〉、〈怎樣博滅蚊蠅〉、〈節蒲〉、〈建設新村提案第一條〉、〈我們的笑容〉、〈漫談讀書〉、〈誰要自己蓋棺〉、〈關於平常談話的常識〉以及〈漫談珠山三月節〉。

<sup>16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一卷第四期，頁 2445。

<sup>162</sup> 這類語詞可能來自金門話中的外來語，尤其是珠山僑居社群「菲律賓衣里岸」(Iligan) 地區所通用的他加祿語 (Tagalog)；然而筆者在對照《金門縣志·卷三·人民志》第五篇〈語言·第二章·外來語彙〉、洪乾祐《金門話考釋》、《金門話研究》等等有關外來語的金門話詞彙後，終惜查無此一條目，礙於筆者學識有限，此處或許仍有待田調或研究金門話之學者進行更為細緻的考證。詳參洪乾祐，《金門話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12)，頁 121-122；李仕德總編

而文中雖已盡量透過諧筆諧調，將自我形象化為「村夫」（甚至將筆名取作「卡叔」）以展現小人物泥土的濃厚氣味，卻不免還是露出「嘗試說教」的馬腳。是以，雖曰此一系列可看作《灌巖》服膺「文藝大眾化」的「去自我化」書寫實踐，但細讀其內容，卻還是可看出當中難掩「代言體書寫」的知識份子痕跡。

「村夫」在整個「實話」的系列雜文中，不妨將其視作一群「卡在中間」的知識階級映現，如〈談寄家信〉中便描寫卡叔不僅能夠理解洋客的生活困苦，卻不免時時受到「婆婆媽媽」們「委託寄信」，在「洋客」與「等待僑匯的鄉民」之間，進退維谷。<sup>163</sup>而另一篇刊載於第十一卷第五期的〈漫談冬至〉，則將主題聚焦鄉中習俗：

一年一度的冬節，按照我們歷次的設祭儀式，在作者對於新舊的禮制俱絲毫沒有點兒把握以前，自然未敢加以非議，不過在原有禮式之間在略為補充些厘，似得以使這一種祭日，會比較有點價值……。<sup>164</sup>

可見「村夫」之語氣，雖一面試圖保持謹慎客觀，卻不無充滿批判的「挑戰」意味，文中接著敍述主祭之鄉老應當將所祭祀之祖先人格學識云云詳加介紹，若無，也至少要介紹其人來歷，否則大家「菜來即吃」、「酒到便飲」，「這簡直是個會餐，何足謂之祭祖。」而對於儀式中的「報成丁」方面，其亦表示應當排出「一二長輩加以訓誡」，且「在可能之下以應多加一條之考驗」，「而後方准其有報成丁之資格，而享入餐權。」文章對冬至祭祖的儀式一方面持「保留態度」，一方面也不吝「評議」，充分地展現了新式知識份子面對在地傳統習俗的躊躇進退之感。值得一提的是，今時今日，每年「冬至」與「清明」的「吃頭」祭祖習俗，依然延續在金門的每一個村落，而「村夫實話」作為「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在地化、現代化實踐，

---

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第三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頁 234-235。

<sup>163</sup> 有關僑鄉家書中所反映的艱難情境，與在地與離散之間的僑批運作機制，已於本文第三章探討，此不贅述。

<sup>164</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五期，2467。

誠然別具意義，值得令人再思。



總括而言，「村夫實話」系列不僅展現出強烈的教化意圖，其對於「代言體」書寫的採用，也標誌著《顯影》從「白話嘗試期」邁向「大眾文藝期」的一大轉折：文類形式從第一人稱的情感自述，漸漸地將要轉向第三人稱的客觀體察，不僅反映出敘述知識份子描繪事物的移轉，也象徵著文藝觀點由「替自我抒情」走向「替集體表述」的意識變化。

類似的轉換，也可從《濯巖》的另一項散文系列「鄉人小史」窺見。該系列文章《顯影》編輯澤人所撰，筆者將其歸類為散文，乃意在凸顯其標榜的「真人真事」：透過描繪珠山鄉中的兩位下層階級的「小人物」，將「在地化」的色彩呈現出來，文筆內斂，凸顯金門僑鄉的生存情境。刻畫最成功者，當為刊載於《濯巖》第九至十三期的〈羅彥伯伯〉，<sup>165</sup>該篇寫鄉中早期南洋歸僑「羅彥伯伯」的故事。其雖出身於南洋一處作者不具名的地區，<sup>166</sup>然而「峇峇」的身份卻沒讓他佔盡好處。作者並未明言，但顯然「羅彥伯伯」出生在南洋一個並不怎麼富足的家庭，又因「個性懶惰」，不願向「南洋鬼子」去「搖尾乞憐」，於是一心幻想著回到故鄉珠山，以求得自給自足，雖稍嫌清苦卻相對安穩的農耕生活。然而他的一生卻並未因歸國而從此順遂，先是其大兒子「為要在尋求比安適的生活，居然狠心撇棄了他的爸媽，重新跑到南洋去」，「起初還曾寄一兩封慰懷的信」，但「不到半個月前，似乎是沉石海底鏡的訊息全沒」。此外，其妻子亦「也許是懷子心切，常是對人嘆氣」，「也許是感到他的老伴是不會互相依靠，心絕了累」，最終「於是也放掉羅彥伯伯」。文中雖然在刻畫人物上保持客觀寫實的內斂原則，但第一人稱的敘事，卻仍舊不斷籠罩在「散文」文體情感言說的特殊性中，如作者對羅彥伯伯破敗住處充滿驚恐的窺視：

他失去了炊煙的內助，走離了承融人，於是家裡一切失了管理，自然也漸

<sup>16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二卷第五期，2595；第十三卷第二期，2647；《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第四期，2687；。

<sup>166</sup> 在《顯影》中，這種對特定殖民區所展現的國族情緒與批判書寫，皆常以「父父父」來表示。

地敬變，這是另一個時期的場景，當我閒步看他的時候，那些破爛褐灰的或黑色成絲條的布，滿塞著門空隙的地方，到是那陰濕的沒有光線的房子；播離了薰雜的氣味，污塵是滿罩著雜具，這包括淒涼的地方，我最恐懼，如進了監獄一般，陡心生起一種特殊的反感——這裏是給社會憎厭而擯棄的羅彥伯伯唯一的休憩所，我在想——他自己不知是否有識的感覺，會不會窺破每個深藏胸膛裏的人心？因為他孤立著如棵老松是被人所之山野。

167

文中諸般帶有階級「由上而下」的自我察覺感，以及透過幽暗場景所譜寫出對人性溫暖與冷峻的懸疑、猜測，乃至於掌握物質性、感官性描繪所帶來的閱讀感受，是「大眾文藝期」重要的書寫轉向之一。

有趣的是，重又翻檢《濯巖》，可發現於創刊號及第二期中，刊載了一篇署名「悔」的譯者所轉錄的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小說〈歌女〉<sup>168</sup>。該篇肇端於主婦作為合法妻子，自持身分優勢，以道德審判者之姿步步進逼；而璧沙雖驚惶錯愕，卻未全然被擊潰，她一面堅稱自身清白，一面以實情自辯，甚至在對方情緒潰決、流淚下跪時，反過來展現自身尊嚴。此一場景的層次切換，並非簡單的角色易位，而是透過語氣與節奏的交錯，使讀者意識到兩人皆在情緒與階級的邊界上反覆試探；而又，階級身分與情感交錯的關係，話語主導權與道德位置，幾度在對話中翻轉。我們從主婦的控訴、歌女的辯白，到雙雙破防的眼淚與沉默中，歷歷可見契訶夫小說的五彩筆墨，是如何著力於兩位女性的語言身段，以及心理的細膩描摹。而這些精彩絕倫的流暢書寫，讓原本典型化的角色形象脫離刻板對立，生成一種動態流變的人物繪影：主婦始於高貴卻終於狼狽，而璧沙看似世故卻亦擁有脆弱一面，此中，兩人皆被制度與情感所困，難以真正掌控命運。

由此可見，〈歌女〉所典型化與客觀描繪者，並非僅是的底層女性的悲哀態

<sup>167</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第五期，頁 2647。

<sup>168</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一卷第三期，2427-2429；第十一卷第四期，2447-2448。

樣，而是旨在凸顯某種社會的罅隙裡，被情慾、金錢與婚姻制度綑綁，糾葛難纏的倫理困境與現代性裂痕。其筆法不僅細膩地刻畫了人物性格，更示範了如何在短小篇幅中，仍然透過角色語言的心理變化，以取代過多的場面調度，來烘托一整套錯綜複雜的價值體系與社會批判。此種敘事手法之於《濯巖》，不僅是一則來自異域的翻譯文本，更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寫作感覺——小說不必鋪張造勢，而是要運用密集的場面對話與心理摹寫的節奏，來構築典型化的階級角色，並從人物身上照見制度與倫理的裂痕。

正如劉研在《契訶夫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書所指出，契訶夫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極為深遠，相較於 19 世紀寫實傳統強調「鉅細靡遺」的情節鋪陳與環境描寫，契氏不僅在題材選擇上更日常化，也為寫實主義帶來了敘事風格的轉變。<sup>169</sup>換言之，契訶夫所體現的則是一種更具現代意識的「客觀寫實」風格——小說不再由敘事者全盤交代，而是藉由人物對話、語氣變化與心理波動，展現現實中難以言說的裂縫與衝突。這種敘事方式，除了要「切面式」地捕捉生活經驗，也要揭露出潛藏其中的社會結構與價值鬥爭。在此，重返《濯巖》刊載的契訶夫〈歌女〉譯文，當可再思其翻譯文本的選擇用意，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反映了金門文藝實踐在進入「大眾文藝期」之際，對於人物刻畫與情節結構的某種期許。對契訶夫文本的其他翻譯實踐，亦刊載於《浯江》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如由施伍翻譯的《出了劇場》。<sup>170</sup>諸般具有嘗試性的翻譯實踐，對傳統金門僑鄉的在地語境帶來了不小的變革，換言之，契訶夫文本所體現的現實書寫意識，無疑已成為一種潛在的敘事感覺（narrative sensibility）。比起「白話嘗試期」的翻譯小說嘗試中，常見的浪漫情節與奇遇設定，<sup>171</sup>《濯巖》透過〈歌女〉引介的，正是一種

---

<sup>169</sup> 詳參劉研，《契訶夫與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01），頁 91-141。

<sup>170</sup> 施伍編，《浯江月刊》二卷四期（金門建設協會出版，1934.10），頁 10。

<sup>171</sup> 如自《顯影》第四卷第二期開始連載，署名「大森」所譯之〈轉變〉，實際上，該篇篇名原文應當為 The Second Honeymoon，並由英國 20 世紀初期最後歡迎的 Ruby M. Ayres 所作，其為通俗浪漫小說家之一，專寫愛情與成長的故事。《The Second Honeymoon》發表於 1920 年代，正值英國戰後社會轉型，女性逐漸追求獨立，但傳統婚姻觀仍然主導愛情敘事。小說講述年輕人 Jimmy Challoner 深愛女演員 Cynthia Farrow，但 Cynthia 為名利拋棄他。傷心的 Jimmy 轉

以人物衝突、心理推移為主的小說語法。它不僅拓展了《灌巖》文藝在結構與技巧精進上的可能性，也為《顯影》「大眾文藝期」的創作，提供了一種關於如何描寫倫理矛盾與社會節奏的參考方向。

更進一步言，契訶夫小說之所以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獨樹一幟，正因其所體現的寫實主義觀，並不流於圖解現實或宣示立場，而是延續了俄國文學傳統對人物內在狀態的深刻洞察——從托爾斯泰的倫理辯證、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的心理拉扯，到果戈里（Nikolai Gogol, 1809-1852）的諷刺筆鋒，契訶夫將這些筆法內化為一種凝鍊、微觀的敍述結構。他的小說世界幾乎不仰仗宏大的歷史場景，而是專注於體察個體行為與社會力量交織的剎那，那種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猜忌與折磨。此外，契訶夫的寫實主義典範，既不同於 19 世紀寫實主義傳統的全知敍述，卻亦尚未步入馬列主義以降「文藝為階級服務」的規訓架構，而是提供了一種猶能自由呼吸的敍事空間。對於《灌巖》編投者同人而言，翻譯契訶夫的作品，對如何「觀察」並「書寫」鄉土，實在別具意義。

在引介外國小說的同時，《灌巖》中亦刊載多篇小說文本實踐，其中，延續契訶夫的「客觀寫實」，與服膺現實主義「典型化」教條的小說，自《灌巖》第五期

---

向童年舊識 Christine Wyatt，卻因內心矛盾而遭到拒絕。當 Cynthia 試圖回頭時，Jimmy 終於看清真正的愛，並選擇 Christine。這部作品反映了 1920 年代社會階級與愛情選擇的掙扎，以通俗但富戲劇性的情節，刻畫主角從迷戀到成熟的成長歷程。值得注意的，此書書名若選擇直譯方式，應作「第二次蜜月」，這樣的譯法顯然反應出該時空背景的兩種可能：其一，「蜜月」作為現代語彙，尚未於白話文體中通行；其二，若「蜜月」已是通俗白話詞彙，則該篇為避免閱讀《顯影》的衛道人士抨擊，則以「轉變」來表示全篇在從上流到低階社會男男女女的愛情中，心理的各種轉變。然而手寫油印時期字跡漫漶，極難閱讀，甚至未附上篇名原文，連原文作者的標示亦模糊不清。甚至因其本為一長篇小說，故終未譯完，卻是《顯影》文藝欄位中篇幅最長的一次翻譯實踐。詳參《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二期，頁 805-846；《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三期，頁 849-878；《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五期，頁 905-945；《顯影（Shinning）》第四卷第六期，頁 946-990；《顯影（Shinning）》第五卷第一期，頁 991-1028；《顯影（Shinning）》第五卷第二期，頁 1029-1064。

(1935.03) 始刊有署名連載荒烟〈寶寶！再睡一會吧！〉，<sup>172</sup>該篇以「南村裏每一家屋頂上的煙囪，差不多都冒出一般的白煙。」將小說的佈景拓寬，彷彿長鏡頭一般，將視線慢慢推進（zoom in），語言間處處透過對貧民窟頹唐物件的摹寫，最終視角轉到「一塊污穢的小天井中」——一戶破落人家的衣食堪憂，躍然紙上。文中以第三人稱呈現下層階級的側面刻寫，不加入「我」，而是讓風景與人事自動切換、運轉，與「白話嘗試期」的浪漫傾向作品，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對小人物的側面刻寫，以及具備現實主義關懷的典型化人物、「去自我化」的寫實小說實踐，亦可見於帶有自然主義意味，兼具寫實與文字藝術性的七郎〈雨天〉；<sup>173</sup>以及諷刺小說，署名「野燐」所作之〈反常了〉。<sup>174</sup>該篇不僅承襲了〈歌女〉中透過對白與複雜的人物心理變化摹寫，最終結尾處，高潮於「無賴漢阿憨」當天化日之下，帶領地痞流氓們劫取賽錢箱的場景。而擁有收香火錢權力的「春屁爺」（這個取名方式也展現了諷刺意味），是地方傳統迷信社會既得利益的仕紳代表，其子孫雖然即時出面維護，一場拳打腳踢最終還是爆發。小說中刻意營造的譏諷氛圍，從廟堂中無能為力的神佛雕像，對地痞與仕紳的端嚴凝視中呈現，並靈活運用陰暗的自然主義筆觸，操持無奈又無賴的敘事口吻、步步推進其陳述節奏，醞釀出結尾一觸即發的衝突，鋒利地揭露迎神賽會的荒謬情境，堪為《顯影》「大眾文藝期」的佳作之一。

由此可見，《顯影》「大眾文藝期」的小說作品對「客觀寫實」、「小人物」、「典型化」、「去自我化」等寫法，業已初步成熟。不過此處不得不再介紹薛崇武在《濯巖》中後期所開創的，另一種更具階級批判意味的文藝實踐。雖曰在「重光後」其成為珠山當地長老，並於冷戰前線時期擔任地方要職，然其在「日佔前」，委實有過一段廣西的求學生涯。在《顯影》第十四卷第三期，化其筆名為「阿迪」的

---

<sup>172</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第一期，頁 2509；《顯影（Shinning）》第十二卷第三期，頁 2553。

<sup>173</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一期，頁 2628-2629；《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三期，頁 2666-2667。

<sup>174</sup> 《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一期，頁 2667-2668；《顯影（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三期，頁 2712-2714。

小說〈伊曼底煩惱〉，以第三人稱敘述一位窮苦的學生「伊曼」，在無法償還浣衣婦工資，又飢腸轆轤之際，向富人「沙特先生」求助卻遭冷拒。整體情節可說近乎「沒頭沒尾」，但正是這種鬆散的結構，與心理寫實的著重，使故事得以聚焦在階級衝突本身，誠與契訶夫許多短篇小說的書寫策略，頗為相似。而其文中多處內心獨白如「這世界，真真是不公平的……」、「我們的苦痛也就是大眾所受的苦痛」，甚至言及「必要先要把大眾身上的镣铐來粉碎」一句，毫無預警地觸發了涉及赤色文藝的「解放」語彙，在那字裡行間，其雖未直言「革命」，但隱隱初綻的批判意涵，肉眼可見。<sup>175</sup>

另一篇〈廣西南寧染織廠的巡禮〉，則更以一種壓抑的筆調，展現其「左傾」之端倪，該文為散文形式，有著冷靜克制的觀察語氣，勾勒出一幅工業現代化下的異化景觀——在唯有「機器轟鳴」的沉默場景中，「我們」默然觀看，甚至冷漠恍惚；「她們」赤腳操機，年輕卻毫無生氣；「他們」則混同於油污與染料間，成為了視覺幻影，也形同機器部件：

我們踏進了近場的門口，只有那拍噠拍噠不停的很單調的機器的聲音和振耳欲聾的鐵器聲。可是我們一直的進了這工場地。

織布機一行一行的擺得很整齊，同樣的隆隆的轉動，用機器織布，真的快捷，一眨眼似乎已織成了四五分長了。比起我們鄉下的手工業來，真真是別於天淵哩。

看機者都是年青的女子，約莫都在廿歲左右的光景，她們穿的是些土裝的粗布，每個頭髮都像剛從床上起來似的凌亂，但是他們的臉容反呈著睡像的悲臉憂腦，她們赤著雙腳，連鞋子都沒有穿著。當她們發覺我們站在她們的身邊時，總遠見不到她們有些興奮，仍是死沉沉似的像機器人。

軋軋的紡織聲，依然不斷的振動我們的耳膜。我們又進紡織間，這裡的空

---

<sup>175</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第三期，頁 2797

氣，更是污濁；地面上，機器上，積了不少的棉絮，尤其是她們穿的衣服上，頭髮上，也附黏著，彷彿間，想起當在上海時看雪景。

一會，又穿入發動機及染布間，這些工作多屬男工的，他們說是忙腳忙手的，把我們的眼睛都弄花了；不知怎的，由他們那滿身滿面污染了黑色的車油，以及染料，再配上那染布間的一切背景，真容易把他們來誤認也是一部份的染布機。<sup>176</sup>

這種將「我們」、「她們」、「他們」全都疏離化、他者化的描寫，不僅凸顯出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在空間與身份上的隔膜，而極致壓抑情感的敘述之中，也無端構築了一種無聲的暴力，襯托出深沈的悲涼。「尤其是她們穿的衣服上，頭髮上，也附黏著，彷彿間，想起當在上海時看雪景。」這段看似情緒恍惚、毫無關心的比喻，實則精準體現了一種「冷感」的美學策略：將女性工人的髒污與棉絮比擬為「雪景」——這種形式上的優雅譬況，彷彿壓抑並消解了現場的勞動痛感與肉身疲乏。在冷漠無造作的筆調之中，行文悄悄拉開了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的距離，不動聲色，殘酷冷豔。這種敘述技巧不只是「去自我化」，更是一種「冷漠化」的高階筆法，其以近乎機械式的觀察與陳述，凝結出文本內部的悲觀張力。最後的「真容易把他們來誤認也是一部份的染布機」，堪稱全篇文眼，在無力反抗的語境中，人物已默默地異化，終為整座龐然生產體系中的，一小部機零組件。這種冷靜而簡約的書寫語調，顯然有意操縱讀者的閱讀心理，使其在閱讀過程中，恍然驚覺自己是否也置身於某種社會的暴力結構中。

然而，作為一名經歷留學與啟蒙的知識青年，薛崇武筆下所展現的，並非全是壓抑，如《顯影》第十四卷第一期所刊之評論〈我對於「新詩」〉，篇幅不過千餘言，卻充分且幾乎是衝動地，表達了他對社會的深刻考察與嚴厲批判。開篇先謙言自己本非詩人，卻因時下報章副刊的「新詩」熱潮鋪天蓋地，遂生若干感想，其認為詩之要旨，並非靈感、幻感的自我抒發，而為時代產物，是「客觀事物反映於詩人腦海中的實感形象」，並肩負指導與改革社會生活之職能；換言之，

<sup>176</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五卷第四期，頁 2934-2935。

詩歌不只是藝術形式，更應成為情緒與社會結構碰撞下所產生的動員工具。薛氏進一步指出，新詩之「音節」應從內容自然流出，必須貼近生活經驗、具有朗讀與鼓動性，且應借助歌謠形式，避免走向虛偽、口號與菁英品鑒的方向；這些主張，不消說是隱含了左翼文學中重要的群衆化視角——「把自己化為大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詩論的後半段，文章語調迅速轉為激昂，明言「詩是武器的文學中的炸彈」，並將當時的中國社會描述為「革命的前夜」，呼籲詩人必須「加緊歌頌風暴的偉大的時代」、「無留情地暴露滲酷的榨取及血腥的欺騙」。最要緊的一句「除了全球六分之一的蘇聯」，「帝國主義」和「中國社會」都需要「變革」，當此，其文藝觀念所暗蘊的政治調性已不言而喻。<sup>177</sup>

由此觀之，此篇詩論不僅展現出清晰的左翼思潮，也昭示了在《顯影》的刊物體系內，除了在地化的《濯巖》，尙仍存在一條更具「理念化」傾向的文藝實踐路徑。此路徑的具體表現，可見於《顯影》的另一副刊《點心》之中。該刊發行自

---

<sup>177</sup> 為保史料與參考性質，筆者謹將薛崇武〈我對於「新詩」〉一文涉及左翼思想之部分列錄如下：「……詩和一般文學一樣，不僅是社會生活的映畫，而且負有指導及改革社會生活的任務；它與其他文學所不同之點，不過在形式有如音節韻律等的區別，即於內容上也有他底存在的特殊性。總之，詩是赤裸裸地把人類對現實社會的認識和作用在情緒的本質的波動中表現出來，能深刻的觸到人的核心，能猛烈地敲動讀者的情緒，能迅速地得到反響；他是武器的文學中的炸彈。新詩要以人類社會的客觀創作現實作背景，它要負著一種滲透在變革社會的動力中，推進歷史的發展和人類的向前的積極性的任務……該借重於音樂性，鼓動性，普及性，更該借助於歌謠而創造出更多樣性的形式，相反地，如果內容是虛偽的，感傷的，口號的，堆砌古典而專供一部分所謂讀書人鑒賞，把大眾離得遠遠的，盡管你煞費苦心，機械地去規定什麼頭韻中韻和腳韻，總永遠合不上社會大眾的胃口。詩人不是生出來就超人的，他也是社會活動的一員；他只有敏感的頭腦，進步的可能的理想和豐富的想像。他看到人群受著難堪的飢寒，殘酷的剝削，暴力的屠殺，便滲合著淚，湧起熱性鼓起勇氣去詛咒去狂歌那殘酷的社會的現實，去揭露那社會的缺點和惡罪，及去指示那社會應走的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最後掙扎的帝國主義，為要暫時緩和內在的矛盾，對於半殖民地的中國以及各弱小民族除加速度的剝削和壓榨外，更醞釀著甚至已有在進行著瓜分及獨佔。自九一八以來，中國便是奄奄一息了，更加內部的年年的天災人禍，農村破產，都市金融的恐慌，失業群眾的加多，飢寒和死亡支配了整個民間，在這帝國主義到發達到需要批判和中國社會以及整個世界（除了全球六分之一的蘇聯）的變革的現時代，是一個異常動亂的時代，是革命的前夜。在這非常時代，社會下所產生來的大眾的情緒是異常緊張而跳動的，而這緊張跳動正是這變革現時代的原動力。就趁這時候努力吧，新詩人！我們要加緊歌頌風暴的偉大的時代，我們要無留情的暴露滲酷的榨取及血腥的欺騙，我們要虔誠的啓示偉大的必然到來的新時代。」刊載於《顯影（Shinning）》第十四卷第一期，頁 2749-2750。

《顯影》第十三卷第一期（1935.09）至第十四卷第五期（1936.07），凡短短六期，由「浯花文藝社」編輯，自稱「承《顯影》編者之好意」，「願借給我們這寶貴的小小的園地」。<sup>178</sup>其刊載詩作、評論，多具濃厚左翼色彩。例如刊於《顯影》第十四卷第五期（1936.07）的〈哀悼革命文豪高爾基〉，<sup>179</sup>與第十三卷第五期（1936.01）所刊之「巴、聶紀念特輯」，分別歌頌法國左翼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3-1935）與左翼音樂家聶耳（1912-1935），呈現出對革命藝術家的推崇與哀悼。<sup>180</sup>此外，《點心》中刊載的詩作往往偏向如此：「無情地鐵腕裡，會逼出一星火花：炎紅的日頭高撐在天空，光明跌到咱們的身上」。<sup>181</sup>這首新詩刊載於《顯影》第十三卷第一期（1935.09），為署名「T.T.」所作〈苦力的歌〉，除了展現出階級壓迫與未來希望並置的經典語法，「炎紅的日頭」一語則更毫無掩飾地流露了赤色信仰。另如〈嚙咨的四邊形〉亦以小民沈默之苦為喻，強烈批判右翼威權與社會冷漠。<sup>182</sup>整體而言，《點心》不僅提供一個承載左翼文藝、進步理念的副刊空間，更展示了《顯影》「大眾文藝期」，於《濯巖》的「在地化」敘述之外，尚有另一條訴諸「理念化」的書寫取徑。

## 小結

本章聚焦於「金門現代文學起點」此一命題，試圖以歷時性的視角進行文本細讀，暨而探討珠山《顯影》於 1928 年至 1936 年間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生產。故此，筆者先考察了「珠山小學校友會」成立經緯，梳理其與在地鄉民之互動情況，

<sup>178</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一期，頁 2632。

<sup>179</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四卷第五期，頁 2844-2845。

<sup>180</sup> 法國左翼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3-1935），其作品將戰爭與政治結合，展現反帝國主義、反戰的人道主義立場。其重要作品包括《泣婦》（1895）、《地獄》（1908）、《炮火》（1916）、《光明》（1919）等。1935 年，他病逝於蘇聯。中國左翼音樂家聶耳（1912-1935），為雲南玉溪市州城人，《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於 1935 年在日本意外溺斃。當時二人剛去世，《顯影》特別製作專輯紀念他們，介紹其反戰、反帝國主義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其堅持的普羅階級立場與作品。此外，該刊還刊載了三首新詩悼念，文句流露出對二人的推崇與肯定。《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第五期，頁 2707-2714。

<sup>181</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一期，頁 2630。

<sup>182</sup> 《顯影 (Shinning)》第十三卷第一期，頁 2631。

進而論述了地方文教／文藝之營造與實踐歷程。本章第一節指出，「珠小校友會」起於地方知識份子施伍的倡議，最初作為地緣／親緣情感聯絡團體，而後旨在推動地方的公共建設、激發文化思想、鼓吹現代化風氣，並協助管理珠山國民教育機構。筆者透過《顯影》史料，爬梳出該會十分多樣化的地方文教實踐：包含以「週年大會」來推動新劇演出；並積極保存傳統藝曲「南調」（南音）；甚至開辦「白話字書院」，以普及衛生、美育、文學等知識，並解決鄉民的識字問題，有利在地與離散群體之間的書信來往。總言「珠小校友會」的地方文藝／文教實踐，乃在地社群力量之凝聚，既保留傳統又兼具現代，可謂民初金門現代化歷史的中流砥柱。

以如此活潑的文化背景為前提，本章第二節參考了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的發展特徵，從白話新詩與傳統舊詩的對讀起始，追溯金門現代文學 1928 至 1932 年間「白話嘗試期」的發端，並指出：《顯影》雖然乘載著「啟蒙」與「現代化」任務，但其新詩詩體的建構路徑，猶踵中國白話新詩之後塵，沿襲傳統詩歌語言中的創作思維。如新詩〈漂泊者〉雖已能達到抒情、敍事之效果，卻未能臻至精緻與細膩；反觀〈洋客苦〉與〈憶故鄉〉等古典詩作，不僅凝練而充滿生命情致，甚至化「舊典」於「新境」，展示了節制與優美的傳統抒情語式。而從新舊詩歌的探討中，筆者特別注意到「白話嘗試期」主要的創作母題，乃圍繞在「戀曲」與「鄉愁」的交織中，此可導源於五四話語中「啟蒙」、「打倒封建」的中心理念，以及「新青年」們帶有「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創作心眼。

「白話嘗試期」中的創作者們，因主要以男性知識份子組成，故筆者決定著眼於此，透過評述他們對「封建母體」與「現代女體」的描寫，指出：《顯影》「白話嘗試期」的小說文本如〈慈母心〉、〈女學生〉、〈離別〉與〈慘痛底飛進〉，不僅取材侷限，敍事技巧也粗糙，甚至性別意識失衡。筆者以為，站在文學研究者的立場，以新眼觀舊作的時刻，必須秉持嚴謹的歷史目光，相應生產誠實的論述。本章所進行的批判論述，誠然借鑒於當代文化思潮的結晶，但當重返僑鄉現代性的情境，考察彼時地方知識份子的文藝實踐時，也應給予敦厚而全面的結論。總此，這些充滿性別偏見、心理裂痕與想像建構的稚嫩文本，或許尚顯青澀，

卻真切保留了金門現代白話文學，在五四思潮與傳統父權結構之間，踉蹌摸索的創生軌跡，及其現代性焦慮。

隨著《顯影》出刊的穩定化，一位年輕有為的珠山出洋客淡菊（薛前璧），於 1932 年 6 月的《顯影》第六卷第四期，發表了〈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一文，是為該刊之編投者，將理念目光轉向「大眾文藝期」之開端。該文站在金門「尚無報紙」的立場，並結合親炙於新加坡報業多年的辦刊經驗，提出了若將《顯影》普及為金門「鄉報」的諸多改革建議：除了增加報導來源、篇幅以外，還要增加政治性評論，甚至改革印刷式樣等等。當中，針對諸般過度煽情與浪漫化的文學活動，淡菊提出「質精」比「量多」更重要，並附上「文藝實用觀」與「文學在地化」等見解。其論述以文藝活動環境為主軸，展現了離散群體的在地關懷，卻招致現代化的菁英主義者寒冰之質疑——寒冰發表於同年 8 月的〈片言〉，詰問淡菊之建言，是否存在「取消」新詩與小說的「文學功能」之虞，該文藉機闡述其「理念化」的文學想望。總括而言，筆者在對「淡、寒論戰」八篇材料進行梳理後，指出了後續的文字交鋒，雖反映出淡、寒二人多樣化的文學見地，卻終於淪為意氣之爭。

實際上，對 1932 至 1936 年《顯影》「大眾文藝期」的報刊改革，真正起到指點迷津作用的，是淡菊〈我見〉一文。其對在地報刊文學生產活動的精闢觀點，除了提倡專欄位以引介南洋文化風俗，亦鼓吹在地與留外學生撰「學校日記」，以及紀錄民間歌謠等，其後廣獲《顯影》編投者之首肯，將其逐一實現。本章第三節接續指出，淡菊的「實用觀」與「環境說」，不啻接合了彼時中國現代文學的「左傾」現象，更與「現實主義」文學遙相呼應，諸皆反應於《顯影》的文學實踐，衍化為「大眾文藝化」的建構與流變。

因此，筆者執用「如何大眾，怎樣鄉土」的問題意識，探討了學童文藝欄《雛燕》的寓言體書寫，以及在地化文藝欄《濯巖》的社會關懷。首先，由「珠小校友會」發行的報刊《顯影》，對學童異常重視，故將之納入「大眾文藝」實踐的重要一環，乃順理成章之結果。《雛燕》開闢於《顯影》第一卷第二期（1928.10），起初作為學童以文字馳騁青春心靈的園地，然自第七卷第四期（1933.01）起，因受

到淡菊倡導，紛紛轉向以「警世」和「命運」為核心的主題，並多採「寓言體」小說作為主要體裁，如〈我對於故鄉的前夢〉與〈一個小姑娘的厄運〉等。雖曰諸般習作旨在引導童蒙之人生觀，俾在使其及早適應社會化，然亦恐致揠苗助長等弊端。



接著，筆者考索了《顯影》中最重要、亦最長壽的文藝欄《濯巖》。此中先以象徵珠山現代文藝命脈的「濯岩」進行訓詁，後因「巖」字乃更具多義與文化代表性，故定其為該欄正字。一言蔽之，《濯巖》副刊對地方與鄉土的關懷，不僅受到左翼文學思潮影響，也流衍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餘波，並直接受惠於淡菊「在地化」的文藝實用倡議。此際，在高度摻入「現實主義」之「介入精神」與「教化意義」的欄位中，經由寫實主義巨擘契訶夫的譯介，在地文學家開始力圖擺脫「白話嘗試期」的第一人稱書寫，從「村夫實話」系列雜文，到「鄉人小史」系列散文，悉逐漸走向第三人稱的「去自我化」，旨在「替集體表述」。

這樣的轉折，除了讓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風景真正「顯影」，也從各個書寫角度，實踐了兼具在地、離散與現代性的文學。如〈羅彥伯伯〉裡對南洋歸僑細膩而溫情的人物寫生，交雜著驚恐的階級性凝視，與悲歡無常的漂泊離散情境；或〈反常了〉譏諷傳統社會迷信、貪婪、威權等固陋錯縱。於焉，人心善惡不斷地過濾於現實主義的書寫，或尖峭、或無賴地揭露而出。這種犀利的筆鋒，乃至〈我對於新詩〉的詩學論文，旋又結合激昂的語調展演，將文學演繹成一場不免政治化的批評。

最末，筆者對《顯影》中的左翼文藝實踐進行了爬梳，如在〈廣西南寧染織廠的巡禮〉中，壓抑地呈現工業現代化的異化景觀，揭示無聲的暴力社會結構，顯其「左傾」端倪。此外，曾短暫刊載六期的文藝副刊《點心》，也頻頻透過「悼念文章」的刊登，以表衷於國際左翼文藝家，如「巴、聶紀念特輯」與〈哀悼革命文豪高爾基〉。又，在新詩作品〈苦力的歌〉與〈儕儕的四邊形〉中，誠已毫無遮掩地吐露對威權體制的不滿、對階級壓迫的批判，詩中明確昭示出「炎紅的日頭」是其所企望的「光明」——而這些紅色的革命星火，於 1930 年代中國各地的凋敝農村裡，早已蔓延開來，這是個不爭的事實。自是，在金門現代文學起點「大眾文藝

期」的左傾文藝作品，不僅或能視作當時中國文藝左翼的一羽，毋寧更可將其放入彼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普羅文藝思潮的波濤洶湧中。



##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完成於 2025 年暑假，適逢施伍 1924 年暑期回金倡議成立「珠山小學校友會」101 周年。在這百年間，位處中國東南沿海的這座小島，飽受地緣政經局勢的風霜，一直到「金馬解嚴」後，才得以透過各式各樣的「金門學」學術研究，讓學者們不斷重探「軍事化現代性」的方式，還返冷戰記憶政治的重溯。在得益於「金門學」幾十年來豐沛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對「軍事化現代性」的田野考掘，與江柏煒教授親力親為《顯影》，及其多觸角化的金門海外社群研究基礎，使筆者有幸與其文親炙，轉而重探民初金門的「僑鄉現代性」。<sup>1</sup>其中〈「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社會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以下簡稱〈混雜〉）一文，以「商貿型華僑」為家鄉所挹注的僑匯經濟為主軸，將僑鄉洋樓物質化展現中，帶有西方殖民意味的「文化象徵性」，視為華僑鄉紳重建地方社會網絡，以及重新樹立權威的文化資本，最終指出僑鄉社會的現代性是一種「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sup>2</sup>。

筆者受到〈混雜〉的啟發甚深，事實上本論文最初的撰寫動機，很大一部份便是試圖回應〈混雜〉一文。是故本文在將《顯影》視為多元性媒介，以「地方文化實踐」為全文主軸進行考察後，此處欲拈出的結論與〈混雜〉「所見略同」。首先，〈混雜〉指出的「混雜的現代性」無啻關乎於華僑鄉紳重建地方社會網絡的策略；再者，僑鄉現代性隨著國軍退守，戰火的來臨而被迫中斷，轉向「軍事化現代性」的建構。然而，經過筆者仔細思索，展開本文第二至第四章的撰寫後，發現「僑鄉現代性」的內涵，應更加具有在地主體性、多元性；當此，在物質體現的脈絡

<sup>1</sup> 雖筆者在第一章已引介，然為供讀者參酌所需，此處再簡述如下：江柏煒教授的〈僑刊史料中的金門〉已將「僑鄉現代性」大致梳理而出，尤其前者旨在引介當時還尚未被世人注意的《顯影》，並闡述其史料價值，詳參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 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 1 期 (2005.03.01)，頁 160-216；另，有關「軍事化現代性」的說明，同請參酌第一章，以及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07）。

<sup>2</sup> 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文化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收錄於《民俗曲藝》第 174 期 (2011)，頁 230。

外，也須重探僑鄉「文化實踐」的意義，這些文化實踐的文本史料，便來自將近五千頁的，寶貴的《顯影》。

正如史書美在其《現代的誘惑》(*The Lure of the Modern*)一書指出，國民政府在 1920 至 1930 年代於中國的政治實權，乃一種「不完全」、「碎片化」且「多元分層」的情境，是為一種「半殖民地」(semicolon) 狀態，<sup>3</sup>這種狀態不僅言明了在 1920 至 1930 年代間「封建主義已被用力撬開，資本主義仍未全面敞開」之混雜的社會形態，也更加精準地將中國與其他正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國家區別開來。換言之，中國從未存在過一個中央殖民政府來管理遍佈全國的殖民機構，此外，中國在語言上保持完整性的事實，<sup>4</sup>更確切證明了在民初中國的語境下，任何他國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 其實都並不完整。<sup>5</sup>

史氏進一步指出，在「半殖民地」狀態中的中國知識份子，為了尋求對中國現代化的解答（便即尋求「啟蒙」，乃至於「德、賽」），在面對「西方現代性」的當下，民族主義與文化主體性需要先「擱置不談」，而不是「完全拋棄」。在本文第二至第四章對金門僑刊《顯影》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這些在地的知識份子雖然一面透過許多社論文字以引入「啟蒙現代性」，然另一面卻大談特談民族主義，甚至秉持「『家』『國』攜手」的策略，堅定在地現代化的論調；換言之，在以「珠山小學校友會」為同人中心的地方文教實踐組織中，積極引進西方文化現代性的「主導權」，看似並不是華僑商紳，而是地方知識份子。此際，以僑匯經濟為資

<sup>3</sup> 必須澄清的是，德國後殖民學者歐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1952-) 指出，這個術語起源於列寧，隨後被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發展整合進「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理論」之中。而另一項由孫中山創造的詞語「次殖民地」(subcolony) 則以民族主義立場強調中國「受到不僅一個國家壓迫，而是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壓迫」。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都是用來修正「殖民主義」(colonialism) 對中國語境「無力描繪外國力量競爭，和中外之間多層次的支配關係」的局限性。史氏則補充，這一方面他的看法與柯恩 (Paul A. Cohen, 1934) 將中國語境下的殖民經驗描述為「部分的、多元的和多層次的」見解相同。則參見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 (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02)，頁 36-43。

<sup>4</sup> 甚至已經透過「中央」政府的政策，將「北京標準語」擴散到全國。

<sup>5</sup> 在此借用史書美之概念，「中國語境下任何他國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 其實都並不完整」，筆者認為最完美的體現便是日本軍國主義扶持的傀儡政權「滿洲國」。

本所提倡並推廣的現代性建設，在《顯影》作為多元化媒介的實踐中，透過通訊欄的募款消息、校舍建築的倡建廣告、面向海內外讀者的社論呼籲、實業諮詢，乃至於開設「文化建設獎券」以募款，種種以「地方現代化」為中心的推動，雖以「僑匯經濟」作為主要資本來源，但透過本文的考察可發現，「在地群體」接受「離散群體」所帶來的「僑匯資本」之過程，在《顯影》中所呈現出的，乃經由另一套關於「社群建構」的故事所成型。

換言之，民初金門僑匯經濟，與跨國／跨地互動網絡的內在邏輯 (internal logic) 與關係性 (relationality)，本身就是是在地、離散與現代性之間的不斷互動交織。具體而言，本文第三章第一節「跨國／跨地互動的媒介」已指出，《顯影》「從鄉訊到僑刊」的自我定位軌跡，體現了同鄉血緣組織對地方文化、教育、實業建設的投入，更見證了近代金門僑鄉，從地方宗族社群到全島共同體的想像，最終生成了跨國／跨地方的「金僑社區」 (Quemoyian sojourner's community)，這個共同體並非物理上的地方 (space)，而是在全球化、印刷資本主義化時代下，所構築的跨國／跨地社會空間。這樣的實踐除了反映出地方官辦政府在管理上的無能，<sup>6</sup>而跨國主義術語的「互惠性」 (reciprocity) 可用以解釋，<sup>7</sup>這種離散群體對家鄉建設的資本挹注，應來自他們對僑居地生態棲位 (niche) 的維穩與綑繆。<sup>8</sup>而這，正也回過頭來說明了「僑匯」作為象徵性資本的「回流」，並非僅僅停留於情感層次或樹立權威，如本文於第二章第二節「刊物沿革及其迴響」所爬梳的「月月運動」，以及第三章第二節「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媒介」所分析的「捐款芳名錄」；諸般皆又可重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資本的形式〉 (*The Forms of Capital*) 中所揭橥，可見無不展示了僑匯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的

<sup>6</sup> 姚婷，〈僑刊參與華南僑鄉社會治理的實踐初探〉，《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2017年3月第一期），頁29-37。

<sup>7</sup>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67-568.

<sup>8</sup>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頁73-76。

轉換。<sup>9</sup>



本文的另一項任務則旨在探索《顯影》中所呈現的僑鄉文化，及其現代性內涵，如第三章第三節分析《顯影》作為「新文化與新思想的媒介」，筆者便即嘗試將 1928 至 1949 年僑鄉金門，定位於近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轉型期，並置回「後五四」的文化史語境，再鎖定地方知識分子如何以「反傳統主義」為批判基調，將「在地實用化」的觀點娓娓道出。當此，《顯影》作為一種重建生活方式與思想秩序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其開展論述批判之同時，豈能不考慮實踐的可行性？如在「金門風俗談座」專欄中，即可見在地知識份子並非企圖「毀滅」傳統舊俗，而是先引進其在外留學時所理解，再構築一套「何謂文明、何謂落伍」的區分體系，加之以層層論述，演述其深刻關懷。

不過筆者亦相信，五四思想於金門的傳播與詮釋，並非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學舌，<sup>10</sup>正如柯恩（Paul A. Cohen, 1934）在其「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框架中提醒我們，現代化研究應避免將特定的敘事結構視為「重述」與「再現」。<sup>11</sup>施繆爾（Shmuel Eisenstadt）則進一步指出，現代性規劃的特質首在於「人」對「自主性」（autonomy）的強調，亦即「人」從某一傳統和文化權威的鐫銬中解放出來，並秉持著對社會政治秩序的「自反性」（reflexivity）與探索精神，有意識地著手於積極的政治社會改革。<sup>12</sup>故此，筆者特別關注《顯影》中那些不蹈五四新文化運

<sup>9</sup>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241-258.

<sup>10</sup> 這點當可參考劉禾（Lydia H. Liu）的《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一書中對中國現代文學話語中跨語（跨文化）際「翻譯」的過程中，所隱含的權力關係之探討。參見劉禾（Lydia Liu）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03）。

<sup>11</sup> 參見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 99；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02）頁 13。（按：「孔飛力」為中國與香港慣常用法，事實上 Philip Alden Kuhn 即臺灣出版界所稱之「孔復禮」，本處為與所引用之出版社的譯名間保留一致性，是以著意襲沿）

<sup>12</sup> 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Dominic Sachsenmaier）等編，郭少棠、王為理譯，《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的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頁 29-33。

動的舊軌，而是在具有「離散情境」的狀態下，透過富含「在地性」意義的表述，闡發其對於「現代性」的感思。

舉凡由施伍帶頭討論的婦女議題，雖然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等諸多先聲，然此處先是乍見澤人於〈關於婦女解放的幾點管見——獻給吾珠婦女〉一文，題已旨焦於「吾珠」，後又結合自身對社會心理學「自我」(self) 的體而闡述其說；而施伍〈五年來的金門婦女〉一文，則更加點出僑鄉社會婦女的特殊性處境：金門家長為女性提供新式教育的環境，並非真正反映出他們對女性地位的在乎，而是為了提升她們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資本，好嫁與事業有成的華僑。另如淡菊所發表之〈金門應實行農村教育〉，文中是如何一步一腳印地著眼於金門在地的農業發展而談；與此同時，淡菊刊登在《顯影》的諸多文藝、雜評，不啻反映了一種心態：「身在離散，心在故鄉」。淡菊身為新加坡「成功的番客」代表，卻從未在任何文章中顯示出成功者的驕矜氣，反倒以古典詩〈憶故鄉〉，傳遞對珠山的珍視之情；乃至其發表〈對於顯影之我見〉，寫來不卑不亢，執筆不疾不徐，惟竭誠提供南洋辦報多年的經驗與觀點。這種心態當返照鑑於惕齋〈對洋客們談談幾句〉所昭示：「出洋」是一種出於無奈的生涯抉擇，「在地」當須展望「現代化議程」，始為根源性正解。總言筆者諸般對《顯影》文章的回顧，可發現無論是在地或離散的知識份子，都從不過度神化「下南洋」的美好，更諄諄誠示著鄉人們不可過度依賴僑匯，而要致力於家國的現代化，以樹立「新村」之可能。<sup>13</sup>此際，又無端想起那句金門俗諺：「六亡、三在、一回頭」，多麼銷魂的警世。

考諸《顯影》展演的「在地化」風景，除了關注知識份子的現身說法，也不得忽視布衣鄉民的參與。是故，本文第四章探討了最初作為地緣／親緣情感聯絡的團體——珠山小學校友會之成立經緯，而後如何推動地方文教／文藝之實踐。此間，綰合民國初年的國民教育發展並觀，便可知所謂的「校友會」，並不單單

<sup>13</sup> 以「新村」來指稱珠山在地的現代化構想，可參考澤人，〈我對於珠山的新村展望〉，《顯影 (Shinning)》第八卷第六期，頁 1925-1928；第九卷第一期，頁 1979-1980；第九卷第二期，頁 2009-2011。

僅作畢業校友之感情聯絡組織；易言之，在缺乏國家官方資源的情形下，在地小村唯有事必躬親，才能賡續其文教命脈。校友，不只用作地方社群的代稱詞，更象徵著一群有能力、有責任的智識階級，其中如施伍、薛崇武等人，更是受過高等教育，熱心服務鄉里的教育家。更有甚者，他們不僅是私立小學的幕後操持者，也是推動「大眾」文教風氣的吹號者；其所實踐者，更體現於文藝、體育、歌舞、戲劇、南調、白話字，乃至於《顯影》。從施伍〈珠山運動空氣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更可看出，「現代性」並非一傳衆咻，而是在「校友們」循循善誘下，才得以逐步擴展。

透過筆者以上針對當時金門社會文化、文教環境的爬梳，得以進一步歷時性地針對發生於 1928 至 1936 年的金門文學活動與文化生產，將肇始於 1932 年的「淡、寒文藝論戰」作為中心點，擘劃為下列二期，以期能動態化地「顯影」出「金門現代文學」之起點：

(一) 1928-1932：白話文學的嘗試與摸索（白話嘗試期）

(二) 1932-1936：文藝大眾化（大眾文藝期）

「白話嘗試期」，其反映出的文學現象類似於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內容涵括白話新詩（現代詩）、舊詩（古典詩），白話散文、小說、雜文（評議性文字），其中，新舊交雜的詩體實踐，反映了新詩承襲自中國傳統詩歌「近取譬」的創作思維，內容以「戀曲」、「鄉愁」，抑或二者交織為主。延及散文、小說，除了多半也採上述主題，也旨在模仿「新青年」之「打倒傳統禮教」的精神，筆致浪漫、煽情、張揚自我，充分展現了「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文學心眼。

「大眾文藝期」，受到了淡菊「文藝實用觀」，以及「現實主義」文學觀影響，筆者爬梳了《雛燕》所代表的學生文藝，與《濯巖》所實踐的在地鄉土文藝，並發掘其特徵相較於「白話嘗試期」多採第一人稱，此時紛紛轉向了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轉往描寫典型化，以及在地的小人物，並展現其文學的「介入精神」與「教化意義」，象徵著文藝觀點由「替自我抒情」走向「替集體表述」的意識變化。

總言 1928 至 1936 年間，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浮現，不僅象徵著在地、離散與現代性交織而成的文化實踐，結合第三章所論及的現代化與媒介實踐，筆者也擘劃了一種基源於全球地域視點的「文學現代性」(literary modernity)，其不僅關乎於「啟蒙」、「現代」，亦進行了一場跨文化的對話 (cross-culture dialogue)：如「椰影留連」專欄所描繪的南洋原民文化，或是透過《濯巖》的大眾文藝實踐，透過俄國文學所帶入的「現實主義」觀點。不過，這樣的探討，仍然存在許多未盡之處。關注金門現代文學起點的生成，除了如本文取道於中國五四新文學傳統以降的研究碩果，以「同時性」的史觀，並置此二主軸的發展趨勢，我們是否還能夠再進一步更深入地探討：有關《顯影》相關編輯者、投稿者，他們是否真正形塑了具體可掌握的文學社團組織？而這些文學社團組織是否僅以「珠山」，以《顯影》為主舞臺來呈現？在同時的金門，是否還存在著更多可關注的文學社團組織？此外，以金門文學組織為中心的文學關係網絡，又是否還能透過其他相關史料做出更加細緻的考察？如：當時一衣帶水的文化重鎮——廈門——從本文的爬梳中，已稍稍可看出其與金門政經，乃至於文化知識場域的互動似乎甚為密切，這一方面是否也可納入研究範圍，甚至拓展其他的考察面向？筆者相信來者可追，或許金門文學的起點，還能被推向一個更加燦亮可觀的研究視界。

## 參考文獻



### 一、報刊與史料

《上海律師公會會員錄》（上海：上海律師公會，1936）。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

江柏煒編輯，《顯影（Shinning）》（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2006；原 1928 年創刊，現重印，全套 21 卷 25 冊）。

施伍編，《浯江》月刊（金門：金門建設協會，1934-1935，現存 11 卷期）。

珠山文獻會，《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

陳獨秀主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海：群益書社，1917.04）。

趙景深，《天鵝歌劇》（長沙：商務印書館，1928.10）。

### 二、專書與著作

Coppel, Charles A.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owan, C. D., and O. W. Wa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Cohen, R.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 Routledge, 2008.

Ember, Melvin, Carol R. Ember, and Ian Skoggard, eds.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Springer, 2005.

Foster, Hal,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Habermas, Jü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Hsu, Madeline Y.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ůšek, Jaroslav.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Thompson, John B.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eber, Max.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Irving Velody with Herminio Martin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國史館編印，《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06）。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編，《左聯論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1994）。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1998）。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Mike Crang 著，《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方亞先，《金門情深》（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06）。

王志弘譯，Tim Cresswell 著，《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

王錫榮，《“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7）。

孔復禮（Philip A. Kuhn）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新北：臺灣商務，2019）。

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麥田出版，2021.02）。

田本相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年）。

可兒弘明、游仲勲編，《華僑華人——ボーダレスの世紀へ》（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1995）。

布魯克斯（Peter Brooks）著，朱生堅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慾望對象》（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04）

史帝文·貝斯特（Steven Best）、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翻譯，《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5.08）。

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02）。

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通史·中華民國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08）。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李康、李猛譯，《社會的構成》（臺北縣：左岸文化，2002）。

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

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Dominic Sachsenmaier）等編，郭少棠、王爲理譯，《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們的闡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

江柏煒，《新加坡的出洋客》（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1.12）。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0.08）。

- 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1997）。
- 李金生，《雞庵山頂談珠山歷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1998.07）。
-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02）
- 李明歡主編，《福建僑鄉調查：僑鄉認同、僑鄉網路與僑鄉文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 李怡，《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10）。
-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96 年續修》（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9.12）。
-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臺北：麥田出版，2013.11）。
- 李罡主編，尤靜波著《中國流行音樂簡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09）。
- 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07）。
- 李歐梵，《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12）。
-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 李建緯，《金門地區傳世總宗畫像普查與研究計畫・結案成果報告》（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21）。
-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文化，1990）。
- 周策蹠、唐德剛、李孝悌等作，《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05）。
- 林麗寬主編，《中華民國八十六年金門縣珠山社區總體營造采微成果專輯》（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06）。
- 奈杰·達德（Nigel Dodd）著，張君玲譯，《社會理論與現代性》（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邱進主編，《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林正珍編著，《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

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上）》（新北：花木蘭文化，2015）。

林毓生著，楊貞德等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新北：聯經出版，2020.09）。

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5）。

南京大學中文系編，《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60.03）

洪乾祐，《金門話考釋》（臺北：稻田，1999.05）。

洪乾祐，《金門話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12）。

胡全章，《近代中國報章之興與文體之變》（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08）。

唐蕙韻，《金門民間傳說》（金門：金門縣政府，1996）。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頽廢、媚俗藝術、後現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夏曉虹、王風等著，陳平原主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0）。

馬森，《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12）。

馬新國主編，《西方文論史》（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1）。

郭哲銘主編，《金門古典文獻探索》（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0.07）。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蘇國勛、覃方明、趙立璋、秦明瑞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08）。

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07）。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9）。

班國瑞（Gregor Benton）、劉宏著，賈俊英譯，《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僑匯（1820-1980）》（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2.02）。

陳奇中主編，《金門學概論（增修版）》（金門：國立金門大學，2022）。

陳炳容、吳秀琪，《古地圖與金門史研究》（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22）。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陳信宏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新北：衛城出版，2024.05）。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

許晚成主編，《上海百業人才小史》（上海：龍文書店，1945）。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

陳志明、張小軍、張展鴻編，《傳統與變遷——華南的認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08）。

張鳴，《農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07）。

國立編譯館主譯，Richard Peet 著，《現代地理思想》（臺北市：群學，2005）。

許乃蠡主編、唐蕙韻整理，《金門民間文學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

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04）。

莊國土、劉文正著，《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09）。

許振義編，《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2015.03）。

陳琮淵、黃日涵編，《搭橋引路：華僑華人與“一帶一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陳成基，《風車今昔·上李流風——埔後村史》（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20.11）。

張亮主編，《盧卡奇研究指南：第三卷·審美與本體論：後期盧卡奇的理論體系構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08）。

喻本伐、熊賢君著，《中國教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5.12）。

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著，郭建玲譯，李歐梵編《抒情與史詩——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12）。

黃瑞祺主編，《當代社會學》（臺北：東華書局，2011）。

賀麥曉（Michel Hockx）著，陳太勝譯，《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1）。

溫塞特（William K. Wimsatt）與布魯克斯（Jr. Cleanth Brooks）著，顏元叔譯，《西洋文學批評史》（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05）。

楊樹清，《金門族群發展》，（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01）。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倪偉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04）。

楊秉訓，《湖下村志：湖清峰翠慶雲出》（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22.11）。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2003.09）。

潘翎主編，崔貴強編譯，《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8）。

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2）。

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04）。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7.01）。

劉乃慈，《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09）。

劉研，《契訶夫與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01）。

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文學術語新詮》（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9.11）。

劉禾（Lydia Liu）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第三版修訂譯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8）。

靜宜大學中文系主編，《2003 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著，《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

謝明珊譯，Couze Venn 著，《後殖民的挑戰：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1.05）。

聯經出版公司主編，《聯經思想集刊①》（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5）。

顧秀蓮主編，《20 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8.10）。

### 三、單篇論文

#### （一）期刊論文

Guo, Shibao. "Reimagining Chinese Diaspora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Toward a New Research end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8, no. 4 (October 25, 2021): 847-872.

Faist, Thom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COMCAD Working Paper No. 8. Bielefeld: Center o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Development

(COMCAD), 1998.

Taylor, Charles. "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5, no. 2 (March–April 1995): 24–33.

Peter Kivisto,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4 (2001): 549–577.

Jonathan Grossman, "Toward a Definition of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2, no. 8 (2019): 1263–1282.

Greiner, Clemens, and Patrick Sakdapolrak. "Translocality: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Emerg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Geography Compass* 7, no. 5 (2013): 373–384.

黃瑞棋，〈現代或後現代——紀登斯論現代性〉，《東吳社會學報》第六期（1997.03），頁 287-311。

梅偉強，〈富有特色的“集體家書”——五邑的僑刊鄉訊〉，《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一卷第三期（1999），頁 72-76。

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收錄於《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71 期（2002），頁 120-131。

陳麗園，〈近代海外華人研究的跨國主義取向探索——評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03），頁 70-75。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收錄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六期（2008.12），頁 29-90。

楊弘任，〈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第 49 卷第 4 期（2011.12），頁 5-29。

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 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第 17 卷 1 期（2005.03），頁 159-216。

江柏煒，〈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 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收錄於《民俗曲藝》第 156 期（2006），頁 85-155。

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文化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收錄於《民俗曲藝》第 174 期（2011），頁 185-257。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收錄於《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期（2014.09），129-187。

江柏煒，〈“兩座島、一群人”：1949 年以前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跨境運作〉，《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七卷第二期（2015.12），頁 1-28。

江柏煒，〈近代菲律賓金門移民社群及其文化變遷：以鄉團及家族為主〉，《海洋文化學刊》第十九期（2016.04），頁 67-116。

蔡博方，〈報刊現代性與公民身份：以《申報》為例的反思〉，《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第 2 期（2016.07），頁 144-145。

姚婷，〈僑刊參與華南僑鄉社會治理的實踐初探〉，《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2017 年 3 月第一期），頁 29-37。

黃克全，〈一座島嶼的滄桑與現代——金門文學芻議〉，《國文天地》第 34 卷第 2 期（2018.07），頁 12-14。

馮加漁，〈民主的多重面向：杜威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中文譯名的世紀流變〉，收錄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 37 卷第 2 期（2019），頁 29-36。

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172 期（2019.04），頁 32-42。

平田昌司，〈胡老師的〈終身大事〉——從「游戲的喜劇」到「社會問題劇的濫觴」〉，《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九卷第三期（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9.09），135-147。

林平、林東余，〈為什麼合作不容易？二十世紀初期荷印華人政治的一些推測〉，《民主與治理》第 8 卷第 1 期（2021.02），頁 31-57。

張堂錡，〈走出“雙城記”——“地方”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探索與爭鳴》總第三八七期（2022），頁 70-73。

蔡孟哲，〈現代性的重構：評《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收錄於《文化研究》第 36 期（2023.04），頁 405-411。

江柏煒，〈臺灣海峽的關鍵島嶼：金門及其現代史的啟示〉，《展望與探索月刊》22 卷 5 期（2024.05），頁 45-60。





## （二）學位論文

林宏信，〈觀察 1990 年代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為觀察對象〉（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袁興言，〈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07）。

謝佳玲，〈《顯影》中金門番客故鄉感形構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07）。

余懿珊，〈金門意識與地方敢形塑：以「僑鄉文學」之建構為例〉（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李鴻駿，〈浯島在他方：金門學的「協商政治」與文學建構〉（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李昀駿，〈《顯影》敍事中的金門治安、公共衛生及地方意識的浮現〉，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22.07）。

## （三）專書論文

川島真，〈金門的軍事基地化與僑鄉因素的變遷：1949 年前後的連續與斷絕〉，收錄於楊加順總編，《2008 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烽火僑鄉、敍事記憶——戰地、島嶼、移民與文化》（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8.11），頁 207-220。

王怡超，〈民匪共處的小區盜賊經濟圈——從珠山《顯影》看 1928~1949 年間金門盜賊事件〉，輯於陳益源主編，《2012 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立文化局、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2.12），頁 235-250。

黃美娥，〈反共抗俄時代的金門文藝論述——以《正氣中華》為分析場域（1949-1964）〉，陳益源主編，《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4.12），頁 53-81。

## 四、網路資料

Ashley Crossman, "Definition of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oughtCo*, January 18, 2021, (來源：<https://www.thoughtco.com/opportunity-structure-theory-3026435>，檢索日期：2024.05.04)

薛前璧（薛殘白、淡菊），〈給侯君長樂〉，《南洋商報》，1930.09.01，第二十版，搜索自「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NewspaperSG 資料庫」（來源：<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300901-1.2.46.5>，檢索日期：2025.07.07）



雲鶴，〈性的新道德之基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雜誌》資料庫》（來源：<https://mhdb.mh.sinica.edu.tw/fnzz/>，檢索日期：2025.07.07）。

金門縣消防局，〈義消人員介紹〉（來源：<https://kmfb.kinmen.gov.tw/cp.aspx?n=5372310519D558A8>，檢索日期：2024.07.05）。

薛芳千，〈緬懷賢達顏西林〉，《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17048>，檢索日期：2024.07.05）。

李金鏞，〈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消防局表彰顏西林生前傑出貢獻〉（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17070/>，檢索日期：2024.07.05）。

王先正，〈閩王祠的故事〉，《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254623?cprint=pt>，檢索日期：2024.12.27）

江柏煒，〈文化漫遊者：藝文創作家施伍（薛永麥）〉，《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 2019.09.23，第六版（參考自：<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310596>，檢索日期：2025.07.07）。

劉婷婷、黃瑾，〈他創辦了廈門大學，組織華僑支援抗戰，被毛主席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來源：<http://www.chinaql.org/BIG5/n1/2021/0326/c437203-32062110.html>，檢索日期：2025.05.24）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中心，「漢語多功能字庫」（來源：<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B7%96>，檢索日期：2025.06.26）。

## 附錄一 淡菊〈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sup>1</sup>

(星洲通訊)



顯影編輯先生：

我在忙到尿流屎滾，連情書也無暇去寫的當兒，忽然執起筆來寫信給你，而且要你把牠刊諸顯影，那些正人君子之流一定會罵我在舞文弄墨、想出風頭，我可以當地發誓，我實在沒有這不必野心的野心，假使是想出風頭的話，在這縱橫不過三十里的金門，也沒有多大的風頭可出，更何況我們大家都是相親，誰半斤、誰八兩，都明白而且了然的。

接到第六卷第二期的顯影，才知道蟄伏南國的浪人，居然也會得到先生的垂肯，要他「時賜大論」，唉，我是如何的抱歉而感激涕零呢？似我這年紀輕、經驗少、腹中又是墨水毫無、瘦零零的人，「小論」還恐「貽笑大方」，哪裡有怎來「大論」可以著之竹帛，以光顯影的篇幅呢？可是先生既然有意于我（這裡所說的有意，並不是男性對於女性，或男性的所謂「落花有意」，或其他匪夷所思的怎末「意」，請先生不要誤會，特此聲明），那末，就得關於今後顯影，應興、應革的事宜，以一己之見，敷陳於左，先生如以為可以採納而施行之，還請採納而施行之。

### (一) 曰：多著時評，以啟迪民智也

沙漠也似的寂寥的金門，報紙之創辦尚付缺如，無所謂輿論，更無所謂代表民意之輿論，以故一般人們對於外寇之侵凌、軍閥之跋扈、黨政之大計，以及一切有關國是之策略，皆莫由知。雖知而能辨其是非得知者，亦堪乎其少，遠者姑不具論，如最近倭寇在滬之暴行，搜金門來客云，金門空氣沉寂死靜一仍如故也，金門民眾醉生夢死亦一仍如故也。嗚呼！際此國家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而民眾之

<sup>1</sup> 原為手寫油印，為俾當代史料資訊化，此歸納繕打自《顯影 (Shinning)》第六卷第四期，頁1373-1380。

表示也如此，是烏得不令人流淚長太息者乎！雖然，金門如是之沉寂，其原因不一而足，然而一切事物無報紙之宣揚、輿論之啟迪，實為主因。今之顯影，雖非金人正式報紙，然而稱之為鄉報，於情於理亦得其宜，既名之為報矣，著論立說為不可少之事，故菊期望而今而後，先生能負起新聞記者之天職，而作鄉事、島事，以及黨國大事之評論，使一班人有深切的瞭解，俾免是非不明、以白為黑，設或先生精神有限，不能兼籌並顧，不妨請能文之鄉親或各處之文人為文幫忙，則後此之顯影前途庶有光明之望也。

### （二）曰：改良文藝，俾切于實用也

現目顯影之文藝，言其量固洋洋灑灑、無慮千言，論其質則又似乎尚未臻於真善美之境也，揆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之義，不可背道而馳乎，故為補救此項弊端起見，可請留外學生將其寫不甚需要之小說或新詩，而改為寫其學校日記或金門歌謠，抑或請各僑居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等，則較以前連篇累牘之小說及新詩，其切于實用，何止霄壤之差也。

### （三）曰：增加島聞，使顯影普及于金門也

夫新聞為報紙之靈魂，微新聞，則報紙將無事可報矣，顯影雖謂為吾鄉之報紙，然在金門尚無所謂報紙之時期，不妨擴大篇幅、增加島聞，使金門人有讀報之機會，至其辦法：

（A）請各鄉學校教員，將其所在地所發生之新聞筆之于書，寄交顯影社，而以每期出版之顯影為酬報。

（B）後浦為金門黨政及人才的切合，一切事物之發生必較各鄉為多而重要，須請一有新聞學識之訪員供給新聞（每月之薪水可酌情形而定，或以新聞之多寡而計值）

（C）在可能的範圍內，先生最好親自出馬向各方搜集新聞（這種辦法，似乎離開事實太遠，但是各鄉親如肯踴躍認捐款項的話，那也不是難事）

以上所述，特舉其肇肇大者，其他如排印鉛字以求美觀（抄寫不惟麻煩，而

且糊塗不明)、新聞寫法需加考究(新聞寫法最好參考上海時報，或購買關於新聞之書籍)，惟望先生能在在加以努力而已。

順奉五元，以為顯影紙費，區區此數「羞人答答」，不過忝在鄉親，請勿以其少而小之。

廿一年五六日寄自新嘉坡



## 附錄二 寒冰〈片言〉<sup>2</sup>



余對目下顯影文藝亦表示非常不滿，現該欄中一切組織及取材即有改善必要，尤其於小說及新詩方面，現為讀者與該刊價值起見，實使余終不能沈默而無一言。康君於六卷四期顯影曾發表一篇最值得吾人注意之文字，其意略謂該刊之採用文藝欄係欲增加頁數而已，吾人在此時方明白該刊為何附設文藝的目的。

又淡菊君一對於該期顯影公開之私信題從「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其中對於文藝欄方面亦曾發表若干意見。先曰：「可請留外學生將其寫不甚需要之小說或新詩而改為寫其學校日記或金門歌謠。」再曰：「抑或請各僑居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等，則較以前連篇累牘之小說及新詩更切實用，何止霄壤之差也。」淡菊君於小說及新詩之前加以不甚需要等字，余不知淡菊君之意是否指一切新詩及小說均不甚需要？或留外學生因學問關係無寫小說新詩之資格？定寫不好，故雖寫，亦不甚需要？或留外學生日太藐視顯影，故欲投該刊之小說及新詩均故意寫不甚需要者？此為本問題中之當先認清的，設淡菊君意思為以前該刊所登新詩及小說均不甚需要，如此則當關係以前該欄中作品，然此一定不！因前句之請留外學生會有未來之意，是當為淡菊君藐視留外學生或藐視一切小說及新詩之問題矣。設此意屬實，深令余蘇生疑問也。此外或淡菊君以為小說及新詩對於顯影為不甚需要？然淡菊君曾在該信中認顯影為一種報紙，余生平所看過大小報紙雖不多，但大都需要小說及新詩，是均可以報紙內容證實之，然則淡菊君之所謂不需要，當又不涉有此意。

良好小說能影響個人性格或社會，是當為世人所公認，顯影文藝欄目下，投稿者大都係初試作，當然是找不到良好作品，然鄉家如能極力鼓吹本刊投稿之興味，久而久之，或不致終無成績，前淡菊君曾在該欄中投下篇「前奏曲」，其中所述意思，現於尚能記憶一二，不至如何健忘，他曾鼓吹鄉親在該欄中「唱戀歌」、「訴哀音」，該篇概當含有此意，余一時記不清楚，而且他也曾寫一首「倦遊的

<sup>2</sup> 原為手寫油印，為俾當代史料資訊化，此歸納繕打自《顯影 (Shinning)》第六卷第六期，頁1509-1514。

歸鴻」（？）之新詩，曾幾何時，何其語言動作茅盾若是也，余深不解。

余對該刊文藝主張當再努力改革，同時小說及新詩皆當保存，並宜鼓吹鄉眾極力愛護之，不可使其淪沒無聞，此後對於小說及新詩之取材，可偏重於描寫社會之暗黑，或比較能切實增益於吾人者，現尚存在於故鄉之不良風俗或習慣，盡力攻擊之，惟浪漫或空虛無謂幻想，不必加注意，余以為小說詩歌之能力，有時並不亞於評論。

淡菊君謂欲將小說或新詩改為寫學校日記或金門歌謠，此舉可不必有，因小說、新詩、學校日記及金門歌謠，都有其各自好處，金門歌謠恐怕不多，書盡時，若專寫學校日記，範圍未免太狹。

淡菊君反對新詩而不反對舊詩，但余希望該欄編輯者將不以體裁而輕動視之，凡有好稿均當為發表，總之讚美舊詩者，謂曰舊詩音韻鏗鏘，為新詩所不及，讚美新詩者，謂新詩可盡量描寫不如舊詩之太受束縛也，試觀我國現在大部分刊物，是否新舊詩體均納，但一談到顯影中所登載之新舊詩，直使一切鄉親都臉紅！

以前所登過小說及新詩，其中實有幾篇或者一概因初次描寫工夫太劣，或取材不好，致使讀者討厭，然此種現象均為鄉之太不努力於該刊建設所致，一部有文學天才之鄉親都不願意投稿，又一部不願盡力研究描寫，以致稿件缺乏，不得不將令人討厭，連篇累牘之小說及新詩均刊登以實篇幅。淡菊君以其太無成績，而思請南洋鄉親寫其所在地之土人習俗文化等以待之，其實凡一刊物材料愈多，愈表示其內容之豐富，若限制之體裁非為單調而且無味，余希望僑居外地之鄉親均樂於做此種記載，以實顯影篇幅，因此種記載將與吾人以不少之新智識，願大家注意及之，地點不必限於南洋，凡吾人足跡所到之地或見聞均可寫入，但同時對於新詩及小說並望其多所貢獻於該刊，淡菊君以其無成績而欲去之，余不贊成！願大家努力創作，使此後小說及新詩不再同樣現發生。

最後余深望淡菊君將能於百忙之中多寫幾篇與「山不在高」不相背道而馳之小說、翻譯……等以增多我們讀者的眼福。